

德賴西著
王清彬譯

政治的神話與經濟的現實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政治的神話與經濟的現實

導言

事實和想像的衝突（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五年）

法國趨向何方？歐洲趨向何方？這是現在人人都在擔心而還沒有得到解答的一些問題。

鬧得天翻地覆，叫人震驚的世界大戰把現代文明引入迷途，使得牠的主要機關不能運轉。直到戰禍完結過了六年之後，（註一）還得尋找應走的方向而設法恢復常態的活動秩序。但究竟怎樣才能達到這目的，至今還沒有人能夠預料。

大戰完結之後，局勢的不穩，前途的黯淡，較之戰前有過而無不及。在大戰方酣時，無論怎樣各國還都有一個明白的目標可資遵循。當時都把戰事想像做一個外科手術，經過這個外科手術纔能把「德意志帝國主義」這個毒瘤從世界上割掉了去。好像只要這個毒瘤一經割掉，經過一個短短的時期，就可以把因受刺激而失掉的均衡狀態恢復過來，而精力百倍地走向一個空前繁榮的時代了。

和約的草訂乃是一個必經的手續，經過這個手續之後，國際聯盟就能用和平手段來解決將來的一切糾紛

了。各國既已擺脫了專制的束縛和祕密的外交而成就了安穩的局勢，則普遍的民主政治將能得到一帆風順的發展——也只有普遍的民主政治纔能擔保各國的幸福和自由。戰鬪員們所以情願在戰場上流血捨身，其意義就在此，其犧牲的代價也就在此。

可是經過了六年的盼望和熱狂的努力，這個目的不僅沒有達到，而且好像愈來愈遠。

凡爾賽條約不僅沒有成爲歐洲的大憲章，而且遭戰敗者的拒絕，和戰勝者的懷疑，甚至連先前要求嚴格踐行此約的人們現在也開始表示厭惡了。

國聯被戰勝者所把持，幾乎成了一個審判廳，牠的權限是極端可憐的，列強只把微小的問題提交牠公斷而且判決的施行還得一任牠們的擺佈。這時，「祕密訂約」、「幕後外交」等等危險的把戲，一如以前的活躍而毫未減色，使得各國不得不負荷與戰前相同的軍備負擔，不得不擔心與戰前一樣的危機。

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使命本在擔保國內的安定和國外的和平，但牠本身既被一種極度的危險所襲擊，所以就連維護當前的，統治團體使勿顛覆的力量也幾乎都沒有了。

暫維一時的獨裁政治

戰敗者剛剛擺脫了專制的束縛，就懊惱己身的困窮，覺得自由不能供給麵包給他們，於是一往直前的走向獨裁之路。

自從莫斯科建立起蘇維埃制度之後，影響所及，到處都發生了相似的革命。這種運動由布達佩斯、維也那、索斐亞、慕尼克、柏林，一直傳播到意大利，那裏的工廠也被職工們佔據了。後來又在法國和英國惹起騷擾，甚至橫渡大西洋把移殖到美國而尚未同化的羣衆也給煽動了。

統治階級遇到這種「勞工階級的帝國主義」自然也會發生劇烈的反抗。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蒂主義（Fascismo）在意大利從容地獲得勝利。西班牙和希臘發生了軍人獨裁。霍西上將（Admiral Horthy）在匈牙利建立起多少有點立憲色彩的獨裁制，同時勃萊鐵奴（Bratiano）在羅馬尼亞，斯坦布利斯基（Stambuliski）在索斐亞也都建立了同樣的制度。在德國，於哀伯特（Elbert）和斯脫來斯曼（Stresemann）兩位政治家的背後，暗中還有一位西克梯將軍（Von Seeckt）主持一切，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蒂主義一齊制止住。在法國，不久以前，一般煽亂之徒也會把獨裁的旗號擡了出來大肆鼓吹。（原文是：召遣了索拉之神（Spectre of Sulla）按索拉爲羅馬之獨裁領袖——譯者註。）

民主政治既足以致勝於戰場，難道就不能在組織方面得到成功嗎？難道我們也得附和那些人的說法，把民主政治看做已廢的信條而束之高閣嗎？不然！不然！因爲這些獨裁制度沒有一個會採取確而不移的方式。萊佛雷將軍（General Primo de Rivera）曾宣言於六個月以內恢復秩序之後，他將要效法羅馬的獨裁領袖而息影於園林，墨索里尼固然自命爲救國者，而時時舞弄他的法西斯蒂旗號，但他始終沒有和君主立憲制度及代議制度決裂過。而且他的種種努力處處都明白地表示要把他的威權拘限於法律和習慣當中——他固然不願因

此而失掉些少的威權，那是不用說的。至於希臘的軍人們也曾把政權交給一個正式成立之共和國，而勃萊鐵奴、霍西和西克悌也都尊重代議制度。

他們都認定他們個人的權力不過是公共安寧的一個手段，只在於非常局勢之下纔需要，等到非常局勢已成過去，這手段也就取消了。他們之中，還沒有一個敢宣布他是在創始一種新的局面。只有布爾塞維克獨裁制（Bolshevik dictatorship）承認牠自己是一個確立不倚的制度，和一切因襲的方式脫離關係。這自然是由於牠幸而有一套確定的理想和主義作為合理而恰當的基礎——任何政變如要得到勝利而成為一個正式的制度，總得有這樣一個基礎纔行。牠所以會在羣衆當中樹立普遍的威望，牠所以會有其他「法西斯蒂」運動聞所未聞的擴張力量，理由就在於此。

但經驗纔是一面鑑別成敗的寶鏡。蘇維埃制度和牠的各種集產托辣斯（Collectivist trusts）把俄國的經濟弄成紊亂的狀態，這是無可辯駁的，局勢不僅沒有改進，反而愈來愈壞。蘇維埃的領袖們目擊這種國富日益凋竭的情形，不得不承認部分地回到個人主義制度——這不啻自認失敗。施行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簡稱 N. E. P.）的結果，只在於初期的時候給農業以暫時的復蘇，到了後來，不僅沒有把社會主義集權托辣斯的弊端醫好一點，反而又加上了中產階級式的種種投機的罪惡。這樣經過了七年的暗中摸索，蘇維埃的領袖們終於露出進退兩難的馬腳，他們既不能用一種新的制度來提高俄國的地位，又不能恢復舊的制度。爲要使已經凋竭的經濟恢復常態，這些領袖們只好自貶他們的聲望而求助於資本主義國家。

這些不幸的國家徘徊於無產階級獨裁制和保守的獨裁制中間，衆人的希望都集中於英、法、美三大國，因為只有她們能夠維持戰前的地位。那末，這三個大國果然就是救星嗎？

毫無力量的民主政治

咳！大布列顛的民主政治和愈來愈多的困難相奮鬥，已經六年多了。各銀行因為金鎊貶值而感受壓迫；各種產業卻反因金鎊的貶值還不澈底也感受着壓迫。資家爲租稅所壓倒，勞動者時受失業之苦。民衆們對於他們的預言家羅德喬治 (Lloyd George) 已經失掉了信仰而正在找尋一位領袖，卻游移於鮑爾溫 (Baldwin) 的保守主義和麥克唐納 (MacDonald) 的勞工政策之間而無所適從。英國民衆總是重視傳統的法式，所以雖然知道舊的立憲制度沒有力量，卻也無法計劃出一個新的來。

法國自詡爲世界上第一個俱有安穩社會的國家，這固然不是毫無理由。在六年之中，她執利租這種口實，一切問題都不予解決，一心只想強制舊的友國和敵國都順從她的意旨。她堅決地固執己見，一切都不妥協，但結果也只是作繭自縛，不得不靠着高塔債臺而渡日。處於內債三千萬萬紙法郎，外債四萬萬金法郎的夾攻之中，只要國內或國外稍有紛擾，他就只好聽天由命。直到最近，因爲匯兌上起了激烈的恐慌，和租稅的陡增，她這極端危殆的局勢纔被暴露出來，於是輿論上起了尖利的反動。不過結果如何還要看左翼各黨能否使得大大小小的各種團體都情願負擔不得已的犧牲並遵守自制的法令。

唯有遠在西方大陸上的美國，民眾能夠在短期的戰事後把經濟的和金融的均衡都恢復過來。戰事對於他們一起初固然是很有利的。可是現在他們因為財富過多也感受着痛苦了。他們冒着兩重危險：不是折本出賣就得停止一部分生產。於是他們不得不輸出他們的產品，原料，製造品和資本，因為這種種東西，他們都感覺過剩。所以歐洲的復興，在他們乃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並且他們也正準備着替歐洲幫忙。他們的需要迫得他們不得不離開所謂「光榮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不過一般的美國人，除非他確實知道舊大陸將決心於和平的工作，他決不願意購買歐洲的債券，因為只有這樣，歐洲人纔付得起利息，也只有這樣，芝加哥的糖果和新奧爾良的棉花纔能運到歐洲去賣。當時美國的國會正在擔心會捲入舊大陸的外交和紛擾的漩渦，而另一方面，歐洲的外交界也正在害怕美國會成爲世界的霸主。

所以事情是這樣的：民主政治什麼都沒有解決，蘇維埃制也破產了，而法西斯蒂也不過是一個暫時的方便法門。於是全世界統統都徘徊於歧路之間，一切都是無結果！不安穩！沒法解決！危險！

自己態度之亟當決定

我們好像是一些遇難的旅客，在一個將沉的船裏，大家都在盲目地暗中摸索，你撞我，我碰你，對於當前的局勢既無清楚的認識，對於將來的行動又無從計劃。在這樣的一團亂擠當中，人人喊叫的意思雖各不同，但他們的心裏沒有一個不是亟欲曉得正在飄向何方的。

當一個航海家迷失於大洋中，考慮應走的航路，他劈頭先想到的就是要推斷他自己目前正在什麼地方。既未顧慮到海的方位，風向和流向，又忘卻了現在正在變換的環境，他只好從遠遠的太空中尋求他所需要的推斷根據。只要作兩個天文學的觀察，他就能斷定他所在的經度和緯度。只要經過一個所謂「確定方向」的簡單程序，他就會再發現這船應走的航路。

到現在，我們的政治領袖們還不應該決定他們自己的態度嗎？大多數很精明的技術家，按照風的方向和流的趨勢，也能很熟練地揚帆掌舵，而羣衆們目前也都稱讚他們的技巧。可是在這種場合，他們也只是聽命於機會，並沒有看到海港的所在。如果他們不僅僅着眼於當前的，表面的偶然事項，更進一步而能觀察到遠遠的太空，追想到過去的景象，就一定能夠找尋他們所在的經緯度，而推定應取的航路。但是當現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又在家家都無隔宿糧的生活狀況之下，沒有一個人會想到把歷史仔細研究一下。甚至連各國政府，他們的主要職責就在預測將來，也只能暫顧目前。不穩的民主政治，爲他們的政治能力所限，也只能看到下一屆選舉的形勢就認爲滿足了。可見目前的局勢誠然是很嚴重的了。

在另一方面，人類社會是依照一個比較緩慢的節奏而進化的。即使像歐洲大戰那樣一個重大的事件也只能漸漸地把牠的影響傳播到全世界。牠的種種重大的結果，現在不過剛剛被人察覺，要等到牠們完全宣露出來，無疑地，非再經過數世紀之久不可。被當代所忽略的一種局勢，往往要經過一兩世紀之後纔會完全顯出牠的重要來。（註二）

要了解社會現象必須用歷史的眼光。我們被事變之洪流飄流到「現在」，這個「現在」是被已逝的若干世紀所決定的。每個人，每個政治家把他的小艇繫在大船之上，都只憑他自己的技巧和急流暴風相搏鬥，而毫不顧及他的前後。但正因為他們沒有預先看到洪流的危險而設法防避。所以洪流的力量才會把所有的人都加以更殘忍的打擊。我們現在所以會有這樣一個不滿人意的局面，其主要理由或就在此。我們的遭難由於所用的方法不對。

困難就在我們自己

假如一個科學家，用健全的方法，根據正確而且完備的材料研究一個問題，結果竟得到一個不合理的結論，他的斷定將必是：這個問題的陳述不得法。他於是轉回頭來把他的推理的線索所依據的種種原則加以精明的分析，以便把或者會羅雜進來的誤點篩淨了去。這是一件大膽而艱苦的工作，羣衆們多半總是不喜歡做的，甚至連專門家也都不喜歡做，因為這樣做會打破了他們的習慣。但這卻是唯一的辦法。

曾有數世紀之久，全人類都把「地球不動」這個觀念認做經驗所證明的一個事實，而且可以說是人類觀察事物的一個要件。火是一個單純而不能還原的原素，直到十八世紀之末，還沒有被人懷疑過。但是拉瓦節(Lavoisier)卻把現代化學建立在明明和此相反的假設上。「光線會有重量」這個觀念，我們至今還信不慣，可是光線接近行星就會歪斜的事實卻把我們全部的宇宙觀加以改變了。

所以人們都認爲不言而喻的種種假設卻大半是錯誤的——不是全部錯誤，就是一部分錯誤。可是當我們解決生活上所遇到的種種問題時，卻會把此項假設做爲根據。此項假設不僅不能解釋任何事情，反把牠們本身的錯誤加在現象的玄祕之上，弄得愈加混亂。在自然科學裏既會發現這種錯誤，則經濟科學和社會科學裏的這種錯誤一定更多得可怕，那是毫無可怪的了。政治家兼哲學家的培根（Lord Bacon）把此項假設叫做「公衆的偶像」（*idols of the public place*）；愈是被崇拜的偶像愈是可怕，因爲這種偶像好像能夠替大多數人代表他們最神聖的社會利益似的。

只要這種偶像確實還能代表一些現存的事實，無疑是應該崇敬的。但是跟着社會進化的日新月異，總會有一天到來，在「社會的現實」和做爲牠的解釋的種種主義之間，連一點近似的關係都沒有了。結果就會發生不易解決的混亂，因爲這種混亂起於當前事實者少，而起於要想把牠理清的人們的心意之中者多。

在目前這個尙待解決的世界危機當中，最重大的困難並不在這局勢的本身，卻在我們自己身上。

「理想的變化較比事實爲慢」是一個著名的原則。無論國家還是個人都缺少想像力，要使沈默無言的少數人對於社會和社會的種種職能得到一個大概的印象，往往非經過一個世紀不可。要使所有的人都承認這個見解，還得再經過一個世紀纔行。但是這時已經太晚了，因爲種種情勢又都變過一回了。所以一切政治的或社會的思想非等到牠已經不合乎事實時不能得到普遍的承認。因爲不會覺察到事實的變化，我們仍然把「過去」當做思維「現在」的標準，所以當我們要決定自己的態度時，就無往而不遇到困難了。

到了最後，時時在變化的現實和牠映於我們心中的靜止的表象愈離愈遠，結果就會產生極度的混亂，而我們所有的困難也就怎樣都不能解決了。到了這個時機（牠是按週期而復現的），人類社會的種種主義就不得不加以改訂了。十八世紀的哲人（philosophers）和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本主義者（humanists）就都是這樣產生出來的。

只要看一看現在世界所陷入的難解的混亂情勢，就可以曉得我們已經又到了歷史上這麼一個危殆的年代了。我們現在對於一切事實都應該有一個審幾觀變的態度；然後只要經過一個從新安排的程序，我們就能設法駕御事實真象和我們腦中印象二者間的懸隔了。

註一 這個記載寫於一九二五年。

註二 我們可以援引所謂「波洛提條例」（La Paulette），做爲例證，以概其餘。當亨利四世時，有一個財政官叫作波洛提（Paulet），立了這樣一個計畫：各地知事（magistrate）只要每年向國王進貢一次，則其轄境內的捐稅即歸他所有。當時這個計畫的意思只不過是充裕國庫的一個暫時辦法。誰知竟因爲這個原故，事實上他們就脫離了國王而獨立起來。國王再也不能調回他們了。過了兩個世紀之後，塔哥（Turcot）想要廢止此項特權以救君政，巴力門（Parlement）竟起而反對此項改革。這種精力，就是專制國王也無法打破。後來君政竟因爲這個計畫而推翻。可是這個計畫先前被人忽略了約有百年之久。

第一編 政治神話學大綱

第一章 支配權之精神的工具

凡好追根問底的人都能看得出今日的文明呈現着一個奇怪的對比現象。牠替我們預備下了許多極複雜的工具和設備，以便滿足我們的慾望，這都是我們日常用慣了的，可是除去少數的專門家而外，一般的人還都把它看作不可思議的東西。

每天有上千上萬的人乘坐電車，可是能有幾個人懂得引起運動的感應電流原理？打電話是一件極容易的事情，可是很少有人懂得電話的道理。在賞鑑廣播音樂的人們裏面，有幾個暫停下來研究研究海士層電波（Hertzian）的性質？我們每天的生活就是這樣，用着極複雜的機械來作極簡單的事情，可是對於這些機械一點也不懂。

如果我們來考察一下人類的社會生活，這種自相矛盾的愚昧現象就越發顯明了。我們的生存爲經濟，法律，財政，政治等等制度一個整個的連系所支配，有許多許多的專門家們把牠加以研究，加以經營管理。門外漢乍然看到一本法典，一張匯價單，或僅僅一張徵稅單，就馬上會覺得這種種制度的複雜可驚。但大眾們對於這些不可

思議的東西。卻一點也不想把牠加以研究。無論電車電話也好，或種種的社會制度也好，他們都只想得到一些實際的暗示，好知道怎樣利用就夠了，至於其中的奧妙他們是不耐煩去考察的。即使他們耐煩去考察，除了必須俱有特異的天資聰明和經過嚴格的預備訓練而外，還得要有精神上的努力，這是無論由時間上或由資力上說，他們都辦不到的。所以人們生活在現代的種種情勢之下，決不能對於他們所處的社會得到一個科學的正確觀念。

神話的必要

但無論正確與否，他們對於所處的社會，總該有某種的觀念纔行；蓋社會團體如果不把個人的自由加以限制，或不把個人勞動的產品課以捐稅，就不能維持。而公民們，對於他們自己和團體間的連帶關係，並聯繫公益和私利的種種事業，如果沒有一個大概的觀念，也必定不願負擔這種種的犧牲。

這個觀念既非科學研究的成果，所以只能是想像力的虛構。我們大家原都有一種自我本位（以自己為中心）的傾向（*egocentric tendency*）。因為受驅迫於這種傾向，所以我們對於社會的觀念，完全是把自己日常生活上的各種概念擴大起來，應用於社會團體而形成的。

假如他是一個小農夫，他就把他的國家組織想像做和他的財產一樣。只不過規模稍大一點罷了。由他看來，國家只是一塊土地，為不可侵犯的界限所圍繞，住着血統相同的人類；他們的祖先遺留下這塊土地給他們，他們希望再傳給他們的子孫。只這一點想像已夠使他懂得：假如貪欲的鄰國來侵犯疆土，他必須拿起武器來防護公

共的財產。這的確是一個粗率而極不合乎科學的觀念；其所以形成，只是把此一範圍內所習見的觀念移而用之於彼一範圍。真理也許很不相同。牠實在不過是一種意造或神話（*figment or a myth*）罷了。（註一）第一個替牠起這名稱的，我想是喬治東瑞（*Georges Sorel*）。

假如人類社會的種種事實，和習俗對此所抱的觀念，同是不變的，那末，用想像來代表現實也就沒有什麼妨礙。無如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因受種種技術上的改革和歷史上的變遷之賜，不停地在進化着；而大眾們所抱的習俗觀念，因為不是科學觀察的結果，卻反變化得很慢。

既然這樣，則下面這兩件事情當中必有一件會發生：假如神話所虛擬的影像大體上還和現實相似，則個人的社會正義觀念決不會受到擾亂，這樣他就馬上可以看出私利和公益間的連絡，毫不費力的遵守社會紀律。但如果現實和他心中所虛擬的影像之間發生顯著的差別，他就會對於現存的種種權力發生不快、不滿、和輕視的心理，不然他也會強使變化不已的現實來適合他心中的影像。結果一定會發生矛盾、混亂、紛擾，甚至滅亡等等的危險。

這個現象是羣衆心理的一部分，在人類社會生活上佔着極重要的地位。不幸歷史家和經濟學家動輒固執偏見而不能持客觀的態度。他們不是過於重視這個現象而把社會進化的原因單歸之於理想，就是把這個理論全部都認為不合乎科學，輕蔑地置之度外，而僅僅注意到物質方面和制度方面。

這兩種傾向，如果推到極端，都會錯誤百出。神話和制度都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原素。二者固然會時時發

生衝突，但也會時時互相吻合。不過二者間的相互關係究竟怎樣，和受什麼原則的支配，好像至今還沒有人加以研究過。

我們如果努力把這兩個原素所盡的職分和牠們各自進化的速度確定一下，就能發覺現代特著的種種矛盾的潮流和矛盾的意見，其關鍵究在何處了。

社會的常數

人類社會的生長靠住三個基本的力量：第一是各種永久的需要（permanent needs）；這就是人類社會賴以組織，賴以維持的原動力；第二是各種變動的制度（variable institutions），人類社會的種種需要賴此而得滿足；第三是羣衆對於此項制度所抱的理想（idea）。一個人，從他成立家庭並負責辦理一樁事業的時候起，就不啻和人家訂了一個長期的合同，結果如何一定要經過一個相當久的期間纔能見分曉。要等到這個事業完成，普通總得經過幾年的努力；要從其中得到安逸與舒適，還得經過若干年。要等到他的子孫都按次成立起來，必要時並能得到他們的幫助，還得再等待更久的時間纔行。這時，老年也就到了。也只有到了這時（如果他成功的話），他纔能收回所投的資本，並得到所耗精力的報酬。所以無論那種事業，總得先有多少的安全和穩固做爲條件。凡是已經安身立命的同胞們也無不希望從社會團體中得到這兩個必要的保證。

但在一切的人類社會中總會有一些人還沒有安身立命下來。第一，這就是那些很年輕的份子。只要他們還

沒有家庭又不負事業的責任，就很容易受影響於「變化」的理想。他們既然知道：自己的年輕力壯和天賦英俊，又不耐於家庭的束縛，只要一有新的理論，絕對的公式和激烈的辦法，馬上就會為所感動。無論是極左或極右的黨派，社會主義者或反對派，無不把這些青年人當作預備隊，墨索里尼把法西斯蒂的吶喊口號，改為對於青年的讚美詩：『Giovinezza!』其中大有深意。除了青年人而外，就要算到那些沒有家業的人了。他們所以沒有家業，或者由於原來就沒有（如無產階級），或者原來有而後來又失掉（如受社會之擯棄者）。

每個社會單位當中都有動力（force of movement）和惰力（force of inertia）。動力是由上述的三種基本力量混合而組成的。惰力則為第一種已經安身立命的份子所代表。動力和惰力有時並行不悖，有時互相軋轢。在平常的時候，惰力的全部力量足以輕減，分散，或鎮壓進步的力量。有時為了顧全內部的穩固和秩序也會把進步的力量摒諸其他的社會單位。

但一旦社會制度不能擔保穩固，或把太煩重的負擔（例如過重的租稅或任意的沒收）加在各種企業之上，則已經安身立命的份子也將不予援助，甚至其中的一部分，還會和進步的份子攜手。

社會制度這時將為進步的運動所襲擊，進步的份子將以暴力奪得領導之權，利用他的威權來滿足他的少年氣盛的衝動，舒解他的需要和仇恨之心。這種革命是歷史上一切社會組織所必有的命運。

但暴力是不會長久的。無論由施者或由受者的立場來看，暴力都含有絕大的危險。正因為「動力」得到勝利，牠遲早（普通都是很快的）總會傾向「不動」（immobility）的。老實說，大部分主張改革的人，都是因為

還沒有安身立命之所，纔主張改革。如果已經有了安身立命之所，他們就不主張改革了。新富的人，既已達到所希望的目標，他們戀慕穩固，正如舊的富人一樣，這樣漸漸就會發生一個和解的局面。如果勝利者能夠藉着妥協和策略恢復了企業的穩固狀態，則失敗者將情願擁護新的制度。只有那些財產見奪的人，纔會投到新的「動力」裏面去。即便是異族的征服者，如果要使他的統治權維持久遠，也不得不低頭於這種運命。

一切人類社會，毫無例外地，都爲這個二重的節奏所支配。在歷史的全過程中，革命和征服只是偶然的事情，安全和穩固纔是生存的原則。我們可以借用一個數學上的名辭把牠叫做人類社會的「常數」。

社會的變數

每個社會單位的代表原素就是那些已經安身立命而成爲某種營業領袖的人們。人類社會就是這些已經安身立命的份子的集合體。在這集合體裏面，家庭好像是個有生命的細胞，營業機關好像是物質供養的來源。這些營業機關形成這個社會單位的經濟基本構造 (economic basic structure)。牠們並非不可變的原素，卻反是在空間上則因應於土壤氣候的種種情勢而變化，在時間上則因應於技術的進步而變化的。但技術在歷史上曾經有好久都是變化得很慢，社會典型 (social type) 所以會有一種不可變性，就造因於此。現在在亞特拉斯高原 (Atlas) 上以遊牧爲生的摩洛哥種族 (Moroccan)，其社會習慣和社會組織都和大衛帝 (King David) 時代的以色列 (Israel) 種族相似。路易非力普 (Louis-Philippe) 時代的小地主，其生活狀況和伽圖帝 (Cato

the Eldon) 時代臘丁地方 (Latina district) 的居民沒有什麼大不同。無論政治家還是歷史家都把經濟進化幾乎完全置之度外，就因為這個原故。習慣上，他們都把各種私營企業看做社會中保持穩固的原素，而把建築於此項材料上面的政治社會觀念都當做玄祕的教條，以為這是根據着神的決定，或根據着不變的理性之假定而訂立的。

自從十八世紀起，直到十九世紀之後半止，英國發生了工業和技術的革命，幾乎全世界的三分之二，其生活狀況都受到了這個革命的震動，可是歷史家和政治家卻仍然固執着以上的觀念。在一八三〇年以前，全歐洲都把農業做爲典型的產業，並且是國家收入的主要源泉和其他一切產業的基礎，但到了今日，在所有的西歐大國（如英、德、比甚至法國）中，一半乃至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倚靠工、商、礦業來維持生活，農業早已變爲附屬的產業了。

生存環境中雖然起了這樣非常的革命，但理想世界裏卻沒有發生和此相當的革命。五十年以來，政治家們不知費了多少精力，拼命想把新產業的發展拘限在舊的體制裏面，而強使之應合。到了今天新產業已經把這個軀殼，四面八方的爆炸開了，可是我們還未曾把必需的各項新制度建築起來。在理論上我們或者都已承認社會的「經濟基本構造」是一個變數而不免會時時變化的，但是在實際上我們還得把牠加以斟酌纔行。

儘管這樣，儘管社會企業（無論是牧畜制度，農業，還是工業）的性質是怎麼樣，可是社會制度的主要目標總是一樣：擔保安全和穩固。爲了保護本社會單位不爲外來暴力所侵犯，就創立一個軍事制度（如部落騎兵，封

建制度，備兵制，徵兵制等等。）爲了擔保內部的安全，就創立了警察制度和法律制度。有時還要用種種的方法盡力獎勵私營企業的發展，例如，建造道路，橋梁，溝渠，以便使一切企業都能得到便利。或者更進一步，而建立起各種公共事業。爲了支辦所需的經費，凡享受此項便利者都得盡一種義務：或叫他納捐，或以法令規定叫他服勞役，或在他的企業產品上加以種種徵課（租稅）。

凡防禦，警察，法庭，公共事業，和財政等等不同的手段都和私營企業結着不可解的關係。牠們要保護私營企業，要爲牠打算，並且必須很自然地適應於牠的種種需要，而隨着牠進步。但正因爲牠們（指以上種種手段）的目的在於保守和防禦，所以牠們的適應能力是很遲慢而且是不無阻力的。只要農業仍然是典型的產業，行政上的方法簡直是不能變化的。現在的法律學校所授的種種原理仍然是羅馬時代的原理。

自從種種工業的法式支配了經濟界，立法者事實上固然不得不把現存的種種制度漸漸加以改變，可是司法者卻仍想固執已經廢棄的原則。結果就會給牠一種奇怪的曲解，並且不僅事實上會因此而發生大的混亂，就連心理上也會受同樣的影響。（註二）可見我們應該承認：各種制度之主要的和基本的原則也是一樣要進化的，而且此項制度就是社會的「行政的上層構造」(administrative super structure)。

同時，如要運轉此項制度，還得有一些人來擔承領導之權，決定策略而施行之。因此政府是必需的，然則叫誰來負責呢？由族長皇帝，或霸王等等一個人來負責呢？還是由一個領袖團體來負責呢？還是由平民議會來負責呢？領袖固然要負很重的責任，但同時他所享的利益也是很可觀的。他對於一切人民的生命財產能夠施行權

力到某種程度；他可以左右國富的前途和其影響；無怪乎頂大膽的，頂有能力的，和頂貪慾的人們都抱着極大的野心，想攬得領袖權。他們都爲了攬得領袖權而爭鬪，既得之後又要濫用權限，結果就足以危及社會企業的安全和穩固，而忘卻了保護社會企業正是他們的義務。所以我們對於他們的威權，應當規定一個明白的界限，並且取得權限的各項規則規定得愈清楚愈好。

這就是所有成文或不成文憲法的目標。把此項規則當做基礎的政治制度就是有組織的社會之推動力。此項規則既受任何內部和外部影響的支配，所以就其本質而論，乃是這個制度裏面一個最易變化的原素。

歷史家總是把因此而起的種種爭鬪敘述得詳詳細細，使得我們不勝其煩。他們把政府的種種變遷（即使是頂小的，）惹起變遷的人物和事件，都仔仔細細的加以分類，並且用浩如煙海的大冊加以描寫。即便是荒村僻壤中的兒童們，也不准他總不知道查理士鮑爾（Charles the Bald）的事蹟和得芒特農（Madame de Maintenon）的名子。

但等到他們描寫行政上，司法上，財政上，或軍事上的種種制度（這纔是社會構造的基礎，）他們就更大膽地信口雌黃了。雖然法學家曾努力研究此項問題幾至百年之久，但至今，一般民衆還幾乎沒有看到他們的工作結果。至於生產交易狀況，煩重的幣制問題，店主和經理的關係，運輸制度，以及其他確確實實的萬衆日常生活上的問題就更只有很少很少的專門家纔注意到。這誠然是一個奇怪的矛盾，就好像我們描寫一個建築物，只把屋頂上的風標加以過細的描寫，屋中的家具則只加以散漫而不相連貫的指示，至於牆壁的基礎，建築的材料卻

幾乎完全置之度外了。

神話的主要任務在於造成自願的服從

但是他們所忽略的東西，明明白白正是一切當中我們所最希望知道的。這種不同的原素，如經濟企業，行政方式，政治制度等等，都是愈來愈繁雜的。在起初，家長（*paterfamilias*）一個人把這種種制度一股腦兒攪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既是軍事領袖和法官，又是全族財產的經管人。但由於防禦上的需要，社會單位漸漸擴大，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城市，再由城市而民族而帝國，各種社會有機體愈來愈專門化。私營企業和國家財產或皇家財產的關係愈來愈少，最後除了納稅而外和牠們再也沒有其他的關係了。於是一種新的關係就因此而發生了，這是必須設法應付的，而且應付的工作，隨着個人所獲得的自治權之日益擴大，愈來愈複雜。

同樣，法律機關和財政機關也是愈來愈複雜。軍隊的新式設備需要長期的訓練，需要紀律和多數的領袖。政治制度分化成各式各樣的有機體，並且包含着各種參事會，各種民選議會的一個整個系統，各具單獨的權力，藉着一個很精緻的機械作用，互相平衡，互相牽掣。結果，國家的行政管理當然會集中在少數的幾個專門家（官吏或政客）的手裏。正因為牠具有專門的性質，所以愈來愈變成大衆所不能瞭解的東西，這恐怕要算是文明國家至今還得設法應付的一個最困難的問題。

任舉一個農夫，一個藝術家，或社會中任何一個愚蠢的份子，都是這個社會團體中一個重要的細胞。團體按

期地佔用他的時間（如納捐，法定的勞役，和軍事服務等等）或佔用他的收入（租稅）並且不斷地強加一些限制在他的身上，例如警察規章都市法令等等。一些他所不認識的人們，憑着他所不知曉的一些規章，強迫着他服從，例如警察，法官，徵收吏等等。假如這些不相識的人們把他的所有物或他的自由，一部或全部地加以剝奪，（罰金或拘役）法律還希望他無抵抗地服從，那末，這種種的犧牲怎樣會叫他甘心願意地負擔呢。

無疑，法律是可以以強制力迫他服從的。爲了嚴格而迅速地施行社會的命令起見，法律固然是必要的，但無論如何，法律本身總還是一個暫時而且非常脆弱的手段。要使法律得以施行無阻，無論由施者或由受者的立場來說，都得感受一個繼續不斷的緊張情態，這是既痛苦而又多危險的。假如力的制裁不是甘心接受的話，則社會團體將難以維持久遠，更不用說擔保牠的份子的安全穩固了。這就是「威權」(authority)的來歷；威權發生於甘心情願的服從；這樣的服從足以代替強制而免掉離叛之憂。然則威權是怎樣創造起來的呢？千萬的人爲了一個制度，甘心情願地擔承種種繼續不斷而且有時會極其痛苦的犧牲，而這種制度的作用竟是他的識見所不及的，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乃是羣衆心理上一個奇怪而又最重要的問題；因爲沒有威權就不能有安穩的社會團體，由此推之，更不能有文明了。每個人類社會都曾求得一個解決的辦法，無論牠們所用的方法怎樣不同，無論牠們隨着時代的流轉，會有如何的變化，牠們都是一個模子裏造出來的。牠們的生長，死，受支配於同樣的原則。

多神教的神話

古代的人和種種自然力相爭鬪，他們想像中以爲在種種自然力的背後，有一些「生靈」和他們自己很相像，並且具有和人類相同的種種情緒，只不過較優美些，較壯健些，並具有不能損傷和不死的性質罷了。他們把那些自然力的支配權賦與這些「生靈」的掌握之中，而他們自己則又爲自然力所壓服。雷的掌管者是焦士（Zeus），暴風雨的掌握者是巴希敦（Poseidon）。他們以爲這些「生靈」具有應該崇敬應該順從的超然性和偉大性，很明白地，這就是「神」了。

但神話不僅由信心而成，其中還含有希望。神既然有支配種種自然力的權能，他當然能夠任意地施禍降福。假如他願意的話，他可以叫冰雹打在某人的田裏。假如他高興的話，也可以把某人的船撞碎在礁石上，所以人們必須和他聯絡而設法得到他的歡心。種種的神祇，儀式，祈禱，祭祀就是爲了求他降與慈祥纔發明的，不過關乎此的種種規則因爲具有神的偉大性，自然都是很神祕而難解的，蓋所謂「神」者，無非就是超乎凡人的意思。所以凡能藉占卜，顯應，傳遞種種作用而窺得其中的奧妙者就是神已經把可怕的威權授與他了，這是任何信仰者都不敢抗拒的。

如果一個家長，經族中長者的同意，已經把族中種種公事的職掌權授與了他，他再領悟了這種神祕的儀式，則他的威權一定會立增十倍的。如果一個軍事領袖由兼攝僧侶的職務而領悟了神祕，藉着觀察鳥的肝臟就

能知道神是否願意打仗，他只要說一句話，手下的兵士就非捨命去打仗不可。任何兵士拒絕了他的命令，一定會惹起神的暴怒，那是毫無寬恕餘地，而且逃也逃不了的；逃到那裏神會追到那裏，比羅馬黎克特官(Tictor)的斧子還要靈驗。即便是一個團體之中，只有一個份子作了什麼惡事，受害者只要請求神實行「普遍的公道」(dis-tributive justice)——這雖離奇卻很有效——神就會對於這整個的團體發洩他的憤怒，所以兵士如果不服從，就會冒犯了那個可怕的刑憲「死」(acer casto)——就是同伴們一齊下手把他打死。

這種神祕的制裁，較比法官的檢舉效驗得多，所以無怪乎一切領袖們都想把長官的職務和教士的職務合而爲一。羅馬史上的「最高無上權」(imperium)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牠的意義就是藉神的名義而行使的指揮權。從此而後，宗教上的種種儀式，標幟，就和發號施令的標幟混合起來了。即便是純粹的文官職務，例如護民官(tribunes)也只是帶有宗教色彩者纔能毫無問題地叫人服從。一個執政官(consul)或一個將軍(praetor)只要他能斷言會看到一些上天的徵兆，就能不必經過討論而把最難惹的平民議會立刻解散。我們也許還記得羅馬某位將軍遭遇不幸的故事：這位將軍確信他某次的策劃能夠致勝，就把徵兆不吉的聖鳥擲在海裏。他的兵士們見到長官犯了褻瀆聖物之罪，相信神降給他們的幸福，經他這麼一來就會失去了，於是剛一交鋒就潰敗了。可見只有「神話」能夠產生威權和甘心情願的服從。那個時代不像現代一樣，現代的威權建築在下面這個觀念之上：全體的利益是個人的利益的總計或平均，在那個時代，這樣一個簡單的觀念是不夠鼓勵起個人的犧牲精神的，但只憑神話的力量卻反能使最粗野最自私的個人覺得自己和團體間有一種宗教上不可分離的關係。

並且覺得自己對於團體須負直接的責任，否則將受神的制裁，那是無可饒恕的。所以那個時代的社會連帶關係 (Solidarity) 是建築在個人的自利主義 (individual egoism) 上面的。

人類社會並非一架機器，乃是成千累萬的細胞所組成的一個有機體。每個細胞固然各有其獨立不倚的生命，但同時卻又得倚靠其他細胞的生命。這許多細胞所處的進化階段各不相同，其中僅只一些已有清楚的意識，大多數卻仍在一種恍恍惚惚的潛在意識狀態之下。不過就是其中的最下等的也能藉着模糊的苦樂感覺而經驗到外界對牠的影響，隨着牠的意志而予以反應。牠毫不費力地服從中樞神經的領導，幾乎成了機械的作用，但在夢境，在不安適，在過度的磨難中，牠也會表示抗拒，而使得全部系統爲之動搖。正如現在的醫生再也不能夠否認潛在意識的影響，現在的政治家們也決不能把無關輕重的事情置之度外了。

因爲社會的神話是人人都能夠了解的，所以即便是頂和理性或論理相反的神話也能夠造成團體的正義觀念。牠乃是支配權的工具，統治者的威權，藉牠之助，能夠迫使採利己主義的個人作集團的行動。

古代的城市完全建築在「神降禍福」的多神教的神話上。希臘羅馬時代的世界受這種神話的移易薰陶達六百年之久，歷史上這段最爲光華燦爛的文明完全受他之賜。在紀元後這二十個世紀當中，還有好多種的「神話」由興而衰，迭相更替地發現於歐洲，都會達到相同的目的。

羅馬帝國征服了所有的城邦，把各城長官和各地教儀的重要減到了最低的限度。牠們的效用既已減少，其意義也就隨着消失了，於是大羣的奴隸，無產者，甚至被苛捐雜稅，剝削淨盡的小地主都自覺他們自己已經真正地擺脫了一切宗教的信仰了。這時可巧由東方傳來了各種的宗教，準許一切人入教，並無城市，貧富，和社會階級的區別。於是全世界好似着了魔一般，爲種種的神祕思想所瀰漫；對於「死」抱着一種成見，以爲死後會有種種凶險，於是希望不死或至少也希望能夠復活。這種種思想在理性上固然可以看做矛盾而不合乎科學的，但正因爲牠們建築在求生的意志之上，結果就給新的神話樹立了一個基礎，這基礎不僅是個人的而且是全人類所共通的。種種新的教儀，新的傳授方式和祭儀在各處發生起來。例如大神母教 (Cybele) 太陽神教 (Mithra) 阿梯斯教 (Attis) 等等都是。但因爲這些都是一種恍恍惚惚的迷信，所以後來並沒有發生什麼影響。

其中的一個宗派突然創立了一個新的理想，以爲只有生前對人行善纔能得到死後的幸福，這就是所謂「仁愛的報應」(the reward of charity) 是一個富有社會意義和道德意義的新觀念。許多小的耶穌教團容許一切被剝奪承繼權者的加入，漸漸變爲互助的團體——這是羅馬帝國前所未聞的一件事，因爲羅馬的城市一向都是貴族化的。這些團體把財產認爲共有，並按期集會，在理事，執事，和主教之下組織起來。對於不堪忍受羅馬的苛政者，牠們使之崇拜一個謙恭和遜的上帝。這個上帝固然也會受到異教的殘虐，卻仍一心普施超人的和善與仁愛。藉着既人又神，既受十字架之苦刑又得復活的雙齣趣劇，這個新的信仰竟能打動了大衆的想像力。這個新的教儀隨着種種新的聖禮而發達起來。新的聖禮能使信仰者得救，並使之服從牧師的指導。於是這新的

神話馬上變成一個制度，新的教儀馬上變成一個支配人心的工具。

羅馬帝國對於一切異邦的迷信固然都持寬容態度，但對於叛亂卻顯然是不能忍受的。這時的衝突非起於兩種宗教觀念之間，（因為多神教在原意上就是很寬容的，）卻起於兩種政府制度之間。經過了三百年的殘殺虐待，基督教的團體也許變得很衰弱了，但羅馬帝國卻並沒有更加強盛起來，於是雙方在尼西亞（Nicaea）訂了妥協的條約。帝國承認基督教團的合法，承認尊崇甚至保護他們的教儀和習慣，他們的領袖，牧師和主教等都當做帝國的官吏看待。同時基督教的主教們也承認羅馬社會應該建立在奴隸制度和私有財產制度的上面，並宣講人們都應該聽從世界上的不平等做為取得死後平等的條件。以上就是他們雙方交換的條件。

把基督教的神話實行採納到羅馬各項制度上面的創始人被人稱做教祖（Fathers of the church）。他們得到這種稱號很為正當，因為他們此舉確曾費了一番心血。自那時起，聖索斐亞（Saint Sophia）圓屋頂上便有了加利利（Galilee）木匠的彫像並且飾以帝國的徽號。自那時起最可憐的奴隸服從皇帝的命令變成了個人的得救問題；甚至連四面八方侵犯羅馬的各種野蠻人都被神聖羅馬帝國用一個貴族文明的紀律和教化，薰陶了十世紀之久。西羅馬帝國因為異教的「命運之神話」（禍福隨諸神之意旨而轉移）而失掉了的社會正義的觀念，現在又被基督教的「得救之神話」給恢復回來了。

封建制度的神話

第五世紀時，西羅馬帝國為漸次侵蝕進來的蠻人軍隊所征服。冒險者的隊伍發誓要隨着他們自選的領袖而戰死，唯一的條件只是戰利品的平均分配。諸侯與附庸靠着「忠順」二字而結成強固的關係，蓋附庸對諸侯忠順乃是一種神聖的約束，諸侯對於不忠順的附庸得加以籍沒土地的重罪，而褫奪其附庸的資格。新的功勳觀念產生了，個人藉此可以獲得高貴的地位，這也就是封建時代的社會紐結，全部西羅馬帝國的社會都靠這紐結來維持。

但這純粹是征服者的思想：征服者要長久維持他的統治權，非取得被征服者的自願服從心不可。新主人為取得這種服從心，就採用了戰敗者的基督教的觀念。蠻族領袖不平的兒子從基督教主教的手裏接受了加冕的聖禮，於是忠順的行為一變而為福音書上的忠實宣誓了。蠻族的戰勝者漸漸為教會所屈服，而不得不在聖壇前舉行武士的輪值禮。他的劍要接受牧師的祝福，他並且要宣誓用這把劍來保護被壓迫者，來抵抗不信教者而維護共同的信仰。這聖禮給予他一種威權，這是對於他自己，同時對於國家都有用的。這時，蠻族的神話和基督教的神話混合而為一了，在歐洲西部，城堡與城堡間不斷的互相爭戰中，而封建制度竟能維持五世紀之久，就因為受了這兩種神話混合之賜。

教皇制度的神話

但到了最後，一般人都覺得要有某種卓越的威權，來薰陶，來利用這種好戰的精神，免得叫牠消耗在沒有了

結的私鬪上。

第十世紀的時候，克呂尼 (Cluny) 的僧徒們和他們的多而且富的修道院，在一個僧長的領導下，由羅馬納 (Romagna) 伸張勢力到愛爾蘭，並由西班牙伸張勢力到波蘭，想把基督教世界組成一個集權的團體，效法回教徒 (Islam) 的樣子，在一個政教合一的領袖下團結起來。不過按照他們教團的規條，是不得干涉世俗教會的，於是他們就求助於主教們。聖彼得 (St. Peter) 的墓墳久幾乎不在基督教的傳說之內，現在又被他們在羅馬發現了；於是各地的參聖團體立刻組織起來，並且引據福音書中所記基督所說的「你是彼得」一段話，把羅馬主教的地位提高，使居所有主教的首位，不久他又取得專有的授爵權。憑着上帝的意旨，他具有「天堂世間管轄一切」(binding and unbinding in heaven and upon earth) 之威權。憑這種威權，他能從宗主 (suzerain) 手裏救出對他忠實宣誓的武士，不管這宗主是皇帝 (emperor) 還是國王 (king)。於是羅馬主教成了凡俗和靈界兩個體統的最高領袖，爲了收回聖墓 (Holy Sepulchre) 的原故，他敏捷地利用他的威權，領導着一般好亂的男爵，從事「聖戰」(holy war)。

由信徒的眼光看來，基督教的世界已經變成了一個神權政治；教皇藉着教會管轄權和武力，負責擔保國內的和平並抵禦異端的攻擊；他戴着三位一體的頭銜，既是他們的軍事領袖和最高法官，又是各國國王和各地主教的宗主。簡言之，就是天主教王 (Vicar of Christ)。

由喜爾德布藍 (Hildebrand) 到逢尼非斯第八 (Boniface VIII)，約有三世紀之久，這個新的神話支配

了西歐，並鼓動起偉大的十字軍運動。不幸克呂尼的神話根本含着一個內在的矛盾：蓋耶穌曾對彼得說過：「彼得！再把你的劍收起來罷……因為凡是拿這把劍的必和牠一起滅亡。」所以彼得的後繼者是做不了軍事領袖的。這神話雖曾努力要創立一個從僧侶的隊伍（*militia of fighting monks*）但羅馬教皇的職位是決不宜於處理軍事的。況且另外還有一個淵源相同而較古的神話成了一個難勝過的障礙。在尼開亞（*Nicaea*）隨君士坦丁（*Constantine*）而俱生的基督皇帝（意即教會之保護者）之觀念，曾經狄奧多西（*Theodosius*）的發揚光大，幾世紀之後，查理曼（*Charlemagne*）又把牠拿了出來，衰老的神聖羅馬帝國始終把牠奉做傳統的信仰。

羅馬教皇制的神話剛一產生出來，就有一部分主教們，因反對羅馬教皇之統治（他們以為這是一件奇事）而接受皇帝的任命，另一方面，卻有不少的封建諸侯因畏懼皇帝的威權而和教皇聯合一致，於是就不久就發生了一種可怖的景象：教皇就驅逐皇帝出教，皇帝就革廢教皇的職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最後竟鬧到三位教皇兩位皇帝為奪取人民的服順，拚命爭鬪一場。最後這兩種神話便都失掉了人們的信仰，而人們依然戀慕着安全與和平，於是各國就都轉而求之於牠們的國王了。

君主政體的神話

以上幾種神話調和妥協的結果，羣衆的心裏上，就產生了君主政體的神話，這個調和妥協的作用既巧妙而

又可貴。國王藉着封建制度的「忠順」二字，作了公侯伯男階級組織的領袖，沒有人敢加以攻擊。在他的臣民們所訂盟約的範圍內，他有處理軍事之權。除了這一點之外，他又是「蒙主傅油的人」(Lord's anointed)。撥伯特王朝(Capetians)果真發明了一種特別的聖禮，(加冕聖禮)在這個聖禮之下，他們經過聖瓶的傅油，就得到一種神祕的力量，能夠醫治癩癘。他們的任命既然是直接得之於全能的上帝，所以他們不僅握有世俗上的權力，而且握有宗教上的權力；藉此他們當然就能干涉教會的事務和主教的推舉。聖路易(St. Louis)的後裔甚至逮捕教皇而竟無人非議；他倚靠聖徒的一致許可，就能反抗教皇的驅逐，並且奪取教皇的財源，爲了自已的利益而利用宗教裁判所(tribunals of the Inquisition)的法官。

後來百年戰爭發生，種種急變使得皇帝可以在他私有領地之外，得到種種財源，並能在封建軍隊之外自行組織隊伍。這樣一來，他就能夠獨自替一般大貴族們擔保和平了——和平乃是中間階級的無上寶物。最後，他又勦襲教會法庭的種種辦法而用到他自己的巴力門(Parlement)和法庭上，同時他又牢牢地把羅馬法當作根據，於是他竟能把國防、司法、警政種種職權統統抓到他自己的手中，藉此保持國內國外的和平；同時他又代表種種神祕的觀念以便證明他的行爲都是合理的。

儘管王室的統治者本身會犯了很多很多的錯誤，但法國、西班牙和英國爲相同的急需和民族生存的意志所推動，由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都朝着這同一的方向而慢慢地進化，同時就有一派理論家和法學家開始向民衆們替專制王國的神話下解釋。照這些理論家和法學家的意見：上帝會把世界分成若干王國，每個王國交給一

個帝王，只要他自己願意，他和他的後裔可以永遠享受這塊國土。君主乃是土地上一切財產的所有人。現在持有財產的人不過是一些代理人罷了，君主是可以隨時把財產收回的。同時君主又是一切人民的主人，所有臣民都須絕對服從他。就是教會的財產和牧師也要受他的支配。教會既受他的保護，他就有推薦主教和分配僧職之權。爲他自己和他人民的方便計，無疑他可以擔保把某種特權給與貴族和牧師，把某種捐稅給與市民和農民，照習慣他會對此加以尊崇甚至加以保衛。但無論他作什麼，都只是對於全能的上帝負責。無論他怎樣窮凶極惡，只有上帝可以罰他，臣民對於他不能加以任何制裁。只有上帝可以阻止暴虐君主的種種計劃，可是人民對於他們主人的犯罪卻還要負完全的責任。這和封建的神話差得太遠了：宗主和臣民之間再也沒有什麼約束了；治者和被治者互助間再也沒有什麼義務了，皇帝對任何人都未必負責；他的一切都是對的，君權是絕對的。

這樣一個思想，竟能得到全人類的認可，在現在看起來，也許好像是極大的矛盾。歐洲所有各大國竟把這種思想當作公開的教訓至數世紀之久，法、英、德、俄、西班牙等國億兆的人民竟虔敬地接受這種思想，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這種思想既非根據着理性——因爲全能的上帝如何能把他的權力委給一個至愚的帝王，一個無知的女王，或一個未成年人？——又非根據着事實，因爲歷史上王室權力的起源和這種想像上的描摹很不相同。但直到距現在不久的一個時期，這種思想還是我們先人的共同信仰，因爲創立任何神話都應具備兩個條件（這是我們曾經替牠訂立的），而這種思想和這兩個條件完全符合，第一，這種思想足以把頂貧賤的農夫在他日常生活上所能看到的事實給擴大地表現出來。什麼事實呢？就是一個地主憑着繼承權而處理他的土地和牲畜，並且

本着爲求「得救」只對上帝負責的原則，而治理他的家庭。第二，當時的歐洲，爲外寇所侵襲，爲封建糾紛和宗教戰爭所困擾，深切地需要保護和永久的安全，而這種思想適能滿足這種需要。

民主政體的神話

不幸因爲朝代的戰爭和足以招致滅亡的財政制度，起初普遍地受人尊崇的君主政體，到了最後又普遍地受人唾棄了。那時已經到了一個階段，帝王的主權該要轉移給人民了，轉移的方法是要把君主政體的神話冒險地改換一下。當時一般的主張是這樣：如果人們要想得到「最大穩定中的最大安全」(the maximum of security in the maximum of stability)非叫那受威權支配的人民自己去運用威權不可。

若是把至高無上的威權付託給包有千萬人的君主（按即人人都作皇帝的意思——譯者註），似乎是一個太牽強的奇論。所以必得計畫出一個整個的代表機關纔行，不過這機關的形式是千變萬化的：直接選舉也有，間接選舉也有，獨一的立法院也有，兩院合成的議會也有，總統兼攝行政官的也有，總統形同虛設，不過只作部長間或黨派間的仲裁人的也有，此外還得想出種種辦法好使諸權分立，並調和權與權間，權與官吏，黨派，報紙和輿論間的種種關係。十九世紀的全部就消耗在設法解決此項政治問題的上頭。但解決的辦法，國與國間極不相同，就是一國之中也會有好多的變化：這已經很夠證明要實現民主政體的神話會有多少困難了。（註六）不過正因爲這種神話很有適應性，所以纔能使得前一世紀的工業革命省去了很多的力量，這卻是不能否認的。漸漸地牠

就變成了人類的共同信仰，而『治者與被治者的融合爲一』就被人看作理想的政府了。

要達到千萬人都能夠同心合意的境界，無疑是不可能的，所以事實上運用主權的，仍不過是一國裏面佔最大多數的團體罷了，但多數統治 (majority rule) 的殘酷壓力是可以設法限制，設法減輕的。辦法就是把個人的不可割讓的權利宣布出來，並給與輿論以自由；有了這種辦法，人人就都能夠希望把多數黨的羈絆加以改變了。這樣一來，人們就可以主張：法律是一切人的意志表現，抵抗法律，就是不合理。也就好像在事理上，取得人們自願服從的根本問題已經解決了。誠然再沒有別的制度（無論是君主政體，獨裁制還是暴君制）能夠在個人的生命、家庭、財產和個人的經濟行爲，理智行爲上行使這樣大的權力。再也沒有別的制度能夠在博得人們的服從上比較民主國家更爲成功的。民主政體的神話所以能夠行使最大可能的威權，所以能夠變爲支配權的空前最有力量的工具就因爲牠把治者與被治者融合而爲一的原故。

神話是合法的根據

在七十五個世代之中，歐洲各項制度所依據的基本理想變化了七次之多。在二十個世紀當中，新舊偶像互相更替也有七次之多。每更替一次，那新興的神話總好像是神聖的，不可思議的，並且是一個絕對信仰的目標。但信仰倚靠效用者多，而倚靠理性或科學者少，因爲科學方法還不是大衆所能領略的。所以無論這些神話怎樣莊嚴，我們如果給他一個絕對的價值，或把他看作千古不朽，都未免太愚。神話完全是大衆的想像所造成的，牠的意

義只於是一個符號。牠所有的神聖的性質來自牠的效用，一旦牠變成有害的東西，牠就要滅亡了。牠的價值純然是相對的，暫時的，正如歷史上其他一切的東西一樣。

但光是靠神話還不能把社會單位合攏起來。社會的體制是由牠的防禦制度，警察制度，法律和財政制度所組織成功的。此項制度都要靠着經濟企業的支持和供養。此項制度好像是骨骼，筋肉，神經和種種營養器官似的，都受腦子的指揮，而政府就好像是腦子。但如果每個細胞對於牠自己在整個組織中的位置和服從腦子的用意，都沒有有一個模糊的意識，牠們一定不會帖帖服服地聽從腦子的指揮。各項神話在人類社會中所盡的職分，就是不僅要使「服從」來得容易，而且要使牠幾乎變成自動的，無論如何也得減輕強制的必要。征服者和獨裁者的全部奢望總是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就是怎樣纔能靠神話的「銓敍」(Investiture)把他們事實上所有的威權變成合法的威權。自從羅馬帝國把一切城邦征服之後，就努力要把奧古斯都和歷代先皇推崇到一切神道之上，而加以崇拜。戴克里先(Diocletian)甚至要把異端神道的一切威靈都拿來加在皇帝的身上。蠻族部落的領袖們，在他們的勢力全盛時代，竟接受主教們的加冕聖禮，以便使極貧賤，極愚昧的農奴把他們看作合法的領袖。由接伯特(Hugh Capet)到查理士第十(Charles X)的時候，王室的神聖威權全靠着『聖瓶』(Holy Vial)的授予。

拿破倫第一的專制威權，雖然已由國家的代表們按照民主政體的種種儀式加以承認，但他仍然要接受教皇的加冕，好叫民衆們對於他不僅是敷衍衍的忠順，因為當時的社會還深深地浸染在基督教的神話之中。拿

破倫第三雖然用武力解散了平民議會 (Popular Assembly)，但因為當時正是民主的神話已經得到勝利的時候，所以爲了證明他這次政變是合法的，他就不得不乞靈於普選制的國民公決 (plebiscite of universal suffrage)。

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時候，要想把事實上的威權變爲法律上的威權，都非靠着當時流行的神話，給以銓敘不可。所以在行政組織（就是我們曾經把牠建立在社會的經濟基本構造上面的）的各項機關當中，神話必定要佔一個位置。國家政策所要涉及的，除了軍隊、警政、司法制度、國庫制度和公用事業的組織之外，就要算到神話的傳布了。

註一 參看 *La Ruine du Monde Antique et Re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英譯 *Reflections on Violence*.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

註二 墨林教授 (Professor Morin) 在他的名著 *La Révolte des Faits contre le code* 一書中，把這一點解釋得很清楚。

註三 參看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a*。

註四 不消說，這裏並不是要由基督教基本真理的立場來把基督教義加以考察，只是要把基督教義和社會制度變遷間的關係考察考察罷了。並且神學也承認：除了少數的神跡外，神之感化人還得藉助於人。

註五 追隨着其他學者，我在一本小冊：*L'Eglise et l'Empire Romain: de l'Étable de Bethléem au dôme de Sainte Sophie* 裏，也想要把基督教的神話怎樣順應羅馬各項制度的需要，分析一下。

註六 關於解決此項問題所作的很多很多的試驗和其結果，M. Seignobos 在他所著的 *Histoire politique de l'Europe contemporaine* 一書，Lord Bryce 在他的大著 *Modern Democracies* 一書，都曾敘述過。

第二章 神話之傳布與維護

我們既已承認威權來自神話，則神話的傳布與維護便有無上的重要了。神話傳布的主要目標就在一般羣衆，而羣衆大都是鄙野愚昧的，所以其中不會有抽象的和教義上的訓導問題——至少在起初傳布時是如此的。所以神話大都採取稗史傳奇的形式，以便引動羣衆的想像力。劇中的角色，無論是神，是英雄，是聖徒，是偉人，都被凡人的情緒（如愛貪，仇恨，忠誠等等）所激發，不僅是聰明靈智的，而且對於觀衆也是很有趣的，同時這些神，英雄等等又都爲一種超然而神奇的力量所鼓舞，使得他們駕乎凡人之上，並且能支配凡人的命運。神話所以會有感化力和威權，就由於牠是日常生活上一個放大的，怪異的而且神化的影像；在原始的社會裏面，牠自然會採取詠史詩（epic）的形式。（如依里亞特，英傑曲—*chansons de geste*——等）

希臘的詠史詩和戲劇

當巡遊的歌人流蕩於鄉村的市集上，歌唱着阿奇力斯伯力德斯（*Achilles Pellides*）發怒的故事，或震撼天地的巴希敦復仇的故事的時候，農夫們和船夫們對於偉大的戰事領袖們也正在狂熱地敬服感嘆着，並且經過牧師兼長官們（*priest-magistrates*）把神的意旨加以宣揚的結果，他們對於神也正懷着恐怖之心。所以阿

爾新納王 (King Alcinous) 恭恭敬敬地款待歌人的故事是一些也不足驚奇的了。

這些零散的故事慢慢就集攏起來，吟誦史詩的人 (Rhapsodists) 把牠一段一段湊攏起來校訂的人 (Diakrystes) 就把牠編成一個和諧的整部故事了。在希臘的各城裏面，依里亞特和奧特賽的一章一首都會經過人的手抄，所以一般人民對於這些故事都知道一個大概。教師也教兒童們讀這些手稿，一方面既可顛倒於神仙的故事而得到快樂，他方面又可以知道一些神祇的名諱，以及諸神和英雄們的事蹟。這些神和英雄們的影像與寺院是城中到處都有的。藉此又可使兒童們明瞭種種瞻禮、儀節、和禮典的意義（因為有了這種種儀式的緣故羣衆的生活幾乎成了一個接續不斷的表演臺，）並且養成兒童們對於主持這些儀式的牧師們和統治這城市的牧師兼長官們，都懷着崇敬的觀念。這些詠史詩又教給他們知道希臘民族的統一性，蓋城邦之間雖然不斷地爭戰，但都是由同一血統的人們所組成，在道德上是應該互相團結以便抗拒蠻族的。希臘全境都按期舉行奧林比亞 (Olympic) 和批新 (Pythia) 競技會，在賽會期間是不準打仗的，所以賽會期間就成了他們繼續不斷的休戰日，這種習慣若非受詠史詩之賜，恐怕也是不會有的。同時倘若希臘人的腦筋中沒有特類戰爭這個傳說 (Trojan War) 的痕跡，則希臘各城邦也決不會聯合一致地抵抗波斯人。

同時又有許多大理石的形象把神們和英雄們的肖像保存起來，各寺院的山形牆上把他們的奇遇記載下來，各種彩色的瓶子和陶器上把他們的事蹟描繪出來。

這種性質的神話不足作為任何理性訓導的題目，牠純然屬於我們現在所謂文學和美術的範圍；雅典對於

美術的發展怎樣的重視藉此也可以解釋了。當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和菲狄亞斯 (Phidias) 時代，雅典人在衛城上築起光怪陸離的神殿和彫像，其意義不僅在宣示他們對於「美」的愛慕，和他們威勢的顯赫；原來的意義乃在表明他們對於神祇的謝意，因為神祇使得雅典城偉大，並鼓勵人民崇敬長官，因為長官是代表神祇說話的。

古代的戲劇也含着同樣的教訓，即如帶奧尼索斯 (Dionysos) 所主辦連續扮演三天的戲劇，所演的故事無非是阿垂斯 (Atreides) 或阿亦狄帕斯 (Oedipus) 死得怎麼可怕，民衆看到這種戲劇之後，心中惟一的印象只有是神的意旨是無論什麼人也逃不脫的，所以服從神的代表是頂要緊的。

以上所說就是希臘戲劇的使命，我們只須看一看給獎者 (prize-givers) 的態度，就明白了，因為凡是得獎的戲劇家一定是最能打動人們發生宗教上的畏懼心理的，至於他是否最偉大的藝術家，那倒不論。攸利比提斯 (Euripides) 所以會被同時代的人加以嚴酷的批評而很少得到獎金，就因為他過於注重人類感情的緣故。

談到這一點，神話的地位就越發尊貴，而變為一種「公家事務」了。(public service) 只要一和城邦的基本制度發生了聯帶的關係，牠馬上就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誠然人人都曉得傳說是沒有歷史上的證明與合理的根據的，就是希臘人自己也把牠公開地叫作神話 (英文的 myth 在希臘文上是 muthos 就是寓言或小說的意思。) 並且連他們自己也會承認這些故事，充滿了謀殺、掠奪、盜竊、暴動等等色彩，決沒有教化啓迪的作用。古代的宗教既不適於作為教義，又不合乎道德原理，所以希臘哲學和基督教的倫理學一下子就把牠推倒了。牠

純然是一種所謂「市民的宗教」(Civic religion)除了具有統轄城邦的效用而外，一點道理也沒有，可是正因為這個緣故，纔必須帶有不可捉摸的色彩。

蘇格拉底，用審慎而可怕的反語要把這些傳說的矛盾和不道德給指示出來，起初不過被好談諧的人們付之一笑罷了。但是等到可怕的西西里(Sicily)和伊哥波塔末(Aegospotami)的禍災降臨到雅典人的頭上，等到雅典的衛城爲斯巴達的衛戍兵所佔據，昨天還在威力全盛時代的雅典，突然蒙受了被征服的恥辱，於是雅典人就覺悟到這是因爲他們的哲學家侮慢了神祇，惹得神祇發怒，纔降禍於雅典城的，一般政治家的意見則以爲蘇格拉底的合理主義，目的在廢弛復興雅典共和國所必需的紀律，於是大家都贊成應把這個創立批評哲學的人（指蘇格拉底——譯者註）判以飲毒草汁的死刑。

可見一種神話只要一旦被公認爲精神上的統治槓杆和政府的重要工具，即使牠公然自認爲不合理，不合道德也決不許人家加以討論的。無論那種神話一旦變爲人羣正義的支柱和槓杆，總會具有毫不寬貸的性質，這乃是歷史過程上屢經證明的一個原則。

羅馬帝國和基督教的正統派

羅馬帝國用武力把地中海一切的民族征服之後，就求助於宗教的神話以便把牠自己的霸權弄成合法的。牠雖然把奧古斯都和歷代先皇推崇到一切神祇之上，卻仍把本國一切的神祇都迎進了牠自己的帕德嫩廟，而

予以羅馬城的種種權利。當猶太發見了一位新神的消息傳來的時候，牠又趕快把耶穌的影像迎進阿古利巴寺（Agrippa）去，和其他神祇的影像供在一起。

但是這個新教派，卻竟斷言只有他們的神纔是真神，並拒絕承認其他的神話，對於歷代先皇的聖像也拒絕進香。由此而論，他們的種種儀式和集會當然也不能受官吏當局的監督了。於是羅馬政府就用種種苛刻的辦法對待他們，這並非宗教上狂熱感情的結果——例如在迫害教徒的第一道勅令上簽字的馬卡斯奧理略（Marcus Aurelius）乃是衆人之中最和異教迷信疏遠的——卻是因為基督教徒不承認異教諸神，把帝國威權之神祕的基礎給打碎了。他們打倒基督教徒的目的是在保持公共的安寧。

基督教的神話雖曾受到苛刻的壓迫但仍能很快地傳播到羅馬帝國的各處。敘述耶穌的生活和奇蹟的故事，採用福音書的形式，無論怎樣偏僻的地方也都傳到了。此項福音書把耶穌的爲人謙遜加以詳細的敘述，把種種的奇蹟加以煊染，把耶穌的和藹仁慈的精神加以描摹，這都是古代世界所未曾前聞的事情，所以福音書對於久處羅馬苛政下的貧者，弱者，受壓迫者確有絕大的吸引力。在各種秘密集會中，長老們朗讀使徒書，使徒行傳，默示錄並把其中的意義解釋給新受傳的人們聽；其影響傳布的迅速令人可驚。在輾轉流傳的程序中，又兼受了傳道者個人意趣的影響，書中意義當然免不了被人曲解附會。於是亞歷山大里亞派哲學家們（Alexandrine）的某一些觀念和異端各教的某一些儀式，便都兼收博採地歸雜到這個新的神話中來。因此，地方會議（regional councils）屢次想把基督教堂加以整頓，但是信徒們在聖書的解釋上卻仍然保留着相當的自由，而教會對於傳

布邪說的人們，除了驅逐出教之外，也別無其他制裁的方法。

自從尼開亞盟約簽訂之後，一切就都改變了。君士坦丁之所以承認崇奉基督教，其目的只在把紛紛投到這位新神腳下的離叛民衆設法拉回到帝國的懷裏來。他的計畫是想把主教的威權給了提督，以便擴大提督的威權。因此教理的統一是勢所必需的。尼開亞大會上所訂的著名信條（symbol）或信理（credo）就是要把所有基督教徒的共同信仰鐵案不移地建立起來。普遍的基督教神話既經統一之後，帝國制度藉此就能把一切人（無論市民也好，奴隸也好）的正義心給攔攔住，以便增強帝國制度的統一力量。自此以後，信徒們如果要想在今世或在來世得救，就再也不能不服從帝國的指揮了。個人和政治制度這時又鎔合而爲一了。

但正因爲這個緣故，許多主教和不少的信徒纔拒絕與以前迫害他們的人合作，並對於尼開亞信條中的若干款發行疑問。不過基督教的神話現在已經變成法定的了，教內的爭持和神學上的齟齬就構成了危害帝國主權的罪名。爲了公共的安寧，這種行爲是毫無容恕之餘地的，歷代皇帝對於異端的基督教徒所以加以殘害，其理由正和以前所有的基督教徒都遭殘害是一樣的。異端的教徒所企圖的當然是要把皇帝拉到他們那一邊去，自然有時他們也會得到勝利。這時阿利阿派（Arius）的教徒就把阿塔內細阿派（Athanasius）的教徒給打倒了，於是受殘害者不是前一派而是後一派了。但等到另一代皇帝又接受了後一派的主義，則正統教派的地位又由前一派轉移到後一派的身上來。這時各種宗教會議就變成了各教派熱烈爭鬪的戰場，各教派都想得到帝國的裁可，對於反對派加以殘害。充軍，坐牢，有時死刑就是失敗者的共同命運。只要基督教在國家的各種會議裏抓到

權力，牠也馬上會持不寬容的態度了。叛離雅典的蘇格拉底所遭遇的運命，現在又變成叛離國教者的共同運命了，東羅馬帝國爲了保護牠的精神上的統一而防備繼起不已的異端派，曾用盡了牠的全部力量和全部財源。

中古的神祕說進香遺物和騎士制

當君士坦丁堡的教統爭論正在甚囂塵上的時候，基督教的神話，繼續用牠的光輝四射的力量感化了一般民衆。東方的傳教士，在聖息立爾 (Saints Cyril) 和麥索地亞 (Methodius) 的領導下，把斯拉夫族和布加利族感化過來，使他改信基督教。聖科蘭班的愛爾蘭僧侶把羅馬教義一直傳布到易北河流域和薩克森山脈一帶。

對於這些蠻族若來討論精微的神學當然是不合時宜的；於是基督教的神話當時就不能不順應於牠的淳樸的環境。得救的觀念這時和聖徒們的遺物打成一片了。只要摸一摸主教聖約翰 (St. John) 的一顆牙齒，或聖仁未甫 (St. Genevieve) 的一根骨頭，就能藉聖德之助而免罪療疾；今生的健康和來生的得救藉此都能得到保證了。到康波斯特拉 (Compostela) 去朝謁聖詹姆士 (St. James) 的墳墓，或到羅馬去參拜聖彼得的墳墓，或到基督的聖墓去進香，成了無上的虔誠舉動，只要某人有幾件遺物，就有人把珍貴的禮物和地產等等送給他，藉此他就能致富。城市和城市，僧徒和僧徒，封建諸侯和封建諸侯之間往往爲了爭奪主教聖約翰的首級，或耶穌幼年的頭髮而理論爭吵，甚或發生殘酷的戰爭。

不過這些迷信舉動，無論怎樣粗野，總還不無用處。在沒有警察制度的時候藉此就能夠制止蠻族首領的殘

暴和貪婪。我們試一讀都爾格列高里 (Gregory of Tours) 的著作就可以知道聖馬丁 (St. Martin) 對於不敬他的遺物，不尊他的寺院財產或他的僧徒的性命者會施以怎樣可怕的報復。

即便是性情暴躁的貴族看到教堂的牆壁上畫着的死之力的象徵，或聽到人家說及地獄之火的一切恐怖情形，也會把他的火氣抑制住。人們聽到誦讀末日審判讚美詩 (Dies Irae) 的聲音，會時常覺得耳朵裏面洋溢着世界末日大審判時可怕的喇叭聲——這都是維持社會紀律很有力的工具。

於是這種神話和封建制度之間發生了一種奇怪的調和作用。關於封建制度的神話是怎樣成立的上文已經有所敘述了；英傑曲 (Chansons de Geste) 就是牠的福音書和詠史詩。內廷供奉的伶人（就是那個時代的荷馬派歌人）吟誦着這種曲子，把一種新的理想傳播到各鄉村和各采地 (Manors) 去。這就是一種騎士制度的理想，以為騎士是要衛護信徒，保護孤兒寡婦，並且矯正一切不良的風俗的。封建的觀念因為瀰漫了基督教色彩，愈來愈神化，到最後竟產生了奇異的「圓卓騎士」 (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 的傳奇和「聖盃」 (Holy Grail) 的傳說。

把志趣公正和聖潔的人們所最不可缺少的和最高尚的種種抱負懸為鵠的，想叫貴族們也具有這種抱負，以便把他們的殘暴的威權洗滌成純潔的東西，真乃是一種神而又奇的打算。所以這種神話對於當時的風俗也許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影響，不過對於一般平民的心理卻的確有一種絕大的魔力。騎士制度的傳奇把封建制度維繫了好幾世紀之久。如果沒有阿利渥斯安 (Ariosto) 的嘲笑，和吉訶德先生 (Don Quixote) 那樣奇怪的譏

刺，則這種傳奇在上流階級中的威望，還不能夠打破。直到期刊小說 (Serial story) 出現的時候為止，一向都把阿門四兄弟 (Four Brothers Aymon) 的故事當作標準的平民文學。

神話之衛護異端裁判所

大約在十二世紀的時候，在克呂尼和十字軍的影響之下，基督教的世界想做效回教的先例，把牠自己組織起來。古典文學藉着阿拉伯的繙譯又重新出現了，初期的大學如薩萊諾 (Salerno) 包羅各納 (Bologna) 貝克寺 (Beac Abbey) 巴黎 (Paris) 薩拉曼卡 (Salamanca) 等也都產生了。基督教的神話現在又受了理性的洗禮了。阿奎那多馬 (St. Thomas Aquinas) 把基督教的神話和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折衷起來，成了他那部名著薩馬 (Summa) 這部著作包羅着神學，哲學，倫理學和法學，把牠們整理成一個整個的系統。各大學不僅替教會，修道院，教皇，皇帝和國王等等的權勢找到辯護的理由，就是牠們的施政人員也全都是由各大學來供給的。

當「大分裂運動」(Great Schism) 發生的時候，巴黎大學居於三位教皇和兩位皇帝之間充當他們的中斷人。這些天命注定而又出身微賤的牧師既無武力又無財產，卻竟能掌握着分配皇位和錫予世間榮譽的大權，其所恃的理由是：惟有「神話」之所寄托的人物纔有資格判定誰是合法的主權者。這誠然是一個稀奇的景象，且不啻赤裸裸地表示：神話的機構就是精神的統治之一個工具。

但是這種純粹精神上的威權，如果沒有物質上的力量來支持着牠，也是不能持久的。後來教皇和國王雙方

果然攜手對此表示反對態度。最後，揆伯特朝竟想整個地把大學給支配住，有時援助大學錫以物質上的利益以便反抗教皇，有時把教皇監管大學的靈界幸福之權給剝奪過來。於是大學漸漸地失掉了牠的普遍的勢力而變成僅僅替法國教堂 (Church of France) 育養主教的所在了。

在異端裁判所的歷史上也有和此相似的進化的痕跡。只要基督教一經再度理智化之後，只要基督教的神話一經成爲種種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基礎之後，則變更教義就不啻攻擊此項制度了。當崇尚品行清潔的阿爾比宗派 (Albigensian Cathari) 主張不必藉助於種種聖禮也能達到『純潔之境』 (Purity Catharos = pure) 的時候，那明明白地是說掌管此項聖禮的牧師階級已經不合時代了，教堂再也沒有保持財產以便供養此輩牧師的必要了。由負擔年賦 (tithe ridden) 的農民和市民們來看，或由久已想把教會的廣大而豐裕的地產收歸自己宗主權 (Suzerainty) 之下的封建諸侯們來看，這乃是一個非常富有誘惑性的學說。如果要想保全那些牧師的職位，則這種邪說便不得不設法滅絕。於是拉忒藍大會 (Lateran Council) 就議決組織一個宗裁判法庭，而大牧師們也把巡查人心的職務付託給聖度明哥 (St. Dominic) 的聖軍軍隊。這時神話又變成一種公家事務 (Public service) 而恢復了牠的『不容異說』的態度。爲了抑制邪說以便保持神話的純一性 (homogeneity) 不惜把炮烙之刑與拷訊之刑，火刑與監禁之刑，兼施並用。

當十四、十五、十六各世紀時，震撼歐洲的一切劇變都受支配於同樣的裁判手續。即如約翰胡司 (John Hus) 主張允許俗人拜領兩種聖餐，陸德 (Luther) 否認『聖肉實在』 (real presence) 之說，喀爾文 (Calvin) 提

倡神惠之理論 (divine grace) 都足以危及教堂財產的根據。結果，人們的物質利益受侵害了，掠奪的行為被惹出來了，可怕的戰爭也隨着而發生了，蓋因當時一般人的心理都以爲宗教上的神話和種種制度結着不解之緣。所以如果要想把神學上的某一個觀念加以改革，而同時又不要惹起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危機，那是決不可能的。受威脅的種種制度往往會有報復的作用，這時「不容異說」的態度，就好像是和平的一個保障了。

並且，改革家對於他們的敵人也是一樣地不寬容，陸德對人講道，主張討伐提倡再洗禮論的預言家來丁約翰。(John of Leyden) 拜恩的農民們雖然都是陸德的門徒，但因為他們否認幾種封建的特權，而所持的理由卻是福音書上沒有如此規定的明文，所以陸德也贊成用武力把他們削平。自從喀爾文把日內瓦的政府建築在「神惠」的教義上面以後，他就想把米雪爾塞爾維托 (Michel Servet) 處以炮烙之刑，理由也是維持公安，一如亨利第二要把度部耳社長 (President du Bourg) 和印刷工人亞田多雷 (Etienne Dolet) 處以火刑的理由一樣。

「不容異說」的態度在政治上的必要

但這種用暴力來保持教義的辦法是不無危險的。教會法庭爲了施行牠的判決不得不藉助於俗人之手。俗人雖是遵行牠的命令卻往往會利用牠。例如撥伯特朝的歷代國君就會利用異端裁判法庭沒收土地的宣判，把他們的宗主權擴充到南部法蘭西的全境，他們對於度明哥的聖軍很能支配，甚至能利用聖軍來壓迫教堂；腓力

四世把札克麻勒 (Jaques Mole) 處以炮烙之刑以便鎮壓聖堂武士團，因為札克麻勒是他們的頂頭的領袖。腓力二世利用異端裁判所來侵犯卡斯提爾人的各種自由權。亨利八世藉口他是「護教者」(defender of the Faith) 竟宣布他自己是英國國教的唯一領袖；日爾曼的國君們以陸德派的教義為標榜，法蘭西的國君們之所以攻擊新教是想藉此和羅馬教皇訂立契約，以便作本國的牧師首領。

於是到了十七世紀的時候，差不多無論何處的教會都和君權團結起來了，君政的神話和基督教的神話合而為一了，結果君權變成絕對的了，自此以後國君再也不能容許宗教上的爭論了。由路易十四看起來，亨利四世之所以承認新教為合法不過是因為時代的變遷迫得他不得不採取這種權變的辦法罷了。侮辱教皇和放逐新教徒不過是同一政策的兩個方面，南特敕令 (Edict of Nantes) 之廢止和一六八二年的加和堪宣言 (Gallican declarations) 把精神統治的工具供獻給國君，而加以確實的保證。

於是基督教的神話便和各項君主的制度密切地聯合起來，全歐洲到處都如此。等到君主制度衰落之後，基督教的神話依然附着在各項國家制度上面。即便是教皇廳所確定的完全一致的教義（這是在宣布教皇無過之後確定的）也不能勝過這種事實上的形勢。

由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時候，德國天主教的主教們宣講對法作戰之熱烈，一如法國的主教們宣講對德作戰。羅馬教皇既不能加入任何一方，又不能強使信徒們守中立。當神話與制度合而為一的時候，制度總是居於主宰的地位，而神話不過是一個附庸罷了。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根據三千年的經驗推論出一個新的原則來。據一般人的假定，都以爲時常糜爛世界的紛擾和流血，完全起於宗教上的熱狂，但這種假定是錯誤的，宗教上的種種神話起初都是多形的，極易變化的，所以對於異說也是持寬容態度的。只有變爲政治制度或社會制度之精神的基礎時，這種神話纔希望達到不變的一致。一到這個階段時，對於教義持異議，就不啻直接攻擊此項制度了。制度爲防護他自己不惜用「殘害」(persecution)之辦法，撲滅異端。所以神話之不容異說並非牠自己要如此，卻是牠的政治上的職能叫牠不得不如此。只要這種職能一經卸去，牠依然會恢復牠的寬容態度。我們只須看一看現代無國教的各大國就可以相信此點了。牠們的國民，大多數依然擁戴得救的神話，(myth of salvation) 只不過牠們不再把此項神話和各種政治制度或社會制度聯合到一起罷了。所以牠們不再認爲所有牠們的國民必須都承認崇奉同一的信仰，只於認爲每個人的信仰都應當受國家的尊敬和保護罷了，以前互相拼命爭鬪的各宗派，現在都各自過和平的日子了，雖然他們的信仰之熱誠，不會有絲毫的減低。只要各個人都把「得救」看作各自的私事，認爲牠只和個人的良心有關，對於社會團體之生活並無重大的關係，就不難互相寬容了。只要政和教一經這樣分開，則教會就能平和和地過日子，平和和地向前發展了。

誠然有些國家，牠們的國民大多數是天主教徒，牠們的天主教牧師還沒有承認宗教是一樁私事。在這些國家，天主教堂還和某一些政府機關或某一些制度結合在一起。並且這些國家——如法、義、西班牙——時常會發生一種熱烈的反牧師運動，所以還沒有得到宗教上的和平。要打破宗教狂，只須把神話和牠的政治職能分拆爲

二就行了。

還有一點應當附帶說明的就是：這個原則適用於凡俗的神話，一如其適用於宗教的神話。

民政的和革命的神話之不容異說

十六世紀時，鎮壓異端的政策，遇到了一個難關，蓋鎮壓異端的目的原在鞏固社會的法令，這時卻反使社會的法令陷於嚴重的危局了，人們用基督教神話的名義作出種種激烈的舉動，結果，基督教的神話卻不能不代人的負咎。蒙旦 (Montaignés) 的懷疑主義產生一班自由思想者，(esprits forts and libertins) 他們受夠了路易十四的壓制，其反動力一發而不可制，結果就鼓吹起來十八世紀的哲人運動。他們理想中的國家制度是要擺脫一切形式的信仰，擔保個人的獨立，並且防止個人間的軋轢。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這時已被列入不可讓與的人權之中。盧騷根據他的社會契約說建立起凡俗國家的神話；所謂社會契約說的意義就是：人類社會的基礎並非建築於上帝的意志之上，卻是建築於一個社會裏面的人民互相訂立的契約之上。

這個新的神話把主權由君主的手裏移交給人民，當時的人都以為這乃是擔保人民不受壓制的一個最高的保證，理由是：現在行使威權的，和受威權支配的都是一個人了。

革命爆發了，中等階級既已用革命的手段把君主推倒，就決意根據盧騷的「人民之主權」的神話把他們的事實上的威權弄成法律上的威權。最初把「人民之主權」規定在憲法中的是國民會議 (Constituent As-

sembly) 後來是國民大會 (Convention)。從那時起，『人民之主權』就變成威權的基礎了。在以前，這不過是哲學家們互相討論的一個題目，現在一轉瞬之間就成了神聖而不可思議的教義了。共和政體是純一而不可分的，如有頑強的異端擅敢否認這個新的信仰，就一定會被牠送上斷頭臺，恐怖時代的旗幟上面繡着這樣奇怪的紋章：『自由，平等，博愛，否則勿寧死。』凡俗的神話，對於異說現在也不寬容了，一如以前的宗教的神話一樣——而所持的理由也是相同的。這已經成爲一個『公安』(public safety) 的問題：亦即建築在這個神話上面的社會制度之安全問題。無怪乎人們會藉着自由這種神話的名義而壓迫『自由』了。

就是現代的民主政體論者也還沒有擺脫了這種必要，例如法國固然已經把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列爲不可讓與的人權，但在該國的國立學校中，卻連『上帝』這個字都禁止提及。這並非由於宗派的精神，如他國一般人所假定的，卻是因爲領導宗教訓練的天主教牧師們當時還和共和政體立於敵對的地位；因爲他們會拒絕承認教會和國家分立的原則，所以如果不是這樣，恐怕他們會藉上帝的名義來反對共和的神話。反之，同是這個法國，牠對於無政府的陰謀卻不得不制定非常的法律，尤其是要禁止反軍國主義的宣傳。所以建築在『自由』上面的制度卻不能容忍反對牠自己的『自由』。

這並非『中等社會』的世界所特有的『偽善』，像一般社會主義派論者所常常說的。試看俄國極左派各黨流行的『驅逐出境』的狂熱病，就很夠證明連他們自己也是持毫不寬容的態度了。俄國的共產主義剛一得勢就把新聞的自由給取消了。正教教堂在衛城 (Krem lin) 的範圍內執行種種儀節和巡行瞻禮是許可的；但是

政治警察 (Tcheka) 對於一切唱異議的革命社會黨卻用一種不光明的威力追捕、監禁、放逐他們，或把他們處以死刑。我們只須把下面這一點考慮一下，就能明瞭這種待遇不同的緣故了：蓋教皇和追隨教皇的無知的大眾農民，在蘇維埃的組織內是不會有什麼影響的，所以蘇維埃制對此是寬容的，不過牠們不參加罷了，但是在共產黨的全體黨員中，只要有一兩個「唱異說者」，則無產階級的獨裁制馬上就要受到危害了。

所以歷史給予我們的教訓是這樣的：一切制度都是不容異說的，無論領導者是國王也好，教皇或皇帝也好，行政長官（希臘）也好，貴族（羅馬）也好，中產階級也好，社會主義者也好，無論那種制度都不能贊助反對牠自己的「自由」。

神話與進化之對照

但是我們切勿以為一種法定的神話，其重要和意義全部都來自牠背後的武力，如果這樣想就錯了——蓋神話的職能的確確地是在於把威權給予武力。神話要叫人服從，必須得到人家的同意，必須一般人的心理都情願接受牠纔行。牠必須裝出「真理」的樣子，不叫人看出牠是一種「有用的理想」(useful Fiction) 但牠原本不過是大众的想像上所生出來的一種虛構的東西罷了，所以牠的裝腔作勢誠然是要費些力氣的。

在黑暗時代，所謂「真理」這個抽象的觀念幾乎還沒有一個人曉得，則「真理」是什麼，當然用不着解釋。只須藉災異、神使和奇蹟把神的力量表顯出來，就很夠證明神話的實在性了。聽了女巫的預言，人們就堅信愛波

羅 (Apollo) 的威力，一點也不敢懷疑。摸一摸聖徒的遺物，則疾病霍然而愈，就不啻證明基督教義確是真理了。

但等到哲學思想漸漸進步，什麼是真理，什麼是錯誤的抽象性質漸漸分別開來，那時，神話便不能不拿出必要的證據給人家看了，只要一般人還都承認：人之認識「真理」完全要靠着聖書 (Sacred Books) 上所記載的神的默示，那就只須把這個通行神話的內容怎樣和聖經符合一致，給解釋出來就很夠了。教會的神父們（如聖湯姆士，巴索提等人）所作的浩瀚的註釋工作，其目的就在藉着文字上的巧妙解釋，證明威權（無論是皇帝的，教皇的，還是國王的威權）都是根據聖經的，但也許會有人反對，說：真理也可以藉着理性上的作用而貫徹呀！就承認牠是如此吧！許許多多的政治哲學的論著，其目的不就在交替地證明君主政治和帝國，獨裁政治和民主政治都和理性上的種種假設相符合嗎？

無論那種神話都會藉助於一種巧妙的精神努力，在某一個時代列入「真理」的班次之中。但是直到最近為止，無論那一派哲學家不是都會主張「真理」的重要特性是「不變」的嗎？這個信仰，一來是受了幾何學的影響，因為幾何學上的定理 (theorems) 都是抽象的，照定義都是固定而不變的；二來是受了一種不精確的天文學研究的影響，因為那時的天文學者見到行星的移動帶有規則性，而恆星表面上又好像是不動的，就假定一切自然律都具有「不變性」(immutability)。但是現代的科學和哲學都漸漸把這種觀念打破了。自從達爾文出世以後，自然界中就沒有所謂「不變」了；自從「太陽系易於移動和星雲及星都是有生也有死的」學說成立了之後，天空之中也沒有所謂「不變」了。到最後，「不變」的觀念甚至被逐出於人類的心理之外，蓋現在的科

學家追隨着傍卡累(Henri Poincaré)的足跡，已經把『科學的真理』(Scientific truth)和『不變的定律』(immutable laws)只看作一種便於研究的假設，在有用的時候還把牠們看作真實的，一旦和經驗矛盾，就立刻把牠們丟入垃圾堆了——假設永遠是暫時的。

但是一般的大衆至今還沒有和這個『宇宙相對性』(universal relativity)的新觀念熟識起來。他們仍然相信『不變的真理』(immutable truths)。所以如果有人硬說通行的神話是建築在幾個『永恆的原理』的一些關聯之上，則這神話便很容易沾染上此項原理的永恆性了，這誠然是一個極嚴重的事情。因爲人類社會在技術發明和政治事變的影響之下，總是繼續進化而不停的；所以各種制度都必須按時順應於新的情勢，如果順應得遲延一些，則整個的政治制度就會陷入危境了。

假如神話的存在僅以效用爲理由，那末牠就容易改變得多了。但如果一旦牠把『不變的真理』當作根據，便馬上變成一件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這時如果還有人擅敢用一種新的道德觀念要把牠取而代之，人們將認爲那是用謬見來代替真理，不僅社會的基本原則將因此而推翻。就連倫理的和科學的基本原則也將同時被推翻了——這簡直是大踏步地跑回野蠻狀態！

愈是人心開化的地方，阻力也愈大。無論那一個黨，那一個時代，都有牠的幻想家。如果他們的理論和他們的主義與某種很確定的利害關係相一致，則他們支配人心的力量將更特別地大，這時利己主義的反感一變而成爲獻身國家的思想；感情披上了理性的外衣，而理性有了感情的勇氣。到了這時，個人將被一種堅決的信仰支配

了他的全身；便再也不能容忍矛盾的主義了。對於和他意見不一致的人們，他將從心裏頭認為他們懷着一種惡意或詭詐之心。他決不肯和他們妥協。等到一旦他掌握了「真理」，他便很容易成為殉道者，或執行「異端」的死刑之人，至於究竟成爲前者或是成爲後者則須看環境如何。理智上的武斷主義向例是會激起大衆的狂信，而驅使大衆跟着牠走的。

神話既從真理取得牠的不變性，牠就將把這種不變性轉送給以牠爲基礎的制度。於是一方面神話把牠的武斷的固定性賦予了制度；他方面國家也把牠的「凡俗之手」的威力，給予了神話，藉此好鎮壓反動。無論那種革新運動所遭遇的無限大的阻力都是這樣成功的。

只要種種行政制度還很能順應社會企業的需要，即便有以上的情形也無妨。但一到此項制度需要改革的時候，那就會發生衝突了。那時守舊派定要一心一意攔阻時局的變遷而把牠拘限在神話的不變的結構以內。『效用』(utility)也加入戰團來抵抗『真理』(Truth)結果一定會發生種種矛盾的辦法，混亂和暴動。

人類社會是不能不進化的，而荒誕的武斷主義就是社會進化的一個最可怕的阻力。

註一 很奇怪，柏拉圖好像是會承認這句話的。據他所著的克賴吞 (Crito) 一書，蘇格拉底因爲他的弟子們曾把逃避死罪的方法貢獻給他，最後就解釋給他們聽，說是城邦的法律必須遵守，無論牠怎樣不合理，怎樣不公。這位哲學家的最後一句話就是用譏刺的態度來表示服從他以前所侮慢和判處他死刑的諸神祇：「克賴吞不要忘記拿維，維祭，祭神呵！」

註二 照那時的習慣，出口貨是不應禁止的，但他却命令異端裁判所把發送馬匹到法國境內去的人當異端懲辦。

註三 當國民大會迫於國內外戰爭的危急而建立了公安委員會的獨裁制時，同時却仍贊成理想中最自由的憲法。羅伯斯庇爾擺出十足

神學家的態度，把「自由內的威權」說得玄之又玄，以便設辭避開這個無可掩飾的矛盾。我們應該還記得盧騷是贊成國教的，因為國教一旦為多數黨所承認，便可強迫着一切的公民都信仰牠了。這時唱異議者便不會是破壞社會契約而須受充軍的懲罰了。

註四 參看 Jules Sageret: *La Révolution philosophique et la Science*。

第二章 神話之盛衰消長

雖然有種種阻力，但人類社會還是繼續進化的——那就是說，神話最後總是會失敗的；不過長期間的阻力和社會及政治上的紛擾，不消說，是不能免的。如果要想了解此項循環往復的社會恐慌受支配於何項原則，必須把歷史上各種神話，如何發生，如何傳布和如何消滅研究一下纔行。

神話怎樣適應各種制度

我們如果把每個社會都必須具有的四個重要原素：即經濟企業，行政組織，政治制度和神話四者考察一下，就能明瞭牠們都是在繼續不斷的進化之中，不過各有各的進化原因，各有各的進化速度罷了。歷史上那些多少會令人感動的滄桑之變就是由於這種種適應的程序和排壅導塞的程序而起的。政治家的第一個使命就是作這種適應的工作；可是在他們之中幾乎找不到一個不爲利害關係所動的。他們既不能不倚靠某一個等級，某一個朝代，某一個黨派或某一個社會階級，他們就只好替這個階級或那個黨派盡力，纔能保持他們的權力。即便是頂專制的君主也不得不低首於這種命運，否則將爲四圍的陰謀家所乘。從前曾有人說過就是羅馬的最初的皇帝和俄國的歷代皇帝所行使的專制威權，也因為怕暗殺的緣故而不得不稍形緩和。(absolute power temp-

red by assassination) 這種說法是不無理由的。

政府也許會爲了領袖階級的利益而改革現存的制度（無論是經濟的，社會的，軍事的，或財政的制度），因此危及私營企業的穩固與安全而惹起反動。反之，私營企業在技術發明的影響下漸漸進化，也許會有一天要求改革行政組織，而爲政府所不許。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運動都是時時會發生的，不過二者的步調不同，很少一致，即便偶爾一致，也是爲期很短。要想調和二者使勿發生阻力，必須每個公民人人都正確地熟悉全體的需要，清楚地了解滿足此項需要的辦法，並有利用此項需要的意志力。要這樣，必須同時具有智慧，修養和能力纔行，但同時兼具此三項特性者是很少的；即便在羣衆之中，愚者的數目不如我們所想像之多，但智者確是僅佔少數的。大多數都僅受過很少的教育，就是那些同時兼有智慧和修養的人，大都也只願爲他個人的利益而運用此項優越的特性，不願冒險爲社會奮鬥。所以由此我們可以說不管在那個時代和那種制度之下，國家的事務都是僅由少數兼具智慧，修養和能力的人去處理的。這個中堅階級的工作或難或易，須看大衆對於他們所持的態度是熱誠的，被動的還是抗拒的而定，這時我們就得把神話和統治階級的關係一向都有怎樣一種變動的情勢來研究一下了。

舊神話之逝去與新神話之產生

在神話剛一發生的時候，或只要仍在牠自然生長的時期之中，由好認真的人們看起來，牠不過是一團粗陋

的迷信而已（例如羅馬的政治家起初對於基督教的態度就是這樣，）至多也不過是意識錯亂的幻想家所臆造的烏托邦而已；一切的天才起初都被人看作瘋子。但如果到了一個時候，那些尚未安身立命的人們，青年們，無產階級們和被社會擯棄的人們，因為他們的志願受了抑制，和野心受了挫折的結果，而投到這個神話的旗幟之下，則無論是迷信也好，烏托邦也好，都會由一個簡單的觀念而變成一種「理想的力量，」因而造成一種「社會運動。」

這種「社會運動」馬上會喚起安身立命的階級表示極端懷疑的態度，他們之所以懷疑，並非由於他們看着這種運動太新奇，卻是由於依附此項運動者和他們立於敵對的地位。政府當局受了安身立命的階級的贊助，勢必判處此項運動的罪狀而加以壓迫，這種辦法也許會使這種運動的影響為之緩和，但很少能把牠撲滅。

但各項現行的制度有時會違背了牠們的使命：譬如，牠們不僅不能保護安身立命的份子而反有使之減少的趨勢。這種情形在羅馬帝國的歷史上可以看得見。當時因為缺乏合理的財政制度，習慣上，對於各省的課稅都是採取「總徵制」(to tax the provinces en bloc) 辦法就是叫地主們負責稅(tribute)的攤配和徵收之責，把應繳給政府的總數負責徵收起來。自從第二世紀起，皇帝的需要愈來愈大，（他們既須利用武士打開帝國的天下，便不得不付酬金給他們，）結果迫得小地主們不得不把土地賣給富的鄰居。這種制度的結果，帝國裏面的中等階級就漸漸消滅了。土地被徵收的小地主看到他們自己的種種政治權利被人剝奪了，心懷不平，就和尚未安身立命的階級聯合起來，於是大批的小地主加入基督教會，並把一種新的原素帶到教會中來，這就是教育

和管理的學問，這是以前在奴隸和一般初期的信徒之中都找不到的。這樣一來，他們自然會做了教會的幹部人員，在第三世紀時，主教，執事（Deacons）和教會中的護教論者，就都把他們當作候補人。他們把愚昧的羣衆變成有組織的勢力，使他們有了抵抗的能力，以便團結起來對抗當局的威權。藉着財政制度的幫助，此項由智識階級加入進來的新教徒漸漸增加，而政府中的人員則好似有了一種「向外滲透」（exosmosis）的作用一般，漸漸地減少下來。到了一天，羅馬帝國只好和這個新的神話攜手。否則惟有自趨滅亡——結果就是尼開亞的盟約。

在現代史中也可以找到一個相似的運動。自從十三世紀的時候起，橫跨歐洲大陸和地中海的大商路重新起來了，里昂和波埃爾的市場也設立起來了，結果中等階級纔漸漸增長起來，因為在以前的封建制度之下，是決不適於中等階級的組織和安全的。他們起初是擁護教皇制度的神話的；藉着所謂「剃髮式」（tonsured）的制度，教皇准許他們有向宗教裁判所控訴之權，並且擔保他們享受成文法上所規定的安全。把因諾森三世治下的教皇政治變成成功基督教的「最高法院」者，就是這一班中等階級。然而不幸這裁判所毫無執行制裁的力量。

一向都在窺伺機會的揆伯特朝諸王，到了此時便要因利而乘便了。凡戴有「國王的市民」（Burgess of King）這個頭銜的，都准他有向國王法庭或市長法庭控訴之權，而「巴力門」（Parliament）憑着他的統一的法律制度和比較確實的制裁力，又戰勝了教皇的「最高機關」（Officialities）。從那時起，中等階級便覺得靠國王來保護財產和職業比較靠教皇更適宜些。國王得到了他們的切實幫助，不僅可以對抗封建諸侯，並且可以對抗教會，國王所以能夠必操勝算，國王的仁慈的力量所以能夠一變而為專制的力量，完全都是受了中等階級之

賜到了太陽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the 'Roi-Soleil') 的時候，這個運動就達到極點了。路易十四的『平庸的中產階級統治』(mean bourgeois reign) 是最不合乎聖西蒙 (Saint Simon) 的脾胃的。

不幸君主擺脫了一切管束之後就要濫用威權了，這是我們早已料到的，宮廷的經費和王朝戰爭的費用日益加重；貴族的地產和教會的財產因爲不必納稅的原故，一天比一天地增加，一天比一天地擴大，而平民的負擔，卻一天比一天地加重。到了最後，法國的中等階級便把他們自己的偶像打倒：路易十六既被送上斷頭臺之後，他們便打着民主政治的旗號建立起他們自己的政府來了。

無論改革運動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新神話之產生總會有衝突的現象爲之先兆。經過了兩世紀無用的殘殺，羅馬帝國的元老院纔覺悟容納基督教會的必要；也得經過兩世紀的苦惱，然後基督教纔準備和君主的主各項制度携手。

必須經過克林威爾 (Cromwell) 的出世，查理一世的斬首和詹姆士二世的推倒，然後專制君主政體的黨徒們和英國中等階級的代表們纔準備接受維廉三世 (William of Orange) 的立憲君主政體。也只有經過了流血的恐怖時代和拿破侖的獨裁政治，然後精疲力盡的敵黨纔肯接受路易十八的憲章，如果各黨都肯傾聽彌拉波 (Mirabeau) 的主張，這憲章在一七九二年時就早已實現了。

但當時正在兩種神話剛剛扯頭的時候，妥協幾乎是不可能的，必須兩種之中已經有一種消滅，至少也須有一種不能再作政府的工具時，然後雙方才能達到議和的境地。

新神話的勝利及其普遍的擴張

但當勝利的神話和舊制度間的調和作用剛纔告成的時候，一向都是分崩離析，脆弱無力的社會團體，這時就馬上會得到一種意想不到的精力與活躍。共同的意識也發生出來了，社會的各細胞也知道遵守紀律了，並且毫無抵抗地服從神經中樞的命令了，於是所得的結果竟是異乎尋常的。

我們試先看一看十一世紀時歐洲的封建制度是怎樣情形。那時的封建制度是這樣一種組織：好亂的貴族專心一意地從事私鬪，繼續不斷地和其他采邑打仗，各過各的生活，甚至連封主的命令都加以拒絕，如果他們主樓（*lounjon*）間的行軍超過兩天的話。突然之間，克呂尼的僧徒們創出了『至尊的教皇』（*Sovereign Pontiff*）或『上帝的代表』（*Vicar of God*）的神話，以便鎮服這班紛紜擾攘的暴徒，同時烏爾班第二則在倡導第一次十字軍的東征。於是許多自私自利的貴族離開了他們的領土，不再為他們的近親復仇，拋棄了他們的土地財產，勇往直前地走上戰場，寧死於異鄉以便拯救自己的靈魂，並由異教手中奪回『聖墓』。

不管累次的失敗，不管大軍所至，生靈塗炭，城市為墟，在連續的六個世代當中，教皇迭次發出了東征的命令，竟有八次獲得人們的聽從。

但這並不是一種稀有的宗教現象，也不是僅只宗教上纔有這種現象，在一七九一年時，列國之中沒有那一國再比法國弱的了，她的府庫空虛，她的貴族和中等階級勢不兩立，她的國君失了人民的信任，她的僱傭兵在宮

門之外和人民肉搏，歐洲各國的外交家不乏眼光敏銳之人，都以為法國已經到了滅亡的時候，他們都忙着分割從東方得來的戰利品，把法國撤在一邊，甚至有懷着野心要到巴黎去戡亂的（例如不倫瑞克公爵的宣言。）

這時「國家的神話」(the myth of nation)發生了，牠擺脫了種種封建的特權而獲得獨立自主了，於是成千成萬的農民們起來擁護牠，他們得不到餉精，甚至往往要忍飢耐寒，但他們竟能夠把「暴君」(tyrants)的軍隊一舉而擊敗之。他們情願死在歐洲的任何戰場上；只要他們想像中還存着「革命的獲得物將有喪失之憂」的觀念，他們就一定會毫無怨言地服從拿破崙的嚴酷的獨裁政治，並且忍受租稅的負擔與徵兵制的痛苦。只要新的神話把「共同意識」賦予了羣衆，而羣衆一旦得到了這種意識，他們一定能夠無限度地忍受任何犧牲，這不啻是列國歷史上的神人時代。

一旦因為某一些事件湊巧地連續出現，神話和制度二者竟能僥倖地結合起來，這個結合的東西馬上便會發生一種擴張的力量，把牠自己傳播到極遠的所在。而決不會被二者結合的發祥地所拘限。

神話不僅是一種信仰，也是一種希望。在羣衆之中，總會有一些被抑制的願望，未滿足的要求，時時激發起一種戀慕改革的模糊觀念。非等到勝利的神話的影像在遠遠的地平上上升起來，他們始終是潛伏而無所表示的；但一旦這個影像上升起來，他們便立刻抓住了這個新的信條，種種的要求，種種的志願便都起而環拱着牠，好像有一種磁石的作用似的。

自十八世紀之始至十八世紀之終，英國議會政治的勝利使得法國的哲學家夢想着人民的平等，夢想着思

想的自由和政治的力量。等到法國革命發生，夢想變爲事實，中歐各國人民的種種願望便都被喚醒了。在五十年之中，只要巴黎發生一次叛亂，表現更向民主政治前進了一個階級，（例如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的情形）全歐洲大陸，從荷蘭到匈牙利，從波蘭到義大利和西班牙，便都如響斯應地爲叛亂與革命的空氣所瀰漫。

在不久以前我們不是也看到俄國革命有什麼精神上的效果嗎？一九一七年的時候，革命的思想還好沒

有覺醒似的：所有各派的社會黨都無精打彩地跟隨着中等階級，爲「公理」（War for Right）而爭。正在這時忽然傳來列寧已經奪到莫斯科政府的消息。於是馬克思派的階級鬭爭的神話便開始把人類的精神刺激起來。自從遠處東北的俄國突然建立起「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全部歐洲便被牠的神祕的革命學說鼓舞起來。在以前的時候，這種學說卻好像是被戰爭的氛圍所掩蓋似的。所有的勞工，所有的智識階級，所有懷抱着強烈而含糊的願望的人們現在都突然地宣布他們自己是布爾塞維克主義者了，但事實上他們對於俄國革命的種種環境和其確實的歷史卻是一概不知的。他們之所以革命，並非因爲受了列寧的政策（或這種政策的實效）之影響；事實上不過因爲他們心中所懷的潛在的想像受了一種表面上好似成功的事變的激刺，而突然的暴發出來罷了。

無論那種神話，只要一變爲現實的一部分（無論怎麼小的一部分），牠便馬上會獲得一種幾乎毫無限制的擴張力。牠的活動決不會限於牠的發祥地之內；卻是不爲任何界限，任何物質障礙所阻撓而播散到四方，恰好像海士層電波能穿過任何的固體物一樣。不管民族，語言，習慣有什麼不同處，全部歐洲從一世紀起到六世紀爲

止都遵奉基督教的信條；十世紀的時候，都遵奉封建制度的信條；十二世紀時，神權政治風行一時；十六世紀時，到處都建立起君主專制政體；十九世紀時，民主政治獲得了普遍的勝利。

雖然在事理上看，國家主義好像會使國家與國家立於敵對的地位，但牠也得受支配於一種國際的律動（international rhythm）。當德國人和意大利人決意要脫離法蘭西霸權的羈絆時，他們也得從法國模擬到國家的思想，從英國剽竊到代議政治的觀念。

所以每種神話都有兩個方面：即現實的方面和理想方面。當神話和制度尚在分立的時候，牠不過是一個模糊的願望，一個大眾的迷信，一個烏托邦的觀念，在社會生活上一點實際的價值也沒有，可是牠一旦變為這些制度的任何一部分，牠便把一個新的生命賦予了牠們；這時神話已經創造出一個現實來，從這時起，牠便得到一種不可抗的，而且具有向外輻射的擴張力了。

歷史上幾個重大的時期

緊跟着便是一個漸漸遲緩下來，漸漸安定下來的時期。這時，私營企業，各種制度和各種理想之間，藉着一種很完美的調和程序，已經建立起均衡的局勢來了，同時，個人也繁榮起來了，國家也強盛起來了，極輝煌燦爛的美術也隨着發達起來了。

伯里克里斯在雅典施行『勸導的獨裁政治』（dictatorship of persuasion）約有二十年之久。雅典的民

治，依戀着牠的諸神祇，追隨着牠的諸長官，又在一班「異人」的統治之下——他們的威權得自平民投票——結果就產生出歷史上最完美的社會風紀。雅典會達到富強的極點，並會開放着極美麗的社會藝術（Collective Art）之花，這是世界上所未前聞的。

羅馬帝國在安托奈那（Antonines）的統治之下，把和平之神迎進了地中海世界，到處都建築起道路，溝渠，浴堂和劇場，也曾演出和雅典相同的奇蹟。牠在各省建立起各種公用事業，做爲各省向牠納貢的報酬。牠們的人民把具有哲學家氣度的皇帝崇拜得如同仁慈的神祇一般。

當因諾森三世的時代，基督教世界，憑着聖彼得的地位，已經握有最高的裁決權，能替私人間的口角和諸侯間的爭論作公斷人，並且是仁慈憐憫的施主，又是信徒們的保護人——幫助他們抵禦邪教。所以這也是一個重大的時期。

路易十四當朝的極盛時代又可算是一個重大的時期。他的專制威權使得一班好亂性成的貴族情願遵奉紀律，又使得中等階級的企業得有充分的發展，以致次一個世紀之中，所有歐洲各國的政府都把凡爾賽當作榜樣。

最後一個重大的時期應該算到英國人所說的維多利亞時代（這個稱呼是很對的。）當那個時期之中，大英帝國努力要在擁有地產的貴族階級和商人階級之間，在雇主和工會之間，在工業化的英本國和農業化的屬地之間，建立起一個極完善的均衡局勢，以致英國首都成了衆望所歸的焦點。

在所有以上這些重大時期之間，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經濟組織，行政制度，政治制度，和通行的神話四者間的諧調。必須這四種要素之間已經有了充分的調和，然後社會團體纔能達到富強的頂點，文明的極巔。

神話的衰落

不幸這種均衡的局勢是極其危險，極其不穩的，這顯然由於這個均衡局勢間的種種力量總都在變動之中。在一個掙扎的時期（這也正是牠的擴張時期）之後，每一種神話都有牠的衰落時期。要想明瞭牠們一盛一衰的情形，必須先把領導國政的人們的性情和成就研究一下，尤其要知道隨着演進的各時期之不同，他們之間有怎樣意外的差異。只要一種神話尚未脫離牠的萌芽時期，同時還正在和種種制度，種種已經公認的理想爭鬪的時候，牠的傳布工作一定是特別地難，特別地危險。這時，作傳布工作的人，大概總要受到大眾的誤會與恥辱，受到已經安身立命的階級的懷疑，和當局的迫害。一個頭腦冷靜，注意週到而且好作打算的人，一定不願叫他自己陷入此項紛擾之中，因為如果一旦陷入，便不僅不會得到什麼好處而且還會遭受重大的打擊。必須是坦白率直勇往直前，而且還抱着一種熱烈的信仰，肯為理想而犧牲一切的人，才願冒這種危險。

這是神祕家的時代，殉道者的時代，出身微賤的人受盡了同時代的人們的誹謗與辱罵，被人們看作瘋子，看作無政府黨，看作幻想家，但是到了後來，他們的影像也建立起來了，英雄，聖人，先覺等等的尊號也加在他們身上了，而替他們建影像，替他們上尊號的人，正是以前誹謗他們的人的子孫。

當神話一旦勝利的時候，亦即當如何把神話與舊的制度俱都加以改變，以便使二者得相調和的問題一經發生的時候，便馬上又有另外一種工作，其麻煩費力毫不減於前者，而且需要另外一種人（或具有別種特性的人）來作。這時被時勢迫得改變信仰的人，決意要保留他們以前所有的特權和地位；而勝利者也定要把自己的理想充分實現出來。由前一種人來看，一切犧牲都是不公的，由後一種人來看，將就一點，妥協一點就是叛逆。

神祕家是生來就不適於作這種調和、妥協的工作的。這時所需要的人才，是聰明機警而具有務實的心性，能辨別什麼應當保留，什麼應當破壞，又有充分的能力，以便貫徹他們的主張，充分的溫和，以便應付各種反動的傾向，並防備牠們聯合起來造反。這時代是眼光和人格都偉大的政治家的時代；他們須是：具有務實的心性，肯獻身於偉大的主張，並具有建立國家的本領的人。歷史上的伯里克里斯，奧古斯都，安布洛茲，因諾森三世，維廉三世，黎塞留，華盛頓，的士累利，畢斯麥等等就是這種人。

但等到調和的程序已經完成，大眾公認的制度已經確立，反動勢力已經消滅的時候，威權的運用就不再需要什麼特殊的才幹了。打個譬喻，好像到了機器已能自由動轉的時候，駕駛人的工作就容易了，就危險少而利益多了。這時平凡人的時代快要來臨了，粗鄙而貪婪之輩都出頭了，衆人都在爭奪權位，他們的目的不在貫徹一種偉大的主張，不在實現一種巨大的計畫，而僅在追求個人的利益和虛榮。

他們既沒有什麼特殊的才幹，要想抓到威權而永久保持之，只有一種辦法，那就是迎合他人的虛榮心和貪慾心。於是利害相同的就結成團體，結成朋黨，黨徒們爲了名和利，擁戴一位領袖而團結起來。到了這時，種種弊竇

就要開始誕生了，而且弊竇所假託的神話愈得到人家的崇敬，則弊竇的繁衍便亦愈快。

這個時代就是政客和腐化的時代了，這是無論那個隆盛的制度之下也會有過的。雅典的好雄克利溫（Clon）（阿諛）人民以便和他的朋黨共分職位。羅馬的貴族們謀求總督之職好到各屬省去括地皮；羅馬的將軍們以酬金（donativum）為餌，驅使他們的士卒去攻打羅馬；封建諸侯們把主教之職分給他們的私生子，好讓他們去爭佔主教的進款；十五世紀的教皇們把教會的金庫分給他們的子姪；各國國君的嬖人，臣僕，妃嬪們和包稅人串通一氣掠取公帑。最後，到了我們自己的民主政治時代，領袖們之中竟也有接受巨商的津貼，爲了他們的主顧的利益而施政的。

無論怎樣基礎鞏固的制度也得受支配於這個腐化的定律。蓋一個制度的成功和腐化有連帶的關係。在起初，臣僕們，嬖人們和供他們驅使的走狗都能成爲鉅富乃人所共知的事，人們都把他们所得的財富看作擔任職責和服務的報酬，所以這時決不會出什麼事故。即便有幾個好批評的人要提出抗議，也因為貪取一份贓物而不作聲了——於是受惠者愈多，弊竇也愈多。

甚至到了一個時期，當局者會把他们個人的利益和公衆的利益（就是他們受人付託來管理的）看作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路易十四屢次聽到人家說上帝賦予他全權來支配他人民的財產和身體，他終於信而不疑並且爲了西班牙的王位繼承權，不惜以國家爲孤注之一擲，因爲他堅信法蘭西的利益和他的朝廷的榮譽是分不開的。他聽信波緒亞的話，以爲他自己只應對上帝負責。有一次他遭遇大難時，曾喊道：「上帝或許記得我替他

作了什麼事情吧！』由此可知神話總會替牠所掩護的弊竇找到合法的根據。

到了最後，破裂點就要發現了；大眾對於有益的神話所抱的理想和實際上牠所發生的效果差得太遠了。就是最不善觀察的人也能夠把這一點看得清清楚楚，於是人們對於神話就不免要加以切實的批評了。

在起初，此項批評都是採取慎重的方式，即嘲弄的方式。亞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把所著諷刺雅典領袖的傑作黃蜂（the Wasps）貢獻給雅典人。一班的吟游詩人（minstrels）既把封建制度理想化了之後，就又摹倣着他們自己的英傑曲（Chansons de Geste）而另作一篇列那狐的故事（Roman de Renart）。鄉野的村夫憤恨諸侯和僧侶的濫用職權因而作出了種種諷譏的彈詞評話（Fabliaux）以圖報復。刺柏雷（Rabelais）在他所著的判塔格魯厄（Pantagruel）一篇故事中，竟敢用談諧的筆墨譏諷教皇和大學，甚至嘲弄到宮廷。傲慢不恭的波馬社（Beaumarchais）戲把飛加羅的剃刀（Figaro's razor）在一般特權階級的頭上懸擺。

無論那個人起頭都把此項有趣的笑話當作消遣品，而且被揶揄的人恐怕反會是頭一個發笑的。克利溫也許是頭一個賞鑑亞里斯多芬的談諧的人，法蘭西斯一世把牧師職給了刺柏雷作為開玩笑的報酬，而亞多亞伯（Count d'Artois）（按即查理十世——譯者）用波馬社的第一版著作來娛客。不過到了人民開始嘲笑他們的神祇時，便是神話將陷入危境的先兆了。

由改革家一變而爲異端

改革家們的出現幾乎是同時的。在起初，他們的目的並非要把現行的制度推翻，只於要剷除牠的弊竇。他們對於神話決不加以攻擊反而要公然加以衛護。

這種改革中的保守態度是打算把一切不滿現狀的人：就是那些本無家業，或原有而已失去，或雖未失去而有失去之慮的人集合到一起，藉此好要求把神話加以改革。但這種態度卻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改革黨和保守黨雙方都假着同一個神話的名義來說話。這時當軸者正是那班藉弊竇來謀利的人，他們卻反獲得漁人之利了。改革家不得不衛護神話的威權，而這時握有此項威權者正是他們想要打倒的人。所以他們的立場根本就是錯誤的，正如以僧侶而批評教皇，以得職於國君的法國巴立門而阻撓國君是一樣的。這時，法律機關很容易把種種罪惡（那時人民正呻吟於此項罪惡之下）都諉之於改革家的不守紀律和不敬上帝。

這時，按事理來說，反對者自然要向統治階級攻擊其不應有假神話之名義而行使的權利。於是他們便立起一個僞教皇來反抗教皇；立起一個教皇黨的皇帝來反抗貴族黨的皇帝；立起皇太子來反抗國君；立起幼子的一支來反抗長子的一支——大分裂（Schisma）的時期已經到了。但這時神話的存在還沒有受到一絲危險，因爲兩方面都是根據同一個神話來要求權利的；這時羣衆之中，還沒有發生紛擾，鬭爭大概只限於統治階級。因爲直到此時爲止，羣衆還分不清楚那一邊是合法的，所以鬭爭也許還不會有什麼結果。這時，反對者便自然會變更策

略來改革神話的本身了。他們定然會說：國家發生種種危險的弊竇，並不僅由於當軸的罪惡，卻也由於神話的本身被腐化了，現在他們的目的是要把神話的本來的純潔給牠恢復過來。例如，亞爾比派（Albigenses）因為見到教會的財產發展過甚，想要把牠加以制止，就否認種種聖禮，路得也由於同樣的見地而否認聖餐上的聖肉實在說。又如後來山嶽黨的單一而不可分的共和政體論和吉倫特黨的聯邦主義論兩相對立……這時就到了異端的時期了。這個時期的優點是：改革黨和保守黨已各有不同的理想，凡承認改革黨者決不會再承認假保守黨的名義而說話的威權，反之，凡承認保守黨者也決不會再承認假改革黨的名義而說話的威權。兩黨已經劃然分開，混淆是決不可能的了。不過，構成社會團體的集合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之精神上的統一（Moral unity）也同時被打破了。

政府黨爲了要把這個精神上的統一重新建設起來，不惜把一切叛離正統思想的人加以罪名而把他們打倒；異端裁判所細細搜查人民的思想，以便找尋異端，準備着把他們加以炮烙之刑；公安委員會嚴令市民遵守秩序，否則把他們送上斷頭臺。這時反對黨也用暴動和革命的手段以爲報復，只要一旦反對黨果然是志在恢復被敵黨腐化的神話，他們便會變成合法的了。

集合意識的打破

這時一個新的階級已上了舞臺。在分裂的現象纔一開始，神話的理論上的統一，一點還沒有受到打擊的時

候，羣衆是極少參預鬪爭的，那時的鬪爭只限於職業社會（如牧師，政客之類。）但一旦精神上的分裂已經告成，羣衆便要加入戰團了。我們應該知道：就是那最沒有知識的信徒和最微賤的市民也會相信當時正在通行的宗教神話或政治神話乃是他們的安全和得救的最高保證；只要少微有幾個造謠的人一說到這個神話受了脅迫，便會引起他們最深切的注意。

一七八九年法國國君廢立的消息剛一傳出之後，各省立刻起了恐慌。到處的人民都武裝起來並組織起保衛隊來。無論到那裏也找不到他們的敵人，可是人人都以爲神話的威權受到侵害了，社會整個地陷入無政府狀態了。這就是所謂「大恐怖」的時期，把牠描寫得最好的要算是騰氏（Taine）了。

這時「中立」已經到了盡頭了。無論是富的還是貧的，是受過教育的，還是愚昧無知的，都已確信他們的重要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已到存亡關頭而用其全力左袒一方。青年人和沒有家業的人大概總是擁護改革黨，而其他團體之中只要是因爲通行的弊竇而頂感受痛苦的人也都會追隨着他們。

但其他許多的人卻會拒絕贊助改革黨，他們以爲：爲了矯正極少數的弊竇而把社會組織的基礎弄得動搖是一個很危險的政策；與其冒險還不如忍受艱苦的好。他們將堅決地防護傳統的秩序，甚至會想出種種方法把青年人和受社會擯斥的階級之中以及窮人之中的同道，拉到他們這一方來。

於是有一些人將覺得他們自己的立場是假秩序的名義而替諸種弊竇防護，而以爲其他的人似乎都是在那裏招惹糾紛，而此項糾紛較之他們本來要想矯正的弊竇還要壞。社會的各階級在這兩個陣營之內混淆起來；

家庭也分離了，朋友也絕交了，不僅妥協無從說起，甚至連商量的餘地也沒有了。雙方都把他們自己的「主義」看作神聖地，爲了維護「主義」，無論怎樣劇烈的暴行也視爲正當的。

到了最後，種種罪惡和對於罪惡所加的種種禁制都不停的累積起了，人們早已把這個恐慌的來源——即他們以前所感受的痛苦與不平，給忘到九霄雲外去了。這時神話的行動不但不能把本來的種種罪惡加以洗滌，卻只於把牠們弄得更加增劇，因爲牠使得這時的混亂較以前更甚了，使得人們的怨恨更加普遍了——試看歷一世紀之久的宗教戰爭和法國革命的十年內戰！

神話的告終：懷疑主義和包容異說的態度

物極必反；這樣劇烈的騷動是決不會無期地忍受下去的，從事鬪爭的兩黨遲早會感覺厭倦的。這時，就要產生一個新的世代了，人們開始要懷疑：保守黨和改革命是否都一樣的具有危險性？兩黨所爭的「主義」是否都害多而益少？這時，神話的本身成了爭辯的焦點；人們開始要檢查一下牠是否有些合理的基礎，結果發現了牠是一點也沒有。如蒙旦、培根等人物，這時就要擺出玩笑的態度，把種種矛盾怎樣潛伏在人心之中，這些矛盾怎樣是幻想的老家，牠怎樣把誤謬的現實性加在幻想的身上；給一一地指示出來。人們這時再也難替如此不正確的「主義」爭辯了。笛卡兒摒去威權的方法，替唯理主義打出一條路子，這足以把基督教的神話在許多人的心理上建立的根基給牠一舉而摧毀。懷疑主義漸漸傳播起來。玄學家在以前只肯用隱祕的文字書寫，而且只給入教

者誦讀的東西，這時也被人大膽地發表出來，甚或印刷出來，以供一般人的閱讀和瞭解。十八世紀的哲學家開始用「包容異說」(tolerance) 這個不可思議的名辭；大眾因為厭倦爭吵就把這個新的信條立刻接受下來，並且強使當局遵守。

這時已經到了決斷的時機。只要人們一旦不再把神話之觀念和確保他們安全的諸項制度聯結在一起，神話的政治上的職分就立刻取消了。這並不是說神話已經不存在了，因為牠仍然給萬衆的希望和需要開闢一個宏大而光榮的前途，以便安慰他們，並激厲他們的志氣。不過這時牠已經變為個人的私事了。另外一個神話就漸漸取得了牠的地位，代牠作了諸項制度的精神基礎，集合意識的工具，和精神統治的槓杆。這時又輪到這個新的神話來重新經歷那三個階段，重新經驗那三個時期就是：玄妙的競爭時期，調整和繁盛的時期，弊竇和衰落的時期。

「絕對」之弊病

我們研究歷史的結果，現在可以推斷出以下這個原則了，就是：無論那一種神話，其為利為害都是輪流更替的，當牠替諸項制度立下一個精神的基礎，好叫一切的人都瞭解牠們，並且甘心服從牠們，以便把社會團體的力量增加到好幾倍，這時牠是有利的。但等到諸項制度都已因為人的過錯而變成腐化的東西，而神話卻依然要維持牠們的威權，使得種種弊竇和舞弊的人受牠威勢的掩護，迫得改革派不得不懷疑神話是否正當，並且連最公

平的改革都拒絕而不納，把整個的社會組織弄成混亂一團：這時牠就變成有害的了。

神話的最大缺點就是牠的剛性。一旦牠和諸項制度配合適當之後，牠就要披上一件「萬世不易之真理」的外衣，討論和改革是牠所決不容許的。牠這時已經變成絕對的，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是進化的，牠卻要把種種觀念一概弄成固定而不變的。過了幾個世代之後，現實和牠反映在我們心裏的影像之間，連一點關係也沒有了；理想不僅不順應現實，反強使現實適合以前的傳統組織。事情本來已經發生困難，神話卻又給他添上了心理的混亂，以致頂簡單的問題都無從解決了。

現在我們且舉一個實例：一七九一年時，法國君政的種種弊竇把皇家財庫 (Royal Treasury) 弄到破產，當經國民會議決定：恢復國家信用的唯一辦法，只有出賣教會的財產。教會財產的用意本來是要作救濟事業的——所以主教的收入纔叫作貧人的財產 (property of the poor)——現在卻完全不是用在原來的目的之上，而只供主教，住持和其他顯貴，過他們的奢侈淫逸的生活了，甚至這些顯貴之中有許多不是教會的份子。

國民會議雖然要靠出賣教會財產的收入來抵消牠的債務，但卻一口承當代為支付種種宗教事業和救濟事業的經費。這樣一來，教會財產既可以恢復了牠原來的使命，而皇家破產所產生的財政問題也一同解決了。這一個簡單，切實而又公平的計畫果然為大多數牧師所贊許。

但顯貴的教徒當然會提出抗議的，並且利用主教和住持的威權禁止教士，僧侶和教徒們，接受這不敬神的法律。國民會議為要避免他們的阻力，同時又知道下級的牧師左袒自己一方面，於是便決議以後教區的教士應

該照其他自治團體的長官那樣，由教徒會議來選舉，不再經由主教會議。這種辦法是依照早期教會的一種老習慣而定的。

不幸這種老習慣已廢止了十餘世紀之久，除少數有學問的法律專家而外沒有人知道，於是未宣誓的主教和牧師很有把握地宣告國民會議破壞了神聖的教階，破壞了教規聖禮和教義。教皇就用驅逐出教的罪名來威嚇，凡接受教士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和購買教會財產者，都判他這個罪名。

神聖的神話這時就上了舞臺了。這時期一班無官階的中等階級懷抱着什麼心理是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他也許很想購買修道院的某塊土地和某處財產，這樣辦，既可拯救國家的破產，同時又替他自己作了一件有利的事。但如果他自己或是和他親近的人相信地獄之說，他將覺得這樣辦會把他自己陷入永久的苦惱，至少也會和他的家庭或朋友立於敵對的地位。

結果，因為大多數人都不敢買，出售教會財產的所得不如原來預料之多，國家的破產不但沒有救好，反倒陷入內戰和宗教戰爭的危境了。這種結果並非來自教會的神聖傳說和教義，卻是此項傳說和教義反映在一般信徒的心理上的印象在那裏弄鬼。

「絕對」與「科學」之對照

我們曾經看到這種「癱瘓的症候」怎樣影響行動的領域，但同樣，牠或許也會影響到心理的領域。

神話總是一些習見的觀念之一個擴大的投影；也只有在這個條件之下，牠纔能爲一班無知的羣衆所了解。結果，牠總會感染上人類中心說（anthropocentrism）的色彩而成爲不合科學的東西。所以牠一定會防礙科學和哲學的自由研究。

在紀元前五世紀的時候，亞拿薩哥拉（Anaxagoras）觀察行星的結果，推斷出月球是一塊平坦的石頭，大小正如伯羅奔尼撒半島那樣。他藉此替現代的天文學打出一條出路：可是正因爲這個觀念足以侵犯月神祭司（priests of Diana）的威權，所以他纔受人非難。

十六世紀的牧師不承認地球繞日之說，也和以上的情形一樣，他們的理由是約書亞（Joshua）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太陽，穩穩地站在基遍山上吧！」鼓勵伽利略（Galileo）從事研究的主教長信服伽利略的發明的，重要正如伽利略自己一樣；但他卻因爲伽利略把發明公布而把他拘禁起來；理由是：這種行爲的目的是打算破壞聖經的威權，其結果也足以損及牧師的威權。

但這種理智上的褊狹態度並非宗教團體所獨有，就是科學界也曾有過。大約在前一世紀的中葉，大多數的科學家，尤其是醫學會（Academy of Medicine）都主張上帝創世之說不合乎科學。爲了解釋生命怎樣會不經神的參與而自有其來源起見，他們就推斷出自然發生的理論（spontaneous generation theory）。這理論的根據是這樣一個事實：把無菌的（或消毒過的）動物膠曝露於空氣之中，幾天之後就會發現極小極小的生物。可見只要在適宜的條件之下，簡單的化學反應就能把生命創造出來。巴士特（Pasteur）觀察到空氣中有無數

的細菌，就斷定這個假設所根據的試驗一定是作得不好。他把他自己的意見開誠布公地告訴了他的老師克拉尾耳 (Clavare)，——他是醫學會的會員——克拉尾耳馬上就勸他不要再作此項研究。他警告這位青年化學家說：如果再作此項研究，就是和所有的唯物主義者作對了，此輩唯物主義者，醫學會中特別地多；他並且指示給他說：他們已經把自然發生說看作天經地義的道理，以便和教會的說法相對立，如果這位青年再作此項研究，一定會變成黨派紛爭的傀儡而不堪其苦，所以他勸他趕快改變研究的方向。

但巴士特堅持要作他自己的研究，並把他那個著名的試驗發表出來。這個試驗證明出來：如果把無菌的動物膠嚴格地和空氣中的細菌隔離開來，生物就決不會發現了。這時擁護基督教教義的黨徒們馬上喜得跳躍起來，好像這個試驗足以證明上帝的存在，而對方則施以兇狠的報復。甚至連學會方面也把巴士特加以詈罵。在這次爭論之中這位青年科學家的名譽，幾乎一敗塗地。這誠然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連著名的科學家也來假科學之名而反對一個在科學上顛撲不破的試驗與件 (data)。他們受了政治偏好 (political passion) 和團體精神 (esprit de corps) 的魔力連科學上一個頂確實的事情——即方法，都忘到九霄雲外去了。一個凡俗的（或非宗教的——譯者）定理 (law dogma) 竟然有這樣大的阻力。

神話倚仗着牠的成功和牠給與人家的好處，到最後，竟想把一切思想和行動的路子都給蔽塞起來。這時牠已盡了牠最大的功能；因為到了任何人都崇奉同一信仰的時候，命令一出人們便馬上服從，其準確幾乎像有一種機械作用似的。不過正因為這緣故，神話纔變成一個空空洞洞的公式或模印，如果一經更改，必然會把牠的功

能失去一些，什麼功能呢？就是充任「精神統治之工具」的功能。這時牠已變成一個固定的東西，並且自以為是停滯不動了。

這時周圍的情勢都在變化之中，經濟世界漸漸地進化着，新的問題陸續發生，於是理想和現實之間現出了一個很大的裂縫。這個裂縫隨世代之演進而日益擴大；種種奇怪的流弊開始棲息於這個縫隙之中，神話對此，反加以保護而把一切光明的路子都給窒塞起來。凡大膽想把此項黑暗的地方加以掃除者，必遭禍患之降臨；這時流弊變成了神聖，矯正流弊就是褻瀆神聖；謬誤是神聖的而真理反是褻瀆的了。同是一個神話以前曾趨向進步和偉大，現在卻變成退化和墜落的工具了。這是由於一般人都相信神話是「絕對的」，相信牠本身有什麼重大的意義，並且相信牠是一切威權的源泉，所以決不能容許別種或更高的威權之存在。

進化就是保守

「世界上沒有確定而不變的東西。」這是二千五百年的歷史上屢經徵驗而不爽的。在西洋歷史上有記載的七十五個世代當中，人類文明至少有七次的變革，每經一次變革則各種制度的典型和那些似係此項制度之神聖基礎的觀念（即城邦，帝國，基督教，封建制度，教皇制度，專制政體和民主政體）都要變化一次；在二十五個世紀當中，人類把他們的舊神推倒而另迎新神曾有七次之多——而變化的速度總是愈來愈快的。現在確已到了我們應該覺察以下這件事情的時候了，就是：我們目前的種種神話和制度都是受支配於普遍相對性的定律

的。只因我們相信神話的絕對性纔把牠弄成強硬而有害的東西。所以只要是社會的中堅階級能夠懂得神話的價值完全是相對的，因此也應該是任聽更改的，則社會便能獲得很大的進步了。但我們究竟憑着什麼徵兆纔能認定某種神話已到應該更改的時候呢？憑着什麼標準纔能斷定牠已經由有益的時期轉向有害的時期呢？

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我們的答案是：就憑着這種神話對於私營企業究竟是有使之興奮鼓舞，還是有使之萎靡不振的影響。我們在上文把牠叫作「社會常數」的那個觀念，在這裏又要活動起來了。

社會組織是各種經濟企業的一個集合體。所謂經濟企業就是：農場，工廠，商店，勞力的行業和勞心的行業等等。個人和牠的家庭都要靠着這些企業來作他們的生存保證，並且個人的種種活動也出不了這些企業的範圍。這些企業就是社會組織的細胞。牠們用一筆公共的款項來支持一種叫作「國家」的機關，這機關的目的就在擔保外部的安全和內部各種關係的穩定。國家靠牠們而生存，也是爲了牠們而存在；牠們就是國家的支柱和國家所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如果牠們任聽國家衰弱下去終必危及牠們自身。由另一方面來看，如果國家只顧自己的生長而犧牲了牠們，如果過於吸收牠們的資財而使得牠們貧弱，國家終亦將有滅亡之憂。

國家過牠獨自的生活，憑着神話的力量，牠可以自動地向那些同意的份子徵收牠們的一部分資財，而此項徵收有繼續增加的傾向。如果一種寄生的機關潛進這個制度之中，牠或許在神話的掩護之下作出極度的破壞行爲。所以各種制度甚至連神話都必須時時加以審核，加以修整，並且要審度時勢的需要而按期施以必要的調整。而那些已有固定生活的份子大概總是會拒絕這種辦法的，只要稍微帶點批評的口氣，在他們的眼裏看來，便

以爲是革命的行動了。

他們總以爲懷疑或批評社會的基本思想當然只是有利於那些窮光蛋和毫無社會責任的人。而那些懷抱不平者一定也不會怎樣退讓，甚至會大聲斥責他們的敵方也未可知。這時生活固定的份子當然也會起而抵抗，好像出乎他們的本能一般，並且凡是敵方所要推翻的，他們都斷言其爲神聖而不可侵犯的。一種盲目而危險的反動作用這時馬上就會起來；因爲牠拒絕把現存的各種流弊加以矯正，結果反足以把此項流弊增多，最後甚或把他們所要竭力避免的災難給惹出來。

由大多數的保守派來看，保守就是停留不動。竟好像他們能夠把時代的趨向和生命的普遍進化都給制止住似的！一切的革命都造因於此項謬見。

以羅馬教會及英國爲例證

在歷史上的幾個時期當中，曾有少數非常的人覺察到這種危險，有時，他們果然有勇氣來改變社會構造的基本思想。即如羅馬教會就曾憑着牠在統治上所有的豐富經驗，把這個難問題解決了好多次；並且幾個偉大的教團也就把這件事當作牠們的主要目的。克呂尼教團努力於教中紀律之維持及精神訓練之提倡，把一班俗教士，從封建貴族的殘暴而貪婪的權勢之下拯救出來。等到克呂尼教團因得意而忘形，因富有而腐化的時候，賽塔克斯教團 (Cîteaux) 就把牠取而代之。過了兩世紀之後，聖多明我派 (St. Dominic) 的僧侶一方面維護教理

的統一，他方面卻也使之迎合當時的新需要；異端裁判所雖有種種過分的暴行，但我們不應因此而忘了聖奎多馬的精密的綜合工作。最後，經過宗教改革的嚴厲教訓，特稜特（Trent）宗教大會又在耶穌社（Jesuits）的監督之下，把教理和教中的風紀大加一番改革。

這樣，一世紀復一世紀地，只要改革派自己變成腐化而不能改革牠自己的時候，便一定會有一個新的教團出世，來作必要的調整工作。各種帝權和各種團體都在陸續地崩潰之中，而羅馬教會竟能把牠自己維持下去，就因為牠容許不斷的改革的緣故。

因為政治組織與各種制度及各種物質上的利害關係都有密切的關聯，所以牠容許改革的彈性較小。但有些政治組織確曾表現出同樣的逐漸適應的能力。

英國雖會經過種種重大的變化，但正因為如此，自從維廉三世以後，任何種革命都沒有發生過。英國的統治階級也和他國的一樣，藉着官職上的種種好處，種種收益而發起財來，甚至到了把社會的均衡弄歪的程度。但他們照例都還知道什麼時候應當罷休的。貴族院容許一切的新勢力加入其中，擁有地產的老貴族容許一切工商業界及銀行界的顯貴加入他們的班次——甚至容許智識階級的加入，因為這班智識階級只要得到爵位，紋章和限定嗣續的權利便肯替貴族們的特權辯護，所以由貴族看來，智識階級是最於他們有利的。以前不是有過這麼一回事嗎？——一位老鐵工被人用華麗的馬車接去，以大法官的資格作蘇格蘭教會會議的主席。

但英國不僅知道怎樣分配牠的特權，並且還能夠作那進一步比較困難的工作——即把特權加以限制。歷

史上好像按期地總會有某種人物出現，國家賦與他全權，叫他把種種必要的犧牲加在貴族的身上；假如在本國中找不到這種人物的話，便到外國去找，例如猶太人的士累利（Diatrieli）被任爲比康斐爾（Lord Beaconsfield）男爵之後，國家便假手於他任聽他去剝奪上流階級的各種特權。英國至今所以能夠成爲「無日落」的帝國，就是受了這種循環不已的修整剪裁的過程之賜。不過要利用這種程序，須得有一種勇氣，這一點卻是一般羣衆很少能作得到的，而且這種程序很少是自發的，或純然根據明敏而周詳的計畫。羅馬教會耽溺於舊日的種種流弊，致失去歐洲一半的天下，直到特稜特（Council of Trent）宗教大會舉行的時候，纔肯把牠自己革故更新。英國貴族迫於克倫威爾的武力纔肯及時退讓；法國的中等階級迫於二十五年的內外戰爭，迫於恐怖時代和拿破侖的獨裁政治，纔肯接受一種議會會的妥協制度。這種制度雖曾惹起政體上的變革，卻反使得中等階級能夠享受到絕對穩定的社會境遇。

所有這些試驗都需要很大的代價，尤其是統治階級和反抗階級都要受到很大的犧牲。所以我們如果要免卻這種種叫作「革命」的週期的激變，而準備着實現必要的調整作用，第一要靠着這兩個階級。

歐洲現在已經陷入了歷史上空前的恐慌狀態中，無論就物質上說也罷，還是就精神上說也罷，在六年之中各國政府都在那裏尋求解決的辦法，結果卻是一無所得。就內政上說，由民主政治而保守的獨裁政治，而共產的獨裁政治，每種制度都嘗試遍了，卻沒有那一種能夠使得社會企業獲得穩定的境遇。就外交上說，由個人的活動而大使的會議，而各種的最高會議，由國聯的裁判而軍事佔領，各種適合於國家主權的辦法也都嘗試到了，卻沒

有那一種能夠擔保各國的安全。

一切都失敗了；世界各國都未能實現我們所說的「社會常數」(Social constant)而一天深似一天地陷入難境。那末，現在是不是已經到了我們提出以下這個疑問的時機呢？——就是現在各國的政府和人民所奉爲圭臬的「主義」是否仍和時局中的種種事實相符呢？

現在各國間的種種關係都受着國家主義 (Principle of nationality) 的支配，這個「主義」產生於一世紀以前，現在已經傳遍世界而被人奉爲一種神聖的宗教了。

在前一世紀之中，社會的基本經濟構造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難道到現在，人類企業所寄託的現實中之種種「事實」和我們的種種制度所倚爲根據的「理想」之間，還不會有什麼根本的衝突嗎？我們只有把現代工業的機構加以仔細的分析，然後拿牠和構成國家神話的種種原素對照一下，纔能明瞭究竟如何。

註一 這種現象，在一八四八年又重演了一回，當時都說是工人佔據了市政廳。最近又發生了一件事情，與此相仿，不過規模略小而已：當一九一九年舉行選舉的時候，有一派政黨就利用人們正爲俄國革命的成功所震驚的時機而施展出牠的詭計來。

註二 卽如德雷福事件 (Dreyfus case) 就是這種著名的劇變中之最後的一個。當德雷福被判處私售軍事秘密的罪名時，大家所提出的簡單問題不過是尊重法律而已。但因德雷福是一個猶太人，所以最初支配着人們心理的，還是宗教神話，至於法權超乎軍權的原則（或神話）不過還是其次的。這時候，人們都爲了這個案子而互相爭論起來，有的主張德雷福無罪，有的主張他有罪，完全要看他們對於這兩個神話之中，看重那一個，或是把二者調和起來，或是把二者對立起來。這個案子竟爭論了六年之久——在這期間之中幾乎把法蘭西共和國都鬧翻了——纔獲得一個取消前案的判決。我們處於新世代中，簡直不懂爲什麼這樣簡單的案子，竟惹出這

樣大的風波。時代不同，神話也隨着而變換了。

註三 當時的代理方丈 (Commendatory abbots) 都是一班俗人，國王卻把寺院的收入給與了他們，而真正的僧徒與牧師反只靠着宗教業務獲得些少薪資以度生活。

註四 參看：Valery Radot, Vie de Pasteur

第二編 現代世界之經濟的相依

第四章 生產費的革命

一八一三年的一天，馬塞諸塞州的釘子製造家約拏單 (Jonathan) 先生晝寢時作了一個夢。他夢見一位仙人，容貌好似管出納的女郎，出現在他的面前，對他說道：『您的工人的工資應該增加百分之五十一，而您的賣價應該減低百分之四十三。』約拏單先生嘆息着說：『那我非破產不可了！』仙人反駁說：『絕對不然！您的利潤每年一定會增加四十萬圓！我說下看！』約拏單先生做了這個夢之後，心神不安，就醒過來了。

不久以後，有幾個機械師帶來幾架很有力量的蒸汽機，有了這種機器之後，釘子可以成千累萬地製造出來，並且幾乎是自動地製造，約拏單先生於是買了這幾架機器而建立了一個工廠。

過了八十年之後，美國勞工局局長卡特卡洛爾先生 (Mr. Carroll D. Wright) 經過一個長期而小心的研究，證實了那個仙人的預言。製釘業中的各種薪水都增加了，賣價反狂跌了，而約拏單先生的後裔也成爲巨富了。這就是用機器代替手工的一個奇怪的結果。

經濟的奇論

這就是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這件事不僅把種種生產狀況給改革了，並且也把人類間的交接，社會間的關係，和社會的結構統統給改變了。雖然無論是那個經濟學家都會描寫過這件事，但是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新聞學家或者一般的公衆都好像還沒有注意及此。當代的人，生活於二十世紀之中，每天都是坐着火車或電車到他們的辦公室去，並且在他們的私生活之中，還有這樣或那樣的新舉動，但是他們的社會或政治方面的思想仍然是把「過去」的時代——就是世界尙未被機器改變過的那個時代——當作標準。

照來特卡洛爾先生的估計，一八一三年的時候，靠手工製造二〇，九〇〇釘子，需要三個人，共同工作二二六小時又二十五分鐘，工資總額是二十圓二角四分（美金）。現在靠機器來製造同數的釘子僅需要八十三個人，共同工作二小時又十五分鐘，而工資總額纔二角九分（美金）。（註一）這就是說：單只勞力成本（Labor costs）就省了十九圓九角五（ $20.24 - 0.29 = 19.95$ ）或百分之九十八！那末，工資減少了沒有？決沒有，而且事實恰恰相反！據官廳方面的研究，一八一三年的每小時平均工資是八分六釐，一八九七年的時候，增加到一角三分。足見僅就製釘工業而言，工資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同時生產費卻反減少了百分之九十八。講到這件奇事的原因卻很單純，蓋不外使用機器以致生產增加罷了。

在一八一三年的時候，雇用八十三個人每天工作十小時，每年工作三百天，照每小時的平均工資八分六釐計算，每年的開支要二一，四一四圓。在一八九七年的時候，同數的工人，同樣的工作時日，照每小時平均工資一角三分計算，每年的開支需要三二，三七〇圓。那就是說：工人的收入雖然增加，但雇主的開支卻也增加了一

○，九五六圓。不過一八一三年的時候，製造家投下了二一，四一四圓，只能收回二千二百萬枚手製釘子，一八九七年時他的後裔，支出了三二，三七〇圓的工資，卻能得到二十八萬九千一百萬枚釘子。那也就是說：在前一場合，每千枚釘子的「勞工成本」是九角七分二釐，在後一場合，卻只要一分一釐二毫——或減少了八十六倍。謝謝機器的恩惠竟有這樣稀奇古怪的現象：工資增加而「努力成本」反減少了。這卻證明那個流行的論調——即雇主和工人不能同時致富，一方面致富則他方面必然犧牲——是虛妄的了。

一八一三年時，釘子還是很稀罕的東西，現在卻變成極其平常的東西了，因為那時的一家製釘業每年產額只有二千二百萬枚，而現代的一家工廠每年卻能出產二十五萬萬枚。結果，工廠間互爭市場愈來愈激烈，賣價自然要跌下去了。依同上的研究，一八一三年時，每千枚釘子要成本一圓零九分六，到了一八九七年的時候，卻只要六角二分的成本——由買主的立場說，就是每千枚釘子可以省下四角七分六（或百分之四十三）。如果把這筆省下的錢，照二十八萬九千一百萬枚釘子來計算，也就是每家工廠每年產額的賣價要減少一百三十六萬圓。由消費者方面來說，也就是每有一家工廠，每年就可以省下這許多的錢。換言之，也就是不啻得到了這許多好處。

由另一方面說，製造家的利潤，在同期間內也增加了。一八一三年時，每千枚釘子的利潤是一角二分四（ $1.096 - 0.972 = 0.124$ ），現在卻增加到六角零八釐八丁（ $0.62 - 0.0112 = 0.6088$ ）。不過我們應該知道：一八九七年時的工業巨頭是要購買很值錢的機器（這是會慢慢耗損的），要收買土地，要建築大工廠，要雇用一羣工程師和工頭，要和同業或他業聯絡，並且要繼續不斷地設法擴充市場的。凡此種種都迫得他非把巨額的資本凝固

起來不可，因此或許要向別人借債，這是要支付利息並且按期攤還的。他的先人在一八一三年時是用不着應付這種巨額的格外開支的。不過即令除了三二，二〇〇圓的工資而外，他還得把他四分之三的收入來應付這種雜項開支（Overhead Costs），但他仍然可以剩下四十萬圓的利潤，也就是他的四百萬圓的資本可以得到百分之十的紅利。

綜合起來，我們可以斷定：製釘業利用機器的結果，在一世紀之間，產生了以下這三個結果：

(一) 就工人的立場說，每年的工資總額增加了一〇，九五六圓。

(二) 就資本主的立場說，每年多進四十萬圓的紅利。

(三) 就消費者的立場說，每年也省了一百三十六萬圓。各生產要素的開銷雖然增加了，但實際上的生產費反倒減少了。這就是那位知名的社會學家勒未塞爾（Lévy-Sassier）先生所說的「經濟的奇論」了。他說：「謝爾科學的恩惠，使我們今天能够用較貴的原料，支較高的薪水，較大的利率，並且還給較優的利潤於企業家，而反例用較低的成本來生產商品。」（註二）

這樣一來，一般人的意見都立刻改變了，一般人的眼光也立刻轉換了。

機器可以當作解放者看

曾有好幾世紀之久，工人，雇主，和消費者被人看作一個無政府的三位一體，永遠是你和我衝突，我和你爭鬪

的。並且在一般人的想像中，都以爲這三者之中，如果有一個昌盛起來，其他二者必然會衰落下去。只要是一說到增加工資，他們便以爲下面這兩件事情當中必然有一件會發現：不是（一）成本價格的增加使得消費爲之減少，生活程度爲之一般地降落，同時生活費也爲之騰貴起來，所以無產階級在全體上雖然會得到什麼好處，但在他們個人的身上仍然會把牠完全失掉了去；便是（二）資本家的利潤減少，使得人們的進取心和企業心爲之氣餒，生產爲之銷沉，結果，不啻給一切的進步和文明敲喪鐘……。

無產階級困在這種極度進退維谷的景況之下，一世紀又一世紀地注定了過他那種永久不幸的生涯，除了富者的不可靠的幫助和國家的慈善事業而外，沒有別的法子可以減輕他們的痛苦。

誠然，只要是人類光靠着他的兩隻手，光靠着所豢養的牲畜和一些幼稚的器具來做不充分的補助，以便控制各種自然力而滿足他的種種慾望，那末，除非任聽生產者和消費者同時遭受打擊，他是絕對無法減輕重負的。並且財富、美術、和文明愈是進步，愈得把飢餓的黎民控制在這個枷鎖之下。假如法老（Pharaohs）的雕像是要用大堆極好的花崗石來建立，以便使他的榮譽在埃及垂之永久，假如大理石的柏德嫩廟是要在希臘的一座山上建築起來，以便顯示和諧之美，假如蘇格拉底是要在遊技所（Palaestra）向好思索的有閒階級講演那微妙而意味深長的哲學，那末，成千累萬的人便不得不在呂比亞（Lybia）和盆忒力卡斯（Pentelicus）的採石場上，在亞各斯（Argos）的原野上或在西蘭米加（Ceramieus）的奴隸監牢裏過着受壓迫的非人的生活。這足以解釋爲什麼希臘和羅馬的城邦既有那樣的文化和偉大，卻也會那樣地苛待手工工人。亞里斯多德說過：『文明只能

存立在奴隸制度的上面。」

自那時以後，基督教也許會把這種『負重的獸』變為一種『有道德的人』（moral individual）而君主政體也會給與他們一些保證，法國革命也會給與他們一些權利；但他們總得在一種剛硬的『鐵律』（iron law）之下做着勤苦的工作，無論他們是奴隸也罷，農奴也罷，無產階級也罷。經過古代，中古，近世這三個時代，人們都把『缺乏』和『貧窮』看作人類命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以為只有宗教的夢想，『來生』的海市蜃樓，和基督教的忍耐精神纔能夠把他們的痛苦減輕一些。

這時，機器突然上了舞臺。科學家揭穿了種種自然力的神祕，企業家利用了牠們來滿足人類的需要，靠着這兩種人的合作，我們不必藉助於人類的筋肉就能創造財富了。在從前，勞力是生產費中第一個重要的原素，現在卻降到第二位或第三位去了。

在從前，每千枚釘子的賣價一圓零九分六釐當中，勞力成本佔去九角七分二，所以除非任聽營業的破產，要想把工資增加十分之一都不可能，但現在每千枚釘子的賣價是六角二，而勞力成本只合到一分一釐二，所以即便把工人的工資增加一倍，叫他每年可以多掙三百九十圓，但生產者和消費者因此而生的額外開支，每千枚釘子不過纔一分五。（註三）

從這時起，奴隸時代，農奴時代，或無產階級時代的一般人的夢想，再也不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了；『缺乏』和『貧窮』再也不是經濟上注定的命運了。在以前，要把黎民登諸幸福教化之域，不過是一個烏托邦的幻想，或只

是博愛主義者的虔誠希望，但是現代的工業，卻已把牠變爲一件可能的事情了。

勞動者變成公民

這種可能的事情距實現還遠，是無可否認的；因爲社會變遷比較技術進步總要慢了好多。

當機器剛一進入工業的範圍，牠不但沒有改進勞動者的身分，卻反把牠弄糟了。一八二三年的時候，歐文（Richard Owen）曾經提起郎卡邑各工廠中英國工人的地位，說牠比較路易斯安邦的黑種奴隸還不如——因爲奴隸的主人至少還要顧及他的「財產」的平安。不過所有這種種的情形，在三個世代之中，都早已改變了。我們試看一看一個現代熟練工人的生活是怎樣的，看一看他所享受的衣食、娛樂和所受到的教育怎樣。路易十六世時代一個商業公司的總經理，恐怕都要忌妒他的舒適，羨慕他的自由呢！他的幸福恐怕是拉布律耶（La Bruyère）時代的村夫，或款待盧梭的農夫所夢想不到的。他能夠花點錢在他自己的身上，能夠享受些閒暇，得到些教育。他能念能寫，這乃是公民資格的頭一個條件；他能選舉，因爲他能夠閱讀一張傳單或宣言，並且知道怎樣處置一張選舉票。反之，如果一個人能夠看懂法律，能夠知道他的那一項權利被剝奪，並且能夠領會人們對於種種流弊——他曾爲此而犧牲——的批評，則我們決無理由拒絕把種種公民的權利賦予給他。於是勞動者就進入了公衆的生活了；他有罷工之權——以便維護他的工資——有選舉之權——以便維護他的自由。他在國家裏面所佔的地位，已經和有財產的人平等了。

這乃是世界史上的一個界標，但直到最近還沒有被人看透。古代的民主政治，由根本上說，勿寧謂之狹義的貴族政治，因為在這種政治之下，只有靠着奴隸的勞力而生活的少數自由民能夠享受到公民的權利。在中古時代和君主政體時代，商業領袖（即中產階級 *the bourgeoisie*）雖然被人容許列入第二階級（*Third Estate*），但農奴、自由農和勞動者是永遠不許列入的。甚至到了法國革命的時候，雖然把「人權」當作口頭禪，卻仍把那些沒有動產，或納稅能力不及若干工作日（*working day*）的人，貶黜在「受動的公民」（*passive citizens*）之行列中。只有進入機器時代以後，除勞力而外沒有其他財源的人，纔能到處都可以取得公民資格。他們在這三個世代當中所得到的舒適和自由，比較由亞里斯多德的時代直到現在為止的二十五個世紀當中所曾得到的還要多。可是文明不但沒有因此而消失而衰落，卻反繁榮昌盛起來，而且繁榮的程度，就是最大膽的烏托邦主義者也夢想不到。

勞動者得升高一步而享受公衆生活，確是現代史上一件頂重要的事情——附帶着說，也就是拉維塞爾所謂「經濟奇論」那件東西的第一個結果。把牠所有的社會關係統統包括在一起，我們可以替牠起個名子，叫作「生產費的革命。」

工業的專門化

上述的革命開始於十八世紀中葉，那時牠所取的方式是一種技術變化的方式，直到十九世紀的末葉，牠把

各國的內部構造和外部關係完全都改變了的時候，牠對於社會的種種影響纔全部地表露出來。

直到前一世紀的中葉，農業還是典型的工業，好像是歐洲社會的母細胞。而且牠幾乎純然是自給的。無論是自耕農，佃農，還是地主都吃他們自己種的玉蜀黍，喝他們自己釀的酒，穿他們自己種的亞麻，和他們自己牧的羊所產的羊毛。如果他們在本地的市集上，賣了他們牲畜的一部分，或賣了幾袋子小麥，那只是爲了納稅或想買幾件農具或想享受點奢侈品之故。他們的生產品中，只有很少的一部份是拿去交易的。

曾有好久好久，人們都把「經濟自給」(economic autonomy)看作一種鄉村理想。克魯包特金在他的自傳(Memoirs)裏會敘述他的父親是南俄的一個大地主，當他父親住在聖彼得堡的時候，覺得：「只消費自己田地上的產品，只容自己的佃農服侍自己而拒絕其他任何人爲之盡力」是一件很可自豪的事情。當貴族蓄養自用音樂隊的風尚盛行起來的時候，差不多無論那個貴族都一定要在自己的封土內招募自己的樂師。

這顯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不過羅馬的「村」(villa)和封建制下的采邑，藉着那樣複雜的徭役制度和物品納稅制度，曾有二千年之久，都是各自形成一個完全的經濟單位。直到近世的時代，各地的鄉村，還都是每週只舉行市集一次，並且只有很少幾種的行業（如車匠，鐵匠，織工等），所以仍然是和古代的「村」或中古的「采邑」如出一型似的。並且有時還是閉塞於很狹小的區域以內。至於那些偶然達到較遠距離的交易，假如這兩個交易的地方天然是可以互相補充的話（譬如甲地是適於農業的平原，而乙地是適於牧畜的山地）那就很容易把牠們組成一個行政區域了。直到一七八九年的時候，這些行政區域之間還有一種關稅制度把牠們隔離着，

並且牠們是那樣慣於過自給的生活，所以當塔哥（Turgo）提議要把內地的關稅制度設法廢除的時候，曾激起很嚴重的亂事。在二千年的農業文化中，各國都是由自給的經濟單位組成的，在這些經濟單位之間，只有斷斷續續的生產品的交易，換言之，也就是只有偶然的交易。

但機器卻在三個世代之中，把所有的這些情況都給改革了。無論那一行的製造業都非建立起很有力量而又很值錢的機械設備不可。既有這種種的機械設備，於是專門化遂又成爲不可避免的了。

在以前的時候，釘子，馬掌，和犁頭都是由村中的鐵匠一手製造的。但是到了現在，製釘業只造釘子，不造別的東西，牠用很低的成本可以生產出大量的釘子。專門化就是賣價低廉的唯一條件。卽如金屬線製造業，展鋼業和鑄鐵業，就已經分成許許多不同的行業了。現在卻連紡業和織業也分離開了，甚至連紡紗廠還要分專門製造粗紗或細紗，以至於專門製造某等級的細紗……

同時，製造廠決不賣牠自己的商品了。牠已經和商人分離了，而商人又有批發和零售之別。運輸業也有同樣的進化；如手車，鐵路，水運，以及各式各樣的交通機關。甚至連農業都會參加這個一般而普及於全世界的運動。蓋農業也分成種植玉蜀黍和牧畜牲口的種種行業了；有的還要專種一種甜菜，或專種亞麻或椰菜。到了今天，一個農場決不是自給的了，牠已經成爲麵粉業或紡紗業，鍊糖業或石油井的補助業了。農夫要買酒喝，買衣穿，甚至買麵包吃，正和任何住在城市的人一樣。他決不消費他自己的產品了；他是爲了出賣纜生產的。交易由「偶然的」一變而爲「經常的」了。同樣，織業也要靠着紡業；製釘的生意也要靠着展鐵廠，而展鐵廠，如果，離了鎔鑛爐也是

不能存在的。

翻轉來看，假使說製造場離不開原料的生產者，但後者的供給卻也必須受支配於前者的需要。人類的活動好似一個鏈子，一端鬧了恐慌，馬上便會傳遍了整個的連續。社會的光景，現在確已煥然一新了。在以前好像是許多不相連屬的企業並列起來的一個總體，現在卻成了許許多多專門化的企業所組成的一個齒輪機了。『互相依賴』(Interdependence)成了日常的定律；除了窮鄉僻壤之外，再無所謂『自給』了。

不過如果『專門化』(specialization)會產生『互相依賴』，反轉來，『互相依賴』卻會產生『階級組織』(hierarchy)。許多工業所共同需要的各種原素，如鋼，紗，煤等，現在都能夠大量地生產出來；於是這種種工業自動地組成了巨大的團結，而種種附屬的工業則變成了牠們的分業，和分業的分業了，譬如樹上的枝子，枝子上的嫩枝一般。這些主腦工業(key-industry)為數雖不甚多，一旦聯合起來卻很有力量，能夠支配其他一切工業的活動；其結果，少數的集團或者會很快地支配了全體的經濟活動。機器，一方面固然便利了民主政治的擴張，因為牠有普降福祉的作用，但他方面卻也有造成寡頭政治的可能，因為工業有集中的趨勢。

這乃是現代世界一個頗有趣味的矛盾現象。

國家間的『互相依賴』

但是這種『專門化』和『互相依賴』的作用，到了一個時期就會超出了『國家』的範圍。強大的工業在

某區域之內，特別是煤鐵區，把牠們自己團結起來；種種附屬的工業，就圍繞着牠們而產生出來，而且愈來愈多，漸漸地把鄉村的人口都吸收了去。農業漸漸地就會衰微下去，例如像英國那樣；不然的話，也會怎樣都不能夠供養大的都市中心，例如像比，德兩國，就是這樣。於是迫得各國都不能不仰仗着距離較遠或新興的國家，如俄國，羅馬尼亞，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亞等等，這些地方所產的小麥，牲口，毛類等等都是遠超乎牠們本地的消費額的。牠們把這些剩餘的原料送到大的工業國，換取後者剩餘的製造品，於是一個新的局面由此而發生出來就是：國家與國家再也不能孤立了。倘使一旦斷絕關係——就像大戰時的情形——歐洲的大工業中心就馬上會感受不足，感受饑饉，而海外的大農業國除了牠們的倉庫滿貯穀物幾乎要撐裂而外，衣服也會沒有得穿，器具也會沒有得用。事變的力量迫得國家不得不專門化，正如個人一般，而「互相依賴」也就成爲普遍的定律了。

但如果各各國家都要靠着別國來供給牠生存所必需的貨品的一部份，則國家主權的定理將怎樣處置呢？國家間物質上的相依與牠們的政治上的自主又將怎樣調和呢？公民的民治上的平等，與企業的階級組織，和主腦工業的寡頭政治又怎樣調和呢？——這裏又是另外一個矛盾了。工業專門化在技術上的種種影響雖然是一般人所極易明瞭的，但牠在社會上的種種影響卻還值得我們加以考量呀！

一個民族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不管牠是多數人所創立的，還是爲了多數人而創立的——總是拿某種標準化的企業型態作爲模型的，而這種企業型態是要牠們來保護，來獎勵的。工業企業老早就是例外了，因爲牠的極大的機械設備和製造廠總是常常在變換的。而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卻是從一起頭的時候就得盡量把

牠們自己局促在一個古老而幾乎毫無變化的體制之中，並且總是停滯在那裏，一直等到所有各門的企業都受了專門化的影響，而例外變為原則，原則變為例外的時候為止。甚至到了現在，人們還要竭力把牠拘限在因襲的體制之內，結果就產生了種種矛盾的潮流，矛盾的意見，而事實與理想之間便起了很劇烈的衝突，一般人的心理上也發生了極度的混亂。在過去六年之中，各種國際改造的計畫所以統歸失敗，就由於這個緣故。

各種政治的，國家的，和民主政治的神話因為統是由一種殘破的因襲觀念中遺傳下來的，所以都應該參照着那個「經濟相依」(economic interdependence)的嶄新而普遍的因素，把牠時常加以修改，加以調整纔行。但直到如今還沒有人想到這個問題。一方面，經濟學家和商人的習慣都是太喜歡討論種種現實的問題或研究種種基本的原理；他們甘願接受流行的種種觀念，卻竭力使之適合於他們自己的需要，甚至會加以曲解附會都不管。在另一方面，歷史學家，法學家和政治家們——他們的真正任務應該是準備着作這種種社會調整的工作——卻也有他們自己的專家的態度。他們的習慣太喜歡把思想和制度的進化，以及技術上和經濟上的變遷看得非常重要。(註四)

還有一點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就是在三千年歷史之中，種種的法律，制度和組織雖都起了無數很劇烈的變化，而基本的經濟構造卻只有極小極小的變動，幾乎可以和當時的種種制度自動地調和起來。但是在最近的一百年當中，情形就完全相反了，這時，基本的構造比較牠所扶持的種種制度變化得快得多了——結果就惹起了激烈的翻騰現象。

這種現象好似移山換陸的地震一般。起初的時候動得很慢很漸，所以大眾都不把牠當回事，仍然在海邊上建房子，等到一天地殼震動起來，陸地也沉淪了，建築也倒塌了，鄉村到處都毀滅了。

最近的歐洲大戰就可以比做這樣一個地震；起初只是地面以下有很慢很漸的移動，一旦突然爆發起來，就把一些社會建築給毀壞了，就是不壞也搖動得不成樣子了，所以假使我們要作整理改造的工作，還得先考察一下『下層土』是怎樣情形。

註一 一八九七年的各項數字，我們這裏暫付保留，因為我們對此當然是不能負責的。我們援引此項數字的目的，不過是要表明：在一世紀之內，生產費中的各種要素有了什麼變化罷了。（所有的數字，都根據美國勞工局的第十五週年報告。一八九八年出版。）

註二 參看：Levasseur, *Comparaison du travail à la main et du travail à la machine*。

註三 不消說，我們對於此項數字僅應與以相對的價值。工資在生產費中所佔的部分，各種產業和企業都不一樣，是要看機器在該業中所佔的地位如何而定。據估計：在一噸煤的賣價中，勞力成本要佔百分之五十，因為在煤礦中，礦工的工作佔最重要的地位；在一噸熟鐵的賣價中，勞力成本卻僅佔百分之十，因為鑄鐵爐的運轉幾乎完全不靠人力；但很奇怪，在一輛機關車的賣價中，勞力成本竟佔到百分之三十三。

註四 最近一個問題的爭論，很足表示專家間意見的衝突：一派人主張經濟支配政治；另一派人卻說：絕對不然，政治是應該佔先的！

心可以支配腦嗎？肝比肺佔先嗎？這也許是學者們認為冠冕堂皇很值得討論的一個題目吧！但據我個人的見解：卻看不出肝會怎樣盡職，如果沒有肺的話，或腦將如何活動，如果心的跳動一旦停止，與其把同一個人身上的各項器官拿來比較高低，我們何不把其間的『互相依賴』指示出來，這樣不是更好嗎？

本書的目的即在於此。

第五章 生產的國際關係

十八世紀的末葉，有幾個商人，利用了克蘭敦 (Crompton) 的發明在郎卡邑 (Lancashire) 建立起最早的精紡機工廠，(Mules) 他們的目的原不過是想把棉布的賣價降低，以便抵制競爭者罷了。

南美大草原的羊和郎卡邑的紡績工廠

他們的確沒有想到毛織工業是會缺少原料的。牧羊業成爲英國的主要富源之一，那時已經有好幾百年了，曾有一個時期，根脫城 (Ghent) 毛織公司的原料一向都由英國供給。當百年戰爭突然發生的時候，法蘭德斯 的各市區 (Flemish communes) 援助英皇愛德華三世 而反對法王，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但是到了一個時期，因爲精紡機的產品，成本愈來愈低，於是各地的訂貨單紛至沓來，不僅英倫三島，就是歐洲大陸也來訂貨了。結果新工廠的發生如雨後春筍一般，而英國的羊毛馬上就供不應求了。

於是澳大利亞的採金者，阿根廷大草原的高朝種人 (Gauchos) 好望角的清教徒都從事牧羊業了。他們有廣大的無主的草原，可以隨便利用，只要有一個監管的人和幾條狗，就能在草原上牧養無數的羊。他們所產的羊毛，除了剪毛的開銷而外，簡直不要什麼成本，於是各紡績廠當然只要他們的羊毛了，英國的牧羊業既不能抵制

遠方的競爭者，牠在世界羊毛出產上所佔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反之，南半球各偏僻地帶的牧羊業卻反都發達起來了。因為約克州 (Yorkshire) 的需要不斷的增加，於是德蘭士瓦 (Transvaal) 和納塔耳 (Natal) 的高原上，阿根廷的草原上，新南威爾斯和新西蘭的山地上，都繁衍起羊羣來了。這些產羊的國家卻都很少紡織他們自己的羊毛，理由很簡單；就是在這些地方不能像在英國那樣容易得到煤和熟練的工人。據以前的估計：用澳大利亞的羊毛，在英國製成的一塊呢，如果運回西得尼 (Sidney) 來，要比較在澳洲本地紡織的同樣的一塊呢便宜一些。於是各國便都專門化起來了。英國比較地很少出產羊毛，而澳洲，好望角和阿根廷也很少製造呢類。「生產費」鬧出來的惡作劇，迫得各國不得不分工了。

這個惡作劇同時還迫得各國必須絕對地互相依賴。假如各大草原上的羊開了病，布刺德佛德 (Bradford) 羊毛市場上的價格便馬上會騰漲。如果約克州鬧了工業恐慌，新西蘭的牧羊業便馬上要遭殃。立於對蹠地位的兩個國家，竟有了這樣密切的關聯，不啻一個人身上的四肢一般！

法國的毛織工業多在魯貝 (Roubaix) 因為那裏的紡織機器有四鄰的煤鑛供給燃料。所紡的羊毛也是澳洲和阿根廷的產品，是由英國收買的，在比國的限威爾斯 (Verriers) 漂淨的，最後則運銷給巴黎和部爾日 (Bourges) 的成衣匠。

德國的薩克森省 (Saxony) 和西利西亞省 (Silesia) 所紡織的羊毛是烏拉乖的產品；那裏所製的衣服一向都是銷給巴爾幹，利凡得 (Levant) 和土耳其。

到了現在，無論是工業化的歐洲也罷，還是澳洲高原也罷，人們所用的一切服飾品統統都是各大洲合作的產物。從倍諾斯愛勒 (Buenos Ayres) 到布刺德佛德，從魯貝到好望角，從新金山到普勞恩 (Plauen) 好像有一條羊毛線把兩半球聯結在一起似的。

布刺德佛德和密士失必的棉花

棉織工業也有同樣的進化，據說曼徹斯特的潮濕氣候使得當地的紡績工廠能夠用很低廉的成本製造出馳名於東方的棉紗布 (muslins)。於是郎卡邑對於生棉的需要愈來愈高，而西印度羣島所產的生棉馬上就不夠供給牠的需要了。美國南部的棉田面積也就隨着麥爾西 (Mersey) 河沿岸紡錘數的增加而愈來愈擴大了。到了現在，美國南部不知道有多少地方都已種起矮矮的棉樹來了。而且無數的黑人都靠着棉樹生活。彈棉花幾乎成了各大城市唯一的活動，而各港灣的主要任務也就是運輸大批的棉花到新英格蘭和歐洲去。利物浦，哈佛爾 (Havre) 和布勒門 (Bremen) 的紡績工廠所需要的原料，大部分都是由美國供給的。

因此歐洲的紡績工廠就和路易西安那的棉田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密士失必河沿岸一經結凍，便馬上會使利物浦的匯率狂漲，而其影響會很快地傳遍了盧昂 (Rouen)、里爾 (Lille) 和卡拉斯 (Calais)。一直到了薩克森的腹地。反之，假使歐洲發生了工業恐慌，美棉的價值便會跌落到不夠採摘成本的程度。

當大戰剛一結束的時候，中歐各地盡成廢墟，致使英德兩國各紡績工廠的工人大部分陷於失業，於是美國

的棉田約有三分之一都把棉花拔去而任其荒蕪了。黑人因爲生活所迫，都到北方各城去尋找工作，他們在那裏學到了自立的習慣，後來，屢次發生的丘·克拉克斯·克蘭 (Ku Klux Klan) 暴動，就是因此而起的。我們真可以說這種震動歐洲的殘暴舉動，大部分是由於歐洲人民購買力的減落……這就是把世界各部加以羈縻的連帶關係了。

加拿大的煤油鑛和德國的鎔鑛爐

要使各種機械工業異常地發達，非先有強大的金屬工業不可。英國的煤鑛和鐵鑛都很豐富，所以起初，人們還都以爲她的煤鐵，除了自給之外，一定還能供給其他各國。誰知鎔鑛爐的慾壑難填，到了後來牠的鐵鑛都耗完了。同樣，萊因河上的製鋼廠也把西格谷 (Sieg Valley) 的鐵鑛給耗完了。比利時自己沒有鐵鑛，便得不到各處去尋找鐵的供給，例如像阿爾及利亞 (Algeria) 的岩石之中，或兩極的冰天雪地之下。現在歐洲各冶金業所用的鐵是由西班牙的畢爾巴鄂 (Bilbao) 加拿大 瑞典的拉伯蘭 (Lapland) 阿爾及利亞的翁札 (Ouenza) 等地供給的。

洛林 (Lorraine) 的鐵鑛，鑛層很豐富，但因其中含磷過多，所以起初人們都不大注意牠，自從湯姆斯的曲頸蒸溜器發明出來，法、比、德各國的鎔鑛爐便都用洛林的鐵了。現在洛林的鐵鑛是在法、比兩國的管轄之下——但牠卻離不開盧爾 (Ruhr) 的焦煤。除了鐵之外，還有他種金屬也是機械工業所必需的，但是地質上的變化卻使

得這種種金屬散布於各處。所以歐洲的冶金業還要倚靠西班牙和美國的銅，西利西亞的錳，俄國的錳和法國的鐵礬士。在大戰的時候，德國因為需要幾噸的鎢和鈳，便不得不造兩隻巨大的潛艇，以便到紐約去採辦，假如沒有這兩種東西，她便無法造重砲了。一個工業國家在平時要製造種種機械設備和機器，以便增加她的國富，在戰時又要製造種種軍械，以便增加她的武力，所以無論她怎樣在戰場上獲得勝利或怎樣征服了他國，也都離不開外界的供給。

英國煤遍天下

所有這些種機器都需要一種動力，而一切動力的來源，第一個要算是煤。在大不列顛的國境以內的地面之下，差不多到處都有煤礦。由此而東，經過法國北部和比利時，盧爾河的兩岸，都是產煤的地帶。此外，薩克森和西利西亞也有很厚的煤層。法國中部的高原地帶，周圍也有很多的煤礦。

各種原料，照例是要從原產地運到產煤區，以便遷就煤炭的。所以無論那個煤礦坑的周圍，差不多都有百種千宗的工廠環繞着。全球各地所產的棉，鐵，毛，銅等原料，照例都是大量地運到產煤區域，在那裏變成製造品，然後再運回各地。於是產煤地帶都成了大工業中心，人口稠密的城市，接二連三地建設起來。

不過有的時候，與其運生鐵來遷就煤炭，反不如運煤炭來遷就生鐵的便利。譬如鑄造熟鐵一噸，需要三噸生鐵，一噸焦煤，就是這樣情形。洛林鐵礦區的周圍，所以會成爲大工業的集中地，原因也就在此。這就是燃料遷就原

料的一個例子。

還有的時候，原料和燃料都由原產地運到另外一個地方來互相遷就。重而且大的原料，與其由鐵路運送，不如由水道運送，反便宜得多，而且水道運送的運費是很少計及路程遠近的。如果一個海港的位置很適宜，在那裏製造的貨物很容易運銷到各地，牠自然會成爲原料的集中地，世界各國所產的煤鐵，毛棉等都要運到這裏來；牠將會變成一個大工業中心，縱令周圍的地方缺乏原料和燃料也沒有關係。例如南特（Nantes）、盧昂（Rouen）、安特衛普（Antwerp）、鹿特丹（Rotterdam）和漢堡等地，就是這樣情形。在這種環境之下，我們很容易想像得到：假如爲了某種原因別處的煤炭運送不到，這些地方會陷入怎樣的苦境。即如法國洛林地方的各種工廠，如果盧爾發生長期罷工，或法德之間起了政治糾紛，或者爲了過重的關稅，都有使之停頓的可能。又如英國的鑛工或碼頭工人一發生罷工，則鹿特丹、安特衛普，或盧昂等地馬上會起恐慌。一九二〇年時英國的大罷工使得法國的鐵路業務受到很嚴重的影響，並且法國幾乎僅免於難。

在現代生活中，煤的重要不亞於麵包。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必要的燃料來供給她自己的製造廠和機器的需要，她將無法支配她自己的命運，一如發生饑饉時的情形一樣。反之，產煤的國家一定會獲得一個很優越的地位，出乎各國之上，在前一世紀的全部時期當中，英國所以會稱霸於世界，就是由於這個緣故。就因爲她所產的煤超過了她本國的各种工業的需要，所以她纔能夠在全球各衝要地點建立起煤站來，而各國的海軍就都受制於她了。她只須停止各煤站的供給，則各大商路間的長距離航行，便沒有一國敢和她拮抗的了。在大戰時期中，德國海

軍雖然有許多強有力的無畏艦，卻總沒有敢出北海一步，也就由於這個緣故。而地中海和太平洋中德國所有的幾隻戰艦，因此也馬上失去戰鬥能力了。

根據同樣的理由而論，假如法國不能從比國和德國得到大量的煤炭供給，則在現在的技術情態之下，法英間的戰爭，將爲物質上的條件所不許。由第厄普城（Dieppe）向西成一直線，舉凡峯多謨（Vandôme）、盎谷雷謨（Angoulême）、貝雲（Bayonne）等城的法國工廠，都要靠着英國煤纜能運轉，而法國的國營鐵路也只好仰仗着英國煤。法國郵船和鐵甲艦的航行能率，也要看牠們煤艙裏面的貯蓄量的多寡而定。所以法國的參謀本部拋棄了建造大鐵甲艦的計畫，的確是很有見地的。蓋此項鐵甲艦只能用來對抗義國和西班牙——而且還須在獲得英國同意的條件之下。可見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出產充分的煤炭來應付本國的需要，便談不到什麼「國家的獨立」（National independence）了。

英國曾經盡量地利用這種天然的優越地位，到了令人可驚的程度。她的商船，不管目的地是往什麼地方，只要貨艙中能有一點餘地，照例從起程的時候就一定是裝滿了煤炭，因為牠曉得在航程中一定是可以賣掉的——而且藉此可以多航行幾次，運費也能低過牠的競爭者。英國所以能夠獲得海軍上、商業上和工業上的霸權，煤炭就是她的頭一個恩人。

但是自從笛塞爾（Diesel）的機器發明以後，到了今天，煤炭在工業上，在商運上，在海軍上所佔的地位已經被石油代替了。英國雖可稱爲煤炭之王，卻是沒有石油；她所用的石油四分之三要仰給於美國和墨西哥。爲了

一種不可缺的燃料，現在也輪到她的頭上，非倚靠着他國不可了。所以她的商人和外交家都在極力地追尋石油井，只要是地球上發現了一個石油井，不管是在怎樣邊遠的地帶，他們也是極力想着要下手的。

所以機器發達的唯一結果就是把各種大工業都漸漸地而且強制地國際化了。最初的時候，牠會把龐大的工廠集團集中在煤鐵盤層的周圍。可是本地的富源很快地就耗盡了，這個時候牠便不得不渡過重洋到遠方各國去尋找原料去了，於是專門化的作用漸漸地就發生了，有的國家只出產原料而她自己並不加工製造，有的國家只把別國的原料加工製造，而她自己並不出產原料。這些國家都有了互相補充的性質，而她們之間的連帶關係也就建立起來了。不管她們的誇大狂會使得她們怎麼解釋這件事，但是她們再也不能過那獨立的生活了。

農業讓位於工業

我們已經知道：鎔鑛爐，鍊鋼廠，紡紗廠，織布廠等等，凡是一切倚仗着煤炭的工業，都有集中於各海港和各煤鑛區的趨勢。這種集中趨勢能夠把各種公用事業，譬如像鐵路，輪航，瓦斯業電業等等鼓勵起來，而這種種公用事業，翻轉來又足以把工場的數目增多。差不多每種事業都會把許多工人和他們的家庭吸引到一個地方，而他們是需要種種日用品和娛樂品的，於是各種的小店，麵包店，雜貨店，咖啡店等等，也都隨着他們到了這個地方來。住房的需要和地價的陡增，幾年之間，就把這個地方整個地變為街市和市郊了。不僅如此，就是那些舊的都市也都很快地繁榮起來了。在一世紀之中，倫敦的人口由九十五萬人（一八〇一年）增加到七百四十七萬六千人。

(一九二一年) 同期間內，巴黎的人口由五十四萬八千人增加到二百九十萬零六千人。而目前柏林的人口數，連市郊計算在內，也有三百八十萬零三千人之多了。

同時，以前很荒涼的地方現在也建設起來許多新的城市了。例如路易港 (Ludwigshafen) 在以前不過是幾個小鄉村，數年之間竟一變而為九萬人的城市了。又如來因河沿岸各地，像薩克森 (Saxony) 和米得蘭 (Midlands) 也都突然地有許多城市生長起來。在產煤區域往往有十個，二十個或三十個城市接二連三地排列在那裏。英國、法國、比利時和德國都有幾個地方，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很大的城市。目前英國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基羅米突計有二百十五人，比國是二百四十六人，(法國只有七十二人) 不拉奔 (Brabant) 是四百三十一人，薩克森是三百零一人，普魯士的來因流域是三百七十五人。

凡在繁榮程度很高的地方，差不多年紀很輕的人，就能賺很高的工資，所以在這些地方，家庭是很容易建立起來的，因此出生率也增加很快。英國的人口，一八二〇年的時候，不過纔一千四百萬，現在卻變成人口四千四百萬的大國了。同期間內比國的人口，也由五百三十萬，一躍而為七百七十五萬。德國在一八一六年的時候，還不能夠維持二千四百萬居民的生活，所以每年要送二十萬的移民到美洲大陸去，但自從一八九〇年以後，她不僅能夠維持原有的居民，而且在三十年之間，人口竟由三千六百萬一變而為六千三百萬。唯有法國的人口因為某種原因（研究起來是很費時間的）是停滯不動的。就歐洲全部而言，一八〇〇年的人口數是一萬八千萬，現在卻是四萬五千萬了，所以牠須得供養的人數，較之一世紀以前，竟增加了二倍有半。

因爲生活程度提高的結果，現在每個人的消費較之以前不知要增加多少。就是最窮苦的不熟練勞工，現在也不屑吃那種非純粹小麥烘製的麵包了。就是最寒苦的勞動階級的家庭，現在每餐也要吃肉、酒或啤酒等類。——甚至兩餐之間還要吃這些東西。糖和咖啡在以前是奢侈品，只有富人吃得起，現在卻成了一切人的消費品了。可知假定人口增加了兩倍多，消費額一定會增加四倍。

食物的需要雖然增加很快，但農村中的人口卻反而減少了。農場上的勞工，羨慕城市中的高工資和適意的生活，紛紛地走向工廠裏去，以前他們曾經生產過的種種貨品，現在都要向人家來買了。於是鄉村和城市之間發生了一種內部的移民運動。各國的組織所以會有很大的變動，這就是唯一的因素。

在一世紀以前，無論那一國的人口，都是以農夫佔大多數，都市的人口僅佔百分之十的樣子。目前的人口比例卻全然相反了。英國的城市人口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七，比國的城市人口是百分之八十二。德國，在一八八二年的時候，有百分之四十三的居民從事農業；現在卻是百分之七十七住在城市，百分之二十三住在鄉村。甚至現在還被人家稱爲農業國家的法國，也不能夠不追隨着這個一般的進化趨勢。在一八六〇年的時候，她的居民，每千人中有五百四十人是以農爲業的；現在每千人中，卻只有三百四十人務農——亦即佔人口總數的三成。

現在的情形和以前全然相反了。在三個世代之中，機器竟漸漸地把所有歐洲各國的經濟社會組織都完全地改變了。這個不知不覺的革命，確是現代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各大國再也不能單靠本國的土地而生活了。

革命的第一個結果就是：歐洲的各大國沒有一國能夠僅僅靠本國土地的產品而生活了。這個革命由大不列顛開始。自從穀物條例（一八四六年）時期地主們慘遭失敗的時候起，已耕的土地，大部分都已漸漸變為農場了。現在所謂「農業英國」，至多也不過像一種大模範農場，其主要任務只在仔細選擇標本以供海外殖民地的農夫們和牧畜家的參考——而英國所需的食料也就仰給於這些殖民地。一九二三年時，輸入英國的農產品，總價值達四萬七千二百萬鎊，觀此可知英國是如何地倚賴着這些殖民地。

說到比國和德國，她們都會努力挽救她們的農業。人工的缺乏，有機器來補救；爲了增加生產，化學肥料的應用也推廣起來了。至於選種和耕作的專門化（Crop specialization）也有人在作專門的研究：農業同時兼有了科學和工業的性質。雖然現在的收穫量較之以前多得多，幾乎增加了兩倍，但生產還是不能超乎消費。比國每年的農產品進口，約值三十萬萬五千萬佛郎，德國每年的農產品進口約值一百三十萬萬佛郎。法國以前曾把「自給」當作替她自己誇口的話，現在卻也不得不屈服於共同的命運了。法國的土地，既有千種百樣之多，而各種土地又具有互相適合的性質，而且地勢氣候都很適宜，所以在以前法國人一向都以爲他們自己的土地一定能夠產生凡百所需的物品以供居民的享用。可是到了現在這種見解至多也不過是時代落伍的政客們的一種老生常談罷了。雖然土地已經是分得無可再分，但農家的子弟們卻仍繼續不斷地往都市裏跑。那班留在農村的，又大

都缺乏資本，只能獲得僅少的收穫。在過去四十年中，雖然保護關稅繼續地增加，但法國還是不能產生充分的穀物以供人民之需。她爲了取得充分的食糧起見，那一年也得倚靠着羅馬尼亞、加拿大或阿根廷。她所產的酒類和牛油，雖有剩餘，但肉類和蛋類就不足了。結局到了一九二三年的時候，她在農產品的進出口差額上，竟拉了超乎四十萬萬佛郎的虧空。歐洲各國，因爲工業發達的結果，再也不能夠自足自給了，於是都不得不向着遠方的新與國家去購買低廉的穀物。這種穀物，或從多腦河流域的肥沃的沖積平原，或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或從南俄的著名的黑土 (black soil) 經由倫敦、漢堡和馬賽而運到各國。由俄亥俄 (Ohio) 到密蘇里 (Missouri) 一直向北又到曼尼托巴 (Manitoba) 平原這一帶的大草原也都成爲種植五穀的農場了。而且當加拿大和羅馬尼亞都在播種的時候，恰好正是阿根廷和澳洲都在收成的時候，歐洲各城市就都受惠於這種天賜的方便，如果北半球所產的穀物被牠們消耗得快，要淨盡的時候，便有南半球來救援。到了今天，我們烘麵包所用的小麥是一年四季都在生長着，我們得謝謝國際貿易的恩惠！

但光是麵包還不夠；城市居民所消費的肉類，其數量也頗可觀；而歐洲本地的供給老早就已不足了。北美、阿根廷，和澳洲的大平原上，牧養大羣的牛、羊、豬，最初的目的僅在採取毛和革。但不久罐頭業就發明了保藏肉類以便出口的方法，於是大量的醃牛肉和他種的保藏品便由芝加哥的屠宰場運到歐洲。後來，又有一個法國人發明了冷藏工業，肉類放在冰箱裏，便能遠運重洋而毫不失去牠的滋味與營養價值。這樣一來，就是最窮苦的歐洲工人，也能夠在他自己家裏，或在舊式的平民菜館中嘗到巴拉他的烤牛肉或美國的羔羊腿了。

孤立就要鬧飢荒

普天下出產的各種貨物都向着倫敦，漢堡，安特衛普和哈佛爾等地運送，以供當地的工廠中，鑛山上，或海港碼頭上的羣衆食用。

歐洲好像已經變成了一個健啖的巨人，吞盡了全世界的出產；歐洲的工人和中產階級，一日三餐都得倚靠着美國或羅馬尼亞的農場以及阿根廷或新西蘭的牧場。我們很容易想像得到什麼樣的禍災會降臨歐洲，假如在一個頗長的期間之內，環境不許這種種的貨物運到目的地的話，或世界各國都採納了愛國者所謂一個國家須得自給的建議的話。

英國的食糧貯蓄，在不到三個月以內就將耗盡——三個月以後，她的四千四百萬居民就將成爲餓殍了。同樣的遭遇也將很快地臨到八百萬的比國人和六千三百萬的德國人頭上。至於法國，或許能夠支持得長久一些，但同樣的命運總歸是要落在她的頭上的。而且這決不僅是學者的假想之辭；在世界大戰時，這試驗確已做過了。只要有幾隻德國潛水艇游弋於大西洋中，阻擋着運送食品的商船，不叫牠到達歐洲，便有一萬一千萬的英國人，法國人，比國人和意大利人不得不將就着吃麩子製的麵包，而且肉，糖，牛乳等物還得按口分給。可是各種運送來歐的貨物始終沒有被德國完全阻攔住過。至於說到德國和奧地利——匈牙利，當封鎖的辦法剛一發生效力的時候，她們便忍受着飢饉的恐慌，而百萬的男女和小孩因此都死於非命，雖然她們曾經想出種種巧妙的食品

代替物，但仍是無可挽救的。

這就是我們對於機器的極度發達所不得不付的代價，因為現代文明就是建築在機器之上的。機器的要素就在分工，國家正如企業一樣，因為分工的緣故，也趨向專門化了。有的國家專從事工業，有的國家專從事農業。這樣一來，無論是農業國還是工業國都可以致富。可是同時她們卻都被分工拘束起來，而不得不互相依賴了。

自今而後，沒有那一個大工業國還能夠靠着自己的土地而生存了。如果和世界上其他各國都隔絕起來，她們便馬上要挨餓，工作也馬上要停頓了；而且工業化的程度越深，這時越要受大害。

尋求海外銷路成爲存亡的關鍵

最初在大不列顛三島上建立織業工廠和鑄造廠的製造家們，其目的不過是要讓他們的同胞有衣服穿，有器具用罷了。但如果要想利用機器而使得生產費低廉，唯一的辦法，只有增加產量，和把交易的關係擴充。蓋只有物價低廉的時候，纔容易奪到市場。但如果這時某一個製造家賺到了錢，便馬上有人和他競爭，而且賺的錢越多，和他競爭的也越多；這個製造家如果還想保持他的主顧便只有再減低賣價之一途——而再減低賣價的辦法，還是只有增加機器和擴充產量與銷路。事情便是這樣反復循環地沒有個終止：凡是不能設法擴充銷路的，便只有眼看着敵人把自己的銷路奪去；所以擴充銷路不啻成了商人的生死存亡問題。

產量既然是這樣地增加又增加，不久英國的國內市場便無法容納了，英國的製造家，這時就不能不尋求海

外的銷路了。起初原是很容易的。因為英國的工業出品，如各項織物，器具，機器等，賣價都很低廉，所以能夠暢銷各地。歐洲其他各國的技術組織，既都不及英國的進步，當然是不能和她競爭的。但不久歐洲大陸各國也開始把鑛爐和紡織工廠設立起來，並為保護此項新興工業起見，保護關稅的壁壘，愈增愈高，以致英國的貨物幾乎無法再在歐洲銷售。於是曼徹斯特和北明翰的製造家便得不到更遠的地方去尋求銷路了。

這些邊遠的地方，因為缺乏煤，缺乏專門技師和資本，所以都不能採用紡織機器和鑛爐，而牠們本地的工業，又因賽不過歐洲工業的賣價低廉，漸漸地也都消滅了。牠們便漸漸地都專門從事於食品和原料的生產。所以這些新興國家都需要農業機器以便補救人工的不足，又需要鐵路，以便把所產的穀物，牲口，和生鑛運到各港口，然後再運往歐洲。牠們所需的鐵路，車頭，貨車，鐵橋材料，農具和刈禾機等都仰給於北明翰；棉織物仰給於曼徹斯特，毛織物則來自布刺德佛德。

此外，法國也把同樣的貨物供給給這些地方，因為她的國內市場也是供過於求了。法國的城市如勒·克勒左 (Le Creusot)，盧昂，魯貝等等地方便都加入了奪取銷路的競爭。不久，比國，德國，最後美國也都加入。如瘋狂的競爭迫得各國的大商行不得不改進牠們的機械設備以便減低生產費，同時還要為增加的生產額尋求海外市場。

我們如把一九一三年大戰前夕歐洲各國的出口總額，和一八四〇年，機器還未發達起來的時候的各國出口總額，兩相比較一下，就可以曉得：英國增加了五倍有半，法國增加了十倍，美國增加了二十一倍，比國增加了二

十六倍。又從一八七三年到一九一三年，一世代之間，各國的國外貿易總額（總括進出口額）有如下之增加：

法國由七，四〇八增加到一五，三〇一（單位百萬佛郎）或百分之二〇六。

英國由六，五四增加到一，四〇二（單位百萬鎊）或百分之二一四。

義大利由二，二二八增加到六，一五六（單位百萬利爾）或百分之二七六。

德國由由六，〇一九增加到二〇，八六三（單位百萬馬克）或百分之三四七。

美國由一，〇二五增加到四，一四九（單位百萬圓）或百分之四〇〇。

各國的工業出品運銷外國的數額，都是與年俱增。有的工業簡直要專靠國外市場。例如郎卡邑有些織業工廠幾乎光是替熱帶人民織造一種布疋（廉價的棉織品）。我還知道稜城（Rennes）有一個毛刷工廠，其出品幾乎完全運銷於新西蘭。在大戰以前，奧托曼帝國（Ottoman Empire）人所戴的氈帽，統統是奧國的出品。

工業生產愈趨專門化，便愈須超乎本國的疆界而向外尋求市場；但是製造品愈向遠方的國家運銷，則原料和食品的需要便也愈大。所以澳洲、阿根廷、南美的產品，大部分是運往歐洲的。這樣的交易使得雙方都得到利益。英國、法國、比國和德國，因此而獲得大量的原料和食品，其價格之低廉是在本國買不到的；而新興的各國藉此也能得到賤價的機器，假如沒有此項機器，那末，牠們的地面上下的富源，便無法開發了。

據估計，一九二四年一年之中，各國進出口貿易的總價值竟達三萬萬萬法郎之多。看了這個數字，可以知道各國間的「互相依賴」已經到了什麼程度。假使國際貿易突然停頓的話，各工業國便馬上會沒有東西吃，沒有

工作，而非工業國也會馬上沒有衣服穿，沒有傢具用，而無精打彩地站在牠們休耕的土地之上和垂死的牲口旁邊，光是發呆罷了。

在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一年之間，僅僅因為匯兌率的變動使得各國間的貿易關係受了阻礙——雖然實際上還沒有停頓——便有二百萬的英國人和三百萬的美國人陷於失業。同時，奧國人也幾乎可以說是餓死了，而堪薩斯市和達科他的農人也把他們賣不掉的穀物當柴燒了。

在三四個世代之中，全世界竟有了這樣大的變化，以致使得無論那一國也不能夠再自足自給了。機器發達的結果，世界各國都趨向專門化，而牠們的繁榮也到了可驚的程度。可是同時各國在經濟上都要互相依賴也成爲不易的原則。牠們如果聯絡起來，便都可以致富，如果分離開，便都要滅亡。

牠們必須互相交易，否則只有死亡。

第六章 市場的國際化

在國際貿易的發展上，還有一些相關聯的問題必須要解決的：這等大量的貨物怎樣纔能運到遠方去？買賣契約怎樣訂立？代價的支付怎樣辦理？資本怎樣流轉？

凡此種種問題都有待於一種新機械或新組織的發明：如輪船，鐵軌，電報，主要的市場，證券交易所等。這種極端複雜的機械是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產生出來的。到如今已經成爲國際組織的流通器具；各國的生命都要倚靠着牠。

價廉而體巨的貨物和海運的關係

第一個須得克服的困難，就是運輸。直到一八六〇年的時候，海上運輸還都靠着木製帆船，速度既慢得要命，而航期又一點不準，並且要任聽狂風暴雨的支配。載重量既很小，運費又極高，所以只能運送體積小而價值大的貨物。橫過大洋的貿易只限於有限的幾種奢侈品，如香料，金條，象牙，絲類，茶，咖啡等等。

等到大工業超出了國家的界限，便需要種種體積很大，很笨重而價值又很小的貨物，如像棉花，毛類，生鐵，五穀等。如果照着帆船的老運價計算，那末，運費將增多兩三倍，而將來的製造品的價格會高得賣不掉了。

自從一八五〇——六〇年之間，英國的各造船廠，造出了巨大的鐵甲船身，裝有很有力的蒸汽機，航運業的成本價格便馬上發生了革命，正如鑄鐵工業和織物工業上曾起的大變化一樣。船身漸漸地的加長，由一百米而一百五十米而二百米；船高如同三層或五層的樓房一般；而且竟能毫不費力地裝載千餘噸的貨物。

誠然，這種大船的建造費較比舊時的帆船不知要多了多少倍；但即便是開支大了十多倍，又有何妨呢？假如所載的貨物增多了一百倍，那末，每噸貨物的運費也許會減少十倍了。而且速度又非常之大，以前需要三五個月的航程，現在只要三個星期了，由於速度的迭增和噸數的增加，現在的一隻輪船，在一定的期間內所能載運的貨物，比較舊日的帆船要多了一百倍。而且牠還有一個優點：就是有一定的時間表。無論由一個商家或一個製造家的立場來看，這都是一個最重要的項目，因為他們藉此即能把交貨的期間算得確定，而不必貯藏大量的存貨了。

最後，牠還有一個無上的至寶就是「安全」。巨大的保險公司成立起來了，牠們負責賠償船舶和載貨的損失，而且因為投保的貨物，數量非常之大，被災的可能又比較的少，所以保險費都很低廉。運費，連保費計算在內，越來越公道了。目前，一噸煤的運費（連保費）還不到賣價的十分之一；穀類的運費約佔賣價百分之十，機器約佔百分之二。現在由紐約運一噸穀類到波爾多（Bordeaux）所需的運費，還不及以前法國境內的鄰村之間運送一噸穀類所需之多。美國大湖邊所產的玉蜀黍，在哈佛爾的賣價，較比離該地碼頭數英里之遠的英高維萊村（Ingonville）所產的玉蜀黍還要便宜。

就由於這種環境，然後國際貿易纔有可驚的發展，而國際貿易大形發展的結果，各國的種種經濟活動也就

很快地趨向於專門化了。船舶的數目，隨貿易之發展而迅速地增加。一八四二年時，世界商船的總噸數還只有六，七六三，〇〇〇噸；現在卻有五六，八〇二，八〇〇噸了。

要把這麼許多的船舶建造起來，當然非有造船廠不可。船舶的製造需要鋼鐵，還須裝置蒸汽機關，這種工作是要委諸金屬工業的，在這一點上，英國又佔了優越地位，英國的冶鐵工廠和石炭坑大都靠近海邊。而且英國人老早就喜歡把他們的儲蓄投資在造船業上面，英國的各門工業又適於替航運業預備下種種要運輸的貨物，較比任何國的工業都適宜。此外，即便是船舶將要啓行而所得運費尙覺不足的話，船主隨時還可以用壓艙的辦法，把空隙的地方填上煤炭，靠這種辦法，他所定的運費，比較他國海運業的一般運費特別來得低些。

於是各大洋上，都有了英國的定期航路——此外又輔以航線無定的運貨汽船，幾乎到處航行，在全世界的各港口上，隨處載貨，所要的運費又極低廉。美國的商船隊，在往日的木製海船時代，很佔重要地位，目前卻在被淘汰之列了。法國藉着很巨的獎勵金，補助造船業和航運業，纔能勉強維持住幾條航線。唯有德國曾於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間，把商船隊建立起來，堪與英國競爭。到了今天，其他各國眼看着英國佔了海上無敵的霸權，都起了一種反動，連最小的國家也在努力航駛她自己的船舶了；於是各國之間起了猛烈的競爭；運費減低了，航行的次數增加了，各項設備，也愈益替旅客的舒適安全打算了。

無論出口進口商人只須在所有各家航運公司中挑選一家；而這許多家公司都在競拉主顧。他當然要挑選那取費最廉而服務最快的一家——結果就有這種奇怪的現象：一家比國工廠也許會由一隻挪威船上取得由

西班牙運來的生鐵，或盧昂的一家製造廠也許會由一隻英國船上，取得牠的煤炭，而把牠的貨物用德國船運到美國。一網阿根廷產羊毛，由德國船運到安特衛普；然後在魯貝織成物品，再用英國船轉運到日本——這已成爲日常習見的事了。所以運輸業的國際化，是毫不減於其他各種生產業的。

但輪船只航行於港口之間。如果一種貨物，要由內地運到海濱，或由海濱運到內地，仍然用得着往日的二桅船。但不是任何地方都能用這種二桅船運貨的。以前在沒有可以航行的河道的原野上，只好完全靠着用牲口拉的載重大車。即便是在路易斯——菲利浦 (Louis-Philippe) 已經替法國建設了可驚的道路的時候，往往仍要用這種方法：四匹或六匹馬由兩個人駕駛着，載着幾噸的貨，最大的速度不過一天十里。一網絲，由里昂運到巴黎要十二天，一桶酒由馬賽運到巴黎要一個月。實際上，價廉而體巨的貨物，幾乎很少能夠運出一省的範圍之外。在經濟上，各地方都是自足自給的，也許這個地方的剩餘穀物會任其腐爛，而鄰近的那個地方正在鬧飢荒，如果一個鐵坑距離市場太遠，那簡直就無法開採。

自從有了鐵路之後，所有這一切的情形都改變了。在大戰以前，法國建築的路盤 (Permanent) 連同徵收土地的费用和必要的機械設備的開銷在內，大略估計起來，每基羅米突要十四萬法郎。此外還要有數目極鉅的車輛和管理人員。可是鐵路建築起來之後，每一輛車頭就能夠帶十噸的貨車四十輛，每天能走五百基羅米突的距離。雖然雜項開支 (Overhead expenses) 很大：以前每天大約要二十五生丁，一九〇六年的時候減到四又二分之一生丁，可是運費，按每噸和每基羅米突計算起來，都已減少了。到了現在，在體積巨大的貨物的價格之中，運費

僅僅是一個無關重要的要素。在以前，因為價值很小而不能運輸的一切產品，現在都突然地進入了國際貿易的範圍之中，穀類，牲口，生鏽，煤，機器等等，都能夠由極偏僻的鄉村運到極遠的市場。就是極易腐壞的物品，也因為受賜於鐵路交通的迅速，而能運送了；鮮魚，鮮蠔，鮮龍蝦，由數百里之外的海濱，送到我們的餐檯上。諾曼底的蘋果，歐洲南部的果品，尼斯的花，在倫敦和布魯塞爾都有得賣，一如在巴黎一樣。

在一世紀之四分之三的期間中，各地的鐵路都不停地擴展，不停地建支路；由加的斯（Cádiz）到海參威和上海，由好望角到開羅，整個的大陸都連貫起來了；由大西洋到太平洋，由加拿大到智利也都通了。並且這許多條鐵路還都和各港口的海運業聯絡起來，把全世界包括在一個極密的網裏，以致阿根廷的草原上，或新西蘭的山地上，幾乎沒有一塊農場不能把牠的產品運到薩克森或蘇格蘭的極偏僻的地方，或把這兩個地方的貨物運回牠們本土來。運輸業的國際化，一點也不亞於各種生產業了。

買賣契約怎樣超越空間而訂立

貿易的國際化是一件很明顯的事實，凡對此事稍加留意的人都可以曉得。可是決定各種價格和各種支付的國際機構，卻就連用得着牠們的人們也很少能懂得。價格總是買主賣主間磋商的結果，可是假定買主在法國而賣主卻在地球的那一邊，則價格將怎樣磋商呢？他們兩方又怎樣碰頭呢？誰也不能設想諾曼底（Normandy）的紡績者會親自到得克薩斯（Texas）去購買所需的棉花，或路易斯安那的種棉人會親自把數千包的棉花運

到盧昂，陳列起來給他的主顧看。可是買主並不知道貨物的質地如何，怎樣竟敢大膽地購買，而賣主也不知道顧客的償付能力如何，怎樣竟敢賣給他，也是同樣不易瞭解的。

現在姑舉棉花的買賣爲例。在墨西哥灣的各大口岸上（如新奧爾良（New Orleans）及加爾維斯頓（Galveston））都有許多經紀人和當地的商家接頭，這些商家的任務就是到棉田上去購買彈好的，並且分類好的棉花。經紀人都不是以他們自己的計算而買賣的；他們正和交易所中他們的對手是一樣的；只不過把他們顧客的訂貨單給轉移一下，以便獲得一種叫作「佣錢」（brokerage）的報酬而已。他們曉得各種棉花都是依照各交易所中通行的規矩而仔細分類好的，並且所打的包也都有一定的重量。歐洲的買主只須言明要訂某等級的棉花，譬如說「上中第三等」（Good middling No.3）就能曉得所買到的一定是某種質地的棉花，如果交來的貨不與他所訂的相符，他馬上就可以取消原來的訂約，或甚至要求賠償損失。那些經紀人，因爲一切的商人，都要向他求售，所以深知各地的供給量如何，並且很能左右賣主的價格。

在大西洋那一面的利物浦，卻也有許多買方的經紀人，和當地的大進口商常常接頭，而這些進口商又常常和各紡績廠接頭而收進牠們的訂單。於是居於大西洋東西兩岸的經紀人們之間便有了一種講價還價的作用；而時價的高低漲落，是要看買賣兩方的供求如何而定的。

這時，美洲的種棉人普通都很想把全部的收穫一齊脫手，以便支付一年中的開銷；而他方面的製造家卻都願意看臨時的需要零碎地買進。這時便用得着期貨市場來作解和人了；金融業者向生產人買得堆棧證券，取得

向堆棧提貨（棉花）之權，然後再將此項棉花賣出期貨，言明幾個月後交付。假如這時歐洲的需要有增加的趨勢，看漲的投機家一定會收買此項堆棧證券，盼望着價格上漲；反之，假如商業有銷沉的傾向，或下屆的收穫期將近，那末，時價就要下降了。投機家便是這樣互相賭着輸贏，至於誰輸誰贏，那就要看誰預料得對，誰預料得不對。而那張堆棧證券便輾轉地經過了許多人之手，一直等到一家紡績廠因為存棉告罄而買進了現貨，委托堆棧把棉花運送出口為止。這種制度使得生產人的收穫馬上可以得到現款的代價，不必等待歐洲的買主——而買主藉此也可以看他自己的需要，隨時地訂購，不必把巨額的資本擱置起來。但買賣雙方如果情願投機的話，還是一點妨礙也沒有。譬如說，一位製造家買進了若干包棉花，同時還可以把他作為期貨，如數賣出。假如到了清算的日子，事實正和他的預料相反，時價竟然下落了，那末，他因急買現貨所蒙的損失，還可以在所賣期貨的上面補償回來。在這種場合，期貨市場由別人看來，是一種投機，但由他看來，卻不啻是一種保險了。在大西洋兩岸上的投機家之間，天天都有這種講價還價的作用在進行着，使得無論要買要賣的製造家都可以得到一種比他個人的觀察更近乎事實的資料；而經紀人們，以中人的資格，讓製造家在貨物的質地、分量、和交付的條件上都能得到更好的保證。

一個製造家所以能夠在千里之外買得他所需要的原料而無需查看所買的貨色，並能在千里之外賣出他的商品而無需和買主接頭，都因為是受了商品市場的這種機構之賜。

這就是棉花交易所組織的大概情形。至於毛類，穀類，糖類，金屬，橡膠，織物，化學原料以及其他有相當交易的

商品也都有同樣的交易所。

電報是傳達買賣委托的工具

但爲使各交易所間的買方經紀人與賣方經紀人，看漲家與看落家都可以進行交易起見，第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靈通消息的工具必須建設起來，由於無限多的原因，時價是總在變動的。棉花的時價也許因爲意外的嚴寒天氣而騰漲起來，也許因爲一個政變而降落下去。投機家須得隨時改變並矯正他自己的地位，辦法就是另做一筆生意，和前一筆正相反。在專靠郵遞爲交通工具的時代，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因爲那時在歐洲得到美洲的消息，或向美洲訂貨，都須三個月之久纔能到達。在這三個月之間，買方賣方的一切情形又都改變了，預料的利益也許變爲損失了。所以在那個時候，國際間的交易都是比較小規模的，並且僅限於有限的幾種商品，有限的幾種生意。因爲電報還沒有發明，那時的國際貿易當然不會有巨大的發展，如像我們現在所目睹的。

藉着一個極簡單的手續：就是把電流由一條銅絲上通過去，羅馬字母的記號馬上就能傳達過去。距離和時間都沒有關係了；一個商人在幾小時之內，就能由地球上的任何地方獲得消息或向任何處所訂貨。遠距離的買賣所有的種種相當的危險，現在都減低到極小的限度了，因爲做了一項買賣，馬上就可以另做一項來矯正牠。生意增多了，交通也頻繁了。在幾年之內，各大洲間都佈滿了銅絲的網子，不久之後，各大洋之間也有了海底電線把牠們連貫起來了。

這種種偉大的設備都需要巨額的資本；可是無論那個地方，只要是有了這種設備，交易便馬上頻繁起來了，商家的收入增加了，運費減少了。並且海外電報的價格可以說是無關重要的——縱令每字十法郎也無妨——因為這筆電報費如果和商人靠牠而賺進來的利潤，或靠牠而免除的損失比較起來，那簡直是微乎其微的了。不久之後，又有了電話來補充電報的不足，因為電話是可以直接對話並且馬上可以得到回答的。到了現在，長途電話發達的結果，紐約的一個商人不必離開他的辦公室，就能和古巴的顧客講價錢，並且不用中人，又毫無耽擱，就能做成這筆生意。在最近的將來，恐怕電話、電報、海底電線等等又都會被無線電給淘汰了。

謝謝這種組織的恩惠，買主賣主雙方現在再也用不着限於在一個城市，一個地方或一個國家之中，面對面地做交易了。加爾維斯敦的交易所隨時可以探聽得到密士失必流域一帶棉田的情勢如何，利物浦的交易所也可以隨時收到英國一切紡績廠的訂單。這兩個交易所，藉着海底電線，馬上可以接洽；大西洋兩岸上的供方和求方馬上可以互通消息，好比一個城市中這條街到那條街一般近，各項交易的市價幾乎可以同時在這兩個交易中心記錄下來，由自動通信器立刻傳達到各銀行，並由各經理處用電話或電報通知所有各報紙。到了第二天早晨得克薩斯的種棉人就可以曉得他的棉花在利物浦能夠賣到什麼價錢，而郎卡邑的紡績廠也可以曉得他須用什麼價錢來買得克薩斯的棉花。藉着交易所的這樣奇怪的結合，各種商業事務都有了極端迅速，極端穩妥的作用。結果商業關係增多起來，使得各地都建了新的鐵路，創了新的海道，增加了船舶的載重量，擴大了港口的範圍，如果我們可以說現代的大輪船離不開電報，那末，也就可以說電報把輪船擴大了。這不過是那個支配各種工

業和各個國家的「互相依賴之原則」的又一例證罷了。只要是各國的交易所一旦都被電報連貫起來，牠們之間便馬上會有一種體統或組織成立起來。

各重要市場

各國的出品當然都先向需要最大的市場求售。例如棉花，一定是先售給利物浦，因為郎卡邑是世界紡績業最大的中心。固然有時布勒門或哈佛爾的市價會比利物浦高些，於是貨物馬上流向那邊去；可是這兩個市場都比較利物浦小得多（尤其是法國的），所以流到那裏去的貨物馬上就會充斥起來，而剩餘的貨物只好仍轉向利物浦去尋找買主。所以按照事理的自然，利物浦市場當然會影響其他市場。假如利物浦交易所裏的棉花市價上漲起來，其他市場的市價馬上會跟着上漲；假如利物浦的市價下落，其他市場的市價不久一定也會下落。

這並非說各地的市價在同一個時間都是一樣的；運費上，匯價上，尤其是關稅上的差別都得以考慮。但沒有一個地方能夠逃避重要市場的影響。而且重要市場的地點決非任意選定的，牠一定是在那出售的機會最大的地方，換句話說，就是在最大的需要中心的附近。但偶然，牠也許是在那運輸情形比較便利的地方。棉花和小麥的重要市場是利物浦；羊毛的重要市場是布刺德佛德；橡膠是倫敦……。

每天在同一個時間，全世界各中心地點的商人都在他們的電說機下等待着重要市場報告出來的數字。埃及的栽種者當收到倫敦來的，向他報告加爾維斯敦或古巴各項市價的電報，他所注意的僅僅是他的棉花或糖

值什麼價錢。任何一種特定的商品在各地的市價都是時漲時落，好像海水的波浪或生物的呼吸一般，再也沒有一件東西能夠表示我們地球上的經濟統一性，像這個普遍的物價節拍 (universal rhythm of prices) 那樣好的了。

國際支付的機關

還有一個須待解決的問題：就是國際市價上的訂貨契約怎樣支付代價？用什麼貨幣支付？

在五十年以前，各國都各有各的貨幣制度，或採金本位或採銀本位。雖然屢經當局的集議，但這兩種金屬的比價仍然是時時變動不停的，結果，一樁買賣，到了清算的一天所能收進的款項，總會比原訂契約上的數目大一些或小一些。於是無論那種商業的交易都有一種貨幣的交易伴隨着牠；在訂立買賣契約的雙方面中，一定非有一方面賠錢不可，所以國際的商業總會有一種令人不喜的危險和牠附隨着。

在十九世紀的末葉當中，各大國都相繼地採用了金本位。大家約定一切國際間的償付都須用金為計算基礎，凡金鎊，法郎，金圓，馬克，基爾特 (guilder) 等等貨幣的價值，都只等於其中所含純金的價值了；雖然因為習慣不同，各有各的名稱，但事實上，金鎊斯已經成為普遍的貨幣單位了。

但是由一國運金到另外一國的費用是很貴的。運金者須付運費和保險費，並須損失運送期間的利息，如果一筆款子是要在孟買，法爾巴萊索 (Valparaiso) 或新金山交付，起碼要一兩個月纔能運到。所以實際上都是用

匯票來代替現金，不過匯票的額面價值是要用金幣來表示的。譬如法國的一位出口商向他的主顧發出一張金鎊匯票，拿到他常有往來的銀行去貼現，銀行付給他法郎，把這張匯票賣給法國的一位進口商，然後這位進口商就把這張匯票寄給英國的一個債權人做爲貨價的支付。到了這張匯票滿期的那一天，這位英國的出口商就拿這張匯票呈給倫敦的一家金融業者，金融業者就照票面所寫，付給他若干金鎊。有了這種巧妙的制度，法國的出口商便由法國的進口商來清付，而英國的出口商也是由英國的進口商來清付；連一盎斯的金子也不必運送過海，所有的帳目就都付清了。

可是事實上，巴黎應付給倫敦的總數未必和倫敦應付給巴黎的總數絕對相等，於是供求的原則，這時就發生了作用了。如果巴黎市場上的金鎊匯票很稀少，那末，法國的進口商便情願多付些法郎，以便買到金鎊匯票，這時金鎊就要漲價了，由二五，三〇法郎漲到二五，八〇，或甚至二六法郎。反之，如果金鎊匯票供給很多，金鎊就要由二六法郎跌到二五，二〇或二五，一〇法郎了——這就是匯兌率的變動。

在平常的時候，只要是實際的匯兌率和平價差不了許多，法國的進口商便寧願多付些法郎以便買到金鎊匯票，而不願運送現金給他的債權人。但是一旦所差的數目，比較運費，保險費和損失的利益三者的總計還要多些，那他就寧可向法蘭西銀行提取現金了。如果逆勢的貿易差額迫得進口商都向法蘭西銀行提取現金，以致銀行的存金減少而有危及牠的鈔票準備金的可能，那時銀行便要提高牠的貼現率，不久之後，就可以得到以下兩個結果：（一）進口商因爲不得不付較貴的利率便限制他們向海外的購買額；（二）外國的資本家見到這時向法

國投資正是賺錢的好機會，都紛紛把資本投到法國來，法國可以不愁現金的缺乏了。

發行銀行的貼現率在平時好像是國際匯兌的一個調節器。大戰以前各國間的匯兌率所以始終能夠維持在平價的範圍之內，就是靠住這種辦法，而且有了這種辦法，國際貿易便得到不少的便利，因為匯兌的危險已經變為一個不必重視的因素了。

也許有的時候法國由美國輸入大量的小麥，但法國市場上的金圓匯票為數甚少，不夠償付這樣大的債務，那便怎樣辦呢？但這時法國市場上的巴西匯票也許很有得多呀！這是因為她會把大量的奢侈品賣給巴西的原故。這時她便可以把向里約熱內盧發出的匯票支付給紐約。這個三方面的支付，只須用兩個電報就夠了，現在的國外匯兌商就常用這種辦法。這也足以表示國外匯兌機關的國際化，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雖然各國都已經公認金子為共通的本位，但實際上的支付工具卻是商業匯票。可是這種匯票上面所有的不過是兩個不認識的人的簽字，那末，怎能擔保到了滿期的日子一定有人承付呢？這就是銀行的職務了。實際上，進口商和出口商並不直接接頭，他們都是委託他們的銀行來成立此項關係的。銀行照當時的匯兌率把若干法郎記入出口商的帳項的貸方，又把同數的法郎記入進口商的帳項的借方。因此而生的匯兌業務，完全由銀行去處理，銀行的這兩位顧客普通都不知道此項業務是怎樣辦的。銀行貼現一張國外匯票的時候，一定是審慎又審慎；因為實際上，照匯票所代表的數目而貸出款項的，乃是銀行。所以銀行必定是由於個人的商業關係，至少認識這兩個簽字者中的一個（或是發票人或是受票人），並相信他的償付能力，然後纔肯貼現。

在各大商業中心地設立分行或認當地的銀行爲支部的，要算英國的各銀行爲最早。所以牠們在各地都有一種索引，詳記當地各大商店的地位和牠最近的信用情形在一張卡片上。凡是歷史久遠的銀行都已經組成一種可驚的商業通報制度，供牠們從事出口業的顧主們利用。這些出口商藉此就能知道他們的遠方顧客的信用如何，以及應該給他們若干日的賒欠期間。英國的國外貿易所以會有那樣的發展，這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假如某人要向遠方的某地支付一筆款項，而他又不熟悉那地方的情形，他就可以在這些大銀行之中，找一家十分相信他的償付能力的，托其代辦。這銀行的經理在這張匯票上面書寫「承付」字樣，表示到滿期的一天，由該銀行負擔支付的全責。像這種帶有里昂銀行或韋斯敏斯特銀行簽字的匯票，全世界各地當然都會把牠當做票面所載的那麼多的現金接受的。人們甚至寧願要匯票而不願要現金，因爲匯票的流通需費較少，並且到了滿期的一天還有利息可得。在國際支付的清結上，承付匯票所以會代替了金塊的地位，就是這個緣故。

倫敦是全世界的清算所

各國都設有清算所，以備各銀行交換牠們所收到的匯票。在這些清算所之間，也有一種組織的關係，一如商業上的交易所一樣。國外匯兌也有一個重要市場，正和棉花、羊毛、銅等商品都有一個重要市場一般。這個市場的地位，也一如其他商品的市場，必定是在需要最大的地方。不過在這個場合，所需要的不是商品而是支付的工具。世界金融市場的中心地就是倫敦。

倫敦所以會有這種優越的地位，主要原因有五：

(甲)英國是最老的工業國，並且是第一個實行工業專門化的。她的國外貿易數量居各國之首位，所發出的商業匯票為數也最多。

(乙)世界各重要航路大半都以英國為終點，又統統都把她當作寄港所，所以即使是運往遠方的船貨也都由英國的經紀人，英國的運送業者或船主來處理。他們所做的此項業務是都要用金鎊來支付的。

(丙)英國各銀行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行，所以任何國的匯票在此都容易買到。

(丁)倫敦幾乎可以說是一切電報線的起點，所以世界各市場的匯兌率，在那裏都很容易打聽得到。

(戊)最後，如果要運金的話，也要算倫敦的金價為最便宜。蓋世界的生金產量，三分之二是出自英國各領地的鑛山（如德蘭士瓦、澳洲等地）。這些鑛山都把牠們所產的金塊運到倫敦去換金鎊。在大戰以前，人們隨時都可以拿金條向英商銀行去掉換金鎊，運鎔解費，鑄造費都不用花。這就是倫敦所以會成為世界清算所的緣故。

一位丹麥商人，如果買了巴西的咖啡，他支付貨價最方便的辦法就是給他一張向倫敦發出的匯票，因為他自己的牛油就是向倫敦運銷的。巴西的這位咖啡種植家一定也很願意接受這張倫敦匯票，因為他可以用這張匯票向巴黎買一塊寶石。而這位法國的珠寶商便又用這張金鎊匯票向好望角買一顆金鋼石，以便補充他的存貨。這張匯票就這樣地兜了一個大圈子。這足以解釋：為什麼和英國沒有買賣的商人也情願接受倫敦匯票，並且為什麼世界各地的銀行，在習慣上都用金鎊來做大部分的生意。所以只要世界各地有一點變動，馬上就會影響

到倫敦市場，反之，倫敦有什麼變動馬上也會傳播到世界其他各市場。所以英蘭銀行一旦提高，或降低牠的貼現率，所有其他各國的發行銀行便遲早都要追隨着牠。

謝謝這個巧妙的機關，國際匯兌已經是便利得多了。

到了今天，一張向外國發出的匯票很容易兌成現款，一如向本國某地發出的一樣。如果一個法國人要支付一筆款子到世界的那一端，他只須按照當時的匯兌率把若干法郎存入他常有往來的銀行就行了。因為有了電匯的緣故，一位巴黎商人在幾小時之內，就能付清一筆在紐約或大版的債務。

而且款數的大小，毫無關係。一九一七年四月的時候，美國財政部長麥克阿兜先生 (Mr. McAdoo) 付給英蘭銀行總裁孔立夫爵士 (Lord Cunliffe) 一張十萬萬金圓的支票，當天就付清了。

在大戰以前，距離的遠近已經是無關重要的了，各國幣制的區別也似乎沒有了。地球上任何兩地間의 支付，沒有不是馬上就能辦到的，而且各國的貨幣單位也都異常穩定，只有專門家纔能夠看得出幣價的變動。以前我們的先人曾有好幾百年之久，都覺得幣價搖動的可怕有如惡魔，現在的大眾卻把這件事給忘到九霄雲外去了。可是這架機器剛有了點障礙，我們馬上又查覺各國幣制的不穩定是危險的了。匯兌率的動搖已經又開始擾亂國際間的貿易了。沒有一天，牠不影響到國內的物價水準，也沒有一個人能逃避牠的影響。這或許就是各國間的經濟相依現象最討人厭的一點吧。

儲蓄怎樣轉移

運輸和匯兌這兩個國際機關使得各大工業國都很快地富庶起來。原料和商品的價格，因為各國的原料生產都漸趨專門化的緣故，一天比一天地便宜；結果就是生產費的減低和銷售量的增加。這樣一來，凡採用現代方法來從事製造，運輸，銷售等業的，沒有不是賺大錢的。

大工業，商業和銀行以及一般居間人的購買力都大大地增加起來，遠過於牠們自己的需要了。生活程度雖然提高，但一點也沒有擋得住人們儲蓄，而且現在的儲蓄量遠非過去的時代所能夢想。那末，所有此項累積起來的財富將做何用項呢？直到十九世紀的中葉，人們的儲蓄還都是投在當地：例如一位地主就用來擴大他的地產，一位商家就用來擴充他的營業或造就他的子弟。但自那時以後，因為蒸汽機的發明，甚至連儲蓄都不得不被捲入國際生活的漩渦了。大的企業都需要巨額的資本以便發展牠們的機械設備。這時私家的財富便不足以應付而不得不向一般大眾之中去找出路，於是股份有限公司就產生出來了。

這乃是現代的各項改革之中，一個最有引誘力的。供大眾購買的各種股票，單位都是很小的，或四十鎊，或二十鎊，或四鎊乃至一鎊，即便是極微少的儲蓄，也能投資在此項股票上面。股票的持有人只對於他所認購的數額負責，並可隨時轉賣出去。各種債券 (Debtenture) 是預備賣給那些素性謹慎，只希望得到一筆固定收入而不願冒太大危險的人，至於股票，則是預備賣給那些喜歡冒險而希望分到一筆紅利的人。一般大眾很快就覺察此項

股票與債券的收入較地產的收入爲大，而且牠的價值增加得很快，即便是頂幸運的農地也不如牠。一個很澈底的革命在不到一世代之中就完成了。資產階級這時便都撇掉了不動產而羣趨於金融投資之一途。大企業增多了，股票債券的發行額，各銀行向各種鐵路，航運，鑛業以及冶金業的股票上投資。各國的中央政府以及市政府都爲了獎勵經濟活動，開始募集公債以開築運河，建設海港——而一般的大衆也都踴躍地認購。在每天的交易所市價單上都可以找得到新的投資途徑，而投資額的數字也愈來愈大（註一）——假如說機器鼓勵了儲蓄的習慣，那末翻轉過來，也就可以說，儲蓄使得機器幾乎能夠無限的發展。在兩個世代之間，歐洲所有的各大國都經過了一個根本的變化。

但不久到了一個時期，國內的各項建設差不多都已完成；這時，財富的增加雖仍不斷地使得人們把更多的儲蓄拋入市場，但股票債券等的發行額卻開始減少下來。資本的過剩，結果使得人們的收入減少。以前的利率會到過百分之六，現在卻要低落到百分之四；百分之三了，若是那些特別可靠的有價證券，一般小投資家喜歡購買的，其利率甚或低落到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也未可知。這時，投資家們的注意點便都轉移到外國去了。中歐各國，俄國，尤其是美國都抱着宏願要想開發牠們自己的廣大農鑛富源，但因缺乏必要的資本來購買西歐工業所創造的機器，牠們便只好請求倫敦和巴黎的各銀行替牠們在英法的市場上銷售牠們的政府公債票，牠們的鐵路和鑛山的股票。牠們往往會提出種種的政府擔保品或抵押品，如像關稅收入以及入港稅等。各銀行爲優厚的佣金所引誘，馬上就答應了，而大衆們爲高的利率所餌，也都踴躍認購此項投機事業的證券，至於這些國家在什麼

地方，他們連一點也不知道。最先有的就是英國、澳洲、日本、中國、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等國政府的公債票。在倫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中，無論那個小國的公債也都有行市開着。後來發現的就是土耳其、俄國和美國的鐵路債券，安提耳或委內瑞辣的築港債券，塞爾維亞或西班牙的銅鑛債券，新喀利多尼亞的鎳鑛債券，德蘭士瓦和阿拉斯加的金鑛債券——以及在地圖上找不到的各地方的形形色色的鑛山債券。法國一般謹慎的農人和官吏隨便就把他們的錢財，付託給一個不詳其所在的機關，如像米那宅賴斯（*Minas Coraes*）的政府，或塔干洛格城的某公司，或漢城的自來水公司，而絲毫不過問他們的寶貴的銀錢究竟用在何處。

在大戰以前，法國持有的外國證券，估計約達三百八十萬萬法郎。英國持有的外國證券，連同各領地的投資，合計約達四十萬萬鎊。倫敦和巴黎的交易所好似一個廣大的貯水池，世界各地的投機事業都到此地來挹注牠們所需的資本。其次，在國際貿易上已有幾百年歷史的古國，如像荷蘭和瑞士，便也有阿姆斯特丹、日內瓦和沮利克的各家銀行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至於德國，自從她漸漸地工業化了之後，法蘭克福和柏林的交易所便也隨着增加起來了。最後，說到美國，因她向歐洲借款之故，便把華爾街（*Wall street*）變成了世界上一個主要的證券市場。

流通管

各種股票漸漸就流通於諸市場之間，這乃自然的趨勢。有了各種電報，有了銀行的各種代理機關，以及國際

支付的整個組織，一個法國人便很容易在任何國外市場買賣各種外國的股票。而且因為借款的數額愈來愈大，所以各種證券都須同時向各銀行中心地銷售，並在任何交易所都標有市價纔行。只要是市價少微有一點變動，各交易所使用電話和電報報告出去，於是各銀行都到市價最低的地方去收買股票，並且馬上用電話在市價最高的地方賣出去。所謂「裁定」的那種作用使得資本有了高度的流動力，差不多天天都有幾百萬法郎的資本流動於各國之間。

有的時候還會發生種種奇怪的團結作用。在大戰以前，德國工業的發展超過了牠本國的儲蓄，德國人便在瑞士組織各種團體，目的專在吸收法國資本，以便替德國的企業籌資金。有幾家法國銀行，每隔兩星期便替柏林交易所墊付一筆清算資金，幾乎成了慣例，因為牠們藉此可以得到較高的利息。當日俄戰爭的時候，俄皇所借的一切借款，差不多都是法國的各大信用機關在法國的市場上替他募集的。但同時巴黎的各家美國保險公司卻用牠們的準備金（這是法國的保戶所納的保險費）認購日本的戰債。這樣一來，法國的投資家，便不啻給雙方備辦作戰的武器；他們雖然在喊着「苦魯派鐵金萬歲！」（Vive Kouropatkine）但乃木擊敗俄國軍隊所用的各種礮彈，卻正是他們替付的價錢。

自那時以後，種種情形並未改變，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法國的法律雖然禁止資本出境，但仍有幾十萬萬法郎流入英國和荷蘭去收買各種石油股票。世界各地的交易所好像是許多相通的管子，流通於其中的資本，自然是向着報酬最優的地方流。資本為最高的利息所吸引，正如流質和固體受支配於地心吸力的法則一樣。

國界是擋不住資本的流通的。此項大工業股票的投資人，只要拿着利息單，就能到任何銀行去取利，並能在任何地方的任何證券交易所賣出他的股票或購買他種股票。這樣一來，他便能把他的錢財放在任何地方而不致受本國政治上種種變動的影響了。

有人說過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很富的俄國地主被共產黨把一切的財產給沒收了。他好不容易纔逃出俄國，到了巴黎，錢袋裏是一文也沒有。可是這時他突然想起他曾把五十張某大石油公司的股票，存在一家法國銀行裏，原來是每張二千法郎買的。這時的價錢已經漲到二萬法郎一張。於是轉瞬之間，這個亡命徒又變成一個富翁了。到了今天，又有一個新的階級——其中包含一小羣富翁，致富原因各有不同——出現在我們目前。他們的財產是投資在種種國際股票的上面，他們時常由這個大旅館移居到那個大旅館，依照季節，由倫敦而遷到俄斯坦德，由開羅而遷到阿爾卑斯山。他們是既無田地又無房產，既無商店又無工廠，他們是一個沒有家庭的流浪者；他們的巨富盡在一個皮夾之中。交易所的國際化產生出來這樣一種新的人物（流浪的富翁）。他足以表示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的色彩，比較社會主義派的勞工都要適當些。在經濟上看，他是沒有國籍的——一個純正的世界公民。

註一 五年之中，法國在鐵路上投下的資本，達一百八十萬萬金法郎。

第七章 活的地球

輪船、鐵路和電報線之巧妙的網狀組織，以及各種專門化的工業交易所，銀行等等都是突然發展起來的。在起初的時候，這種種現象不過僅限於歐洲的幾個國家，但不到一世紀之間，就很快地傳遍了東西兩半球，終於把全世界都征服了。

在一百年以前的地圖上，各大洲的中心地帶還都寫着：「未經查勘的區域」的空白。那時的北美洲還沒有人去探過險，廣闊的亞馬孫流域（Amazon basin），安第斯（Andes），以及諸大草原之上只畫着幾條旅行的路線；中阿非利加和澳洲的全部還都是人跡罕到之處；西伯利亞還是一片荒地，中國和日本尚都閉鎖着。只有小小地歐雷西亞半島（Eurasia）是白種人「開發過」的。至於其他大洲，除了沿着海岸窄窄的一條地段之外，尚都是人所不知的地方。

一般人固然也都知道這些新的，或閉鎖的地域，內部蘊藏着極豐厚的富源，舉凡原料，食糧，寶石，金屬等等無不應有盡有，可是因為缺少價廉而有力的必要的運輸工具之故，這種種富源是無法開發的。即便是到了鐵路輪船降生之後，這問題仍未能解決，因為建造的費用太大。若是花一筆巨款在這種荒涼而野蠻的地方，以便購買金屬原料，建造鐵路和海港，那一定會賺不回本錢來的。在一噸的出產尚未賣出之前，先得拿出幾萬萬的創辦費來！

世界的開拓

這時，歐洲各國，都因驟然致富之故，無不感覺儲蓄的過剩和投資的無辦法，而利率馬上低落下來。從那時起，歐洲人便再也不專替貧乏的白種人（如匈牙利人塞爾維亞人等）募債，而把眼光轉移到摩洛哥人、愛西屋皮亞（Ethiopia）人、暹羅人和剛果人的身上來了。法國或比國的小股東，對於這些新奇的地方是一點也不明瞭；可是愛西屋皮亞或暹羅的政府定會給他一種保證，不然的話，法國或比國的政府也會給他一種擔保。他既相信他的銀行，又因為這種外國證券有百分之六的利息，而他本國的整理公債不過只有百分之三的利息，於是自然會踴躍地認股了。這樣一來，他的微小的收入馬上會有相當的增加。於是幾萬萬的款子便貸給亞特拉斯圈狀村落（Atlas douars）的遊牧民族，或貸給印度支那的苦力和窩班（Oubanghi）的黑人了——不意他們對於此事卻還完全不知。

公債發出後，過了幾個星期，便有許多建築材料和機器卸在一個荒涼而尙未開化的碇泊所，那裏的碼頭也築起來了，沿着海邊也有了防波岸了。不久，從洛林（Lorraine）運來的鋼軌，從郎德斯（Landes）運來的木料，以及克勒左（Creteil）的車頭都在碼頭上堆積起來；白種和有色種的勞工陸續由各地招募了來。再過不久，低原上和高山上都建設起鐵路來，一直達到建有許多回教寺院的白色摩洛哥城市，由此再深深地通入內地，那裏還有許多遊牧的部落，過着亞伯拉罕時代的生活。

同時，在澳大利亞的高原上，也有許多工程師正在建築路盤，而第格利斯河與幼付拉底斯河流域也正在建築，幾乎把歷代亞述國王和巴科達回教國王的靈魂都嚇活了。再往北還有一條大鐵路，在西伯利亞的荒原與河流上貫穿過去，吉利格拉地經過了許多光怪陸離的東方宮殿，驚醒了饒有古風的滿洲，把上海商人的帳房忙得如瘋似狂。

對於這些偉大的工程，摩洛哥人（Kurbs）和中國人固然沒有花過一文錢，可是用他們的名義而募集的公債卻也很少付給他們現錢。英國或法國所認購的公債債款，大部分都仍留在本國；即以此款付給該國的製造廠，作為鐵軌和車頭等物的代價。此項債款不過替各國的冶金業開闢出若干新的銷路，替各國的股票持有人增加若干紅利，替各國的工人找到一些工作罷了。這時，各地的大農場，大牧場，以及森林鑛山都有鐵路把牠們連貫起來，各種新興的公司，如雨後春筍一般地產生出來，去作採木，掘礦，剪羊毛等工作，各種工廠也設立起來了。

在三十年前，剛果河流域還是一塊閉鎖的地方，由海邊進去幾哩，就有大瀑布擋着去路。後來花去許多的錢纔由馬他第（Matahi）建了一條鐵路通到有瀑布的地方，由那裏藉舟楫便可直達內地。這樣一來，剛果內地的產物，如貴重木料，象牙，銅，尤其是樹膠等物便都由剛果河各支流運了出來，直到馬他第，然後再由馬他第運銷各國，自這時起，樹膠的供給大形增加，價錢便賤下去了。歐洲的中產階級，在各大城市的通衢上坐着汽車兜風，就完全是受了樹膠之賜。由此類推，只要是一個新的地方開闢出來，種種物產，如稻，麥，咖啡，銅，棉等等的市價，便馬上會

低落下來，使得歐洲的製造家，商人和消費者得到不少的利益。

這還不算，只要是內地的物產能由鐵路運至海上，那末，歐洲的商品便也能由鐵路運至內地，土人雖還沒有富庶起來，但也有了種種新的需要：他很願意用樹膠和米，換取曼徹斯德的棉織品，因為此項棉織品的色澤既很華麗，而價錢又比本地婦人所織的土布要便宜一些。他也學會怎樣用歐洲所製的廚房什器，也知道怎樣用玻璃珠作裝飾品了——此外還替歐洲的商業闢了許多許多的銷路，結果，所有此項出口進口的貨物，都會替鐵路公司增加收入，使牠能夠分派很高的紅利給股東們。各種企業的成功引誘人們再發行新的股票，創辦新的企業，開發新的地方。

由於上述的作用，全世界的開發，不到一世紀之間就已告完成。現在幾乎連一塊未經查勘的地方也找不出了。即便還有什麼地方要建設鐵路，也一定早已有電報線敷設起來，並且無論什麼高山峻嶺之上，也早已有飛機。勘查過並攝製過影片。只要把所需的各種工人招募了來，便馬上能把羊腸小路變為可行汽車之路，再進一步，就能把此項道路變為鐵路——而此項鐵路又可藉着許多航線，與世界所有的各工業國連貫起來。

廣大的美洲草原，以前不過是紅種土人和外來獵戶的爭鬪之場，但不到一世紀之間就變成一塊廣闊的安樂士，農業也興起來，工廠也設起來了，大城市也發達起來了；事實上，不啻成為第二歐洲了，原來的南美大草原現在都變成大牧場了；剛果也變成歐洲肥皂業的附庸了；日本和曼徹斯德競賽着高下，而中國爲了教育上的目的，也派遣官吏到歐洲視察。西伯利亞把所產的牛油經由北極圈運至倫敦。而我們的電報線是用坦干伊喀湖所產

的銅製造的。盧昂的工人爲涅公河流域的苦力織造棉織物，而法國的小中產階級就把他們的資本投放在揚子江邊，或安第斯的硝酸製造廠中。

歐洲文明就是這樣很快地傳遍了各大洲，甚至把未開化的地方——這些地方從開天闢地的時候起，一向都是孤立的——都捲入世界生活的旋轉與律動之中了。大工業藉着現代機器的力量迫使各國不得不專門化，並且因爲到處都以最大的產額與最小的成本爲最後目的，致使全世界的經濟統一，在不到一世紀之中就告完成了。

這個快似旋風的征服作用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一件事，如果把塞索斯特立 (Sesostris) 賽刺斯 (Cyrus) 亞利山大 (Alexander) 愷撒 (Caesar) 或拿破侖 (Napoleon) 等人所創的帝國和這件事情一比，便都不能算是一回事了。這件事情是多麼更覺重大，更覺有效驗而持久呢！後代的人將要詫異爲什麼他們的先人目睹着機器所成就的革命，卻一點也不覺得牠的重要。

由水虵到脊椎動物

工業革命是在十八世紀的中葉由英國開始，而於十九世紀之中，傳播到西歐和北美的。牠已把世界各國的基本經濟構造給完全改變過了。

在蒸汽時代以前，農業乃是代表的，典型的產業，乃是社會單位的細胞；農人及其家庭的一切需要幾乎無不

取價於此；即使有些買賣交易，實際上也僅限於一個鄉村，一個省區，除了些少幾種奢侈品而外，是決不會超過國家的範圍的。這些自足自給的細胞，互相之間，只有很小的差異；他們只是毗連在一起，僅僅因為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的系統纔結為一個團體或一個國家的。

自從蒸汽機關發明出來，再配以股份有限公司的組織，所有的一切就都改變了。工業(Industrial enterprise)在起初只是例外的，後來漸漸增加，漸漸繁衍，卻竟成為一切企業的典型與標準了。他愈來愈趨專門化，迫使其他一切企業連同農業在內，都不得不走向專門化的路途。大工業，迫於無論何時都得增加機械設備以便減低成本的需要，必須繼續不停地推廣牠的銷路。纔行到了一個時期，生產的速度超過了本國的需要，便不得不向國外市場去打出路了。同時牠的原料的消費，也增加到了極度而不得不向國外尋求供給的來源，又因人口之日益增加而不得不到極遠的地方去找尋食糧。漸漸地各國就都變為專門化了；有些國家，備有龐大的工業機器，牠們的生活便完全仗着把原料變為製造品來維持；另外一些國家則僅從事農業上或鑛業上的生產，而要倚靠着前面那些工業國來供給牠們製造品和用具。致富很快的工業國替農業國預備下開發所需的資本，而正在開拓的新國則替舊世界的各種工業闢出必要的銷路。其結果就是各種物價的普遍低落，消費和人口的增加，以及世界前所未睹的繁榮。

國際貿易由例外而變為原則，而且幾乎即是生存的條件了。假使郎卡邑的工廠都停頓起來，密蘇里的種植業者便無法謀生了，假使中國或巴爾幹各國不買英國的織物，英國的工人便馬上要失業。

社會單位的細胞現在再也不是自足自給而僅毗連的，卻是經過專門化而不得不互相倚靠的了。貿易超越了國家的疆界，把世界變成一個有機的總體，其中各部有如人身的四肢五官一般，都是互相補充的，而且都各有一定的與專門的職能：如營養，變形，分配等等。

這種種的職能，依照着一切生物所共遵的定律，而創造出牠們自己的器官。

(一)脈管組織——這是由一切鐵道和航線的大國際脈路組成的。具有互相補充作用的各處地方，藉此就能超越乎一切海洋和大陸的阻隔而互相聯絡起來。在各國，又都有小的脈路和此項大國際脈路相連貫，而各國的脈路又都分派為無數的毛細管遍佈在當地。有了這種組織，便無論怎樣偏僻的小鄉村也能拿牠的產物和外界交換了。反之，無論那種著名的產物（如巴西的咖啡）也能在極偏僻的地方（如布勒塔涅）找到了。

(二)神經系——一個廣大的電報電話線的網子遍佈在全世界之上，把任何極小的鄉村也都囊括在牠的網孔裏了。牠的反應是極其靈敏，極其迅速的，只要有一件事情發生，便馬上會藉着電報傳達到各大通訊社，再由各大通訊社用電話通知各報館。一件關於東京地震，或美國選舉總統結果的新聞，用不了一天的功夫就能達到法國極偏僻的鄉村，以供當地居民的閱覽。藉着同一的徑路，他們每天還能知道所需要的各種商品或希望賣出的某種產物是什麼市價。一切的人每天都能和全世界的輿論或消息相接觸。

(三)神經中樞——在各大商路相遇的地方，一定會有各種重要的交易所設立起來。這許多交易所，藉着上述的『神經系』傳達給牠們的消息，就能測度各種商品的一般供求情形，並能為之規定時價，而馬上通知有關

係的各方面。牠們收到各方面的訂貨單，就立刻用電話或電報發送到極遠的地方，而上面所說的那個脈管組織的全部機關因此就能活動起來，把原料和食品運到各工業中心，又把製造成功的物品運回各自的市場。

(四) 生殖器官——這樣取得的財富，其中有一大部分不是由那些生產的人自己消費掉，卻是用儲蓄的形式留存起來，而委託給銀行保管着。銀行由一切希望創立新企業的人收到申請書而放給他們款子，那不啻是說：資本已經轉移，留存的貨物現在已經提出來供新設的企業利用了。藉着這種作用，鐵路和航線都擴充起來，電報線也延展到未開墾的區域去了。而這整個的「經濟之樹」(economic tree)也就滋生出新鮮的嫩枝來了。

(五) 腦——爲了調整並管理所有這些專門化的器官計，便有一個中央的器官發生出來。所有的交易所都互相聯絡着，好似流通管一般，並且都跟隨着那個周轉額最大的交易所而變動。只要是一種重要的消費品，便有一個主要的市場設立在那兒，所有其他的市場都聽從牠的指揮，恰好像節節脊椎骨的神經中樞一般，起初原是各自獨立的，但是到了後來就漸漸地互相銜接而聽從腦子的命令了。另一方面，所有的工商企業也都要仰賴着各種銀行來替牠們處理收支，貼現票據，發行股票債券以及辦理投資等事。只要是商品一過手，便有現款的轉移——或寧可說是銀行帳目上的轉移。所以銀行不啻是各種企業的會計員。

銀行藉着證券交易所的機構就能診察金融上的脈搏，而貼現率又不啻是牠們推斷商業流通速度的指針。牠們好像是這有機體的腦子，使得牠能有意識的作用，並且替牠記錄行爲，調和動作。有的時候，在銀行的系統之中，也會有分化和階級的作用，所以銀行也有種種的區別，如像儲蓄銀行，商業銀行等等；所有這些銀行都受支配

於一個統制的機關。這就是各國的中央發行銀行（Central bank of issue），牠對於幣制金融有着統制的力量。如果因為生產過剩或消費停滯的緣故，各銀行的現貨準備漸漸緊縮而外界的信用需要卻反增加起來，這時，各銀行便要把牠們所有的商業票據，拿一部分到中央銀行去再貼現；中央銀行則用牠的金準備作抵押而增發鈔票，把此項多餘的信用通融給商業界，以免破產。但如果信用的需要太大了，中央銀行便要提高貼現率，好阻止各銀行向外貸款；這樣一來，商業界便不得不降低賣價以便清償積欠——於是消費受了刺激而生產受了阻撓，漸漸地就把金融上的均衡給恢復了。各國的中央銀行，雖然在牠們本國以內，都是經濟的統制機關，但不能不受他國中央銀行的牽掣。國與國間的資本移轉是極其容易的，如果某國的中央銀行提高貼現率，各方面的流動資本便如潮湧一般，馬上流向這邊來，其他各國的中央銀行自然也就不能不提高牠們自己的貼現率了。

實際上，各國的中央銀行都唯英蘭銀行的馬首是瞻，所以英蘭銀行好像是個統制中心。在歐戰以前的時候，只要英蘭銀行一提高或一降低貼現率，巴黎，柏林，亞姆斯特丹和紐約的銀行，在幾天之內就一定都會效尤起來。蓋倫敦乃是世界所有各大海底電線的相交點，所有各大航線的終點，又是世界最大銀行的所在地，和一切金融市場與清算所的中心點，並且還是世界上進出口額最巨的國家的首都。結果，當然只有倫敦纔能夠成爲世界經濟活動的統制機關而其他的都市是絕對沒有這種資格的。

因爲有了這種廣大的脈管組織與神經系，有了這種由商業中心與銀行中心配合而成的等級組織，有了這種調和啓迪人類奮勉的中心機關，所以從大戰爆發的時候起，全世界就已經好像成了一個有生命的物體，牠的

各部分是互相依靠的，而且依照着相同的節拍而一致動作的。

國際的恐慌

我們只須舉一個實例就可以明瞭：如果這個有機體的一部分發生了很小的恐慌，便會怎樣迅速地而且激烈地傳播到其餘各部分。在一九〇七年的初秋，美國正在經過一個極度繁榮，極度狂熱的時期。各銀行對於新興的企業，只要是想像得到的一種事業便無不墊付巨額的款子給牠，而且所墊的款子，不僅出自銀行的資本，就是存戶的存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墊在其中了，但存戶們卻還一點不知。在這許多新興的企業之中，最有進取心而且最有計劃的要算是威斯亭好斯公司（Westinghouse）有好幾家很殷實的銀行，幾乎無限制地幫助牠，其中一家就是克尼克拔克兒信託公司（Knickerbocker Trust Company）在那一年的十月十六號，這許多家銀行之中，有一家叫做漢紫（Heinze）的，因為作銅鑛的投機不幸失敗，結果不得不停止支付。過了五天，國民商業銀行（National Bank of Commerce）便在清算所中拒絕接受克尼克拔克兒信託公司的票據了，理由是牠曾幫助漢紫。這消息一經傳出，克尼克拔克兒信託公司便宣告停業，因為牠的現款都貸給威斯亭好斯公司了。就在那一天，威斯亭好斯公司也不得不停止支付了。懷抱杞憂的民衆，不知道這一回的恐慌將要怎樣了結，便紛紛跑到各信用機關去提取存款。各銀行因為急於取得現款，就把所存的證券急速向市場上拋賣。於是各種證券的市價都紛紛狂跌下來，而皮特斯堡證券交易所也馬上倒閉了，這恐慌一直傳播到紐約，以致紐約的各銀行也有巨款

被提。結果有九家銀行停止支付，其餘各家也都忙着收進現款。當時的利率竟漲到百分之二十二左右。

在這時候，銀行家毛爾更（J. Pierpont Morgan），煤油大王羅克費羅（J. D. Rockefeller）和他們的朋友們——他們也許預先曉得這次的大禍——便決定要參預這回事，以便救他們的同業。辦法是貸出慈善性質的放款，利率取百分之二十二。他們所能籌得的款子，無論怎樣重要，但仍然不夠應付當時的需要；幸虧歐洲各國的資本，因為高利率的吸引，都流向這邊來，於是紐約的恐慌在十月二十六日就停止了。

那時，這恐慌現象漸漸傳播到大西洋的對岸去了。英法德等國的資本家與投機家，爲了貸款給美國人以便解救危難起見，只好拿所有的股票作押，向銀行借款。各銀行因爲牠們自己的資金不夠應付所有此項需要，便把牠們所持的商業票據拿一部分到中央銀行去請求再現貼，各國中央銀行的鈔票流通額因此就增多了。這時人人都要向英蘭銀行申請現金或購買金圓匯票。爲了這個緣故，英蘭銀行曾向法蘭西銀行借了七千五百萬金法郎的債，但仍不足應付當時的需要；結果，牠的鈔票發行額儘管增加不已，但牠的資金反倒減少下去。英蘭銀行爲阻止投機起見，便把銀行利率（Bank rate）提高，由百分之五而百分之五·五，而百分之六，最後竟增到百分之七（一九〇七年十月）。法蘭西銀行也跟着牠一致行動。尤其是德國的情形最爲急迫，金準備減到鈔票發行額的百分之二十二，貼現率漲到百分之七·五，以股票作押的放款利率增加到百分之八·五（十一月三十日）。在這次恐慌以前，各國的非發行銀行（按即中央銀行以外之各銀行——譯者註）曾經承諾以百分之五六左右的利率墊款給各項製造業和商業的，到了這個時期，卻都拒絕此項信用的展期了。各銀行的存戶，爲償還此項

放款，便不得不出賣他們所持的股票，致使證券交易所也都恐慌起來。其他沒有股票的人，便只好把他們的商品向市場上拋賣，甚至甘受損失，也要把商品脫手。於是許多人都破產了，並且連累得他們的債權人也都傾家蕩產。迫得這些債權人都把以前所訂的購貨契約一筆鉤銷，致使歐洲的經濟界全部都發生恐慌。

在德國，恐慌尤其劇烈，因為許多新興的產業，例如造船業，紡織機器製造業都是靠着信用經營的。許多的工人解雇了，工資也減低了。據德國統計的估計，一九〇七年的損失，達二，一六二，〇〇〇工作日（working day）。而一九〇八年時，竟達一〇，七八三，〇〇〇工作日之多。就是法國也有同樣的現象：因為美國人限制購買額的結果，花邊業的工人有百分之七十陷於失業了；卡雷城的絹網製造廠所蒙損失尤為嚴重，而旅館業也被恐慌波及了。

遠隔重洋幾千海哩之外的一家叫作威斯亨好斯的電氣公司引起來的金融恐慌，竟會使得全部歐洲倒閉了許多大公司，以致成千成萬的工人陷於失業，可是他們和那家電氣公司不但沒有商業關係，恐怕連叫什麼名子都還不知道呢！在不到十天之內，這恐慌竟傳遍了兩大洲！

大戰發生，國際間的匯兌機構為之破壞，確會使得各地對於上項恐慌的反應步調，為之緩慢下來，可是反應期間的長久與反應程度的激烈，卻一點也沒有受影響。到了一九一九年的盡頭，美國的銀行界覺察出：美國向協約國不斷地輸出巨量的食料與戰爭器械，已有了雙重的結果：一方面國內的商品為之耗竭，他方面卻使全世界的現金充斥於本國的市場之上。其結果，金圓的購買力減低，國內的物價猛漲，而一般的投機事業則被刺激起來，

致使社會的均衡受到威脅。聯合準備局 (Federal Reserve Board) 就決定要把國外貿易業所享種種貼現便利，加以限制。不久之後，日本就發生了可怖的恐慌（一九一九年十月至十二月）。東京、大阪和長崎的各銀行，以前曾替工商業界墊出巨額的款項，現在卻都不能繼續維持牠們了；收藏證券以待漲價的投機家也不得不把牠趕緊賣出了。結果各種物價一般地跌落下去，許多商店都倒閉了。正在所有存戶都喧嚷着要提取現款的時候，商家欠銀行的錢卻正無法償還。結果全體都崩潰了。幾十家銀行倒閉了，幾千家商店破產了；在一星期之中，所有的交易所也都關門了。全國都如死了一般，在幾個月之中，人人都覺得前途茫茫。日本所遭的這次災難，正和地震一樣，直到如今，她還沒有恢復過元氣來。

因歐戰而起的匯兌上的不穩，阻止了各國間資本的流動，所以這次災難確乎沒有馬上影響到世界其他各國。可是合衆國的緊縮政策 (policy of deflation) 是依然繼續下去的。一九二〇年四月，英蘭銀行見到金鎊對金圓的匯價，一直往下跌落，就把貼現率由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七；法蘭西銀行也把貼現率由百分之五加到百分之六，並把信用大大地加以收縮。於是法國各銀行也都拒絕商業信用放款的再行展期，正和幾個月以前東京的各銀行一樣情形。投機家因為希望行市上漲，都收藏着巨額證券，現在卻不得不全盤拋出，結果證券的市價大跌，許多投機家破產了。銀行也無法把外界欠牠的款項全部收回，結果雖有其他銀行的通融，但仍有兩家銀行不得不倒閉。證券交易所的市價也跌得一蹋糊塗，由一九二〇年六月到十月之間，法國市場上，各項有價證券跌價的總額，不下幾十萬萬法郎。

美國金融政策一經改變了方向，竟使得全世界各金融中心，由巴黎以至東京，都爲之紊亂起來。

我們只須看一看各大國的批發物價曲線，就愈能明瞭現階段的世界經濟生活是有着怎樣一種密切的連帶關係。由一九二〇年六月到一九二一年十月，各國的指數都順着平行線而下落；美國由二七〇落到一四五，英國由二七二落到一四三，法國由二二三落到一一八。

這次恐慌的反響，傳遍了全世界，影響到每個製造家，每個商人，每個銀行家，每個賺工資的勞動者，以及各行各業的人。各種人類行爲間的連帶關係，恐怕再也找不到更有效驗的例證了。

在一世紀以前，全世界好像一個很大的水螅；無數並排着的企業在一塊共同的岩石上過着幾乎各自獨立的生活。也許有少數的國家可以算爲例外；但牠們至多也不過像一個環蟲類的動物，牠的各部分，只有很鬆懈的關連，就是把牠們用力地分解開來，也不會危及牠們的生命。可是今天的世界卻不然了，牠已經變成一個龐大的脊椎動物，牠的各種器官都是互相補充的；四肢五體都是一塊兒生長着的，都是禍福與共的，如果分離開來便馬上就死亡了。

事實上，全世界已經變成一個有生命的東西了。賈瓦斯基博士(Dr. Javarski)替這個新進化成功的生物，起了一個名子，叫作「活的地球」(Geon. γη = 地球 ov = 存在)。這個名辭，很能把經濟進化現在已經達到的階段適當地表現出來，是值得我們採納的。

一位巴黎人怎樣度日

這決不是僅僅一個理論上或詩歌上的觀念，專供我們玩想像的把戲的。我們只須少加留意於周圍的各種習見的事物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動作，就能知道上面這名辭是怎樣和具體的事實相吻合了。我們果真少加留意的話，便馬上能夠看出：不僅整個的社會體（Social body）是國際化了，就是牠所由組成的各個細胞的生活也一樣地國際化了。

試看一看一位普通的體面的巴黎市民在一九二六年的時候是怎樣過日子？

杜蘭先生每天早起用剛果花生油所製的肥皂洗臉，用一塊路易斯安那的棉質毛巾揩乾。然後他就開始裝扮起來。他的襯衫和領子是用俄國的麻布製的，外衣和褲子是用好望角或澳洲的毛織品作的，領帶是用日本蠶繭所製的絲綢製的，鞋是阿根廷所產的牡牛的皮革製的並且用德國所產的化學原料硝過的。

在他的餐堂裏擺着一個荷蘭式的食器架，這種傢具是用匈牙利森林中的木料製的。餐桌上鋪着一塊用里奧亭托（Rio-Tinto）的銅，海峽殖民地的錫，澳洲的銀合鑄而成的金屬版。那裏還放着一塊新鮮的麵包，製麵包的小麥，按四季之不同，或來自波司（Beauce）或來自羅馬尼亞，或來自加拿大。他所吃的，除了這塊麵包而外，還有幾枚由摩洛哥新到的雞卵，一片來自阿根廷的凍肉，和幾粒加利福尼亞出產的豌豆。他所吃的甜食是英吉利果醬，這是用法國的果品和古巴的糖製成的，還有一杯精美的巴西咖啡。

精力恢復之後，他就去工作了。他搭電車到公事房去，這電車是採的湯姆生——霍斯頓制。他把利物浦倫敦阿姆斯特丹或大版等地的匯兌市價登記下來之後，就把所要寫的書信口授打字生，在一架英國製造的打字機上打下來，然他就用一枝美國自來水筆在上面簽了字。他的工廠正在替巴西的顧客製造一批「巴黎出品」(Paris articles)所用的原料，是許多地方出產，所用的機器是在洛林製造的，專賣特許權屬於德國。所用的煤乃是英國的出產。這批貨製好之後，就由寄港於瑟堡的一隻德國船運往里約熱內盧。

他於是去到他的銀行，拿一張荷蘭顧客所給的，用基爾特 (guldens 荷蘭貨幣名) 計算的支票去買金鎊匯票，以便清償所購英國貨物的代價。銀行的經理，這時將乘機告訴他，說他的帳上還有不少的結存，而煤油股票恰好正在漲價。杜蘭先生採納了他的建議，但不願把錢花在一筆用途上，就同時買了四張荷蘭皇家公司 (Royal Dutch) 的股票和十張某家法國公司 (這家公司已經合併於 Standard oil 了) 的股票。

這天杜蘭先生賺錢不少，滿意之餘就於傍晚陪着他的太太出遊去了。她穿着一件極講究的長外衣，是巴羣公司 (Paquin Ltd.) 的出品，圍着一條西伯利亞的綠狐皮製成的圍巾，身上有好幾顆產於好望角的金剛鑽。他們在一家「意大利菜館」裏吃飯，商量着究竟是去看俄國跳舞團，還是去聽米勒氏 (Raquel Meller) 的音樂，商量的結果，也許是去看羅賓斯坦 (Ida Rubenstein) 扮演的一齣丹嫩齊奧的戲劇 (d'Annunzio's plays)。這齣戲所用的佈景是巴開斯 (Bakst) 設計的。

他們在高加索酒館 (Caucasian Cave)——那裏有一種喧鬧急奏的黑人樂隊陪伴着——吃過小喫，就

回家去了。快樂地過了一天之後，杜蘭先生就就寢了，蓋的被是用挪威的鴨毛製的。他睡着之後，夢想着法國確乎是一個大國，完全是自足自給的，如果和她一比，全世界各國都是渺乎其小的了。

無論穿衣吃飯，工作或娛樂，我們都要仰賴於太陽底下的一切國家。我們的一舉一動，無不倚靠某種出自極遠地方的物品；反過來說，地球上任何一件重大的事件，也要影響到我們的日常生活。現代的人確乎都是一個世界的公民，可是他自已對於這件事卻完全不曉。我們這個時代所遭遇的悲劇，和戰後時期的一切騷動，都造因於此。我們還得想些避禍的辦法纔好。

註一 美國可以算是例外，但十二家聯合準備銀行，本身上還是要受聯合準備局的統制的。

註二 參看羅賓紐 (Robinan) 出席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法蘭西銀行股東大會的報告書。

註三 各國的批發物價指數都已化爲一種共同的金幣單位；一九一三年的各種物價作爲基數。各項數字均根據聯合準備局的統計。

註四 還有一個極小的例證可以引用在此處。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一日馬丁報 (Martin) 發表了一條由香港來的電報，說是曲阜 (Fouche) 城正在鬧着可怕的失業。事情是這樣的：當長髮正在流行的時候，人們都戴一種髮網，是用細絲線或頭髮打的。因爲中國工人工資極廉而且手藝又著名地好，於是製造這種髮網的工業就集中於小小的曲阜城。但後來盛行短髮，髮網無人用了，曲阜城的人民就都無法謀生了。幾個巴黎人創始的一種時髦的短髮竟使一個中國小城市會有幾千人陷於失業！

第三編 國家之神話

第八章 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

人類生存的種種條件既有這樣大的變化，有人或許會設想：一般人的想像定已受了相當的刺激而一種新的神話將要產生了。可是事實決不如此；無論在那一個國度，一般人對於國際關係所抱的見解，依然和塔力藍（Talleyrand）時代，或公共馬車與農業經濟時代的見解一樣。一切社會企業，連農業在內，現在都已工業化了；每個公民的生活，在一百年以前，還只嚴格地拘限於一國國界之內，現在卻已變為世界活動的一部分了，但一般羣衆對於這個事實依然是莫名其妙。

羣衆何以不知經濟相依現象

這確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情況，雖然是很容易解釋的。烘製麵包的人，當售賣麵包的時候，並不言明他的麵包是用波司（Beauce）的小麥或阿根廷的小麥烘的，因為他自己或許也不知道——他的麪粉是在巴黎或考拜爾（Corbeil）的一家批發店裏買的，只有這種批發店纔和各國的出口商發生關係。同樣，製鞋者不知道他所用

的皮革是什麼地方的出產，縫衣店也不知道他所用的衣料是什麼地方的出產，正和他們的主顧一樣。工廠裏的工人毫不過問他所製的貨物將運往何地銷售，或替何人而製。一切零售店所賣的貨物都是由批發店供給的，消費者見到他的一切需要都能在他本鄉本土的狹小範圍內得到滿足，就決不過問貨物的來源了。他的生活情況依然是帶着地方色彩的，正和他的一切需要都仰賴於本鄉土產的時候一樣。

他永遠接觸不到國際貿易那個龐大的機構，那幾乎完全是由大的輸入商和銀行機關處理的，他和此項輸入商與銀行之間，還隔着一大羣的居間人。經濟相依的現象起於工業和商業的專門化，而一般羣衆不能明瞭經濟相依的現象也就由於這種專門化的事實。

那些居間人，生活於此項國際組織的範圍之中，並且天天運用牠，可是就連他們對於牠的作用都還沒有一種明確的觀念。假定由巴黎打出一個電報，無論是打到凡爾賽，還是打到倍諾斯愛勒，手續都是一樣的；電話局還是那個電話局，格式紙還是那樣的格式紙，接受格式紙的職員還是那個職員。發報人只要把電報的稿子交進去，他就不管這電報是從那條線打出去了，究竟是從英國的海底電線，還是法國的海底電線，他一概不問了。假如他向蒙提維多訂購一批貨物，貨物到了波爾多的時候，還要經過法國經紀人的手，買主只須到車站取貨，至於這批貨曾經過若干人的手，他是一概不必過問的。

關於貨幣支付，情形也沒有什麼不同。假如他拿一張金圓支票存入他的銀行，銀行就按照當時的匯兌率，把支票上所記的金圓數折爲法郎而記入他的帳戶中。至於銀行怎樣把這張支票兌成法郎，那是銀行經理的事情，

他一概不管(註一)

真奇怪！這種巧妙而且緊要得令人難信的機構，其吸引羣衆注意的力量，卻還不及一件很小的政治事變或很浮泛的報紙上的閒談來得大。這是因為機械大都是自動的，而自動性恰足以造成習慣而打破人們的好奇心的緣故。

一個人初次看見一架無線電收音機，對於牠的作用一定是覺得奇怪，覺得驚異，可是等到他一旦學會了適當的處理方法，就一點也不覺得驚異了，那時，在封騰布羅 (Fontainebleau) 收聽夷府塔 (Eiffel Tower) 放送出來的音樂，便同走路或呼吸一樣地平常了。

現代的人，便是這樣生存於複雜的機械之環境中，可是他對此卻一概不懂——他已經是看得太慣了，以致於不要去懂得牠了。人們的好奇心被複雜而寬廣的現代發明給弄得麻木不仁了。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的話：「驚異是科學精神的起源，」人類目睹極非常的科學變化，並且生活其中已歷三個世代之久，以致對於這種變化並未保存住什麼深刻的印象。假如這種變化是突然發生的或是用暴力加在人們身上的，那就一定會有一種刺激人們的情緒和愛憎的力量而使得羣衆驚心動魄了。但這種變化乃是漸漸地實現出來，慢慢地適應於往日的政治情形與社會情形的無疑地，在鐵路開始建設的時期，窮鄉僻壤之中，確曾有一部分擁有土地的紳士表示反對，怕得是解放的思想，自由的思想或許會傳播到他們這個地方來。可是等到他們明白了他們的糧食與牲畜會因此而找到更好的銷場，他們便比任何人都更覺得鐵路是好的了。各種制度，各種立法，都是這樣一點一點地

革新起來，毫無激烈的動搖，毫不刺激人們政治上的好惡，所以人人都覺滿意。一種運動行得這樣慢，是不會引起多數人的注意的；牠的技術上的特色使得人們不能明瞭牠，而習慣又把牠排除到人們的意識之外去了。所以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在人類心理上所佔的地位與所有的感動還不及一件次要的政治事變——如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或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之高之大，這是毫無足奇的了。

伯則老 (Berthelot) 巴士特 (Pasteur) 居禮 (Curie) 等人的名子不及列寧或畢斯馬克的名子能夠激發人們的幻想。前面幾位是在社會建築的基本構造上作工夫的，可是這種基本構造是不能夠看見的，而一般大眾多半對於房屋供應分配上的一些爭持倒會較為留意，至於這建築的基礎上或許發生一些破壞與裂痕，他們反淡然置之了——等到一天，地震突然發生，整個建築到了搖搖欲墜，千鈞一髮的時候，他們才覺悟過來。

這種緩慢的下層革命，因為缺乏熱情和戲劇色彩之原素，所以在教育機關的課程表上，是不會佔到一個適當的地位的。誠然，科學與技術，不僅在大學和專門學校的訓練上，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就在中小學的一般教育上也要佔一地位。可是人們的習慣總是要把科學、技術與社會政治制度分離開來，好像二者處於兩個分離開的平面上（縱令是平行的平面），其間並沒有什麼接觸和反應似的。

教地理的講師也許會講到各國出產的原料，可是他總要忘記說到這種原料是在那一國製成熟貨的。物理學的講師也許會把一架機器的種種原理原則加以解釋，但很少講到牠的成本，牠的出產力和牠是在何處製造的。至於經濟學家，他們的首要的職務應該是把這種種要素之間的關係解釋出來，可是他們時常會陷於這種謬

誤就是把他們的課程變成一種艱澀難解，勞而無益的煩瑣哲學。種植穀物的人對於交易所怎樣確定市價的手續，總是不聞不問，工廠中的工人，對於製造品的銷往何方也總是不管不顧。在一個社會裏，個人和國家的生活都受支配於生產費的定律，可是沒有一個人會把『這個定律究竟建築在那幾個原則上』給指示一下。

現代生活的一般情況，似乎一向都未曾有人把牠貫通起來，加以綜合的解釋，或把牠化爲一種神話，以便使羣衆藉此都能明瞭牠的內容。

工業革命的完成，誠然可以說是很容易而未會倚靠過什麼玄學上或道德上的動機。牠用不着這樣一個靠山，因爲生產費的減少就是牠的唯一原則或基礎，所以牠用以說服人家的種種方法就都集中在牠自己的身上。附隨着工業革命而來的幸福是人們立刻就能把握得到的，並且不必先得懂牠就能夠享受的。這個世界的經濟變革，用不着和流行的見解相衝突，也不必推翻前一時代的種種制度，就竟爾實現出來了。

但是到了最末，這個社會建築的基本經濟構造卻已經完全改變過了。企業的自主以前是原則，現在卻變爲例外了；專門化和互相依賴以前是例外，現在卻變爲原則了。現實世界的一切都改變了，理想世界卻毫無改變；於是各個人都有着兩重人格：一個是經濟的人格，其行動是國際化的，另一個是政治的人格，其思想是國家化的。所以神話與現實之間就起了衝突了。衝突的真相如何，我們已經敘述過。現在我們且把主宰的神話，即『國家』(Nation)分析一下。

由王國 (Kingdom) 到國家 (Nation)

現在，人人都是一個國家的公民。一方面，他對於國家須盡守法律和服兵役的義務，可是另一方面他也享着權利，就是國家須替他防備國內的擾亂和國外的襲擊，以便擔保他的身體的安寧和財產的穩固。

我們知道：國家的觀念發生於工業革命以前，在法國，牠是發生於十八世紀之末；但事實上，牠究竟是怎樣發生出來的呢？

一七八九年以前，歐洲各民族大都分派爲若干王國。所謂王國就是許多地方的一個集團，這些地方之間，無論在地理上或在行政上都沒有什麼統一的特徵，只不過是受統治於同一的王朝而已。牠只是若干封建的土地，偶然因爲婚姻，繼承，征服或條約上的關係，在同一個君主之下混合成一個團體罷了。在這些采邑 (Fiefs) 之中，許多還保留着牠們自己的法律。法蘭西國王的地位不過是布勒塔尼公爵，如果不得各「邦」(States) 的同意，則他的祖妣安公爵夫人 (Duchess Ann) 所遺留的普通法，他是一字也不能加以修改的。例如他想要在布勒塔尼加徵一種特稅的話，他必須先召集貴族，僧侶，和平民的代表，舉行會議。這班代表將以款待外國大使的儀節接見國王的代表；國王代表將國王的要求在他們面前宣布之後，須立時退避，以便讓這評議團體有完全的自由。表決的款數就叫做「無報酬的禮物」，並且還要附以種種條件。布勒塔尼和法蘭西之間，隔着一條關稅的界線，但卻與英格蘭自由貿易。雖然種種的羈絆使得布勒塔尼不得不依附凡爾塞宮廷，但牠卻永遠保持着倨傲的獨立。

精神。甚至到了大革命的前夕，青年子爵得謝多勃良（Viscount de Chateaubrian）還在來因寺城（Renner）的大街上，爲替布勒塔尼爭自由，而向國王的巴立門（Parlement）揭反旗。至於郎基多克（Languedoc）勃良地（Burgundy）以及其他侯邦的局勢也無不如此。

在一般人的心裏，都以爲所有這些采邑只有一件事情是共同的，就是他們統統擁戴一個名義上的首領——法蘭西國王。大不列顛諸島上的局勢，也正和此相同，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只不過是一個君王以下的三個獨立的王國罷了。哈布斯堡王室（Hapsburgs）既是奧地利亞的大公，又是匈牙利的國王，又是日耳曼的皇帝和米蘭的公爵。霍漢則蘭王室（Hohenzollern）既是普魯士的國王，又是勃蘭登堡的公爵……我們只須看一看君主們的公告上寫着一大串的头銜，就可以明白他們的土地之間所有的關聯只靠着人的關係了。

事實既然如此，則其當然的結果：帝王的施政方針也是以人爲轉移的，其主要的動機乃是個人或他朝廷的利益。當一七〇一年，路易第十四決定從事西班牙王位繼承的戰爭時，他當然是看重了如何把一個波旁（Bourbon）王室的後裔，安置在腓力二世的王位上，而看輕了他的百姓的安謐，這是沒有一個人覺得詫異的。君主們向戰場上發出的軍隊都是由各地招募而來的僱傭兵，所以當路易第十四有一次檢閱他軍隊中的瑞士，蘇格蘭和佛來銘各聯隊時，他說了一句「法蘭西的軍隊，」馬上又用矯正的口吻說「我是說屬於法蘭西的軍隊。」老百姓們也很明白此項軍事冒險與他們自己無關，所以他們總是完全持冷淡的態度，除非到了他們自己已經變成戰禍的犧牲者時才改變。有的時候，他們甚至會降順敵方，而背叛他們的君主。當紐巴都（Pompadour）的嬖

人，不幸的蘇俾茲 (Soubise) 被腓特烈第二 (Frederick II) 大敗於洛斯伯斯 (Rossbach) 的時候，一班的中等階級還在狠心地譏諷他；法蘭西國王的軍隊打了敗仗，巴黎反懸燈結綵地慶祝。福耳特耳竟會慶賀普魯士國王的戰勝，而一刻也沒有失掉衆望。

王國好像是若干封建的團體，牠們之間的戰爭和老百姓不發生關係；王國的興替，由老百姓看來，只不過是名義上的首領變換一下而已，他們決不會因此而喪失了絲毫權利的。

國家觀念是一個農地的神話

但自從一七九二年以後，一切都改變了。法蘭西大革命把一切封建特權都給取消了。農民、手藝人和中等階級得到完全的自由了。被褫奪的貴族，向外國的君主投降，千方百計地要想恢復古代的奴隸制度，一切的人目睹共同的危局，被一種連帶的關係把他們統一起來了：省、公國、侯邦等等的界限都泯滅了；布羅溫斯 (Provence) 諾曼底，布勒塔尼的獨立主義也化爲烏有了。所有的人民爲保護大家同享的種種權利而結爲一體了。

凡變爲地主者，不是他自己加入軍隊就是遣他兒子從軍。募兵者又爲勸誘那些沒有從軍動機的人們起見，就和應募者訂了一個契約，約定於和平恢復時，把由亡命的王黨 (émigrés) 和教堂沒收來的財產拿出一百萬萬來分給他們。

研究這時期的歷史家，多把這個契約一字不提地忽略過去，他們都把一七九二年時人們的志願應募 (Vol-

lunary enlistments) 完全歸因於爭自由的熱情。雖然這種熱情，在革命初期，尤其是城市中，確乎實有其事，但我們也還得承認「給祖國防禦者的一百萬萬酬勞金」對於第一次革命的兵士，確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後來，這筆鉅款弄到無法籌措；國家的財產賤價出賣了，紙幣和通用票 (Mandats territoriaux) 也貶值了；可是這班志願兵卻還沒有忘記這件事。巴塞爾議和 (Peace of Basle) (一七九五年) 以後，他們曾索過這筆酬勞金——這次議和是為尊崇革命軍的勝利而舉行的。於是兵營之中起了騷動，巴倍夫 (Babeuf) 曾利用他們的要

求，試圖煽動巴黎的衛戍兵去參加那個有名的格勒涅爾叛變 (Grenelle conspiracy) 這時，沒有田產和金錢就無法打發這班兵士歸田，遣散既然不成，於是戰事繼續下去。巴塞爾和亞眠 (Amien) 的兩次議和所以僅僅成為暫時的休戰，而拿破侖所以不得不統率着他的得勝軍隊，不停地打遍歐洲，主要原因都在於此。

過了二十年之後，所有這些志願兵不是死於戰場，就是升為上將或元帥了，其尤幸者，甚或登了王位（如瑞士和那不勒斯的國王就都出身於此輩志願兵）。那些目不識丁仍充衛戍兵者便只好躲在一旁鳴不平了。最末路易第十八把所有官吏的薪俸減了一半，立法議會誓約，對於國民大會和第一法蘭西帝國的外交政策雖有很大的影響，但這時已經完全被人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共和戰爭 (Republican war) 所以會得人心，全靠土地為餌。後來，因為徵兵的結果，拿破侖被人痛恨——據說犯軍律者非常之多——法國的農民眼看着他們的皇帝被囚於厄爾巴島，反覺大快人心。可是一旦波旁王室的勢力好像會威脅到「國民財產」的所有人時，鸞旗（法蘭西之軍旗）便馬上又飄揚於尖塔與尖塔之間。

了。等到一八一五年的憲章再給他們一層擔保時，農民們便又把那被放逐於聖海里那島的拿破侖完全忘了。

由民衆的立場看來，大革命這整齣的戲所以會支持到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之久，其根本目的就在撲滅種種封建特權以便使一個新的農地法令得以產生。由一七九二年到一七九五年，軍隊中的士兵，都不是爲了得一些餉金而替君主爭個人的利益的；這軍隊乃是一班公民爲了保護屬於他們自己和他們子孫的田地團結起來而組成的。這正和羅馬城邦的主義相同，而古典的用語再變爲時髦的口頭禪也就很自然的了。二千年以前的老格言，這時在奧士和馬索所率領的旅團之中，又時常可以聽到了；這正是雅典的甲兵和羅馬的軍團兵打仗時所用的口號：“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我國好男兒齊向前進！）就在那一天，王國被國家取而代之了。

我們試把這個新神話，研究一下牠決定了全世界人類的志願，約有一世紀之久了。上文曾經申述過：要使一種神話發生作用，要使牠能夠把羣衆的志願集中起來，那末牠一定不能是一個注入的觀念或抽象的理想，而必須是一切人的日常生活上種種習見的觀念一個擴大的投影。在歐洲史的這一時期之中，農業不僅是典堡的企業，並且二千年以來，牠這是初次由一切封建的束縛解放出來。而從新在法國取得牠的全部意義和重要。

土地的所有，普通都是一條一條的，有一個確定而不可侵犯的疆界圍着牠。牠總是某人的財產，由這人的祖先傳給這人，這人希望再傳給他的兒子。在某種限度內，他就是這塊地的所有主或主人，有利用牠或毀掉牠的權利。除了他自願盡的義務以外，他可以不承認任何義務。

把這個簡單而習見的觀念擴大而應用到一個王國的範圍——這就是國家了。

所謂國家，由牠的本質上說，就是一塊地方，牠的疆界是明白規定而不可侵犯的。(註二) 在這塊地上，住着許多享有同等權利的地主，並且都是一個家庭的份子。牠有牠自己的法律，另外的集團是不得干涉牠的意志的。

這個國家觀念的由來，不過是把地主身分（牠是與法國革命而俱生的）上的種種特徵，移而適用於公衆生活之上罷了。牠決不是一個理性的或抽象的觀念，牠是一個純粹的神話，由人類中心論的作用而發生的，一如其他神話一樣。我們可以把牠叫作農地的神話。

法國的農民立刻就領悟了這個觀念的意義和內容。他們爲了保護國家，毫無畏縮地忍受大革命和第一法蘭西帝國的戰禍到二十五年之久。等到德國和意大利的農民也懂得了這個觀念，他們便也起了種種愛國的運動，這是歷史上屢有記載的，在前一世紀當中，凡以土地所有爲主要財源的國家，都漸漸地爲這個觀念所支配了。後來，這個流行的神話開始被人加以合理的解釋；學者們竭力替牠辯護，替牠找證據。並且有人從歷史上，人性誌上，法學上，和哲學上，把牠加以種種考量。這種種考量的結果決未把這樣簡單的一個論題的輪廓弄得模糊，卻反把一個持久的特徵賦予了牠。

國界的神祕性

由本質上說，國家就是一塊地方，牠的範圍必須明白規定，所以國家的周圍都要立上界標。這些界石雖是很單純的東西，但藉着神話的力量，牠竟取得類乎宗教的意義。

由地主（按照新的革命分配而成的地主）的立場來看，劃定疆界乃是一件大事。蓋疆界不僅是兩塊農場的分割線；也是兩個經濟主權的界限。一隻雞迷途而跑入鄰田，或是一把犁無意地觸到鄰田幾方寸的地方，固然是極小的一件事，可是如果把這件事看作侵犯了地主的主權，那就或許成爲復仇私鬪的導火線，而引起難了結的訟事也未可知。古代羅馬人很懂得這件事，他們崇奉一位管理公私疆界的境界神（Terminus）任何犯界的舉動都視爲褻瀆神聖而須受宗教上的制裁。因大革命而得解放的農奴，藉着直覺的作用又把這個古代的神話給恢復起來了。（註三）

同樣，國家的界標也取得了一種神祕而不可褻瀆的意義。即便在和平的時候，如果一個農夫遇到了一個外國的哨兵在佛日山（Vosges）或阿爾卑山的羊腸小道上迷失了路途，他固然要很謙和地引他到正路上，可是他一方面還得通知軍事當局並打電話到政府去。照例，本國政府（按著者係暗指法國政府而言——譯者註）要用經常的外交手續向外國政府交涉，外國的大使要向本國政府道歉，很長的公報要送到各家報館去。輿論一定是很密切地注視這個全部的手續——尤其是在極度重視此項形式的國家，情形是如此。

如果此項意外的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出來，則國人將懷疑對方或有敵對的意思而警角就要吹起來了。一九一二年，德國的一架徐伯林式飛機，因在霧中迷失，在南錫登陸了，法國的民衆見到敵人的空軍越過了國界而守兵竟一概不知，於是立刻不安起來。後來威廉二世鑄了一塊獎牌表揚這件事無意中使得這個小風波有了挑釁的樣子。許多法國人便開始懷着德國將即來侵犯的念頭。這類小的變故很容易使全國的人都相信他們的安全

受到威脅，和防禦戰的不可免，縱令事實上並沒有什麼損害。蓋界標已經成爲國家之神話最有力的一個工具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維維安那（Viiviani）命令全法國的軍隊由國界向後退出十基羅米特的距離，以便表示戰費非由法國挑起，當時他是很明瞭這件事實的。很明顯地，這舉動並不足以證明衝突的起因何在，因爲在好幾年以前，歐洲各國的當局便早已有打了打仗的動機了。可是結果，首先越界的乃是德國騎兵，於是法國農人找到了自明的證據，足以證明確爲愷撒（Kaiser 意即德帝）所襲擊了。而且他們對於侵掠的恐懼心理，在前三年中，早就被報紙給鼓動起來了，所以現在叫他們動員去防禦他們的國土是一點困難也沒有的。

就在那一天，德國政府也在玩同樣的把戲。她當然很難否認他們的軍隊是首先越界的。可是據他們的報告，說是在數小時以前，曾有一架繪着法國旗號的飛機，飛過努連堡（Nuremberg）的上空。德國人民老早就相信他們要被敵人包圍之一說，現在他們的感情更沸騰起來，甚至連住居離戰線很遠的人民也覺得他們正在敵人的威脅之中。連社會主義者也相信防禦的必要了。德國人民藉着這種託辭——因爲上項報告是一個假造的——便可以主張他們的軍隊侵入法國的領土是爲了報復法國飛機侵入他們的領空之仇了。德法兩國政府都把同樣的神話作爲辯護的理由。

這當然是不用說的世界大戰的真實理由，和空軍或騎兵無意侵入鄰境這樣一件小事是毫無關係的。大戰的眞因由於經濟情況或國際情態，但這是一般無知的羣衆所不能了解的，靠着這種理由無法使他們信服動員是合理的。可是邊界上的一樁意外，或領土的被人侵犯，卻是任何人立刻就能懂得的。這種措辭乃是國防的神話。

之種種表象的姿態，唯有牠們纔能深深地打動羣衆的良心。幾百萬人爲這種措辭所激動而猛烈地互相攻擊起來。他們的本性都是愛好和平的，如果他們沒有這種被攻擊的幻想，他們決不會打仗的。

歷史上的權利

每個地主自然都會想着要把鄰人的田地圈入他自己的土地。至於他爲什麼這樣主張，他總會有種種很好的理由：不是說他的土地被人圈去，妨害了他的耕作，就是說把牧場地和穀地連接起來是合宜的，因爲二者的產物可以互相補充。假定土地是一切財富的來源，人人共有的奢望當然都是要擴大他自己那一塊地。

國家也是受支配於同樣的定律。只要是國家的主要分子是一羣農人——或一羣以土地的收入爲生的地主——則牠們（指國家）一定懷着領土的野心，而牠們（指國家）的政策的一般趨勢也一定是吞併鄰國的土地。

可是武力的吞併，如果沒有權利上的根據總是很危險的。就一個農人來說，此項權利總有一種法律上的文件爲之證明，無論是一張遺囑也好，一張讓與契據也好，一張結婚證書也好，並且都是有合式的證人署名，粘好印花，封好，然後慎重地交給註冊官的案卷保存所的。如果對於鄰居的土地有所主張，或對於親戚的爭奪，要有防護的根據，此項權利契據（title deeds）都可以作爲必要的參考。

法國革命是在舊王國的境界內完成的，國王舊有的土地當然就是國家的領土。同時，君政時代的種種案卷

也成爲新主人的所有物了。其中包含有大堆的條約，結婚證書，繼承的權利等等，所有這些都是舊日君主的財產契據。現在都成爲大革命的財產契據了。當一七九五年，得勝的愛國志士跑到巴塞爾去和戰敗的君主們商討和平條件時，國民大會的全權大使們——他們以前曾作過路易十六的外交官——就把以前和萬人痛恨的君主所訂的條約作爲領土權的根據。試看這是多麼奇怪的一個景象呢？國家剛剛發表了人權和公民權的宣言，剛剛宣布了專制朝廷的推翻，現在竟又把暴君們所簽訂的條約當作國際法的根據了（註四）而暴君的消滅，由他們看來，卻又是天命註定的一回事。

這個矛盾好像不會使法國的歷史家爲難。他們認爲共和國承受君主的遺產乃是當然的事情——或者寧可說：他們以爲在一千三百年的民智幼稚時代當中，歷代的法國君主都是由人民委任的。法國的小學校裏所教的歷史課程就把這種說法當作原則和基礎。

他們給愷撒時代的高盧所畫的疆界線差不多和現在的法國相同。並把法國所必得設法抵禦的外侮加以敘述，由東方來的日耳曼或韃靼蠻族，由西班牙來的摩斯盧（Moslem）騎手以及黑王子（Black Prince）的弓手，查理五世的騎兵，神聖同盟的哥薩克騎兵隊，畢斯麥統帥下的普魯士人，都是接連不斷地想把這塊大好山河分割了去。幸虧歷代出了許多壯烈的將帥和有本領的外交家，獻身於精誠團結的事業，把有如散沙的各部分聯合起來，以便保持並擴充法國原有的疆域。

這就是歷史上把牠加以闡明，加以讚頌的整個的事件之順序！如果一個條約在幾百年之中，表現出領土之

減少，他們就認爲這是武力地侵犯權利，在法律上這條約當然是不能有效的。報復乃是合法的，如果得勝的將帥們能把這個條約撕爲碎紙，那乃是他們無上的光榮。反之，不管什麼武力的舉動，只要是可以把疆土擴充，他們就認爲那已經是把明確的所有權授予本國了；如果這樣合併而來的疆土，以後因爲軍事上的把戲又行喪失的話，那末，再把牠奪回當然總是合法的。

由這個固有的而且永久的國家之觀念推論下去，則其結論，任何過去時代的條約，只要是有利的，就決不會失去時效。此項條約，也許會爲了權宜之計，而暫時地把牠作廢，可是等到時機一至，總是會被人家再度搬弄出來的。國家的權利乃是絕對的，不爲時效所拘束的。這種理論是羣衆們所甘願接受的，而且總在渴望膨脹領土的各國政府，也都覺得牠是一個很方便的法門。任何處的國界，總是會時常發生變動的，並且及時會有很烈害的變動，所以我們如果要尋找一個文件來證明要收復某一塊被人覬覦了去的領土是合法的，那是一定能夠找得到的，只要我們把歷史追遡得久遠一點的話，國界那邊的國家，如採用同樣的手續，當然也很容易在他們自己的案卷上找到前前後後的有關所有權的契據，用同等的力量來證明他們在這一塊被爭奪的領土上，有種種歷史上的權利。

當一八七一年的時候，法國的亞爾薩斯洛林 (Alsace Lorraine) 被德國割據了去，法國的歷史家、政治家、新聞學家就都乞靈於威斯特發里亞條約 (Treaty of Westphalia) 和維也納條約 (Treaty of Vienna) 因爲這塊地方是根據前項條約纔歸屬於亞爾薩斯，並根據後項條約，在國王斯坦尼斯羅 (King Stanislaus) 宴駕的

時候，纔歸屬於洛林的，甚至連藉以合併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的復合勅令 (edict of reunion) 這時也搬弄出來了。法國政府藉所有此項破爛的羊皮紙文書，就很容易使法國的人民相信法蘭克福條約 (Treaty of Frankfurt) 是違犯國際公法的了。這時，德國的歷史家也用相同的邏輯來證明威斯特發里亞條約和巴黎條約都是在武力壓迫之下締結的，而路易十四的復合勅令也是純然的掠奪行爲。此外，他們還能根據同等可靠，而且來歷較古的種種文件來證明德國所「收復」的兩個省分，自從羅退耳 (Lotharing) 的時候以來，就已經是神聖日耳曼帝國的一塊重要的領土了。各國當然都是承認那較有利於牠自己的題目，如果是和對方沒有什麼相干的題目，牠當然更願意承認了。

一位法國的共和黨員永不會懷疑到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所簽訂的條約的效力問題；一位德國人也決不會懷疑八四〇年時查理曼諸子的分裂和現代情勢間的關聯。這種歷史權利的觀念很夠使兩國之間，醞釀着反感和宿仇到四十六年之久。

爲了辯護政府和政黨的領土野心，沒有一件意外的事變不能拉扯得上，沒有一項文件不能援引得上。當拿破侖三世計劃着要想併吞比利時的時候，報紙上便把舊事重提，堅決主張比利時在愷撒時代就已經是高盧的一省了。而泛德意志論者也會同樣地要求將勃艮地復合於德國理由是：勃艮地的國王龔第加 (Gondicar) 千萬萬確地是個德國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謂歷史的權利，便僅僅成爲辭令上的把戲了。

但這種歷史的權利，對於人類的命運竟有這樣持久的支配力和影響力，試看牠在凡爾賽條約的商討之中，

竟又露了頭角。當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可怕的大戰正在劇烈的時候，法國參戰的主要目的，據說是爲了恢復因法蘭克福條約而喪失的兩個省分。但等到得勝之後，法國的工業家們又發現出洛林的各工廠。若沒有薩爾區域的煤炭，便不能工作，可是這塊地方在法蘭克福條約以前，就已經屬德國所有了。於是法國的外交家只好趕快再向他們的案卷之中去搜尋口實。後來竟發覺這塊地方，從路易十四一直到拿破侖第一的時候，一向都是法國領土的一部分。他們便馬上要求不僅要恢復一八七一年的疆界，並且進一步要恢復一八一四年的疆界——這個疆界，已經被人遺忘了一百多年之久。（註五）

所有這些歷史的權利，幾乎一定會被他人駁倒，而且定要有武力的維持，纔有其實際上的價值。人們所以要把牠們搬弄出來，不過爲的是替領袖們的種種野心和執政者的種種策略作一個假面具，以便使得他們的主張都像煞很正當似的，否則在現代的民主政治之下，將無從推動輿論——輿論乃是軍隊動員的一個預備條件。這也足以解釋爲什麼條約的歷史會在各國的民衆教育上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只要是取得一塊領土便馬上創造出一個絕對的權利，不管取得的時間怎樣短。反之，只要是失掉一塊領土，便一定說是對方濫用武力而侵佔的，非請『宇宙遍在』的正義把這件事加以矯正不可。歷史權利的理論乃是一個奇怪的辯論武器，無論是想併吞他人的領土，或是報復他人對我之侵佔，都可以把牠用爲工具。

可是街頭上的愚者，因爲缺乏歷史上的知識，卻還保存着他的一片天真。報紙只須從古舊的外交文件中摘出一段含糊的文字，就能把他說服，使他相信他們的主張是對的。同時，還能夠把一個壞的信念和一個掠奪或強

暴的罪過加在敵人的身上。於是以前藉以了結某項戰爭的條約，現在又變為準備將來的爭鬪的一個工具了。關於此事，其意味最為深長者，要算是法國利用凡爾賽條約了。那些反對這條約最力的，卻正是從前最熱烈擁護並主張嚴格履行的人。但輿論一點也沒有被這件矛盾的事情所擾亂。由農人看來，土地上的所有權，就是一張貼有印花，並且有正式署名和簽着起首字母的契據。一位商人，如果遇到契約上的履行條件發生變化時，大概總會簽訂一個變更方針的誓書，可是農人就不然了，他寧可打官司或和人打架，也不情願變更以前的契約。由他看來，凡是一張貼着印花的契據所具有的神聖不可變性，都可以移而按之於條約之上。所以說絕對的歷史權利之理論，本質上是一個農地的觀念。

自然的國界

可是國家案卷的蘊藏終究有個限度，牠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一個民族垂涎鄰國的領土，或者爲了想替過剩的人口找出路，或者爲了想得到某種特產（如穀物、森林、礦山、牧地等）——不然的話也許是這塊地方和她的經濟生存有重大關係，有了這塊地方，她就能接近一條河或得通海口。如果歷史的權利太缺乏，或縱不缺乏也太有被人辯駁的餘地，那就不得不乞援於自然的權利（*natural rights*）了。這種轉變應歸因於法國革命。國家的第一個使命就是保護財產和生存於牠領土之上的個人。可是國家的安全，大部分要靠國界的地形形勢。很明顯的，一段山脈，或一條闊而深的河流，——其上有有限的幾座橋樑是極易拆毀的——都很適於防禦。

外侮以求自保。但如果國界恰好是一片寬闊的豁谷，那末，國家的安全就很不可靠了。在這種場合，便只得建築宏大的堡壘，並且，即使是在和平的時候，也得維持巨大的常備軍。該國處於這種形勢，自然會要設法把國界推展到當地的河邊或山嶺上。如果已佔有該地的國家，藉口條約向牠提出抗議，牠的答辯就是：在人的權利之上還有那超乎一切的自然權利。

這就是致力於法國革命的幻想家所創立的理論。當共和國還未強盛的時候，她是很以法蘭西王國的舊疆界為滿足的。一七九二年，一般人的整軍經武的呼聲，除了防禦外侮的侵入而外，別無目的。甚至到了共和國的得勝軍，一舉而攻入比利時，洛林和亞爾薩斯的時候，國民大會恪守着歷史權利的主義，還會鄭重地拋棄一切征伐的念頭。可是不久就有亞賽格內紙幣的禍患，把共和國鬧得七零八落，她便漸漸察覺養兵的不可行了。要養兵便只有把他們安插在已經佔領的土地上：因為他們已經在那裏定居下來。爲了申辯這種併吞的舉動，就發明了「自然國界」的理論。

這種方式一出，帝王婚媾的奇想以及由暴力而生的條約，就再也不能作爲替解放的民族決定國界的工具了。這兩件東西都只是過去時代暴政的遺跡，不適用於理性和邏輯的時代了。假如國家的存在，目的在於保護個人的安全，那末，國界顯然要能夠擔保國家的安全才行。就法國而言，她的國界顯然爲來因河，阿爾卑斯和庇里尼山三者所決定。法國人民對於這三個界限以內的土地，有着一種權利，比較封建時代的人們所設定的權利要優越得多，因爲這種權利是由「自然」親自設定的。自從盧騷出世以後，「自然」已經成爲支配一切人的性情心

地的一位新神了。自然的和絕對的人權及公民權已經被人制定爲憲法的礎石了，其中的一項就是個人對於財產的權利。那末，國家對於領土的自然權利，何以不能列入其中呢？若按十八世紀哲學家們的唯理與演繹的精神來說，這是一定不成問題的。

由政治家們看來，這也是一個極端方便的理論，因爲自然的意匠比較用文字寫的條約容易解釋得多了——而且，祈求薄弱的人類團結來反抗「自然」的定而不移的決定，那不是一件狂妄的舉動嗎？歷史被地理駁倒了。如果把歸根於腓特烈一世或甚至查理曼和克羅維斯（Clovis）時代的權利與歸根於地質學上各時代的權利一相比較，那還能算一回事嗎？

國家已經變成時間和空間上的一個絕對體了，而這適足以投合一般羣衆對於清晰簡潔的觀念之偏好。萬世不易的真理成爲一般人要求的目標，因爲牠既不需要沈思冥想，又可以祛除躊躇不決之憂。羣衆們都希望在那「四海皆準百世不移」的種種事物之中尋找歸宿。只有「絕對」纔能給人以安慰，纔能喚起人們發生那些奇怪而有力的反應；這種反應對於知道怎樣利用牠的政治家是很有用的……只要是歷史權利和自然權利應有盡有，只要是把那關於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國界之那種農地上的神話（幻想）在學校當中恭恭敬敬地培植起來，則羣衆們一定能夠供政府的驅使，甘願忍受現代戰爭中所不得不有的種種可怕的犧牲而不辭。

註一 有些商人對於他們天天利用的國際貿易機構完全不懂，簡直到了令人難信的程度。我曾保存一封信，這是一位常向倫敦匯寄金鎊的法國進口商人所寫的。他心中竟以爲，實金鎊或金圓給他，在牠們的金庫之中果真存有巨量的金圓和金鎊，他還誠懇

地向政府提議，說此項現金應由國家徵收，以便根本遏止匯兌投機。他竟完全不知支票和匯票的作用。

註二 波蘭賀爾 (J. Brunner) 和瓦洛克斯 (O. Vallaux) 曾確證：「永續的疆界」之觀念是舊制 (old régime) 以下所沒有的，牠大部分是大革命和第一法蘭西帝國的產物。所以牠和國家神話的降生是適相符合的（看 *La Géographie de L' Histoire P. 34*）。

註三 在大戰前的幾個月之中，有一個休假的青年兵士因攀登一棵櫻桃樹偷吃櫻桃，被薩斯 (Sathé) 的一個農夫用鎗擊斃。當訴訟時，主席判事深責這農夫不該因為一把櫻桃就打死人。但這農夫極力否認因櫻桃而殺人。假如那兵士是在他的籃子裏，市場上或大街上偷去櫻桃而被這農夫打死，則這農夫雖被監禁也甘心。可是那不幸的兵士曾跳過人家私有的圍牆，走進不屬他所有的土地上，做出好像把那塊土地當作他自己財產的行為。據農夫的意見，他這樣侵犯了至高無上的所有權是應有死罪的。他以為事實上他所做的傷害和偷櫻桃無干。

如果我們向這樣的人告訴他說一個德國的斥候兵越過了國界，他定會贊成總動員而毫無猶豫地去打仗。

註四 “Tyrons descendez au corneil (The Marseillaise)”

註五 參看 M. Andre Tardieu 所著的 *La Paix*。他是這條約的議定人之一。

註六 「自然國界」的觀念是早經黎塞留 (Richelieu) 創立的。不過由他看來，所謂「自然國界者」只是爲了軍事上的需要，或爲了保護王國而設的一種方便的手段罷了。自從法國革命發生，纔把牠認爲一種權利。

第九章 種族

「我們祖宗的鄉土」這成語，本質上是一個古典的觀念，用拉丁字表示就是 *terra patria*。可是希臘和拉丁的城市範圍很小，其疆域還不及現在的一個選舉區大。每個城市僅有數千市民，互相都認識，至少藉着他們的氏族 (*gens*) 就能相識。除了爲保護他們的財產，每年有幾天的行軍而外，他們很少從征。他們的連帶觀念完全得自互相間直接的接觸。

自從現代的國家出現，便有一個新的問題發生出來。現代國家的疆域之大，幾與古代的王國相等。馬賽人或波爾多人會被政府派到亞爾丁森林或萊因河上去保衛佛來明人或洛林人的疆土。他們離開故鄉到了這樣遠的地方，當然很難把他們的遠征，認爲是爲了保護他們自己的財產。他們心中卻反會覺得詫異：他們自己和香賓 (*Champagne*) 或畢伽的 (*Picardy*) 這兩塊地方的居民之間究竟有什麼共同的利害關係，因爲他們和此項居民之間的關係，幾乎要與他們和德國人之間的關係，一樣的疏遠。

一七九三年的時候，芬底人和布瑞敦人拒絕到萊因河去從軍，這是實有其事的。在他們的心意之中，抗拒國民大會以衛本省的念頭，比較抵禦普魯士人以護法國的念頭還要強烈得多，因爲普魯士人並未侵及他們的鄉土。

所以在此項住居離得很遠的人們之間，必須要設法造成一種連繫纜成；在他們依戀本土的心情而外，還得要造成一種不是物質的而是人的關係，以便把他們都看作一個家庭的份子。所以國家的問題，這時已經由領土的一變而為種族的了。

「我們的祖先高盧人」

這個概念和其他的概念一般，也是把鄉村生活上常有的想像加以放大而造成的。

家庭的情緒大部分總是在鄉村中養成的。農業的固定性使得關係很疏遠的親族也能夠認得出來。在那些窮鄉僻壤之中，現在還有全村的居民都互有親戚關係的。親族的關係固然不能絕對防止族內的糾紛與內訌，可是不論他們之間有多大的紛爭，血統相同的人自然還是會團結起來以禦他族的，這不啻是根基很深的一種本能。種族的各種特徵在容貌上，身材上，性情上都會流露出來，所以親族關係是無論如何也不容否認的。這種特徵是永不能消除的，並且不同財產一樣，是決不會失掉的。不相識的人，因為朋友關係或利害關係，也許會聯合起來，可是這種結合是屬於意志方面的，所以很不牢。唯有血統的關係是不能毀滅的，因為牠和意志無關。

這誠然是一個再好也沒有的觀念了，既可以求內部的統一，又可以和外部相識別，這恰好是人們着眼點的所在。神聖的祖國的一切所有人，將以血統的相同為標記以與其他血統對抗——國家的神話上，除了領土統一的觀念而外，又加上了種族統一的觀念了。

這種傾向在舊制 (old régime) 之下，就已經很顯明了。由附近的土地而合成的較大的采邑，繼續地維持下去，其間的商業又漸漸地發展起來，就把鄉黨心慢慢地給消滅了。布勒塔尼，諾曼底，洛林和布羅溫斯都變成了單元，在每個單元之中，習慣、服飾、傳說和方言是人盡相同的。可是當時的君主並沒有十分想把這種愛省心，鎔合爲愛國心。因爲封建的法則在那裏作梗，所以地方的各種制度是不得不尊重的，而且在那專靠傭兵打仗的時代，也還沒有這種需要。

法國的人民，直到大革命的時候爲止，還過着以省爲單位的閉鎖生活，雖然其閉鎖的程度還不及庇里尼斯山以南的各地那樣厲害，因爲那裏的卡塔盧那人，卡斯提爾人和亞拉岡人，互相之間幾乎已經是仇敵之心強於同胞之情了。那不勒斯的細民也不承認和倫巴底的農夫或皮德夢特的山居者有血統的關係。至於日爾曼人，則因久已分治於無數的獨立王侯之下 (Sovereign-princes) 所以他們對於同出一源的觀念，早已是淡然忘懷了。日耳曼，意大利，西班牙，這些字眼已經不是民族的名稱，而僅僅是地理上的用語了。

新的國家，因爲在那不甚遠的過去時代，找不到一個共同的祖先，便只好歸根到那宇宙之始去了。這正和從前他們爲了劃定國家領土的疆界，曾經仰助於種種歷史的權利一樣，現在爲了補充歷史之不足，便只好仰助於人種誌了。人種誌乃是一種臆測性最大的科學，因爲牠的資料 (Data) 都已在事物原始的朦昧中遺失了。但正因爲牠是很不確實的，才大有助於國家系譜的構成，蓋製譜者隨時都可以參照新的需要而臨機應變。

我們現代的人種誌學者，拋棄了聖經上亞當是人類的共同的祖先的神話，發現了雅利安族由中亞細亞散

布到歐洲大陸，是按着一種波狀的連續而前進的。意卑里亞人（Iberians）衝進西班牙的奧地，高盧人走進現在的法蘭西，日爾曼人走到中歐，而斯拉夫人則散布到波羅的海以北的草原城，希臘——拉丁人（Graeco-Latins）則沿地中海而前進。（註一）所以每一個現代的國家都能在這些支派當中選擇一支作為該國人的共同的祖先，因為如果要把牠的公民在種族上統一起來，勢非有這樣一個共同的祖先不可。

單就法國而言，她要在高盧人、羅馬人和法蘭克人三者中選擇其一。高盧人是法蘭西有歷史記載以來最初的居民；羅馬人是法蘭西的語言和文化的創始者；法蘭克人確立了封建制度的基礎，法國的政治組織，即以此為其骨幹達千年之久。可是法國若以法蘭克人或羅馬人為選擇的標的，都不無缺點。如果選法蘭克人為法國的祖先，則不啻承認法德同出一源了，如果選羅馬人為法國的祖先，則法國又將與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同戴一祖了。總之，着眼點不僅在聯合所有的法國人，尤其是要使法國人可以和她的隣國人分辨出來，因為隣國的人有時或許成爲他們的仇敵。所以他們只好選高盧人了，因為只有如此纔能使法國有一個特殊的來源。選了高盧人作祖先之後，就可以使住於佛日山和庇里尼斯山間的一切居民都相信他們自己是屬於克勒特族（Celtic race）了。這未免太武斷了。即使承認羅馬征服以前的高盧人是一個純粹的，各別的種族，但我們仍難相信羅馬人既然在高盧全境留下了那樣深的痕跡，卻沒有遺下若干拉丁血統的混合種在那兒。至於說到日耳曼人，遠在克羅維斯一世（Clovis）以前，就已經被高盧——羅馬（Gallo-Roman）的地主們，由萊因河那邊招募了來，並且就在人口稀少的若干地方定住下來，作為移民了。所以法蘭西確是一個混合種族的國家，這是毫無問題的；假定

羅亞爾河流域的東面和北面，是日耳曼的成分較強，那末，在南部一帶，拉丁的成分一定也不少。

一般人都承認血統相同的人，在外貌、色素和身材上定有種種共同的特徵。現在的法國人，大體上說，都是平均高度，褐色或赭色的頭髮。可是尼母（Nîmes）、卡卡孫（Carcassonne）或土魯斯（Toulouse）一帶地方的幼童都是漆黑的眼睛，和褐色的鬚髮，他們卻常常用好聽的拉丁音調背誦着官定教科書上可記的句子：「我們的祖先，高盧人，是很高的，他們的眼睛是藍色的，頭髮是金色的……」用這樣一個根據來作建立民族統一的基礎，誠然是薄弱的很！

一種國語是怎樣形成的

這時，言語學就來補救人種誌的不足了。小孩子學語是在母親的膝上，一邊吃乳一邊學的。我們祖宗的語言就是這樣一代一代傳下來的，所以人們很容易把國語看作種族的表象，而假定方言相同的人們就是同一個祖宗的子孫。

但這種觀念是決不合乎科學的。語言和種族，每每是兩不相涉的；一個純粹的種族羣也許會拋棄了牠自己的方言，而去採納一個較強盛，較有文化的隣族的語言。高盧人就恰好是這種情形：在不到兩個世紀之中，他們完全採納了拉丁語，結果，克勒特語的遺跡，在愛爾蘭和威爾士雖仍保存得很好，但在法蘭西語上卻連一點痕跡也找不到了。

羅馬帝國在強迫地中海西岸一帶的居民都採用拉丁語這件事上，確曾成功了。但是這種統一，只有在他們和羅馬的關係不間斷的時候纔能維持下去。一旦蠻族的侵入使得交通有了危險，則這種共同的語言，在每一個孤立的地方都會發生種種變化。所以羅馬斯語 (Romance language) 在西班牙半島，在高盧，意大利和羅馬尼亞都有不同的演化。又因封建制度下土地的分割，和農奴代代都附着於一塊田地，其間的差別，便愈來愈大了。在現在的法蘭西這塊地方之上，原有兩種語言，羅亞爾河以南是 *langue d'oïl* (法國北部土語總稱)；每一種又分爲許多種的土語，如伊得夫龍斯 (Ile-de-France) 法蘭德 (Flanders) 畢伽的 (Picardy) 圖棧 (Touraine) 諾曼底 (Normandy) 等地的方言，都以重音變化，造句法，和語彙而不同，弄到最後，甚至這一省難懂那一省的話。意大利說多斯加納 (Tuscan) 威尼西亞 (Venetian) 安布立亞 (Umbrian) 等地的方言，西班牙說卡斯提爾 (Castilian) 和加達魯尼亞 (Catalan) 的方言。

在中古時代當中，統治階級一向都沒有注意到語言的進化。因爲教會和帝國都有一種適當的工具來推進牠們巨大的集權政治。這就是宗教上的拉丁語，那是當時歐洲通用的言語，無論是神學家，法學家或是王室的，皇帝的以及帝國的官吏社會，都用這種語言，大衆的農奴和手藝人是沒有公民權或政治權的，他們的身分爲不文的習慣法所規定，結果，無論是牧師們，或是封建的諸侯們，或是君主們，都無意於替人民建設一種統一的語言。但是隨着君主權力的擴展，一種趨向反對方向的運動就漸漸顯著了。我們已經知道揆伯特王朝的諸君主從第十世紀起，就怎樣渴望着要把他們的勢力伸張到法庭之上，並且城市的住民如果得到「國王的市民」

(*Burgessess of the King*) 這個頭銜是怎樣的痛快。從那時候起，用國王的語言對執行吏、家宰和其他王室官吏講話，變成了一種禮貌和便利。漸漸地，伊得夫龍斯的方言就較法國北部土語中的他種方言佔了優越的地位，並且隨着國王的領土向羅亞爾河以南漸漸地擴展，法蘭西語便也慢慢地普及於操南方土語的各地了。

法蘭西語的普及，起初原僅採一種重疊的方式。中產階級或貴族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仍然用本地的土語對他們的僕從講話，但一遇有大典的時候，便不管什麼地方也得用法蘭西語了。說法蘭西語就是表示有修養有禮節，同時，還表示社會地位的優越。自從法蘭西斯一世下了那道維拉斯——高得瑞茲 (*Villars-coterets*) 的諭旨，通令自彼時以後，一切公文都須用法蘭西語撰作，不得再用拉丁語，這種進化的速度便愈發加快了。從那時起，伊得夫龍斯的方言，就成爲位於一切方言之上的官話了。

恰好這時候，印刷術又催促着官話的普及。一本手稿所以值錢是因爲稀少。反之，一本書的收益卻是印刷的冊數愈多則愈大。所以編輯者當然是歡迎那些用大多數的人都能夠懂得的語言撰寫的著作。等到一切有教育的階級都覺得說法蘭西語是時髦，那時，各種書籍當然要用這種語言刊印而不用拉丁語了。蒙旦 (*Montaigne*) 是加斯科尼人，刺柏雷 (*Rabelais*) 是圖梭人，二人卻都用法語撰著。一般新教徒既然渴望着要把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盡量地加以感化，則根據同樣的理由，他們的著作當然也不會用別種語言。喀爾文 (*Calvin*) 所著的教會制度 (*Institutions Chrétiennes*) 和克力門馬魯 (*Clément Marot*) 所譯的聖詩，都是用的法蘭

西語。

後來，詩家們也採用這種新官話了。七賢士（Pleïade 或譯昂社派）努力使這種官話俱有學者國語（learned tongue）應有的一切柔和與豐富。度柏雷（Du Bellay）著了他那本法蘭西語之辯護與闡明（Dé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e）。龍沙（Ronsard）想要證明各種古典式的短詩、書信、諷刺詩和詠史詩都能用法蘭西語恰恰當地翻譯過來。

到了十六世紀之末，伊得夫龍斯的方言就已經明確地成爲政治界和文學界的通用語，而他種方言則被貶於土語之列了。可是這種工具卻還未十分完善。語彙和造句還是一任個人的想像；於是當時就有一種要求，要釐定語彙和造句的慣例，並且要防備喜嘗試的行家的太多，以免他們破壞這種言語的純一。黎塞留（Richelieu）的最大志願就在促成法蘭西王國的統一，他很懂得這種奇怪的集權政治的工具是如何的重要。他創設法蘭西學院的主要目的就在釐定並統一法蘭西語。同時，服格拉斯（Vaugelas）就負了創造文法的使命。貴族婦女，藉着他們社交的力量，使得這種語調流行於交際界，而中等階級自然又處處要模倣貴族的習氣。法國的散文和詩所以會有明確的形式，是應歸功於巴爾札克（Balzac）、筏屠耳（Voltaire）、馬雷布（Malherbe）和柯奈耶（Cornelle）等人的。

舞臺劇是要用口語演唱的，在推行國語上說，牠乃是超乎一切之上的一個最有效的工具。所以不久，優伶的劇團就得到了王侯的保護與獎勵。莫里哀（Molière）和他的劇團，凡遇各省政府的集會附帶舉行各種典禮的時候，總是給康體公爵（Prince of Conti）充任隨從——要把朝廷的語言、音調和風習傳播給各省的貴族、僧

侶，和中等階級，這確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當時的著作家多領受國王的恩俸，這是由國王自己的荷包中掏出來的。優伶和詩人差不多已經成爲一種官吏了，他們的職務不僅在替王侯們尋開心，還在使他們能夠投合全國的人望。所以優伶和詩人對於國語的統一也是確有貢獻的，雖然他們的辦法和人不同。

到了十八世紀，推行法蘭西國語的工作已告完成。那時，由萊因河流域到阿爾卑斯山，由布勒塔尼到底里尼斯山，一切的人都通用這種共同的語言了，這種語言的地位超越了一切地方土語。

可是一直到大革命的時候，各省還是說土語。在南部，法蘭西語的推行未能出乎一般有教育的階級（如貴族，牧師，以及有職業的中等社會）。鄉間的老百姓大都是不識字的，所以還沒有忘掉了他們世俗的土語。他們在政治上沒有地位，所以不管農奴階級說什麼土語（布勒通語，巴斯克語，或是布羅溫斯語）都和君主無關。另一方面，天主教會的唯一職責就在管理人民教育，他們只關心於宗教宣傳，不管說教和問答教理用什麼土語都毫無關係。至於說到牧師的本身，因爲他們已經有拉丁語作爲統一的工具，所以那也就夠了。因此，一直到法國革命的時候，還沒有人想把全國人民所用的言語統一起來。

語言統一在軍事上的必要

在十九世紀當中，隨着現代國家的興起，一切事情都改變了。國民兵代替了僱傭兵，不識字的農夫和不熟練的勞動者都被徵召來服軍役了。

但如果新徵的兵士不懂官長的語言，將怎樣訓練他們呢？對於這樣廣大而流動的團體，怎樣纔可以使號令迅速的傳達呢？還有一件頂要緊的事情：他們之間的精神團結又將怎樣促成呢？在以前軍隊都由職業兵組成，這些兵士，沒有家庭，沒有責任，爲得餉金而受訓練，爲種種他們所不能知道的原因而犧牲性命，那時他們的思想是用不着考究的。但是到了現時，必須使一般國民離開了家庭而受若干年間的訓練，並忍受訓練上種種的辛苦，而且還要準備着犧牲他們的性命，卻連一點金錢上的報酬也得不到。這是很顯然的：非有某種理想鼓勵着他們，並且非使他們感覺到和武裝的同伴之間，有一種密切的連帶關係，定難使他們甘願服勞役而冒危險。可是在語言各不相同的人們之間，這種團體精神又將怎樣培養起來呢？這時須得克服的種種困難便不僅是技術上的，而且還有精神上的了。

大革命一經爆發，這種困難便立刻顯露出來。芬底人（Vendéens）如布勒塔尼人（Bretons）對於國民大會的普遍徵兵，都拒絕應募，在二十五年當中，西部地方有許多逃軍犯，藉着老百姓的幫助和串謀，竟能逃脫了拿破侖憲兵隊的監視。

可是，只要是帝國（指第一法蘭西帝國而言——譯者註）專用操法語的兵士作戰，軍隊中的團結便維持得很好。但如果操德語或意語的各地分遣隊一旦被強迫加入兵籍，尤其是領導他們的官長也操同樣語言的時候，那末，勝利便定然操在敵方了。當來比錫戰爭（Battle of Leipzig）方酣的時候，薩克森各聯隊整個地投降和他們操同樣語言的敵方，而開始向不通語言的己方襲擊。

在十九世紀當中，各國都漸漸地覺悟組織國民軍的先決條件是要有一種國語。可是無論那一個重要國家的窮鄉僻壤中的農民，依然都還操着各種土語，這是必須設法減少，設法禁止的。要達成這種目的，最好的工具就是初等教育，可是直到現在為止，各國政府還多把初等教育置之度外。人民的教育普通都是付託給牧師去辦理，可是由牧師的立場來說，語言的歧異是無關重要的。自從徵兵制漸漸實行起來，各國政府便都注意到教育上面來了，而且到處都實行了強迫教育；如果學校的數目不夠，便由國家出錢設立。教師變成國家的官吏；一切學校都被強迫採納了相同的課程，而國語的訓練竟較所有他種科目佔了優越的地位。

於是事情竟至這樣：在法國，連布勒塔尼、巴斯克和布羅溫斯的一個小農人都不得不學法蘭西語了。雖然在他們之間和他們家裏，仍然是說土語，可是人人都懂得這種共同的語言。現時，由法蘭德斯到那瓦（Navarre）由布羅溫斯到布勒塔尼，幾乎沒有一個法國居民不懂得法蘭西語了。

在德國，這種工作便比較困難了。由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的法德戰爭而產生的德意志帝國（Reich）包有許多省分，其中的居民大多數不是操日耳曼語的，如波森（Posen）通行波蘭語，什列斯威（Schleswig）通行丹麥語，亞爾薩斯和洛林的若干部分通行法語。日耳曼帝國政府決定強迫這些省分的學校都教日耳曼語，各省遂起而積極反抗。尤其是波蘭的主教們反抗最烈，因為他們恐怕日爾曼文學的傳布，會有利於新教的宣傳。政府就採了壓制的辦法：兒童們受懲罰了，父母們被監禁起來。帝國議會中提出了種種動人聽聞的質問，全歐洲的報紙都把這件爭鬪的新聞熱烈地加以討論。

到了大戰將近的時候，壓制政策愈發激烈起來。這確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素以系出條頓種族自驕，並且把日耳曼語當作寶貴的血統符號的德國國家主義者，現在卻又把这个選民（個人或團體爲神所選當受特恩或永生者——譯者註）的符號強加在他族之上——這不啻是自己否認了自己的得意理論！不過關於這件事，人種誌和語言學都不過是達到某種目的的一個手段罷了。根本問題僅只是促成德國軍隊的統一。非把語言統一起來，國民軍將無從得到精神上的一致和技術上的和諧。就只因爲這個緣故，波森，洛林，和什列斯威的兒童們在學校裏的語言練習纔變成日爾曼帝國一件極重要的事情。

指揮之語言

這個語言問題尤其是哈布斯堡的奧匈國（dual monarchy of Hapsburgs）所最焦慮的。只要軍隊是由僱傭兵所組成，那末，既便哈布斯堡的人民有四分之三所操的語言與他們的君主不同，也沒有什麼關係。而這種語言上的歧異反倒便於少數的日耳曼族來支配匈奧（Austro-Hungarian）的人民。但爲了要與法德俄等國巨大的國民軍相頡頏，他們便不得不隨着人家採取了「國民皆兵」的制度，這時就覺察出在同一个聯隊當中，有的兵士說日爾曼語，有的說匈牙利語，有的說捷克語，波蘭語，哥羅西亞語，與羅馬尼亞語。當時固然決無強使一切人都說日耳曼語的意思，但爲保持命令的迅速傳達起見，便不得不把操同樣語言的兵士集合在一起，並派一個種系相同的人充當他們的官長。可是這些官長卻非用同一種「指揮的語言」（language of command）

不可。

日爾曼人自然是佔了傳統的便宜。但是馬札兒人 (Magyars) 卻因為堅持要和奧地利亞人處於平等的地位並且要比斯拉夫人和羅馬尼亞人絕對佔優勝的地位，便定要讓由來塔 (Letha) 以南招募而來的各分遣隊都用匈牙利語。斯拉夫人對此當然要提出抗議，理由是他們佔大多數，所以行伍之中當然要用該族語言發號施令纔覺便利些。可是如果這樣，哈布斯堡帝國便要覺得軍隊複雜的煩累了——並且軍事行動將因此而失掉和諧。國家的統一也將發生危險。此外，斯拉夫聯隊回想起往昔歷史上的種種糾紛，也許會向匈牙利或日耳曼聯隊開火。

哈布斯堡的整個政策就爲此種恐怖所支配。軍界中，議會中和報紙上，都把「指揮的語言」這問題加以熱烈的討論，當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的時候，這問題尙有待解決。這時，奧德聯軍所募的捷克波蘭聯隊適巧和操同樣語言的俄軍聯隊相對陣，於是他們便發生了嚴重的叛變情事。一向都是由異族人接受命令的兵士們，這時便向其最高指揮和他們操同樣語言的敵軍投降去了。當大戰時奧匈軍隊的薄弱，無疑地是以沒有共同的語言爲其最大原因。關於奧托曼的軍隊，情形也正相同。當斯拉夫和希臘的分遣隊和其餘隊伍混雜一起的時候，紊亂和潰敗幾乎是不旋踵的。反之，凱莫爾 (Mustapha-Kemal) 的軍隊，因爲是清一色的土耳其人所組成，所以纔能避免一切挫折而得到最後的勝利。

所以由一世紀的經驗看起來，我們就可以明白了，所謂「國民軍」者是包含着「國語」的意義在內的。歐

洲各國的政府沒有不是盡可能地要讓語言的疆界和領土的疆界符合一致的，原因就在此。「一塊國土只容許一種語言」這句話已成爲現代的口號，可是在古代傭兵制的王國，卻決沒有這種說法。如果這兩個因素不相符合的時候——有時牠們之間會隔着一道鴻溝——便要盡力使之符合，甚至連惹起暴亂並犧牲牠們所時常祈求的歷史上和人種誌上的種種權利亦所不惜。無論那一國，國語的傳播，在本質上都是由於軍事需要；並且都是由在上者藉着強迫教育而推行的。在好多地方，所謂國語不過僅是一種人爲的東西。決不是語言造成了國家，卻是國家把語言強迫地統一起來了。

一般人卻不惜顛倒事實，倒果爲因而持和此相反的意思。所有聚合在同營之中並操同樣語言的兵士們，根據那種把一切現在的理想都要溯其已往的根源的自然趨勢，而想像着他們自己是屬於同一個血族，並且互相認爲同胞的兄弟，都應負保護祖國——即他們共同的遺產——的責任。至於出自另一根源的敵人，只須憑語言的不同就能辨識出來。

共同的歷史傳說

親族的關係愈遠，則遠族兄弟愈有互相忘記的趨勢，如果不是這家族集團的所有分子都還記得同出一祖的事實，則血緣的關聯，到最後定會被他們完全忘卻。

古代的家庭，藉着祭祀家神 (Lares) 而維持其和協一致。貴族的家庭都各有各的系譜，各有各的紋印。他們

的自重心和勢力怎樣，全靠他們的門第出身，至於個人的身分高低那就要看他的血統傳襲的長短和他的祖先的事業與功績是如何的顯赫。在青年貴族的教育之中，複雜的紋印科學 (Science of heraldry) 久已形成一個重要的部分。但這種貴族的癖嗜與私事卻非一般平民所能有份的——因為他們沒有顯赫的祖先。

首先擔任羣衆的教育事業，使羣衆能有種種共同的歷史觀念的，要算是教會——但其目的是宗教的而非國家的。由第七世紀到第十九世紀，教會學校許可任何兒童入學讀書——他種學校決沒有這樣的——教以聖書的歷史，至於聖地的故事和新舊約聖經的內容也教以大略。亞丹和亞伯拉罕，諸帝，諸預言家，耶穌，諸使徒和諸教皇成了基本課程。這種袖珍小冊的著者，有時會把若干帝王和大政治家的事蹟夾敘其中。這種小冊是在主教的監督之下刊行的，目的在取悅於當時的當軸，如果這樣辦有什麼好理由的話。可是他們提出此項歷史上的大人物，主要目的是要把他們看作護教者或反教者，並按照他們對於宗教的態度而加以評判。

教會的走廊上和彩色玻璃窗上都繪着這種往昔的事蹟，使信奉基督教的羣衆養成一種深刻的連帶情緒。不幸牠們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各國的教會無不雷同；此外，自從宗教戰爭的發生和自由思想的傳布以後，就連同一國家的人民，也不能統統都承認牠了。宗教的神話和國家的神話二者已是不相一致了。

於是就有創造一種新的歷史教義的必要，不過這種歷史教義仍須合於上述的楷模。牠現在所要敘述的不是聖地而是國家的領土了；領土的神聖疆界怎樣爲「自然」所劃定或根據什麼條約而劃定當然是要述及的。以前的「選民」(Chosen people) 現在代以法蘭西，日耳曼或意大利的人民了。聖徒，預言家和殉教者都不談

了，而另換上一批民族英雄，帝王，大將，外交家和政治家，他們曾經捨身衛國，或設法擴充祖國的神聖領土。半世紀以來，歐洲各國都在國家的監督下刊印各種歷史小冊，以便養成全國青年崇拜同一英雄或記取同一事變（無論是福是禍）的心理。

誠然，假如我們要謹嚴地而且單純地以歷史資料為根據，則這種共同的記憶事項一定是屬於最近的而且為數不多。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那些造成今日的德國或意國的各邦，幾乎不斷地互相爭戰。甚至法國在大革命以前，還是各省各有獨立的生活，各有歷史的傳說。布勒塔尼，耶基多克和布羅溫斯都是到最近纔「統一於君權之下」（United to the Crown），以前也是常和法王爭戰的。

但上述各事決非青年的想像中所宜有的記憶事項。如照教科書所述，則在高盧和味辛澤托立克斯（Ver-cingetorix）的時代以後，事實上早已就有法國了。於是伊得夫龍斯便被故意弄成了舞臺的中心一般。在法國各省的兒童的心目中，凡有關於伊得夫龍斯的任何事情，不管在什麼時代，都要看作國家大事的。這樣一來，克羅維斯在托爾拜克（Tolbiac）的勝利，由土魯斯的兒童看來便好像是他們自己的成功，可是那時他們的祖先還在哥德人（Goths）的領率之下呢！布羅溫斯的幼童都把部焚戰爭（Battle of Bouvines）看作一件可慶的事，可是別人決不會告訴他：他們的祖先，那時還不是法國的臣民而是條頓族的神聖羅馬帝國的臣民。布勒通的幼童，現在都把克勒西（Crecy）、波亞疊（Poitiers）和阿金庫爾（Agincourt）看作國家的禍水，可是事實上，百年戰爭時，他們的祖先卻常常和英國人聯合。二十世紀的加斯科尼兒童固然會讚賞西門·得·蒙福爾（St

mon de Montfort) 的東征成功，但他們的祖先亞爾比派 (Albigenses) 卻決不會如此。

但所有的教科書，其編著的目的全都是要讓人忘卻那不方便的历史事實。他們無論提出那一樁事情，都懷着一種念頭，就是要在讀者心中，留下一個「萬世的法蘭西」之印象，做爲現代法國的一種原型。其間露頭角的英雄也都要依照這原則一一加以評判。即如度革克朗 (Du Guesclin) 本是布勒通 (Breton) 的一個首領，屠梭 (Turenne) 乃第一法蘭西帝國的一個諸侯；薩克森摩里士 (Maurice of Saxony) 本是日耳曼的一個王侯，以及奧士 (Hoche) 宋濟 (Chanzy) 等人，都被他們看作護衛祖國的勇士了。黎塞留雖曾任紅衣主教，馬薩林 (Mazarin) 雖然籍隸意國，刷則爾雖然職任西班牙之大公，但都被他們看作本國的大忠臣了。他們認爲菲力普奧古斯都 (Philip Augustus) 查理第五和路易第十一所最關懷的事，只在替第三共和國的兒童們開闢一條途徑，以便使他們能有隸屬「世界第一等國家」的榮幸。所有這些大人物，君主，大將，外交家，或政治家的等次，都要按照他們會替這塊共同遺產開拓了若干土地而定。以拿破倫那樣的天才，尙且被人非難，其緣故並不是他會使歐洲戰亂十年生靈塗炭，卻是他使得法國的領土比較他稱霸歐洲以前反倒小了。

這種教育決不合乎科學是不用說的。牠僅僅是一組歷史上的謬見，把現代人的種種偏見和理想硬加在古人的身上。例如他們敘述阿克佐安 (Joan of Arc) 的故事，那是再奇怪也沒有的了。他們給她上了尊號，叫作「祖國的聖者」，可是她不僅不曉得此事，恐怕就連這名稱也一點不懂，這是再的確也沒有的。她和她一切同時的人一樣，對於世界只有一種純粹宗教觀念。她以爲各國君主既都信奉基督教，而他們的權力又都是上帝親自

賦予的，那末，他們互相爭戰就是褻瀆神聖。她的宗旨是在使法蘭西國王重新在他的「遺產」(Heritage)以內恢復王位，而強迫英格蘭國王也回到他自己的「遺產」去。然後再讓他們互相和解，以便遣派他們的軍隊從事那唯一合法的戰爭——即是打倒異教徒的戰爭。佐安是受了那舊有的十字軍神話的激動而決非有感於那新生的祖國之理想，蓋後者的流行乃三百五十年以後的事情。

但如果歷史是照上面那樣述說的話，不僅小孩子們，連大人們也要不懂了。反之，如果他們把阿克佐安的故事這樣述說：說她是把英國人逐出法國的境地，那末，就無異把她描寫成一個「國土的解放者」了。由一八七二年起的一個世代當中，人們懷想着以前的失敗和受英國侵略的情形，在他們的憂慮懸念之間，這個十五世紀的殉教女郎就不期而然地變為他們理想中的偶像了。運動團體，軍事團體教把她看作牠們的守護神一般；尤其妙的是天主教會竟忘了從前曾把她燒死的事實，這時反倒把這位女郎尊為聖人了。宗教神話出頭維護國家神話，二者各藉相互的力量而增強起來。俗世的共和黨和好戰的天主教忘了牠們中間的宿仇，大家排起行列來，一齊集中於解放的旗幟之下了。如果不是好事者熱狂地干涉，則國節將是奧爾良解圍紀念，而不是巴斯太耳陷落紀念了。由於驚人的時代謬誤，這位十五世紀的女郎居然變成了一種神話的符號，而她自己對於這種神話卻是決不會知道的。

一切學校的歷史課程都是照着上面這個典型的實例而教授的；事實敘述得很對，可是解釋得錯了。不過這樣一來，事實便更容易懂得，而且更有趣，更生動了。現代的種種政治偏見大都被他們附會到過去的时代上去。領

士統一的觀念被他們向後倒拖了好幾百年之久，以便給牠一種永久性。而這辦法倒確是很重要的，因為一種神話，如果我們打算叫牠有效力，能耐久，勢必要不容許商量討論纔行。牠必得是一種絕對的真理，也必得是一種永存的真理，因為如果牠是「有始」的話，那就勢非「有終」不可。

各種神話，無論是社會的，宗教的，朝代的或國家的，都有一種超乎時間限制的根據。當凱撒打算建設帝國時，他曾斷言他自己是維那（Venus）的直系後裔，愛攸拉斯（Iulus）的兒子，伊尼阿（Aeneas）的孫子。味吉爾（Vergil）的阿尼特（Aeneid）唯一目的就是要用古典敘事詩的形式來傳布這故事。又如日本天皇，都說是大陽神的直系後裔。在封建時代，系譜學者常常要把貴族家庭的根源倒填若干年上去，而且愈古愈好。直到現在，利未斯米瑞玻益（Levi's Mirrepolis）的諸公爵還是斷言他們自己和聖女（Holy Virgin）有遠支從兄弟的親誼。

除了有限的幾位學者而外，一般平民之注意「過去」，只是把牠當作辯護「現在」的一種理由而已。基督教的護教論者對於希伯來的歷史，只記得那些可以作為救世主降生的先兆的若干事實。當波緒亞（Bosquet）著世界史論（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的時候，他的目的不過是要替路易十四的君主專制政體辯護罷了。現在的情形仍和以前沒有什麼不同，現代人作史的目的也不過是要給國家的神話準備一個不可詰難的外觀，使人一看就知牠確是一種不變的，絕對的，並永存的真理。

我們很可以推斷不僅法國曲解國家的歷史，就是歐洲所有各國也莫不漸漸地採納同樣的方法來批判各

種英雄人物和事件背景。在德國的各種教科書裏以日耳曼尼亞 (Germania) 代替高盧 (Gaul) 以阿民尼阿斯 (Arminius) 代替味辛澤托立克斯 (Vercingetorix) 以腓特烈巴巴羅薩 (Frederick Barbarossa) 代替聖路易 (Saint Louis)。在時常爭戰的隣國之間，同一個人物雖或同時出現在兩國的歷史上，但兩方的月旦便迥乎不同了。由法國的小學生來看，黎塞留、盧福爾 (Louvois) 拿破侖都是他們祖國的干城，因為他三人有開拓疆土之功。但由德國的兒童來看，這三個人都是窮兇極惡的暴虐者，因為他們蹂躪了德國，把德國弄得四分五裂了。根據同樣理由，萊因河右岸上的人們都把畢斯麥尊為英雄，因他有統一日耳曼之功，而且永遠捍衛祖國使不受野心隣國的侵犯與瓜分。但萊因河左岸上的人們，卻把他看作武力之神的一位殘暴戰士，因為他於改竄一封電報之下就出了不義之師而把法國毀滅了。

這是創造「國家精神」的一種奇妙方法。布羅溫斯、布勒塔尼和加斯科尼所有的幼童都在一種共有的同情心之下團結起來，同時又為一種共有的怨恨心所束縛——因為大家對於巴威、薩克森和普魯士的一切幼童都懷着怨恨之念。所以這兩國的人不必會面就早都在互相憎惡了。

不僅如此，假如歷史上這兩國之間常常發生過嚴重的衝突，則危險的「世仇」(hereditary enemy) 之觀念遲早總會出現的。

註一 參看威爾士世界史綱。

註二 在現在的美國也可以看到相同的現象：愛爾蘭、斯拉夫、匈牙利、希臘、德國、意國和瑞典的移民，到了美國，一二代之後，就把祖國的語言

完全忘掉而光會說英語了。

註三 在國民會議當中曾經有過一個提案，提議禁止使用土語並以死刑懲處一切談公者。由此我們可以斷定是國家強制地統一了語言，並不是語言統一了國家。

第十章 國家的天賦

國家神話所以能無區別地傳播給一國中所有的兒童，全靠曲解歷史之力。

至於那些有機會受到比較長期的教育，並有力量由中學升入大學的中等階級子弟，則另有一種特殊的教育和巧妙的方法替他們籌劃在那裏。這些青年天天和各種文學或哲學傑作相接觸。這些傑作雖都是人類共有的遺產，可是他們所最熟悉的當然只是用本國文字撰著的。

固有的天才

每一個受過教育的法國人必已把柯奈耶 (Cornelle) 或露俄 (Victor Hugo) 的最優美的詩句和福爾特爾與謝多勃良 (Chateaubriand) 的最好的文章銘記在心。無論是日常談話上或報紙上，只要是徵引一句拉封騰 (La Fontaine) 的話或引喻一段莫里哀 (Molière) 的劇情，則人人立刻都能懂得。但如果所引的是康德的某一條定義，或哥德的某一句詩，事情就大大地不然了。所以一國之中，凡是受過教育的人，必都俱有一種共同的智力外觀，某種共同的思想態度和談話態度，和某種共同的精神習慣。兩個受過普通教育的法國人，族途相逢，立刻就能互相認出是同胞來。

可是教育上養成的這種習慣，就正是他難於了解外國文學傑作的原因。一個人讀慣了福爾特爾和庫累（P. L. Courier）的清晰流利的文章，定會覺得句法冗長複雜和濫用抽象名辭的德國散文是曖昧難明的。反之，在德人方面，卻會覺得清晰的法文是單調而浮泛的。法國人鑑賞慣了谷諾（Gounod）的韻調清澈而簡潔開展的文章，對於瓦格涅所作的精心結構的曲子，定會難於欣賞。傾倒於路易十六典雅謹嚴的風格的人定會厭惡慕尼克（Munich）的狂放不羈。

這種種區別究竟怎樣解釋呢？牠們何以會和國家的疆界全然一致呢？或者有人會說：這是因為牠們正和種族的諸項屬性一般。「自然」替每一個民族預備下某種特殊的智慧和藝術上的感覺性，為其隣族所不能有的。據說這種種特徵都是先天的，由祖先遺傳下來的，一如眼或髮的色素一般。這種種特徵由父傳之子，子傳之孫，只是不能傳給他族的分子。

每一個國家都有牠本身的天賦，這是牠所有的分子生來就秉有的。生於庇里尼斯山和佛日山間的兒童，對於笛卡兒的唯理主義自然就有一種癖好。同樣，生於萊因河彼岸的兒童，生來就會傾向於康德的批判主義。博學的日耳曼人將會論證下面這件事，就是當阿米尼亞斯（Arminius）殲滅了未刺斯（Varus）的軍團時，他的伴侶們就早已浸染上那些固有的特質了。日後路德的座談錄（Table Talk）和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都是由這種特質產生出來的。

據說一個種族之內，大多數人都會不知不覺地，隱而不露地具有這種國家的天賦。可是僅只偶爾遇到一兩

個天才特富的子孫纔會爲牠所感應，正如爲神所感應的預言家或女巫一樣。這時便會有一種哲學、文學、藝術或音樂上的傑作產生出來，該族的人立刻就把它這個傑作認爲全族千古不朽的偶像了。

這乃是各國的評論家和大多數受過教育者所公認的理論。

各國藝術精英之融會貫通

可是實際情形果真如此嗎？現在我們且不管閱讀這種傑作的人怎麼樣，轉過來看一看撰著這種傑作的人是如何。

他們果曾用畢生的時間，一心一意地研究他們自己的民族嗎？果會專心致志地表現他們的國家天賦嗎？只是要把思想史略翻一過便知事實恰好相反。

第一，所有歐洲各民族的文化都發生於一個共同的來源，就是希臘和羅馬的文化——不僅意大利人、法蘭西人、西班牙人是羅馬的嫡系子孫，就連日耳曼人、安格魯薩克遜人，甚至斯拉夫人也統統都是。當中世紀時代，凡受過教育的人都把拉丁文當作共同的語言。在基督教國的各修道院中，古代的稿本都有得傳抄；聖哥倫坡派的愛爾蘭僧人走遍日爾曼各地去宣教；亞里斯多德哲學的猶太文和阿拉伯文譯本，藉撒利諾（Salerno）波倫亞（Bologna）巴黎（Paris）和柏克區比（Beac Abbey）諸大學之力，傳遍了泰西各國。一切的教堂，起初都是照羅馬式建築的，後來又採納了伊得夫龍斯的哥德式，由西班牙到波蘭，愛爾蘭到西西里，各地的文化都被基督教

統一起來。

人們或者會這樣想：自從十五十六世紀諸大民族王國興起之後，歐洲文化就已有分裂的徵兆，各國的藝術和思想也有了不同的發展。可是事實不然。當意大利剛剛把古代的傳說完全無缺地恢復過來而開始要產生文藝復興第一流的傑作時，法蘭西，法蘭德斯，日爾曼，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學者，哲人和藝術家們便已不期而會集於羅馬和佛羅稜薩來學習新的思維法和繪畫法，新的雕刻術和建築術了。他們除了到新發現的古蹟出處去參拜一次之外，那一個也沒有在他本國的思想史上留下一點他自己的痕跡。意大利式的教堂，邸第，繪畫，書籍和服裝幾乎流行了二百年之久。但意大利的藝術漸漸地染上了拘泥一格和因襲重複的色彩；牠已經沒有那種偉大的人類氣味而失去了牠的威信。智慧的中心地點移到他處去了。這中心地一度移到西班牙，但不久就在巴黎固定下來。

法國宮廷和城市中的藝術，起初都是傾服於意大利派的彫琢氣和矜誇氣；例如柯奈耶就不能逃出這兩種習氣的窠臼。但隨後突然出現了一羣藝術家，其領袖為莫里哀，拉封騰和拉辛，於是便有幾部傑作在巴黎降生下來。這幾部傑作雖仍以希臘拉丁和意大利的藝術為其源泉，但確是生動的藝術作品，可以公諸世而無愧的。在此後三四個世代當中，各國的藝術精英便唯巴黎的馬首是瞻了。德國，波蘭，英國都模倣法國詩；人人都在摹擬蒙薩（Mansart）和勒諾特耳（Le Notre）的格調。甚至連巴黎式的傢具，服裝和客廳的格式也成爲世界各國的楷模了。以威名震撼一世的腓特列第二和喀德隣還專好操法語，並於閒暇之時擬作法國詩呢！

這時，英國發生了一件新的事情。宗教改革派和議會改良家的奮鬥引起了哲學上和政治學上的創作運動，代表人物便是浩布斯、洛克和休謨。於是法國所有的輿論領袖如孟德斯鳩、福爾特爾、盧梭等便都渡海峽而訪英了。當時的英國詩雖仍以法國詩為摹擬的標的，但「哲人們」的主要論題卻轉移到英國的風俗、制度和思想上去了。愛迭孫固然還摹擬拉辛，可是福爾特爾已經把牛敦與苗卡兒相提並論，並且覺得莎士比亞也很投他的脾胃了。

這時的歐洲，在哲人派國君的領導下，正耽溺於古典主義，不期盧梭卻在那兒大唱政治上的民治主義與文學上的浪漫主義。難道這就是「瑞士天才」的表現嗎？誰敢大膽地作這樣的斷定呢？盧梭不為日內瓦所賞識，卻深蒙英吉利的恩寵，人家既把他看作法蘭西的一位政治預言家，又把他尊為德國新體詩派一位精明的選手。德國的名著維特（Werther）和法國的名著爾勒（René）都是師法他的新愛羅依斯（Nouvelle Héloïse）。至如抑鬱不得志的拉馬丁（Lamartine）、睦舍（Musset）、霍俄（Hugo）更都是他的後輩了。

自那時以後，工業革命所引起的國際關係的大變化只不過加強了這種「藝術精英之融會貫通的作用」，而把牠推到最高點罷了。各種文字的譯本，學術團體的批評與通信，藝術作品的攝影複製以及國內或國際的展覽會等都如雨後春筍般地增多起來。任何一種較重要的作品，任何一種發明，任何一種學術研究的結果都必公表於世，以供留心歐美時事者的參考，在任何圖書館或博物院中都可以看得到。謝謝一般國外宣教家和旅行學問家之恩惠，各項研究和調查都是到當場去舉行的。一方面，各地的繪畫家和雕刻家不遠千里而來到蒙帕那色

(Montjarnasse) 他方面，法國的各種繪畫以及羅丹和鮑爾得爾的各種雕刻則流傳到世界各處的博物院。在精神方面，國家與國家間並無隔閡。國界上的哨兵阻止不住思想的傳播。一般大眾或因不諳外國語言，或因沒有閒暇時間，也許會以略知本國傑作爲滿足；但卽令其如此，實際上，他們所認爲國家天賦之最高表現的作品也不過是震撼全世界的各種思想和感情之反響而已。我們很難找到一位科學家，一位哲學家或藝術家可以主張他自己的成功只叨蔭於本國的學術遺產而毫不依恃國外學術的補助。

我們現在的理論家無疑地會這樣回答：說是他並未否認那掃遍歐洲各國的大思想潮流之重要，但是——他會這樣辯論——法國藝術家和思想家的任務當然是使這個潮流適應於法蘭西精神，德國藝術家和思想家的任務當然也是使牠適應於德意志精神，這是很顯然的。誠然，在同一時刻，兩國的思想產品竟有分歧之點，已是證明兩方都各有一種各別而不變的「國家天賦」了。

但這乃是一種毫無根據的假設。在文學史上我們決找不到一件事情足以證明一般作家的中心確存有這種意思。當龍沙 (Ronsard) 和昂社 (Pléiade) 中的人物在意大利發現了古代美術的標準後，他們便嚴重地非議「法蘭西精神」(這是現代文學批評上一種神祕的措辭) 所產生的任何東西了。凡法國的短歌，短詩，二韻詩，神祕劇，傳奇，彈詞等等，他們都認爲是淺薄而已廢棄的藝術慣例之遺跡，應該一齊擲到垃圾堆裏去。這些改革家以爲法國語言僅僅好像是一種樂器，要使所譜的歌曲合乎希臘羅馬的美學原則，還得加上幾根新弦纔行。

無論誰吟誦這些詩句。

除非他是位希臘人或羅馬人，他手中所持簡直不是一本書，

而是一塊笨重的東西。

——這是龍沙自己說的話。他決不變通；他非難四百年當中的法國文學，統統把牠們一筆抹煞了，縱令這種文學至少還有地道法國出品的價值，他也不問。如微隆 (Villon) 查理斯得奧爾良 (Charles d'Orleans) 以及蓋薇故事還得藉助於現代學者的力量，纔能把一般人對於他們的愛好恢復過來，這就是新文學運動的成效！

甚至聖母院 (Notre Dame) 和聖禮拜堂 (Holy Chapel) 也被人假借了維特魯維阿 (Vitruvius) 和布刺曼忒 (Bramante) 的名義而加以非議了；那有名的建築法國的主教禮拜堂現雖號稱爲「法蘭西天才」最艷之花，但當時也會被人加以侮慢的名稱而叫牠做「哥德式」。

差不多任何一世代對於已往的各世代總是不能了解的，這是歷史上屢有明證的。馬雷布 (Malherbe) 把龍沙罵得一文不值，一如龍沙罵中古時代的作家一般。現在的人把莫里哀尊爲「法蘭西天才」之最完美的化身，但盧梭卻罵他是一個淺薄而無德的作家，覺得他的詩討厭。羅俄說拉辛的藝術是狹隘的，流俗的，未經潤色的。莎士比亞像橡樹，

拉辛是個木頭般的笨東西。

無論那一派法國文學都會受過牠後輩的非難。並且奇怪得很，總是假借着外國美學上的一種習慣作爲理

由。

例如柯奈耶就最爲私淑亞里斯多德的諸項原則。霸羅 (Boileau) 和他的朋友把何拉斯 (Horace) 的詩論 (Ars Poetica) 看作評判任何文學作品的標準。而聾俄在克林威爾的序文上把伊利薩伯朝的一位英國大詩人尊爲王政復古時代法國作家的模範。

所謂「國家的天賦」之綿延性與排外性不過如此而已！

歐洲各國的文學和藝術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無論那一派藝術家或文學家都攻擊他們的前輩，所謂一國之中會有一種「國家天賦」代代相傳的話，在他們心裏壓根兒就沒有這種觀念。人們所說馬內 (Manet) 是盎格耳 (Ingres) 的後繼者，德獵克洛亞 (Delacroix) 是大衛 (David) 的後繼者，聾俄是拉辛的後繼者；馬雷布是龍沙的後繼者，無論由這班大人物或他們同時的人看來，都是全然狂妄的說法。他們以爲藝術和思想統要受支配於普遍的法則，所以他們對於接受外國的「煙士披里頓」(鼓勵)是毫不猶豫的。

人們好像總是把希臘的美術尊爲美學的極則，這種情形已經頗久了。甚至連改革家也不過主張把已經敗壞的傳統法式再行恢復過來罷了。最偉大的改革家都會把時代進步的理論加以否認——我們只要回憶古代派與現代派之間那著名的論戰就夠了。如果那「藝術和思想按照各國國民性的系統而爲平行的連續發展」的說法，那時已然有人提倡，他們或者會更加竭力排斥呢。

傑作之國際性由於具有人性

有一件東西最爲各國藝術界的中堅所注意，並且最爲文化所寄托的，就是「傑作」。叫做「傑作」是很有意義的——其含義就是一種卓絕的作品，足爲一般作品的代表與標準。這種作品應受「傑作」之名，不僅由產生牠的國家來看是顯然的，就是由任何國家來看，也莫不如此。因爲只要有一種傑作出世，馬上就會惹起各國人士的興趣，並且只要是同行，不管他是藝術家，文學家或哲學家，都會把這個「傑作」看作一種激勵。

種種須得克服的困難當然是不免的：如言語文字之不同，習慣傳說以及見解之互異。可是在這種場合，這些困難都已減輕到了最小限度，因爲傑作之所以爲傑作，顯然就在其能爲一切人類所接近。

比多芬 (Beethoven) 是德國人，但是他的田園諧樂 (Pastoral Symphony) 不僅感動德國人，任何人都要爲他所感動。林布蘭 (Rembrandt) 是荷蘭人，但是他的解剖學課 (Lesson of Anatomy) 所要描寫的並非一位特殊的荷蘭醫生，卻是要由種種人皆懂得的面容來表現一個「人」的靈魂。在羅米娥與朱麗葉 (Romeo & Juliet) 一齣戲裏，我們所以感覺興趣，並非爲了那十五世紀時一個意大利城市中孟德鳩和卡飄勒特兩族間復仇的爭鬪那回故事，卻是兩個青年能夠打破迫使他們分離的社會慣例而戀愛起來的那個不朽的劇情。人們所以老是喜歡誦讀與欣賞俄的詩句，並非因爲他那可笑的地方色彩，卻因爲他那種令人可驚的抒情的才能，他知道如何利用這種才能去表現種種不朽的情緒。

一個作品所以能成爲傑作，非由於牠所具備的種種特殊的民族性，卻由於牠所具備的種種普遍的人類性。無論那一個種族或那一個國家都不能壟斷傑作的產生。天才的降生是任意所之的，也許在壯麗雄偉的宮廷，也許在窮鄉僻壤的田野。傑作的創造者乃是「自然」的成就之一。天才是一種不爲遺傳律所支配的性質；縱有王侯后妃之尊，也無從勉勵牠；縱有國家疆界之限，也無從範圍牠。

但如果把天才看作一種神的鼓舞而以爲牠是可以逃避我們塵世之種種的法則，那就又錯了。這樣神祕的說法是容易引人走入歧途的。滕氏 (Taine) 曾竭力證明天才的發展是需要某幾種環境和條件，某幾種制度以及傳說的，缺乏這種種條件，固然不能產生天才；即令條件俱備，還是不足使牠降生的；因爲由這種種條件培養而成的天才，必須還得把牠自己由其中解脫出來纔行。天才之所以希罕，顯然就由於這種矛盾的條件。

拉斐爾 (Raphael) 之成爲拉斐爾，須要有利奧十世 (Leo X) 時代的羅馬教皇廳和佩魯機諾 (Perugino) 的傳授等等爲其背景，但拉斐爾之所以成名，卻僅由於他的繪畫是維妙維肖的，即令某人不知有佩魯機諾其人，也不知教皇廳及利奧十世和十六世紀時代的意大利是怎樣情景，但仍必爲拉斐爾的傑作福那里那 (Fortinaria) 所感動的。天才之整個的傾向就是要解決以下這兩個問題：(一) 既要由牠自己的時代解脫出來，同時卻又要描繪這時代的色彩；(二) 規避牠的環境和過去——這卻正是鼓舞牠的東西——並使那普遍的人性和那宇宙的、永恆的道理，得藉那特殊的人性和那地方的、暫時的情景而表露出來。要先有若得爾 (Jodelle) 和麥瑞 (Maire) 纔能產生柯奈耶；先有波提拆利 (Botticelli) 和佩魯機諾以及許多別的人纔能產生拉斐爾。然則要

有多少布勒協爾 (Brueghels) 纔能產生出一位魯本茲 (Rubens) 來呢！無疑，布勒協爾的作品是很有趣的；他的法蘭德斯的地方色彩，的確較魯本茲更爲濃厚。但假使魯本茲的地位較布勒協爾更爲卓越的話，那顯然正是因爲他淡於法蘭德斯的地方色彩而濃於普遍的人性之故。一種作品，其所具的民族色彩愈薄則愈要成爲傑作。這乃是幾百年中不易的經驗。笛卡兒在德意志著方法論，隱居於荷蘭而老死於瑞典。福爾特爾爲使自己的土地得自由，便館於腓特列第二的宮裏，後更避居瑞士。羅丹的作品大部分陳列在美國的各博物院。我們如果任何一國的藝術或思想之進化史加以研究，便可明瞭幾乎任何一派的藝術或思想都會爲其後人所誹謗。各派之間的關係不是一線相承的，卻是數線重疊的，或斷而不接的。反之，在歐洲文化的形成上，我們卻很容易看出同一個時期當中，及國與國之間，有很明顯的幾個大潮流存在。這種潮流並非按種族與國家的不同而各爲一線相承之進化的，卻是爲若干國際間的反應關係所影響而同時進化的。

國家風格之變化

一種傑作所具的特徵，除了牠的「美」而外，還含蓄着或表現着一種新的人生觀。只要有一種傑作出世，四面八方便馬上會有摹倣者出現，無論那個大藝術都有他自己的一羣門徒。

這班門徒往往是有天才的人，而且有時天才頗高。他們的個性不很顯著，不能全然由他們的環境或當時的事故把自己解脫出來。他們常常爲最小阻力的原則所支配，爲了迎合當時的癖好只好承認本地的遺傳慣例。

——他們這種努力會很快地得到好結果。湯姆斯柯奈耶的凡庸的戲劇，竟較他兄弟的傑作更能長久地連演。羅斯丹 (Edmond Rostand) 的西哈諾 (Cyrano de Bergerac) 不過是摹擬露俄 摹得尚可人意，但這劇本在十年之中的重演次數較之露俄 的歐那尼 (Hernani) 在五十年之中的重演次數還要多得多。薩爾陶 (Sardou) 不過僅僅保留了浪漫主義的若干外表和若干歷史上的軼事，就竟能抓到不為最偉大的傑作所動的觀眾。

這班門徒愈是迎合某一特殊的社會，他們自然愈難接近世界各國的上流人物。反之，他們卻是愈來愈要適應他們那個特殊社會的地方色彩，而那個特殊社會也將承認他們是屬於牠自己的。到了這個階段，則各國的小潮流將與那世界傑作的大潮流分道而揚鑣了。例如，學問復興時代的那個哲學和藝術的大運動就會分離而成爲法國、意國、德國、或西班牙的學問復興運動。同樣，各國也各有一種特別的浪漫運動。

文學上和藝術上的各種出品愈是凡庸的愈富於地方色彩——由是我們就可以明瞭爲什麼許多第二流的作品會藉着現代歷史家的力量而得免於湮沒。(他們若是湮沒了，一點也不屈。) 蓋現代歷史家的頭一個任務就是要注重時代和國家的不同。真正的通家總是要使藝術和思想排除了「特殊性」以取得「普遍性」而各家學派則一意要把「普遍性」恢復成爲「國家性」。各家學派不僅阿附社會的流行癖好，同時還把社會引入新的幻想。過了一二世代之後，以前以爲新奇的，現在變爲一種習慣，一種向例了。十七世紀的時候，拉辛的細膩而微妙的藝術，他那種高雅而多少具有抽象性的作風，很難獲取宮廷和城市的欣賞。但一旦人們承認他的戲劇藝術和辭令之巧已臻盡美盡善之境，他的門徒便更進一步而把他的習癖愈加推到極端，以致法國的悲劇幾

乎成爲長篇演說，而法國的詩歌幾乎成爲謎語了。社會公衆也只知道一派而不知其他，對於一切採用紆說法（periphrasis）的作家都毫無猶豫地加以褒獎，由克累俾永（Crébillon）以至得利爾（Delisle）都被認爲法國風格的具體代表了。至於音樂、繪畫，以及雕刻，情形也無不相同。根據同一原則，在這些門藝術之中也有富於譏諷和神奇的意國風格，傾向誇大的西班牙風格，和充滿情感的德國風格……。

這確是一個可贊賞可寶貴的發明。因爲每個人都希望對於當時的書籍或戲劇下一番觀察，以爲有鑑賞力是可以自豪的，可是現代生活的急迫使得大多數的人不能有必要的閒暇去得到某種文學上或藝術上的修養。幸而還有所謂「國家風格」者可以恃爲後援，藉此就可以免於誤入邪道而成爲笑柄的危險。此項風格無論其屬於那種範圍，都是由各家學派多少根據那最好的範本而決定下來的；並由批評家把牠加以整理；牠的原則，在各種教科書上都可以看得到，牠的評判在報紙上發表過。這樣一來，人們就可以常常地進戲館，聽音樂會或參觀展覽會而不必有所疑懼了。評判一種書籍或一種藝術作品的價值，也就沒有什麼困難了。書籍和作品的應褒應貶，要看其中是否有某種習慣的標記——所以個人的意見總會和一切的鑑賞家相一致的。

所有此項習慣的標記，的確都是由各種傑作的某種副從的特徵，和某種一般的心理習慣模擬而來的，所以是易於變化的。如果一旦有一種真正有力量的創作出現，不爲本地的傳統習慣和一時的風尚所拘束，而以一般的人性和普遍性爲其目的，則此輩鑑賞家便都如墮入五里霧中而不知所從了。那些原則都被推翻了，他們的習慣也被擾亂了，這時他們便要宣布「法蘭西精神」被人污辱了。當露俄想要把詩中的紆說法拋棄，以便使韻律

更爲自由的時候，那班鑑賞家因爲看慣了得利爾的格律，便一口咬定說冪俄的詩是粗俗的，怪誕的。曾有一個時期，他的歐那尼（Hernani）幾乎被人家逐下舞台去。

這種現象是時常會發生的。最初，柯奈耶的西特（Cid）爲法蘭西學院所非難；後來，那趨時的公衆又假借柯奈耶的傳授之名義而叱責拉辛。冪俄則又被人用拉辛的名義加以譏刺。後來，人們又用盎格耳（Tubers）的名義把馬內（Manet）唾罵了；用笛卡兒的名義把柏格森非難了；白利渥茲（Berlioz）也被人踢開了，羅丹也被人斥拒了。凡足以爲法蘭西光榮的傑作，到頭來總是要被人家假借「法國風格」的名義而把牠打倒的。意大利、西班牙、英格蘭和德意志的藝術史和文學史上無不如此。

到現在，歐洲社會已被這種沒有終了的誤謬判斷鬧得烏煙瘴氣，以致於大家看到盧梭那樣幼稚的作品都不敢加以可否了。

在以前，人們都假定那寶貴的「國家天才」是可以用傑作來表現的，可是到了現在，我們既已不能藉傑作來認識牠，那末，究竟要藉什麼標記來認識牠呢？現在的學者已經放棄了替牠下定義的打算，可是碰到需要的時候，還不免要利用牠。在歐洲各國的報紙上，現在還常常發現「國家風格」和「國家天才」的字樣，不過普通都是用來批評或排斥國外的作品的。牠的任務幾乎光是消極的了。

這足見要把「國家天才」作爲基礎，以便使「國家神話」在心理上得以成立起來，那是絕對不夠的。到了這時，就不能不把教政治史時已經受人歡迎的同樣辦法，再應用到藝術史和思想史上來了。（註一）

系譜法 (The Genealogical Method)

到了十九世紀最後的廿五年中，藝術史和文學史便有了一個美學上的目的，一如哲學史曾具備一個倫理上的目的的一樣。教學的努力便全部集中在解明很少幾種最優的作品之上，以為這些乃是至美至善的，很適於陶冶本國青年的審美力與智慧。教師依據希臘的各項標準把一個優良的悲劇所應遵守的各項原則定下之後，他的注意點馬上就轉到柯奈耶的研究上去了。他們總也提不起提及馬勒 (Maire) 的索芬尼斯布 (Sophonisbe) 或克累俾永 (Credillon) 的戲劇。文學史上的先驅者和摹倣者統統被他們刪去了，至多不過間接地提到而已。至於那些無定形和初期嘗試的原始文學，他們更要把牠完全拋棄，認為那時期的語言還沒有一定的方式，所謂「原則」更加談不到了。他們以為引徵微隆 (Villon) 和壯微爾 (Joinville) 的文句，足以污損學生的審美力。甚至連那更古的英傑傳，或中世紀樂師和抒情詩人的詩句，也統統被他們丟開，因為由學者們看來，這些也都不過是野蠻藝術的遺跡罷了。

但是在不到一百年之間，浪漫派推翻了古典派，高蹈派 (Parnassians) 又推翻了浪漫派，後來高蹈派又被寫實派推翻，寫實派又被象徵派推翻；一個學派跟着一個學派被人推倒，所有的「標準」都在爭辯之中，所有的「原則」在各派衝突的美學理論當中都被人打破了。到了這時，便難辨認究竟什麼纔是所謂「優良的風格」而藝術教育就不得不另建新的基礎了。

這時候便有所謂系譜的方法來代替那美學的方法和倫理的方法。依照新派的意見，以為現時足以代表那最完美的文化典型的，乃是法蘭西精神——看場合之不同，或為德意志精神，或為不列顛精神，或為意大利精神。但這種精神並非自古如此而是漸漸演化來的（演化二字是新派最喜用的字眼）；是幾百年的長期間中，產生出來的無上稀有的出品。現在每個法國人（或德國人或英國人）都應該把他先人的系譜探溯一下。這種探溯的工作，將使他得到兩重的滿意：第一意識中知道他自已屬於一個很古的國家，這將給予他一種為他人所不能得到的尊榮；第二藉此即可推定他的文化既是由一個很長而富有天才的血統發展而來的，那末，他的地位當然要比那不幸的隣國人高出了一等，這足以自豪的。如此則每個法國人（或德國人或意國人）由他祖國的藝術史、文學史和哲學史上所能尋得的東西，屬於美學或倫理的教訓者，實不若屬於心理之尊榮者為多。

由這種立場來看，則最富興味的作品，不一定是那最美的，卻是那最古的。在法國文學所有的參考書裏，沒有不提到那第九世紀的無定體史詩聖攸雷力（*Sequences de Sainte Eulalie*）的，因為牠是最原始的法蘭西語。那可以算做法蘭西方言和德意志方言分道揚鑣的最初文獻的斯特拉斯堡誓約（*Oath of Strasbourg*）也成為文學史上的大事了。羅蘭的傳說（*Chanson de Roland*）所占的地位，其尊榮不過僅次於伊里亞特（*Iliad*）。大眾們對於這種長篇的史詩，牠那整齊劃一的頭韻，和牠那奇離古怪的文字正在歡賞若狂。

Go sent Rollant que la mort le trespent（羅蘭毅然犧牲了她的性命）

但因為牠已有現代法語的譯本，所以大學生都能毫不費力地朗誦牠了。

Ma Durandal, que tu es claire et blanche ! (我的 Durandal(寶刀)你是多麼光輝多麼雪白呀) 而且在他們的想像之中還以為老樂師們的作風頗似包尼 (M. Henri de Baniier) 的詩劇羅蘭的女兒呢。況且偶爾帶點古體的筆法也沒有什麼大不得了得。現代的中等階級，因為鑑賞眼光的幼稚都很喜歡玩古董。不管怎樣醜陋，怎樣不合用的傢具，只要是古的，便都是好的。正和這種癖性一樣，他們也時常喜歡把一些陳腐的古典牢記心中，如微隆的「去年遺雪今何在？」之類，好像不如此便不足以炫耀他們的學者氣似的。

文學史家大都喜歡效顰布輪退耳 (Brunetiere)，利用這種心理狀態來推行他們的文體進化說。他們藉口達爾文的進化律可以適用於心理方面，於是無論那一種人種智慧的發明都被他們看成動物學的類別上之一種標本了。由這個觀點來下見解，一種作品的美，和其形體的完善以及所具的人性，便都成了次要的東西。主要的問題是要把諸形體的整個序列重建起來，因為無論那一種體裁（如詠史詩，戲劇，抒情詩），由其興起至其衰落無不經過這個序列的。十本傑作，如果是花樣重複的，將不及一本第二流的或甚至可笑的作品之有趣，蓋後者在一個序列的鏈鎖中，構成一個不可缺少的環。明白主張這種觀念的第一人就是布輪退耳，在他的文學史綱要 (Manuel d'Histoire Littéraire) 中，曾把這觀念毫無隱諱地應用起來。例如，顯宜 (André Chénier) 就是文學史上難得提到的一個人，因為他的詩是死後纔知名的，尤其因為他的詩富有希臘的風格，他這種獨特的作風足以推翻那十八世紀時已經成立的文體進化說。反之，那毫無意義的婦人文會 (Ruellies) 和那不堪一讀的斯苟台里 (Mille de Saudéry) 的小說，卻佔了很重要的地位。

踵布輪退耳之後而使用這種方法的還有蘭孫 (M. Lanson) 其人，不過他的方法要聰明得多，溫和得多，優雅得多。在最近四十年中，所有的中學教員，大學教授，以及一般批評家沒有不受這種方法的陶冶的。大學生們當然是更非熟讀關於蘭孫，法給 (Fagnet) 或布輪退耳等人的參考書不可，而且比較拉辛或露俄的傑作還要讀得透澈。在法國，凡是有教育的中產階級，都會受過這種文學上和藝術上達爾文主義的薰陶。他們那種過分的好古心理，無疑是由於這種關係。

民衆們對於所有這些學者的舊習，只知把那最基本，最簡單的觀念記在心中，他們當然很容易陷入奇怪的謬見了。在他們的眼光中，那英傑傳已經成爲法國偉大天才的表現了。龍沙的 *La Franciade* 沙普郎的 *La Pucelle* 和福爾特爾的 *La Henriade* 都是模仿這本傑作的，不幸都未能成功，最後到了露俄的諸世紀故事 (*Légende des Siècles*) 纔成功爲這種故事的最圓滿的表現。

他們假定那種經由刺柏雷，馬魯 (Marot)，拉封騰，福爾特爾，庫累 (Courrier) 等人一直廢續到安那托法 蘭西 (Anatole France) 時代的滑稽諷刺的作風。是可以探溯其根源到中世紀的古詩體短篇小說的。而拉馬丁 (Lamartine) 和法國抒情詩人的先輩也可以追溯到龍沙和昂社，其間雖隔以三百餘年的古典主義，但他們是撇開不論的。魏倫 (Verlaine) 和蒲特雷 (Baudelaire) 也被他們曲解爲微隆 (Villon) 的直系後輩了！誠然，時代的不同和天才的系譜上那種廣大的裂罅，他們並沒有想法隱蔽。可是他們自有他們的解釋法，他們把這種現象比之於生物學上類型的隔世遺傳，在各族的生物中，遠祖的種種特徵，過了數世代之後，還可以突然

復現的。他們就是這樣大規模地把系譜排定，以便包括幾百年的事蹟，各學派間的差異和矛盾，他們看得極其淡薄，以為那只是同一精神上極細微的差別罷了。在那形形色色的作品上，他們只記得其間的類似點——專就傑作而論這誠然是真的，因為傑作是表現各時代之人性的——於是牠們中間一個不間斷的系統就建立起來了。

基督教的護教論者對於舊約全書只曉得記誦那些似乎可以作為救世主降生的豫言的部分。由他們看來，自從亞伯拉罕的時代以後，一切國王、審判官以及預言家的存在，其唯一的理由都不過便利基督之降生罷了。同樣，法蘭西（或德意志或意大利）精神之系統樹，其繪製法也是如此：不過要使現代的公民，想像中覺得他自己是一線相承的許多創造者之後裔，而這些創造者把種種相同的理智上和道義上的特質，一代一代地迭相傳襲下來。他（指現代的公民）由他們學會了怎樣思想並如何表現他的思想，因此他承認他自己是他們的後裔，並由此而推斷：所謂不朽的永恆的國家天才，是實有其物的。

在十九世紀當中，歐洲各大民族都已把牠們自己的思想系統建築起來。德國的尼泊龍故事，其地位猶如法國的羅蘭故事，哥德和席勒的地位猶如拉辛和聶俄，康德的地位猶如笛卡兒。英國則有他們自己的莎士比亞，密爾頓和培根。意大利有但丁和馬基雅弗利；西班牙有塞凡提（Cervantes）等等。

精神的遺產

一國裏面，所有受過教育的人，既都是在相同的作品之崇拜和模倣下培養起來的，隨着教育的普及，自然就

漸漸學得了相同的精神習慣。而各國既各有不同的範本，結果所產生的思想和表現的態度，當然也就不同了。這種微細的差別，愈來愈變爲明顯，尤其由外國人看來是如此的。於是慢慢地就發現了法蘭西的、英吉利的、德意志的「精神」。

國家天才間的不同，確是不能否認的。每一個國家現在都有牠自己的談話態度和思想態度，這種態度的不同，甚至在說笑話的時候都看得出來。一個德國人，或一個英國人，不容易瞭解法國的舊語，即令能懂，也不能自由使用。英國人的談諧爲許多法國人所不能瞭解，而德文的 *Gemüthlichkeit* 乃是一個在法文中找不出同義語的觀念。

但我們如果把這種細微的差別言之過甚那就錯了。例如一個布勒塔尼人或一個法蘭德斯人不一定就懂得布羅溫斯或加斯科尼的一種談諧態度。都德 (Alphonse Daudet) 所寫的那三種塔塔林 (Tartarin) 所以會成爲傑作，不過因爲他善於表顯南方法蘭西人所特有的某種性格而已。反之，海涅 (Heine) 和叔本華雖是德國人，但他二人賣弄法蘭西舊語的手腕，較之大部分法國人還要高明得多。而且誰又敢斷言魯賓遜漂流記、海外軒渠錄和吉訶德傳定非法國人所能了解呢？

民族間的不同是不能否定的，而且有日益明顯的趨勢。在西歐全境都以拉丁文爲傳達思想之唯一工具的時候，這種不同簡直可以說是沒有。當法蘭西語幾乎爲任何地方都懂得的時候，這種不同還是很不容易看出。可是自從十九世紀以後，各民族都有了自覺心，知道了牠們自己和別族間的對立關係，這種不同便十分清楚了。

「國家天才」這時便被人看作一種很有力量的現實，可是牠的發生只是最近的事情，幾乎還不到一百年的光景。而且並非自然發生的，乃是一種人爲的東西；曾受過學者們的培植，和國家與公立學校的教育方針的養育。牠只是一種後天學得的習慣，人們卻偏要把牠看成先天固有的性質，在思想史上一如在政治史上一樣，明明是現在的偏見，人們偏要替牠找到歷史上的根據。

由於這種誤謬的看法，任何一國都要相信：牠自己的思想態度和說話態度是和牠所有的先人一致的；這種種態度隨着國語一代一代地傳襲下來，結果就成了牠自己所專有，是不能傳達給別國人的。從這時起，所謂「國家天才」者，便好似成爲一種不可變的自然力的模樣，無論由內或由外都不能把牠加以改變。這時，人類便又遇到了另外一種「絕對」，另外一種有力的宗教信仰。

如果我們想像中假定僅只那學術界的中堅人物纔有這樣的觀念，那就錯了。事實全然相反，只要是一個受過教育而虛懷若谷的人對於所有這些觀念學的虛偽性是很明白的。他知道本國的各派文學，各派藝術，是怎樣互相反對，也知道牠們受過了外國傑作的什麼好處。無論那裏學術界的中堅人物，對於國外的事情總是極端高與留意的，而且凡是想給牠們的後人遺下一種不朽的著作，對於國外的作品，總是要加以研究討論，加以模倣的。

但若是一個受過普通教育的人，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凡是勉強受過中學教育，腹中只記得幾本精華錄之類的東西，對於學校課本上所說的國家天才之永恆性，當然會信之不移。很奇怪，教育程度愈低的階級中人，這種觀

愈強。那些對於本國的思想史一無所知的人，見到報紙上所說的：一個德國人，一個英國人，或一個意國人的思想方法，決不能和一個法國人相同，當然會相信。他既沒有讀過德國作家或意國作家的作品，對於這種主張的是非，是無法求證的。同時一定會有人告訴他說：他的國家是世界上最聰明最機警的國家，這樣一個誇獎他奉承他的主張，他怎樣會拒而不納呢？只要是人家一提到他本國的種種傑作，縱令他不熟悉這些傑作，他心中一定也要充滿了一種純直的自豪。他自己愈是缺少個人的優越點，他愈將憑信那團體的優越點。正如一個家庭，如果家中的一人受到了榮耀的頭銜或職務，全家都要覺着光榮。波爾多（Bordeaux）的關者，定會覺得他自己較人家聰明，因為他的主人是法蘭西學院的一個會員。同樣，一個沒有理性的法國人，會以 he 自己是阿那托法蘭西的同胞而自驕。如果全世界都向巴士特或居禮致敬意，那最沒有知識的人便會覺得他自己也聲價十倍了。

新聞界對於這種「團體的自尊心」（Collective amour-propre）的力量知道得很清楚，遇有機會便要阿諛牠。他們把拳師卡盆特爾的勝負說得像國家的勝負一般。如果一位外國的科學家有了什麼重要的發明，法國人便總會找到一位本國的先賢，說他早已有了這種理想，不過因為當局和輿論的忽視，致使他的理想未能實現罷了。誠然，這種辯解本身上就是可以非難的，可是普通人總是寧可懷疑本國政府的無能和自己的無知，也不肯否認自己所屬的種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於是一種理智上的愛國心便產生出來了，這種愛國心是很深固的，無論怎樣質樸，也還有其可貴的所在。

謝謝現代學者之偉大的努力，一種新的觀念已經傳遍了各國：這就是所謂「精神的遺產」任何民族都各

有自己的「精神的遺產」，這乃是牠的創作，其內容蘊有宏大的寶藏，如不朽的著作，藝術和文學的傑作，各種制度和各種哲學思想，應有盡有。這種觀念也就是一種信仰，所信仰的就是人類種族中，無論那一族都會創造一種特殊的美術，一種優越的思想；保護，培養並發展這種藝術和思想乃族人的義務。

這個遺產為一切的公民所共有。奧物克內 (Auvergne) 或布勒塔尼的農人，雖沒有瞧見過盧甫耳 (Lorraine) 的宮庭劇場和莫里哀 (Molière) 的戲劇之表演，但也會對此感覺興趣，因為這些傑作表現他本族種最強的特質，他雖然不熟識這些傑作，但如果贊許這些傑作的毀滅，那就不啻毀滅了他自己。

於是難壞了古代城邦的一個問題，這時就得到解決了。古代城邦從未敢把軍役的負擔和那戰爭的危險加在牠的貧窮的市民或奴隸的身上。凡沒有土地房產的人都一概豁免；只有業主纔要服軍役。到了後來，國君也令那些有封建的地產要得保護的貴族服軍役，而行伍完全是由職業兵組成，他們是由各地招募而來，吃軍餉而賣性命的。可是近代的國家就更進了一步。牠把一種精神的和心理的財產給了那些沒有物質財產的人，這種精神財產乃全國國民所共有，無論富者或貧者，雇主或勞工，農夫或市民都有保護這財產的共同義務。

這乃是人類社會曾經發生過的各種神祕理想中最可貴的一種形式。這是一個新的社會現象，完全是十九世紀中的創作。

心理上的帝國主義與文明落後的民族

爲使無知的羣衆更容易領悟起見，每個民族都要把自己的文明拿來和隣族的文明兩相比較，揚己而抑人，乃其當然的結果。

「自負」總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一切的國家籠罩在那幾乎僅知崇拜本國傑作的迷信之下，結局當然是堅信本國的作品較之他國要高出一等，外國的作品無論如何也是看不上的。只須把各大國的學校課本，名人演說和報紙上的論文章草閱讀一過，就可以明瞭牠們是時時在誇耀這種理智的卓越。

火焰的守護者 (Guardians of the Flame) 告訴法國的小學生說：法國在人類的進步上總是站在先鋒的地位。那自由，平等，博愛的三大原則就是由她發軔而傳播到全世界的，她會大膽地做了種種試驗，別人因此得到利益，但她自己卻常常要犧牲。謝謝她那綜合的天才：她的理想藉着這種天才表現出來，立刻叫人瞭解而傳遍各地。她乃是各國之中一個偉大的創始者。她的科學家，她的藝術家，她的才幹，她的態度，都較其餘人類高出一籌。巴黎是文明的老家，是世界之理智的都城。由此而推得的結論，明白地是：法蘭西以前在軍備上在外交上都是居於優勝的地方，故今後必仍握世界的霸權。她既爲「正義」做了不朽的戰士，她必須要團結所有在她周圍的小國，助她們抵抗強權。她乃是歐羅巴聯邦天然的領袖。

德國的國家主義者對此將作如下的答覆：日耳曼民族的純潔道德，自從凱撒和塔西佗 (Tacitus) 時代就早已名聞於世。憑她的哲學天才，她能理解複雜的事物，較之任何國都要高明。憑他們所用的科學方法的嚴格，他們會創設了許多實驗場和工業，再憑他們那種爲集團的和有紀律的努力之能力，德國人定能稱得起那「最優

良的民族」的。她的使命就是去討伐那些驕奢淫逸，腐敗墮落的拉丁民族而把一種卓絕的文明替世界建築起來。

可是不列顛的愛國主義者這時就要提出異議來了，說是英國人決不是像德國人那樣的一個籠統的理論家，也不是像法國人那樣的一個冒險的理想主義者。惟獨他纔有一種現實的知覺力和務實的，隨機應變的心性。首先倡議個人自由，首先創立議會政治與民主主義的就是他。首先發起經濟革命，藉機械之力而改變了全世界的局面的也是他；首先創造一個偉大的工業化，商業化和銀行化的帝國，連古代的羅馬帝國都不能夠想像的也是他。

最後，就輪到意大利的法西斯黨起立而發言了：他追想那未脫野蠻狀況的歐洲，在美術上政治上和哲學上都曾受過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的薰陶；歷代的羅馬教皇和皇帝支配了各國的民心和武力有數百年之久；新意大利是決定要重新負起古羅馬的使命的：*Tu regere imperio populos et ducere gentes.*（你應該作國家和民衆的領袖）

在這種國家天才的崇拜之背後，潛伏着一種唯我獨尊的夢想。個人之間既有天賦高低之不同，種族之間當然也有優劣之分，那優勝的民族當然希望把他們的文明傳佈到，推行到他們的四周。這不只是一種權利，而且也是一種義務。

他們的注意點，最初是向着那些貧弱或落後的民族。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如羣鷹攫兔一般向那回教民族，

印度民族，中華民族，黃種人和黑種人突然地撲來，他們熱心地把鐵路，電報，留聲機，酒毒，梅毒，等物送給他們，可是他們這種熱心並非毫無利害觀念在內。如果哪里發生抵抗的情事——這顯然是由於愚昧無知和世俗的偏見——他們便有種種治療的方法向這些「病人」施展出來，大之則軍事佔領，設保護國，小之則「和平的侵入」，可是這種種方法都還是爲了「病人」的利益而設的，只不過是一種迫不得已的手段，以便把人的權利，康德的倫理學，或 *Pax Britanica Pax Romana* 等等課程，懇切地教給這些野蠻人知道而已！

一切大的思想運動或宗教運動都會有過這種武力布教的局面。回教有牠的神聖戰爭；基督教有牠的十字軍東征；法國大革命是爲了列國的自由而戰。輪到十九世紀便又發明了那「爲了文化的戰爭」。他們揚言：那領袖民族，憑牠那優越的文化，對於弱小的民族有強行支配的權利，即便使用兵力也無妨。

不幸這些領袖民族，在努力於武力布教之際，互相間已有了敵對的關係。如果他們的行動僅只假借一種共同文化的名義他們之間縱然不能合作，但至多也不過僅有和平的競爭。可是他們統統都主張只有自己的國家天才纔是高出一切的；而且人人都知道（註三）：這個國家天才又是真正地各別，真正地特殊而不能傳給別人的。每個「國家天才」都是各自形成一個絕對體，兩個絕對體起了衝突，當然是勢不兩立而必亡其一的。所以人們的想像都以爲：兩個大的文明國家，如果起了戰爭，戰勝國將會把戰敗國的文化壓服下去，硬強拿自己的文化取而代之。

誠然，只有那極端的國家主義者，纔會把這種見解推到牠的邏輯的結論。但是各國，一方面不承認牠自己是

國家主義者，他方面卻總會輕於相信隣國是個國家主義者。當大戰的時候，法國的輿論總是說：如果維廉第二得到勝利，他們的子孫慢慢地勢非改說德語不可；而在智識階級的心目中，莫里哀的地位也勢將為哥德取而代之；慕尼克的藝術一旦侵入巴黎，法國的一切藝術精華，勢必全部毀滅。這種憂懼完全無稽，那是不待言的，因為任何帝國的武力也不能夠把一個擁有三千六百萬住民的高等文明國家之語言與文化滅絕了去的。試看德國想把波蘭，什列斯威和亞爾薩斯洛林的住民加以日耳曼化的政策之失敗，就是明證。但是德國在這些地方所為的可憎的強暴舉動使得法人相信德國對於法國全境也有同樣的企圖。於是人民便都起了恐怖的幻想，以為一旦戰敗則不僅身為奴隸，連精神都要奴化了，而後者較之前者還要痛苦萬倍的。所以連那頂寒苦的人民也決意要奮鬥到底，而不肯叫他的子孫忍受這種暴政的。

國際間的戰爭，既有這種心理的要素參加其中，其劇烈的程度便不減於宗教戰爭了。蓋只有這種心理要素是不能讓步的，如果僅有物質的利害關係，普通總會找到一個妥協的途徑的。但是如果兩個「絕對」遇到一起，哪個又肯讓步呢？由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爲了保衛本國的文化而死的人，不知有若干千萬，可是他們對於本國文化的認識，只不過憑着耳聞而已。

信仰一種國家理想，本身上確是一種高貴而良好的感情，但如果把他變爲獨一無二的崇拜目標，那就不管是強暴和破壞的一個有力的武器了。

這種心理上的帝國主義，好像是一件富麗無比的外衣，專替那經濟的帝國主義遮掩那卑鄙的詭計。

註一 參看第八章歷史的權利。

註二 在大戰時，法人確曾主張「德國科學」、「德國化學」等等和法國科學、法國化學根本不同……德國的東西當然是野蠻精神的表現。再進一步，則萊因河兩岸的數學定理都會不一樣了！這種驚人的理論乃竟為第一流的科學家和哲學家所提倡，而此輩學者所負於德國思想者要算最多。德國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對於法國的思想當然也是同樣地輕蔑。雙方的這種批評都是由衷的，那是無可辯駁的。國家神話的力量使得在科學的客觀性上最有訓練的頭腦都為之遲鈍不靈了。

第十一章 國家神話的宣傳

我們現在如果把這個奇怪的統一之試驗，在文學上，政治史上，言語學上，和人種誌上同時進行而獲得的結果集攏一下，就可以得到以下的各項結論：

各國間不解之仇

同一個國民集團的一切分子都把他們自己看作是同一個種族傳統下來的，因而有種種共同的生理特徵：如身材、色素、眼色、髮色等等。他們在同一種氣候；同一種飲食之下，同居了好幾百年之久，所以天賦了相同的資質。又因為操相同的語言，在種種相同的記憶，種種相同的癖好，和相同的文化之下養育起來，所以不僅種種精神習慣是相同的，就連種種道義上的特性和傾向也因為得自「國家天才」而相同。

如果把這些各別的生理上，心理上，和道義上的特徵重疊起來，就能繪成一種典型的圖像，這圖像將會酷似同一國內所有的人，而且僅只和這一國的人酷似。這就和把一個家庭各各分子的照片在一塊底版上重疊起來而得到的那個混合的肖像相似，他們的共同的諸特徵是格外明瞭了，而那些非共同的特徵反倒朦朧了。

一般人的想像上會起過這樣的作用。他們爲了自己的方便，替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以至其他國人，各立起

一個習慣的模型。這種虛構的畫像，藉圖畫和漫圖而漸漸通俗化，報紙把牠翻印出來，學者的大著把牠加以討論，結果，羣衆們誤假爲真，以爲這種虛構的圖像真能代表那活着的人。

法國人是平均的高度，頭髮是棕色，赭色或金色（這種特徵就有點不清楚了；）他大半會吃酒；他是活潑，聰敏而機警，一個個人主義者，理想主義者或唯理主義者。英國人是身材高高的，信經驗的，務實際的，喜食肉並好運動的。德國人是生得胖胖的，美麗的，富感情的，有條理的，守紀律的，性質遲鈍的，私淑康德的，喜飲啤酒的。意大利人是身材矮矮的，棕色皮膚而喜吃空心麪，端莊穩重而藝術化，機警精明而易流於不守信義。西班牙人是棕色皮膚，愛自大，喜游惰的……。

這種虛構的畫像都很有討論的餘地。可是羣衆們卻把他們統統認爲是真的，因爲羣衆無論如何也少有機會去試驗牠們的真偽。這樣一來，真的「神話人物」就被他們創製出來了，這種「神話人物」的生理特徵與心理特徵被他們描畫得極爲清楚分明。牠們出現的所在大半是在政治討論上，在報紙上，甚至在文學上。人們就利用牠們的性格或感情來解釋歷史，正好似易力安城（Hinn）周圍的希臘人與特類人（Trojan）其命運之受支配於荷馬時代諸神之爭一樣。

自然，牠們的特性或缺點是會引起人們的同情，猜疑或憎惡的。但這種感情是依照政治環境而改變的——結果，人們確認爲足以代表各國的模型也就發生了奇怪的變化了。

例如當大戰的時候，英國人是忠實，剛愎而慷慨的，並極願加入戰爭以衛護那弱小的比利時……但是大戰

以後，他竟一變而爲自私自利，不顧信義並且專門注意利益與霸權了。意大利人不久以前還是那樣勇敢而率真，這時也忽然變成了貪婪，自傲，欺詐，稱得起是馬基亞弗利（Machiavelli）的子孫。美國人在威爾遜時代還是理想主義的，公平無私的，這時也變成了一個貪慾無厭的銀行家，只管做自己的生意，對於歐洲的痛苦一點也不關心了。法國人從前也曾做過正義之戰士，不義的侵掠之犧牲者，但是會幾何時，在他的老同盟國的眼裏，他已經成爲一個可怕的帝國主義者，就要步威廉第二的後塵了。誰又敢斷定那殘忍，卑怯，不顧信義的波卡（Boche）德人的綽號）不會再把他那多情，和平，而具有詩人風度的優點恢復過來，一如羅俄著 Le Rhin 時法人所愛戴的日耳曼人呢？

所有這些咖啡店的政治哲學顯然都是荒謬無稽的。只要看一看牠的變化多端，就可以明白牠是曖昧而皮相的了。可是這些綜合的說法，創造了一個大衆皆知的模型，致使一國中所有的個人都互認爲同胞，團結一致而對抗隣國，因此他對於羣衆才有重大的影響。當圖棧，法蘭德斯和加斯科尼的農人們，在兵營中初次晤面的時候，對於他們之間的語音，風俗，習慣之不同，當然都會覺得出來；他們將各依省籍而結成團體，也許會互相揶揄呢——因爲舊日的愛鄉觀念這時尚未泯滅。但是經過不久的時間他們就會和好起來，他們操同樣的語言，受過同樣的教育，有着同樣的習慣。但如果他們遇到一個德國農人，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他們是不能夠和他交談的，即令能夠交談的話，也只能發現他們和他之間的差異。

如果各種國民模型間所具的不同的特徵，人們只把牠認爲偶然的，並且是教育的結果，因此是可以變化的，

那末，國家之間仍然能有一個持久的諒解。但是這種不同的特徵，人們都把牠歸之於種族的關係，所以一個國家的特性與缺點，在那模型上描繪出來的，也都被他們認為是固有的並先天的了。這種特性與缺點是不能改變的，一如人之不能改變他自己的體內組織，或眼睛的色素一樣。法國人有法國人的心理與精神，德國人有德國人的心理與精神，這正如來布尼茲之「單元」是不能夠互相交通的。英國人，法國人，意國人，俄國人，西班牙人都是人類這一「屬」中的一「種」，正如狗、貓、猴、馬、虎、獅都是哺乳類中的一「種」一樣。他們或許能夠比較和平地各自過各自的生活，但他們之間決不能有持久的諒解。他們的友誼是暫時的，他們的聯合總是靠不住的。

因為自然各給他們一種國家天才，致使他們互相看做外路人，因此，不免懷着敵意，所以處在那古代歐洲的各國，為血統不同的諸隣國所圍繞，——如同叢林中的一羣狼——，其間時常會有衝突的可能。因此，他們都得各自嚴加防範纔行，這種不安使得同一個集團中的個人愈加密切的團結起來。誠然，在每個國家之內，並不是沒有自相軋轢的機會；其中的分子，為了利益的衝突，政治的鬭爭，宗教的差別，和社會的嫌惡，是不斷地互相爭鬪的。但一旦外侮來臨，一切嫌隙就都化為烏有了：連那反對最烈的敵手也將簽訂那「神聖同盟」的盟約，黨派間的宿仇將一概泯滅，和外國人的友誼關係立即斷絕。血族的要求，較之個人的同情或怨恨要強硬得多。如果這時還和敵陣內的某一個人維持着什麼關係，那就是「叛逆」是「通敵」，乃是最大的犯罪，其不名譽是死有餘辜的。種族的觀念，憑藉牠那歷史上文化上……上之理智的內容，在國家之間建立起一個精神的障壁，比較那防守最嚴的國境要塞還要難於越過。

於是「國家」(national family)和「國土」(national territory)這兩個觀念就結合在一起了。對於「國家」則與以種種自然的和憲法上的權利，對於「國土」則與以明瞭的界限——國界上的哨兵對外國人說：請勿再向前進——這樣一來，大多數人類所具有的那兩種最有力量的感情即：「愛鄉土心」和「家族連帶心」就融合而為一體了。國土好比是這個家族的財產，依照着他們自己所訂立的原則而分配於同胞兄弟之間；就連那教育程度最淺的農民也瞭解這種記號表示。他自己就是一個小規模的地主；他同他的手下人耕種一塊祖遺的田地，這塊田地日後仍將傳給他的子孫。任何生人如侵入他的田產而妨害他的耕作，他必起而反抗……由這種人的眼光看來，所謂「國家」者也不過是幾百萬和此相類的產業並列在一起而已；他把國家看成他自己的田地之一個影像，只不過極度地加以放大。二者都是不可侵犯的。國家受人威脅就等於他自己受人威脅，這時他將毫無猶豫地武裝起來，趕到國界上去，幫助他的兄弟們保護這塊共同的遺產。

那古代的鄉土之神話——同一血族的人團結起來保衛他們先人的土地——便如此地重新被建造起來而極度加以放大。

由職業兵到國民皆兵

可是實際上還有這層困難：同國的人對於這塊田產不是人人都有份的。在地主之下，還有那一無所有的農工，他沒有田地，也沒有家具和農具，睡在馬廐裏，與牛馬為隣。在製造家和店主之下還有那雇工和那勞動者，他們

住在一間由別人租來的房子裏，作一天工吃一天飯，工資是那樣地不充足，以致連一張床都買不起。哪一國都有牠的無產級級；自從大工業發達以後，他們的數目便陡然地增多起來了。這些人民既然是一無所有，怎樣能夠希望他們去保衛非他們所有的財產呢？

在現代國家降生以前，這問題一向都沒有發生過。希臘的城邦之中，每個市民都會被強迫去服軍役；但那時的市民都是財主，他的生活專靠他的奴隸在田地中或工場中替他工作而維持。在保衛他先人的神聖田地上，他有着直接的利益，因為那確是他的所有物。奴隸自由民和外僑都沒有從軍的義務。連那窮困落魄而無力購備軍裝的市民都被豁免了。那時的人，沒有一個能夠夢想得到軍役的負擔和戰爭的危險怎樣會加在那一無所有（因此沒有可保護的東西）的人們的身上。

羅馬的兵力雖然超邁前代，但所採的辦法依然和希臘相似。一直到布匿戰爭結束的時候為止，她的軍隊完全是由財主市民組織起來的。後來經過了半世紀不斷的戰役，這些財主市民均已傾家蕩產，那些將軍們便採了職業兵的辦法，在這些零落的市民當中招募兵士而給以優渥的兵餉。如凱撒、龐培、革拉蘇、屋大維等人好像都是戰爭的包辦人，由銀行借得款項，以發給軍餉，然後再把被征服各地得來的戰利品償還此項借款。

後來遍地中海一帶已無可供掠奪的邦土，那市民便只好甘心接受那種『賞金』（donatum）——這就是慶祝登極的一種禮物，無論哪位新皇帝在卽位時都得把這種『賞金』分給他的軍隊好得到他們的承認。可是到了最後這種制度太覺煩重；在第三世紀時，正式軍隊已經廢除，守邊的任务便付托給那野蠻的部落，因為報

酬較廉的緣故。

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法蘭克和喀羅林朝的歷代國王所調遣的軍隊僅只是他們的封建諸侯；國王把采邑分配給他們，他們當然是要保衛自己的財產的。可是這些封建諸侯和他們的附庸——如克勒西，波亞，亞登，阿金庫爾等地——雖然勇敢卻是不守紀律的，後來就代以有秩序的軍隊，這種軍隊由國王支餉，由貴族指揮，是在各國任意地招募了來的。

這種制度一直繼續維持到法國革命的時候。直到那時為止，不領受兵餉或一點需要保衛的財產也沒有的人是向無從征的義務的。而且由那時的眼光看來，使這種人當兵是極不妥當的。

在歷史上第一次大膽地下令在羣衆中徵募所有的壯夫的要算是國民會議（Convention），其徵募的理由是：祖國方在危難之中。可是那時正是國民會議剛剛解放農奴之後，而把『財產權』給予了一切市民的時候。至於那些義勇軍，他們依然是一無所有，則應許由國民財產中撥出十萬萬的款項給他們做爲賞賜，這種國民財產是由亡命王黨的手中沒收了來的。自那時以後，各國的憲法就漸漸地都採納了強迫軍役的制度——雖然實際上還有種種制限。徵募是有限制的；此外還有拈鬮的辦法，如拈到不祥的鬮，准其花錢雇他人代替。所有的壯夫都要服軍役的制度，是十九世紀之末才有的。

可是那時，各國的強迫初等教育已經發生作用。凡一切的未來公民都要受一種地理學的課程，這種課程講述那神聖的國土及其界限是怎樣為自然及歷史所決定，並且述及他們的先人在開闢、守衛並拓展這塊土地上有過如何的努力。這種課程又證明了他們是由若干代的祖先一線相傳下來的，所以大家的血統相同，語言相同，嗜好相同，教育也相同。對於那些沒有得到物質遺產的人，就給他這一種精神遺產，而後者較之前者所以尤為可貴，就因為牠是純粹心靈上的東西，恰好和每個公民的意識是同一的。

國家雖未把土地給與無產階級，但至少還替牠預備下了種種教育的方法並使牠能有機會憑牠自己的力量在社會等級上向上升進。既然如此，不管牠有沒有什麼財產，牠也應該納稅，而且牠對於城市的管理既然有投票之權，牠當然也要負守衛之責。於是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之間就成立了一種連帶的關係。牠雖然沒有財產，但是在牠的本分上，無論如何，也應該和別人合作以便維護那由先人遺傳下來，較之任何國家都要優良的主義，理想與文化。這乃是一種神祕的情緒，足以促使個人為種種高尚的目的而忍受無上的犧牲；這種情緒對於羣衆的感動力較之純粹物質利益上的種種考慮還要強大。大凡一種理想都是沒有商量和妥協的可能。

這種理想甚至連令人完全瞭解的必要都沒有。當宗教改革派中那些淵博的神學家和巴黎神學院那些有同等學問的博士們討論「神靈感應」(Sanctifying grace)的問題時，他們之間是否總是互相瞭解，頗有令人懷疑的可能。但自從新舊兩派教會的信徒都把永遠得救的觀念和各種聖禮聯結在一起，而這些聖禮的效力又要靠着這些模稜兩可的信條，於是他們為了求免於來生無窮的懲罰，便毫不躊躇地要在今生忍受那最難堪

的凌辱了。人們對於自由、正義、公平和爲國盡忠的崇拜也有同樣的效果。我們只須回想大戰時這種神祕說在各國曾有如何的影響就可以明白了。(註二)

當局的演說，新聞紙的評論和民衆宣傳的文藝作品都是時常訴諸「國家的情感」，以便盡力發揮牠們的論題之神祕性——他們這種辦法是很對的。由羣衆的眼光看來，所謂「國家」者並非代表某種物質的利益，也不是一個很明確的觀念；「國家」原來是一種情感；既然是情感當然是混亂而不分明的，但也唯其如此，牠纔有那種自然的力量強使人家忍受那最大的犧牲。

根本上說，國家的神話對於羣衆所以會有那樣大的力量就因爲牠所根據的張本是和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發生關係的。拿現在歐洲的任何一個農村來看：所有的居民，互相之間多少總有點關係。他們的語言相同，風俗習慣相同；他們在一起工作，有時並且互相幫忙。他們之間，儘管有貧富之分，友敵之別，但一旦全村遭受大難（如火災、水災、暗殺、搶劫等等）他們一定會團結一致以救危急的。

如果把這種常見的簡單的影像擴大到二千萬乃至五千萬居民的地方，則你所有的便是個國家了：國家不啻是農村一個絕對的投影。國家觀念在民衆的想像上所以會有那樣現實的情態，原因就在於此。

無疑，這個擴大的程序太大了，不是容易成功的。須得靠着各大學的學者，在人種誌上，歷史上和言語學上，經過若干世代耐心的推敲研討，並且在學校中，在報紙上不斷地宣傳。可是結局，牠竟完全成功了，因爲牠使得數百萬愛好和平的人，甘心忍受那軍役的重負和那可怕的戰事危險。

在社會學的範圍內，這可算是十九世紀中驚人的偉業之一，足與工業技術方面同時發生的偉大變化兩相媲美。然則這種結果是怎樣得到的呢？這是別處已經談過的：其方法不過是把現在的種種事實與情感，硬給牠接排在很遠很遠的過去時代，而把因果加以顛倒罷了。

實在的情形是這樣：因農民的解放而得降生的『國家』，主要地爲了軍事上的理由，而先把語言統一起來，然後再把文化統一起來，於是在人民的腦筋中留下了同種同族的印像，但教育家的眼光，完全和事實相反，因此他們所要傳播的說法也恰好和此相反。他們極力主張種族乃最初的因素；這最初的因素，藉國語的力量而把他們自己的風俗、習慣、嗜好和天賦加在他們一切子孫的身上，使得他們互認兄弟的關係而團結成一個國家。在這種看法之下，國家當然不是最近才長成的，也不是由於某種需要而產生，並隨着這種需要而變化而消滅的。牠乃是一個實體，牠的原始可以溯至那渺茫而不可知的開天闢地時代，牠的神氣確像那大自然的諸項永恆的力量之一。牠是一個絕對體。

歐洲民族國家之興起

各國在苦心經營那國家神話的時候也會用到同樣的方法。

在十九世紀之中，國家神話漸漸地傳布到了歐洲和美洲大陸一切各民族。自從二十世紀開始以來，牠再向亞洲的各民族伸展勢力。到了現在，以農業爲其文化特徵的各國，實際上都已在牠的勢力之下，那就是說，除了游

牧民族和黑人之外，全世界都已受牠的支配了。像這樣地能夠巧合於各民族的羣衆心理的一種神話，牠本身定有一種強有力的宣傳力量，那是毫無可疑的。

但是我們如果以爲牠之得勢，僅僅靠着牠的宣傳力量，那就錯了。羣衆所以會陷於牠的誘惑，是因爲政府爲了軍事上的原因曾經利用過牠。國家神話最初的發生地是法國，其目的在於保護這塊新得解放的土地，達到這目的的方法是把必要的威權給與革命政府，讓牠能夠在羣衆中強制徵兵，能夠驅使志願兵去守邊，能夠實現羣衆襲擊的軍事策略，能夠撲滅國王的雇傭軍隊而樹立那土地自由與個人自由的新制度——如果軍隊能夠支持長久的話。

歐洲各國的君主，爲抵抗這種可怕的襲擊，除抄襲牠們敵人所用的各種手段而外，別無辦法。現在他們也只好在他們的子民中徵募兵士而組織國軍了，爲了這個目的，他們便不得不把國家神話在他們本國培植起來。

熱那 (Jena) 戰役之後，拿破侖曾禁止普魯士的軍隊超過七萬二千人。士泰因 (Baron Stein) 怎樣瞞哄這命令乃人所熟知的一個故事，事情是這樣的：同時武裝起來的人永沒有超過七萬二千人，可是新兵是時常更換的，結果等到拿破侖的大軍由俄國退卻時，士泰因竟能急速發出三十萬有訓練的軍隊去從事追襲。這種募兵制度和普魯士的慣例極端相反，如果不是斐希特 (Fichte) 在一八〇七和一八〇八年連續發表他那告日耳曼國家的有名的演說，這種制度定會行不通的。他的演說的要旨是這樣的：當前的問題並非保持幾位帝王的王位，而是所有操日耳曼語的人同是一個種族的子孫；他們的祖先把種種共同的性情，共同的志願和他們本族

所特有的一種天才遺傳給他們，所以他們必須共禦外侮，以便保護他們生來而具有之權利。爲了這個目的，他們必須在一個政治團體，一個軍隊，和一個國家之下團結起來。

同盟的君主爲充實新神話之內容，便應許人民以種種權利和自由。他們號令人民武裝起來，口號是：「百姓們，自由吧！我們都是自由人。」這種新的心理態度是由法國革命得來的，足以叫人民發生愛國心，中歐的各君主國，唯有靠著這種愛國心，才能招募那必要的軍隊以抗拿破侖的霸權，到了一八一三年，局勢就完全翻轉了。拿破侖靠著他那已經服務二十年的軍隊勉強支持着，他的軍隊已經染上了那職業兵的種種劣點。至於國外的各分遣隊，其紀律之壞，較之一七九六年時，更加壞到極點，所以不僅不足增強軍威，反足擾亂軍心。反之，和我們這位皇帝對陣的各國軍隊則爲一種強有力的理想所鼓舞而準備着決一死戰——此乃軍事勝利的先決條件。德國、英國、俄國和奧國的軍隊前仆後繼地一擁而上，結果，拿破侖就只好屈服了；他靠國家神話而得勢，不料卻又被相同的神話給推倒了。

誠然，法國的禍患一經消滅，這班同盟君主便把他們以前的誓約完全忘掉了。在維也那會議席上，他們的唯一念頭只是怎樣照往昔君主國的慣例把歐洲的土地與子民加以分割。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神聖同盟把國家神話加以利用而達到目的之後，現在便決意把牠毀滅了。可是後來，塔力藍 (Talleyrand) 再把這神聖的火焰燃燒起來，他打出了「國家主義」(principle of nationality) 的旗號，把所有畏懼大國吞併的小國都團結在這個旗幟之下——於是這新神話就公開地進入外交的範圍了。

到了和平恢復之後，被解伍的歐洲老百姓仍然懷想着那未曾實現的誓約。他們看到法國雖經滑鐵盧之戰，卻仍舊保持着大革命時所獲勝利品之精華——即土地和個人的解放。在萊茵流域，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達爾馬提亞，凡實行過拿破侖法典的地方，其中等階級和農民無不渴望恢復法國的舊制，但現在卻不是因為受了外國人的壓迫，而不得不如此了。因為法國一旦被人認為恐怖的對象，便不再把她尊為模範了。

有利於國家觀念的宣傳機關，到處都組織起來了，而且都取同一的方針。語言成為這種神話的根據與基礎。凡操同樣語言的人便被人認為屬於同一種族——附帶地說，這是一種很不合乎科學的見解——並應成為同一國家的一部分。在意國和德國，方言的差別很微小，操同一語言的各單元團結得很密切，這個新說法尚能獲得一般的承認。但如像哈布斯堡王國的情形就大不同了，因為那裏的方言分歧得很，致使該國皇帝不得不選拉丁語（註三）為官話，以便治理匈牙利、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子民。國語馬上就成為積極宣傳的標的；一八三三年時，公認的官話是馬札兒語，一八四三年又改為塞爾維亞語了。

可是這些種慣用語，有的竟退化而成為土語，便須得語言學家為牠訂立語彙和句法的規則，並把牠統一起來。為使各民族能有共同的紀念事件，學者們便盡力搜集古代的神話、歌曲和故事。如撒克人沙夫力克（Schafli）會發表他的斯拉夫的古蹟。其他學者（如波拉克基 Polacki 就是其中之一）便替撒克人撰述其未降服哈布斯堡以前的歷史——這確是使人嚮往已忘的獨立之一種無上的妙法。匈牙利人塞承（Szechenyi）為了同樣的目的而創立布達佩斯大學院。所有中歐的各大學都成為國家神話的試驗室和最有希望的宣傳中

心了。

一方面，古文學正在復興，同時新文學也在創作之中。詩人科拉（Kollar）用撒克語寫了他那本光榮的女兒（*Daughter of Glory*）其中表揚斯拉夫民族的同胞之愛如何與條頓民族相反。不久噶蘇士（Kosauh）在布達佩斯創辦 Pesti Hirlap 報，這是用匈牙利語撰述的最初的報紙，直到現在還存在。塞爾維亞人多喜追憶一三八九年科索伏（Kosovo）的國難紀念，那時塞爾維亞人終於降順土耳其人了。保加利亞人則喜回想昔時俄皇道陳（Douchan）的威勢由黑海伸張至亞得里亞海的故事。富足而素有修養的希臘人散居於地中海沿岸，在他們本鄉創辦了許多學校；他們追想着古希臘時代，見到現在尙未能脫離土耳其的羈絆，便時常想着喚醒同胞以便恢復他們的自由。

『民族解放』這個流行的觀念，其意義普通不外包含：（一）各項封建特權的取消，（二）對於租稅的議決權和（三）土地的完全所有權。這樣一來，私利和理想既可歸於一致，同時，所有這些理想，不管牠是如何新鮮的，藉往事的追憶，便都能得到歷史上的正當根據。例如瑪志尼（*Mazzini*）的青年意大利運動就被稱爲復興運動（*Risorgimento*）；又如德國的大學界現在又把神聖羅馬帝國的紅色，黑色和金色看作時新的衣色了。

一八一三年至一八四八年之間，遍中歐各地便都如此把國家神話制定起來，後來，這種神話漸漸地成爲布爾喬亞階級和農民的中心理想。君主們雖想壓制這種運動，但他們自己正是這種運動的創始者，所以他們的企圖終成泡影。於是意大利就有燒炭黨（*Carbonari*）希臘就有帕利卡爾黨（*Palikares*）和獨立黨（*Klephes*）

塞爾維亞就有烏斯考格黨 (Uskoks)，到處都有了這種半盜匪，半叛黨的團體，凡願爲民族獨立而戰者，在百姓的眼光中都是英雄。

經過三十五年的醞釀，這些民族運動在一八四八年的閃爍之光中突然爆發起來。法國二月革命的消息一經傳出，維也那，柏林，米蘭，和威尼斯便都起了暴動與叛亂。普魯士的國王被時勢所迫而發誓爲日耳曼的統一效忠；法蘭克福曾召集過一次國民議會。梅特涅 (Metenich) 被逐出維也納。匈牙利人取消了封建制度而宣布自主；斯拉夫的議會在布拉格召集；哥羅西亞振興了，倫巴底人和威尼西亞人驅逐了奧地利亞的軍隊。但是勝利只是暫時的，在兩年之中，一切這些運動又都煙消雲散了。不過牠們確足證明國家神話的力量。

先驅者，殉道者和英雄們的時代既成過去之後，照常就該政治家的時代來臨了。拿破侖第三把「國家主義」當做他的外交政策之柱石。他發現如果要使奧地利亞脫離意大利而成爲法蘭西的保護領土，國家主義乃是一種很便利的工具。可是，喀富爾 (Cavour) 最初雖不得不求助於他，後來卻竟能脫離他的羈絆而促成意大利的統一。這時，俾斯麥也曾利用法國的串謀，而把奧地利亞逐出德帝國 (Reich) 的範圍之外，但後來他能竟促成日耳曼的統一以與法蘭西對抗。再往南一點，則有匈牙利人建設起來的獨立國家，牠和奧地利亞站在平等的地位而聯合起來（一八六七年。）

各國的君主既如此地合作起來，國家神話無疑地會失掉一部分自由的傾向。可是另一方面，牠卻得到行政當局和正式軍隊的幫助，這是一八四八年時所沒有的。到了一八七一年，遍中歐各地的民族政府就都成立起來

了。

「被壓迫同胞」之解放

在這個爭鬪之中，我們所應考慮的，不僅是各民族的願望，還有諸君主的野心。結果，這些新民族國家的疆界，和種族或語言的界限並非互相吻合而不爽絲毫的。

普魯士把屬於日耳曼族的奧地利亞攝諸統一的帝國之外。奧地利亞和匈牙利把語言不同的各民族置在他們共同的支配之下：如操斯拉夫語的撒克人，小俄羅斯人和哥羅西亞人；操拉丁語的羅馬尼亞人（居於德蘭斯斐尼亞）和意大利人（居於的里雅斯德）。至於其他操塞爾維亞語，保加利亞語和希臘語者則仍在奧托曼帝國的範圍內。

那些被人忘記掉的同胞，見到他們的鄰人受他們同族的治理而得到解放，很覺羨慕，便開始夢想着自主。同時，已得解放者，也覺得那班「被壓迫的同胞」是應該重新加入這個共同的國族的。於是各國政府開始作那收回領土的運動，那些佔有富庶的地方或交通中心的同胞們是無論如何也得容納回來的。例如意大利要求收回的地方有：阿的治河和特稜鐵諾河的上流流域，因為這地方很關係她的安全；還有的里雅斯德港，這是通中歐一個衝要的門戶；還有達爾馬提亞和阜姆，這是通巴爾幹的捷徑。每個民族都有牠要收回的地方：法國要收回的是亞爾薩斯——洛林，丹麥要收回的是什列斯威的居民。如果握有此項土地的大國提出條約上的權利，他們就藉

口一種新的主義以與之對抗。這就是民族的自決權 (the people's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這是完全依據民治主義的理想：各地的子民既都已變成自由的公民，那末，他們對於自己願意受其治理的國家當然可以自由選擇。唯一的條件不過是要讓一切公民都有自由表決之權，辦法就是所謂「全民投票」的制度。以國家主義為其基本政策的拿破侖很得這種制度的助力。喀富爾反抗奧地利亞人也曾用這種辦法。連續舉行好多次全民投票，便把摩德拿、帕馬和羅馬納，多斯加納和撒地尼亞統合併到薩渥 (Savoy) 王國之內，又把薩渥和尼斯合併到法蘭西之中來了。

如果各國政府能和人民一致的話，這確是一種很方便的制度。不幸他們是很少一致的。新日耳曼帝國不許亞爾薩斯和洛林的人民，什列斯威的丹麥人和波森的波蘭人有全民投票之權。凡爾賽盟約雖曾鄭重宣布把這個制度尊為原則，但實際上小俄羅斯人和日耳曼人卻被併入捷克斯拉夫，而斯拉夫人則被併入羅馬尼亞，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即便是實行這個制度的地方，其選民也要受壓制於強國的暴力，例如西利西亞便是證明。

在這種環境之下，各大國定會把國家神話用為開拓國土的一種工具——一個很可怕的工具。到了這時，便似乎所有的斯拉夫人都應該在俄皇的保護以下團結起來，所有的日耳曼人也都應該團結於帝國之下，所有的希臘人也都應該團結於雅典政府之下，好像只有如此纔合理。於是在十九世紀的後半，便有所謂汎斯拉夫主義，汎日耳曼主義，汎希臘主義產生出來。但是一切利害關係的團體，對於這種主義未必都具有同等的熱心。在奧地利亞國內，信奉舊教的日耳曼人全體都不願受那信奉新教的普魯士皇之威權的支配。加里西亞人回想波蘭

的命運他寧可歸依那威權較弱的哈布斯堡皇室也不願受俄皇的羈絆。還有許多希臘人在奧托曼帝國之下，已經得到富貴尊榮，就不大願意遵從雅典政治家的指揮了。

但無論如何，民族自主的觀念，對於在異族政府下過生活的老百姓一定會有很大的吸引力——而渴望開拓疆土的各大國對此也頗注意。要想分裂鄰國，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在牠領土內助長民族運動——試想征服他國，除了「爲被壓迫的同胞謀解放」而外，還有什麼更好的藉口嗎？

特別是俄皇曾把國家神話弄成一個奇怪的法寶來替奧托曼帝國鼓動內亂。爲使他的勢力得達到君士坦丁堡並自由出入於地中海計，最好的手段莫過於煽動巴爾幹的希臘人與斯拉夫人而激起他們的民族叛亂。

曾有一個時期，俄皇的客卿希臘人易普息蘭替，爲替希臘的革命運動招募義勇兵，籌備款項和軍械而組織各種秘密團體。在塞爾維亞則有過喀拉喬治 (Karageorge) 和邁羅奧布梭諾維赤 (Milooh Obrenovitch) 兩次叛變，都曾受聖彼得堡外交策略的幫助與接濟。而一八七七年時，俄國軍隊確曾助長羅馬尼亞人與保加利亞人的解放運動。斯拉窩斐爾 (Slavophili) 在波斯尼亞建築教堂和學校曾受俄皇的補助。同時，維也那內閣也正想要在愛琴海找一個出口，便利用同樣的民族運動來抵制俄國的勢力而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下起手來。另一方面，英法兩國想把大陸列強在地中海的勢力，一舉廓清，便贊助土耳其人向西壓迫，一直等到土耳其人和維廉第二携手纔失掉英法兩國的同情。

在一切這些陰謀奸計的根底上來看，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宣傳實在只是列強所玩弄的一種外交的工具。其

間最關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馬其頓問題；在那五十年之中，這問題不知會使文人費了多少筆墨，武人流了多少血。

事情是這樣的：馬其頓被土耳其人佔領已有四百年之久。土耳其人對於當地人民的宗教、語言和慣例毫不加以干涉，只不過課以重稅並禁止他們從事各種政治運動罷了。所有居於巴爾幹的平原和谿谷上的農夫們，在這個共同的統制之下，過着和平的日子，各族人民便互相通起婚姻來。在鄉村裏，種族各異的家庭比鄰而居，往往只有一個教堂，到了星期日早晨舉行彌撒的時候，常常是九點鐘照着希臘的儀式，十點鐘照着保加利亞的儀式。有時爲求簡單方便起見，便只舉行一種儀式，不過牧師背誦聖經用的是希臘語，而信徒們的應答卻用的是塞爾維亞語。這些無知無識的農民幾乎已經忘了他們自己的來歷，在種族上，語言上，和宗教上一點反目的痕跡也沒有。

可是等到北方的塞爾維亞王國和保加利亞王國，南方的希臘王國一旦成立之後，便都期望着要把土耳其的勢力早早驅逐，於是各各都懷着吞併馬其頓之心。列強計劃建築的大鐵路都要由這塊地方經過，奧地利亞的侵入策略是由塞刺也窩（Berajevo）而達薩羅尼加，其他強國則注意由多腦河通亞得里亞海的路線。

一種奇怪的傳教師，全身武裝起來，遍歷馬其頓的鄉村去傳道。其中一位傳教師會對農民們說道：『你們都是奉正教的，是不是？那末，好極了，你們乃是希臘國王的子民。』另外一位插嘴道：『請原諒！你們是屬於分離派的；這派的宗教領袖在索斐亞，所以你們乃是保加利亞國王斐迪南（Ferdinand）的子民。』第三位說道：『全不對。』

你們都說塞爾維亞語；你們的國王在柏爾格雷德臨政。『這些不幸的農民們，無論聽從那位傳教師的說話，都會被其他兩位目爲背教者；他們不是被鎗決就是被絞刑，他們的妻子兒女被人陵虐了，房屋被人焚毀了。』

巴爾幹別動隊員（Comitajia）在馬其頓傳布民族主義歷二十年之久，情形正是如此。同時，少年土耳其黨人爲防止那燃眉的瓜分之禍，就發明了一種奧托曼民族主義把斯拉夫人，希臘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兼容幷包，不管牠願與不願。結果就產生了巴爾幹戰爭（一九一二——一四）——這是那世界大戰的開幕劇。

但理想這種力量是不容易駕御的，牠總有牠洶氣的辦法，各大帝國雖然很會利用民族理想來抵抗牠們的敵人，但是到了一天，因爲一種反動的緣故，就要被民族理想給暗地傾覆了。那龐大的露西亞帝國，所包含的民族非常複雜，所以在二十世紀的初年，她就遭遇了這種禍事：芬蘭人要求自主，波蘭人渴望恢復往時的獨立，高加索的回教徒們又傾向於少年土耳其黨。

哈布斯堡王國的反動甚至更要激烈些。儘管有種種奇怪的束縛，但因教育與報紙的普及，撒克人，斯羅發克人和小俄羅斯人都漸漸地發生了民族意識，便聯合起來和奧地利的日耳曼人相對抗——後者感覺不安便轉而傾向於柏林了。同時，在馬札兒人統制下的哥羅西亞人和羅馬尼亞人也漸漸不穩起來。到了一九一四年，民族主義的騷動達於極巔，連到哈布斯堡王國的壽命也發生危險了。欲求安全，只有以下兩條道路：或者是使斯拉夫人與日耳曼人，匈牙利人立於平等的地位，而把這個二元的王國，改造成三位一體的王國，以便使這三種人的命運不得不與帝國相終始；或者是一任戰神的蹂躪，不惜人民之流血，而把帝國的斯拉夫人與俄國和巴爾幹的

斯拉夫人，分離開來。法蘭西斯大公斐迪南贊成前一個方針；但是奧匈的貴族對此當然要極力反對。一九一四年六月大公被刺於塞刺也窩。激烈派便得勢了。所以在民族主義的神話掩護之下而激成的中歐與東歐的騷動就是世界大戰的決定原因之一。

國家神話變成一種世界的宗教

照上文所述，可以知道：當十九世紀之中國家神話就漸漸地深入歐洲各國的人心了。其擴展之速由於四個主要因素：

由羣衆方面說：

牠具有誘惑力：民族自由，民族獨立的呼聲很能打動人們的心弦，因為他們屈服於異族君權之下已有數百年之久了。

交通工具的發達把偏狹的地方生活之體制給打破了。

由政府方面說：

軍事上的需要：一旦有一個國家實行徵兵制，使全國民衆均有當兵之義務，其他各國爲了保持勢力均衡，便也只得把雇傭兵制改爲國民皆兵制。

最後，帝國主義外交的野心知道怎樣把這個新神話宣傳到鄰近各國，以便達到傾覆他國的目的而實現牠

擴張領土的夢想。

這樣，在由上和由下的雙方壓力夾攻之中，國家神話與國家行政便漸漸銜合而為一體了。由於這種銜合的作用，各種制度便得到無上的威權，而各國政府也就能夠發展一種空前的武力了。小小的歐羅巴半島所以能夠昇進到遠邁世界各國的地位，也就由於這些因素。

當地中海與波羅地海之間，苦心經營這一套神祕的把戲的時候，也正是歐羅巴人向美洲大陸殖民，並用同樣辦法組成新國的時期。

到了十八世紀之末，北部大西洋的英國各殖民地，為欲脫離祖國的羈絆而合組一聯邦國。在十九世紀之中，他們所容納的移民，幾乎各族皆備，不過大家統統要說英語。僅只經歷幾世代，他們便已有了共同的文化與習慣了。誠然，當北部和南部幾乎成了仇敵之國的時候，那時確已到了他們的生死關頭，但是應該謝謝林肯的智謀，南北戰爭反倒使得牠們的團結愈加鞏固了。自那時以後，民族的情操，隨着聯邦組織的漸趨柔韌而日加濃厚。直至一九一七年，牠的力量竟能促使美國政府為了一種和他們沒有什麼直接利害關係的主張而派遣百萬軍隊渡海參戰。

在拿破侖稱霸全歐的時候，西班牙國王曾經把他的殖民地武裝起來，但後來這些殖民地卻因受了法國政治思想的影響而革起命來，並且依樣葫蘆地也把牠們自己組織起來。雖然種族複雜，但牠們竟能組成頗強的國家藉此抵抗好多次戰爭的破壞影響。

現在輪到亞洲的懦弱民族來降服於這個新神話的魔力之下了。亞洲最近興起的有一個土耳其民族，在戰場上牠雖屢遭慘敗，但終能保持牠自己的勢力以與歐洲對抗。此外還有一個埃及民族也能戰勝了不列顛的阻力。波斯民族也覺醒了；甚至連那盛行階級制度的印度，也在甘地的指導下，一意向着自主與統一之路摸索前進了。

最後，那黃色種族也放棄了他們祖宗所持的態度而採納了新的信條。日本在一世代之中，一躍而變為現代國家，學校，報紙，代議政治，強迫軍役，以及一切無不現代化。那愛好和平的日本農民往時只知蹲伏於武士的寶劍之下，現在卻也養成濃厚的民族情操。一舉而擊敗那數不勝數的俄國軍隊（一九〇四——五（註四））甚至連那給異族征服者（但征服者卒被她同化）做俎上肉達三百年之久的中國，為鄰國之勝利所震驚，也覺醒起來了。當拳匪倡亂的時候，就是她要想組織軍隊並建立現代國家的起頭。假如不是英美日等野心國家，為了利益的衝突，資助她的軍閥，惹起內戰，幾乎把那大帝國弄成了巴爾幹，她或許已經成功。也是我們意料中之事。

到了今日，全世界一切民族，除了那些游牧民族和黑人之外，都已降服於國家神話的魔力之下；而國家神話成立的程序又是到處一樣的。最初是先把語言標準化，藉此使大家對於歷史都有相同的記憶，對於文學都有相同的鑑賞。於是每個國家漸漸地都造成了牠自己的「國家天才」，這種「國家天才」都是固有的，而且不能傳給他族的。然後再使同一種族的人，對於所居的土地同等地享有種種不為時效所限的歷史權利和自然權利，同時他們對於所居的土地當然也都有保衛的義務。

歷史指示給我們：在每個文化階段上，種種社會、宗教或政治的信條都是如此這般地傳布到世界各大洲，任何想像得到的阻力也不能夠阻止牠們的傳布。在西方各民族中，最初是古代城邦的愛國精神，繼之以帝國的與基督教的種種神話，再次則有封建的與忠君的種種神話。而最近的國家神話，其包容之豐富更要超過以前的任何神話，因為其中同時包含兩個因素：一是物質的因素亦即土地所有權，一是情感的因素亦即家庭的連帶關係。簡言之就是「土地」和「血統」。

國家神話包容之豐富既超過其他神話，所以牠的放射能力也是牠們所莫能及的。在一世紀之中，牠已經成爲全人類普遍信仰的一種宗教了。

註一 羅馬曾經做過一次這樣的試驗。奴隸們得到解放的允許，便拚命去打仗。但戰事才一完結，他們就被派到一個荒涼的地方，繼去武器，統統加以屠殺了，爲的是遮掩這一個危險的先例。

註二 誠然，軍事審判應是足以增強牠的力量，正如異端裁判所足以增強信仰的力量一般。但如果沒有民族的信仰，軍事審判應又如何能存在呢？

註三 讀者或許記得匈牙利和馬利亞德利撒的締盟誓約是：Moriatur pro rege nostro Maria Theresia。一九一四年時，一個主要戰艦就叫「Viribus Unitis」。

註四 現代日本的全部組織不過是歐洲諸制度的一個巧妙的摹寫。但事情却是如此安排的，致令日本人民完全不知道這個事實。一些沒有受過教育的日本人曾經問過歐洲人：歐洲是否也有電話和鐵道。由一個平常的日本人的眼光看來，他的國家所以會發生那樣的變化，完全由於皇帝的天才，因為皇帝乃是太陽的後裔。新的制度雖和過去的傳統那樣不同，但究其實不過是古代制度的復現而已。新紀元叫做「明治」就是古制復興的意思。

第十二章 多重主權

自從十九世紀的最後五十年以來，在歐洲比鄰而居的國家不下二十餘國。牠們想像中的互相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

每個國家對於牠自己的看法都是：把自己看作一個自治體，天賦牠一種語言，一個種族和一種天才，三者都是牠自己所獨具的；並且握有一塊土地，他自己就是地主，這塊土地足夠供給牠一切重要的需要。牠認為只要在牠自己的地界以內，當然不准他人參預牠的事情。這種看法就是把地主對於他自己的財產所有的觀念擴大而大的；二者間的重大差別不過是：就私人而言，所謂「自治」者，並不排斥以下幾種觀念：（一）和比鄰的所有主間之經常關係；（二）大家所公認而共遵的法律；（三）大家所共戴施行此法律的威權。

就國家而言，情形就不同了。國家固也承認各國公民間確有種種繼續不絕的關係，和支配此項關係的種種司法和商業上的習慣；甚至連同盟的條約也可以締結的。但牠總認為沒有什麼在上的威權足以干涉此項契約的履行。如果任何一國的政府認為便利的話，牠就儘可撕破此項契約。即使在衝突的時候還不無仲裁的可能，但如果是存亡攸關或體面攸關的場合，當然就不能適用仲裁的辦法了——此種場合只可一任各國自己的裁判。總之，各國僅只對於自己負有種種義務；所謂「主權」的意義大要不出乎以上所說。

這樣一個觀念，其危險性是顯然的：牠足以妨礙各國間經常社會關係之樹立，而且永爲國際和平之暗礁。爲解釋牠的發生經過起見，我們還須回過頭來看一看歷史。

羅馬的單一主權

希臘城邦，憑藉牠的神祇，城牆和軍隊，而自成爲一個完全自治的單元。牠的統治權操之於少數自由民之手，這些統治者的生活，全靠奴隸和外邦人的工作；他們所享有的種種政治特權和社會特權，決不願和鄰邦的自由民共享的。他們總是極端關心他們的自治權，而絕對反對足以妨礙自治權的任何盟約。

雖然各城邦爲了抵抗蠻族的緣故，有時會聯合起來，但那只是在外侮的威脅下不得已而爲之，一旦危險過去，聯合必立即瓦解。所謂同盟，也只是一個城邦支配着其他同盟的城邦，這種情形既足以惹起激烈的霸權鬭爭（如雅典與斯巴達，斯巴達與底比斯之爭）其結果一定是因爲內爭與革命的緣故而致同盟的崩潰。希臘的各城邦雖然很明瞭牠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文化，但總是擺脫不了各邦獨立主義。

【近隣同盟】(Amphictyonies) 最初發生的原因是爲了保護神廟並擔保 Pythie 競技會中的休戰，到了馬其頓的統治之下，牠才成爲和平的工具。最後各城邦雖然降格而結成同盟，但阿琴 (Achaean) 同盟才組織成功，便馬上有有意與連 (Aeolian) 同盟出而反對，結局二者都不得不解體而爲羅馬的武力所併吞。希臘的滅亡，可以說是由於自治城邦之上沒有一個統治的威權。

只有羅馬能夠抓住這個問題。她最初只將城市權利給予她的諸臘丁同盟，後來才慢慢地給予所有意大利境內的各同盟，這樣一來，她就能漸漸擺脫那曾經拘束雅典的陝隘組織而變為一個『高級城市』(Super-city)。她既能使各城市和各殖民地的一切自由民都接受她的動員令，有如她的子孫一般，於是她便組織成功一個無比的軍隊。最後，她既將地中海世界征服之後，就把城市的各項權利給予了帝國的一切自由民。各城和各省都各有自己的地方行政權，但她卻爲她自己保留了那召募軍隊，對外防禦和對內警備，以及爲公衆利益而施行法律之權。

這時候那羅馬皇帝纔真正表現出主權的樣子來——所謂主權就是在牠之上再無其他權力的意思。這個主權的職能是爲地方各當局做一個最高的裁判者。在我們的想像之中，這個主權當然是獨一無二的，因爲兩個勢均力敵的主權到了一起，是決不會相安的。地中海世界過了五百年所謂『羅馬和平』(Roman Peace)的日子就因爲受了這種制度之賜。

世界帝國的企圖

這種制度隨着羅馬帝國的滅亡而崩毀，可是牠的理想卻依然存在。蠻族的首領們，無論是高盧人或法蘭克人，只要是曾在西方建立過比較持久的王國者，都不把自己看作主權者。他們不僅對於他們治下負種種封建的義務，並且至少在理論上也承認皇帝的主權。他們向皇帝（不管是羅馬的皇帝或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要求執

政官的勳章，受皇帝的敍任，並且大都替他做代表人。

在回教徒屢次侵入的時候，封建從屬的關係已經鬆弛，於是一般人又都覺得要有一個真正的領袖才行。而這時帝國的理想仍然很活躍，查理曼爲尊崇他自己的權力還得向他乞靈。在中古時代的初頭，神聖羅馬帝國始終被人視爲唯一的裁判者與主權者，其使命即在維持基督教王侯間的和平。皇帝對於主張這種權利一向未曾放棄過；他這樣作總能迎合人民的希望，試看那時期的詠史文學卽足爲證。在此項文學中再沒有比腓特烈巴巴洛薩的故事更爲意義深長的；他被人禁錮在一個石洞裏有幾百年之久，鬚鬚都長得可以把他坐着的石頭蓋起來了。可是他仍然活着，而且總會有一天再讓那些好勇鬪狠，專事掠奪的貴族匍匐在他的主權之下。

可是事實證明皇帝沒有繼續做最高裁判者的能力，這時便輪到那主張兩重主權（俗界主權與靈界主權）的教皇蓄志要攪得主權者的地位了。於是教皇和皇帝就起了衝突；兩個主權互相敵視，結果是兩敗俱傷。雖然如此，但全部西方繼續爲那古代羅馬的單一主權之理想所支配約有數百年之久，並且就靠牠來維持和平，來保護基督教界，使不爲蠻族和異端所欺侮。

不幸教皇和皇帝都不能夠控制封建貴族；而活動範圍較小的國王們卻反能作到他們作不成功的事。國王既已盡了主權的重要職能便開始要求主權者應享的權利了。英國的亨利第八和詹姆士第一與法國的瓦羅亞家治下的法學家們，把古代的羅馬帝國法典發掘出來，不過不再把牠應用於皇帝，卻應用於國王罷了。在威斯特發里亞條約締結的時候，他們的勝利便決定下來。已經失敗的皇帝，這時和其他王侯站在平等的地位了。不肯和

異端講和的教皇也被人擯斥了。從那時起，沒有一個國王會承認在他自己之上還有什麼更高的威權，於是羅馬時代的單一主權之理想就被多重主權之理想取而代之了。

這確是一個很古怪的理想。一旦人們既不承認在個人或國家之上還有什麼無上的威權，社會的紐結便馬上會解體。他們之間，除了勢力關係之外，再沒有別的了。但是直到那時為止，已有數百年之久，教皇和皇帝也會想要實現另外一種裁判權的理想，以便維持王侯間的和平，卻一向沒有成功。他們之間無謂的爭鬪不僅不能保持秩序，維護和平，反只增加紛亂和鬪爭。國王們的活動範圍雖然較為狹窄，但惟有他們反能多少設法維持封建貴族間的和平。

誠然國王是互相爭戰的，但他們的軍隊都是雇傭兵組成的，所以戰爭也只是斷斷續續的。老百姓們因為他們能夠維持城堡間的和平，至少把那裁判者的理想實現了一部分，就欣然接受了多重主權的理想。十七和十八兩世紀的全部就是這個理想得勢的時期。

可是等到十九世紀來臨，國王的地位便又被「國家」代替了。然則國家對於國際關係保持什麼態度，對於複雜的主權問題又怎樣處理呢？法國革命似乎曾表現出一個根本的變化。在開始的時期，牠並不是一個嚴正的民族運動。牠所宣布的人權和市民權，非僅為的法國，卻是為的世界各國。牠所主張的自由，也是指一切人的自由而言。牠的得勝軍隊佔了何處，何處的封建特權便立刻取消了，並且靠着牠的軍隊的力量，使得到處都把新法典制定起來，共和國成立起來。後來拿破侖藉口其他名義，繼續進行這個運動，人們替他起了個綽號叫做「軍靴中的

革命，』這個綽號很恰當。假如他的活動能夠持久下去的話，全歐或許變成一個聯邦國，各邦各有自主的國王與自治的行政，但都把拿破侖法典做爲組織的根據，並都承認法國皇帝爲最高無上的威權。實際上這不啻把羅馬時代單一主權的理想，亦即最高領袖和一切國家之裁判者的理想再行恢復過來。拿破侖竭力要想使同時代的人明白這其間的關係，所以爵位，勳章，服裝以及傢具無不按照羅馬的格式。

但拿破侖的帝國統治之夢終於在培雷西那的冰天雪地之中驚醒過來。維也那條約（一八一四——一五一五）雖然滅絕了許多小自主國，卻仍舊維持多重主權的原則。俄國和奧國的皇帝，法國、英國、普魯士以及薩克森的國王統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一如威斯特發里亞條約時代的情形一樣。

民族主權

但不久諸民族即開始爲國家思想所激動，到處都起了打倒君主神權的革命呼聲，歐洲所有的自由黨藉助於各種秘密團體，各種俱樂部和報紙，在一個連帶的約束之下結合起來。終於促成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由根本上說，每一個爲解放而掙扎的民族都要爲隣國所阻撓，並且都是爲了本身的利益而努力。少數的政治家很明瞭這種情形並且知道怎樣利用他們的學識，於是屬於意大利民族的各國就以薩瓦國王（King of Savoy）爲中心，屬於日耳曼民族的各國就以普魯士國王爲中心而各自團結起來了。

新的民族國家自然是要在君主統治的舊體制之內組織成功的，但是輿論在議會中所佔的勢力愈大，則人

民愈是渴望那「他自己雖須忍受其支配，卻也享有其中一份」的主權。等到後來，民治主義幾乎到處風行，「握主權的人民」(Sovereign people)便自動地把「握主權的國王」(Sovereign King)取而代之了。

現在歐洲的自主國家不下二十八國，每個國家都覺得自己有明確的人格（如種族，語言，天才即其表徵。）因此斷定在牠自己之上不應再有更高一層的威權。往昔君主國家共有的一種現象就是謹慎防衛自主權，唯恐他人侵犯，現在牠的後繼者民主國家又把這種現象整個地因襲過來。「握主權的人民」從「握主權的國王」繼承過來牠們對於絕對獨立的各種要求。牠們雖然祈求和平，但迄未能證明牠們確能建立一個更高一層的威權，以便強制維持和平。

然則這些形形色色的自主國究竟如何表現自己？牠們互相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的？

一個國家一旦承認另外一國在法律上的存在，那就等於否認牠自己有干涉後者的內政之權。每個國家對於牠自己的法律和行動都是絕對自主的，只有合於牠自己的利益時，纔把他國加以考慮。

可是完全孤立又不可能；說句俗話：「長城」（原文是 Chinese Walls）已經整個崩毀了。隨着貿易和交通的日漸發達，每個國家都不得不把給與本國公民的各種公權，同樣地給與外國人。這就是國際私法所以制定的緣故。

但實際上，無論那一國的政府也是自己規定自己的國際立法。假如兩國的政府互相允許交換同樣的利益，那並不是說甲國法院的判決一定能夠在乙國自動的執行。譬如，法國法院的某項判決，不利於某意大利人或某

荷蘭人，除非執行裁判的命令得到羅馬法院或海牙法院的允許，這判決將不能夠在意大利或荷蘭境內執行。因此，在立法方面，司法方面，以及法理方面，各國之間會有種種的衝突，而私人在國外的營業，財產和資本，也會受到種種的困難。

各國爲了國際關係的穩定起見，也曾締結種種商約，和約和盟約。但如果締約的一方高興懷疑或違犯約上規定的義務，國際間既沒有一個法庭來解釋條約的內容，又沒有一種公衆的力量來強制他們履行，也沒有一個裁判機關來懲辦破約者。受侵害者除非訴之戰爭，別無他法，如果牠不是強者那就只好屈服。

所以一切條約都含有危險性。沒有一個國家會爲牠自己的簽押所拘束。牠只對牠自己負責。國際關係的極端不安定就是多重主權的結果。

國家的體面

十九世紀末年，海牙國際法庭成立的原因就由於此種局面所引起的戰事危機。但列國之間並沒有定要倚靠國際法庭的約束。連那些曾在強迫仲裁條約上簽了字的國家，都還要保留着種種特別的情形，如果他們的重要利益陷於危險的話。至於什麼是他們的重要利益，只好由他們自己去判斷。

到了沒有『重要利益』可做藉口的時候，他們還可以把『體面』拿出來。我們對於這個古怪的觀念須得仔細加以玩味，因爲牠所要玩的把戲是特別危險的。

在古代的時候，諸城邦到了存亡攸關的時節就會不顧所負的義務，所謂：Salus populi Suprema lex（高於一切的公共治安。）就連法國革命都常常把「公安」(Public safety)當做藉口。但現在所謂「體面」(Honor)的觀念，那時的人還沒有。在羅馬時代，所謂體面人 (honoralis) 就是位居達官顯宦的意思。社會光叫他享受顯耀尊榮的權利，卻不叫他負什麼特殊的義務。

隨着封建制度而出現了所謂騎士的體面。封建的主君和家臣之間的敬禮使他們為一種人的關係所拘束，而這種人的關係不過僅以誓言為根據。一位武士，為了遵守他已發的誓言，便只好時常準備着拔刀而鬪。如有人懷疑他的忠義或僅僅說他不勇敢，那就是無上的侮辱。如有人向他挑戰而他避不與鬪，他將受人賤視，而玷辱了他的聲名。所以「體面」(或名譽)乃是此輩好鬪的貴族所最重視的美德。後來隨着封建制度的漸趨崩潰，所謂「體面之點」就變為一種武技，那不可勝數的決鬪事件就是由此而激成的，連黎塞留的法令都不克禁止此種惡風。

但這僅是侍從們的遊戲。「布爾喬瓦」是不講這種體面的，也沒人和他決鬪。拉辛因為在一首諷刺詩裏譏刺了內維爾大公 (Duke of Nevers) 竟受到杖責的恫喝。羅漢爵士 (Chevalier de Rohan) 爲了報復福爾特爾的諷刺，竟令他的僕人毆打福氏，並把這位詩人送入巴士的獄，罪名是傲慢不遜擅敢向一位貴族挑鬪。

在大革命之中，中等階級把貴族的優越地位根本推翻，卻仍然保留着所謂「體面之點」，而把牠很自然地適用到國家的身上。在舊制之下，國王爲王國中爲首的縉紳，他不僅爲了王國或本朝的利益，可以對外做戰，就是

爲了他本人的「體面」也可以對外做戰。中等階級既然代替了他的地位，便認爲國家的體面，較之國王的體面尤當重視。

所謂「國家的體面」和與之相當的慣禮就是如此發生的。大家業已公認某些個人，如公使，大使，領事，某些符號如國旗，紋地是代表國家的結果，假如某國的國旗被人撕毀，或大使被人侮辱，那就不啻把該國的全體人民加以侮辱或向之挑戰，倘非對方鄭重道歉謝罪，該國勢必訴之戰爭以謀報復。例如阿爾及耳總督 (Dey of Algiers) 用扇子把法國領事打了一下，竟至使阿爾及利亞被法國征服。倘若柏林的民衆出於憤慨把法國駐德大使的紋地扯下，就連最和平最凡庸的法國農民也將怒髮衝冠，認爲不啻本身受到侮辱，而咖啡店中的極端愛國主義者將大聲疾呼全國的總動員，以爲只有如此才能洗清這樣的奇辱大恥。

在一個黷武的政府手裏，這種情緒便成了激勵輿論最有力的武器，有時候也用做侵略他人頂方便的藉口。一九一四年發生的世界戰爭就是因此而起的。

當法蘭西斯斐迪南大公在塞刺也窩被一個塞爾維亞學生刺殺之後，維也納閣立即要求柏爾格刺德政府賠償損害。後者鄭重宣言，表示爲前項慘劇悲悼，且極力剖白本身無過，並宣稱這個案子發生於該國疆土之外，非該國所能防止。奧方則認爲此項剖白並無充分理由，同時要求塞國政府懲辦教唆前項暗殺案的祕密團體。塞方也承認了，就逮捕了許多煽動之人。但奧方這時又宣言不信任塞國的法官而要求起訴時准許奧方代表出席。塞國的輿論認爲此項新要求侮辱了本國的「體面」。但柏爾格刺德政府這時還能想出一種辦法，既足安慰奧

方的要求，又不損及塞國的威嚴。那時維也納內閣卻斷定送達柏爾格刺德的最後通牒已到滿期之時，於是就招回公使而向塞國宣戰。

奧國要求監視塞國法庭處理此案，顯然不過是一種藉口而已。外交家還有其他更為重要的理由纔主張作戰。在大公被刺之前，早就設法尋找決裂的機會了。但老百姓們決不能了解此項深奧的政治動機。反之，法蘭西斯約瑟皇帝的宣言，說塞國拒絕懲辦此案罪魁，是損傷了他的體面，塞方彼得國王的宣言，說奧國要派該國的法官出席塞國法庭是侮辱塞方的國家尊嚴，為塞方所不堪忍受，卻是兩國人民都能夠完全了解的。

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起來了，正如封建時代的貴族爲了「體面」問題而決鬪一般。

勢力之均衡

假定有二十個人，種族，語言，性格，教化都各不同。共同住在一個森林中，誰也不承認誰有最高的威權，互相之間，僅只訂立了一些不可靠的契約，其中任何人都可以隨意把牠撕破。他們之間的關係顯然是極端不穩的，每一個人都不得不隨時警戒着，全身武裝準備隨時爭鬪。二十世紀初頭，歐洲諸國間的局勢就是如此：二十幾個武裝的國家，生活在隨時可有戰爭的危險之下。

如果我們把以下這件事情考究一下，便更要覺得奇怪了：每個國家，爲了生活於牠的領土之上的個人，而各在一個統治的威權之下組織起一個穩固的社會來。但無論那一國也不能在國家之間建立起一個相似的制度。

可見國家之間只有勢力的關係。牠們的主權觀念迫使牠們互相看做一個森林裏的許多野蠻部落。可是既已在一起生活便不得不訂立一種暫時的條約，這的確是不可靠的，但卻是大家所公認的——一種草莽的法律。只要一個國家已到充分牢固的狀態，而無被他國滅亡，瓜分或併吞的可能，則其他國家便正式承認牠的地位了。牠們相約不去干涉牠的內政，並且在法律上 (*de jure*) 承認牠事實上 (*de facto*) 已經取得的主權。

原則上，每一個主權成爲一個絕對體，一切的主權都是平等的。理論上，德國和丹麥，法國和比國，英國和葡萄牙站在同等的獨立地位上。但實際上，牠們的勢力決不是等量的。

一個國家，在人口，資源和兵力上也許比較牠的隣國強到十倍。爲了牠自己的利益，牠也許想要吞併人家，割裂人家——什麼歷史權利啦，自然權利啦，又是什麼重要利益啦，體面啦，牠都可以隨便引爲口實，以使本國的人民覺得牠的吞併政策是對的。所以凡是與強國爲隣の弱國都不得不互相攜手以便保衛牠們的共同獨立。如果兩個大國聯合起來，其他國家更非採同樣舉動不可。

當十九世紀之末，德國先和奧國聯盟，後來又和意國聯盟（三國同盟），迫得法國也和俄國聯盟；後來，日耳曼帝國的勢力漸漸伸張到巴爾幹和土耳其，這法俄兩國的同盟便只好再和英國做友誼的協商，以便增強己方的勢力。

在這個制度之下，各同盟的人口，資源和軍隊是都要加以考慮的。如果數字不相上下，便可實現歐洲的均勢了。在多數主權國的制度下，這就通稱爲和平。

可是互相均衡的諸勢力永遠是變動不居的，所以均衡的局面也總是不穩的。例如假定某國人口增加很快，而與之為隣的國家的生產率不是降低就是靜止不動，則某國縱然毫不變更牠的軍事法規，但牠的軍隊實力自然就會增加起來。諸隣國這時便將覺得牠們自己地位的卑劣，爲了恢復均勢，牠們將把募兵辦法酌加改變，以便把國中壯夫多募一些。但是生產率增加的某國將認爲這是足以變更現狀的，而迅速採取同樣的計劃——於是軍備競爭就開始了。

但即使軍隊實力毫不變更，一個國家光靠工業的發展或財富的增加，也可以增加軍備力量，增加槍礮的數目和射程以及鐵甲艦的噸數等等……僅只一種技術上的發明，如水壓制動機或潛水摩托等都可以打破列強間的均勢。

以下這種局勢或許會發生：一個國家，爲了人口與工業生產力的增加，便不得不在國境四週或遠方大陸上尋求土地，以爲移民或推銷貨物之計。但每次新的征服，無論是在歐洲或在殖民地，都要增加牠的軍事力量才行，反之，新的征服同時也就是增加軍事力量的一種手段。

最後，就連各國想藉以成立均勢的，那規模較爲廣泛的同盟，本身上都是不安定的因素。每個同盟的集團都時常想把敵陣中的同盟國加以離間而拉過來，所用的手段就是假親善和陰謀，結果致使各國的外交和輿論都陷於永久不安的狀態之中。如果一旦某國脫離了原來的集團而投降敵方，則均勢立即破壞，而較強的集團將向較弱的一方下攻擊令。

武裝和平

在這種情形之下，和平總是不穩的，無論那一國都總得準備着抵禦外侮。所以那和民族國家並駕齊驅的常備軍制完全是一種現代的制度。

在古代的城邦中，和約一經簽字，當兵的市民立即歸田，爲維持秩序計，雅典專靠西徐亞弓手，而羅馬則專靠她的持斧官。即使是在羅馬的共和時代，戰役也只能夠在收成以後開始，在播種以前就得完結。

唯獨羅馬帝國曾有過常備軍隊，但那是用在邊防上的，後來就把牠取消，而代之以蠻族部落，給以報酬使防他族之來襲。在封建時代，和約一經簽押，主君便把他的諸侯遣散。後來的國王也是一樣，戰事一過，他的傳令隊伍便遣散了。

國民皆兵制度是隨着國家神話的興起而出現的。法國革命立下了強迫全國人民服軍役的原則，其他各國勢不得不追步牠的後塵。自那時以後，歐洲大陸上便到處都設立了常備軍的制度。誠然，自從一八一五年以後，各國政府都想設法減輕本身的負擔。雖然仍舊維持全國人民服軍役的原則，但每一個分遣隊的兵額是預先規定的。登入軍籍者例須抽籤，即以抽得與否爲標準而決定。那些人應服務若干年軍役，那些人可得免除此項義務。藉此辦法，即可避免將全國青年盡皆登籍的經費，而且各國的參謀本部也決不希望使過巨的軍隊動員，因爲按當時的交通和運輸情形而論，龐大的軍隊是不容易調動的。

可是隨着國庫的迅速膨脹，以及鐵路和電報的發展，準備隨時作戰的分遣隊便也漸漸地增多起來。軍役的期限雖然縮短了，但軍役的義務卻擴充到了全體人民的身上。及至十九世紀末葉，普及軍役就已成爲事實了。

在平時，一國的現役軍隊爲數不過百萬左右，遇到戰事這百萬人就得去攻打前鋒，可是在這個帷幕之後，還藏着巨額的準備軍呢，蓋凡是四十五歲以下的壯夫，都得隨時準備動員的。當兵者既然是以國民的資格而從軍，當然是無報酬的，但爲了實施訓練起見，勢非組織一個各級軍官的幹部不可，這是需要巨款的，此外還得替這百萬軍隊備辦伙食，軍裝和軍器（軍器的精巧又是日新月異的）並儲蓄軍需和軍糧，以備不時之需。另一方面，因爲鐵甲艦，無畏艦，大無畏艦和潛水艇等的發明，海軍的經費也是日益膨脹的。在二十世紀的開始，歐洲各大國的國防費都已超過十萬萬金法郎。這筆保險費原爲保護國富而設，現在卻把國富吸收了一大部分，而且愈吸愈多，各國爲了武裝和平的負擔將非至精疲力盡不止。

但是此項軍備的過度發展不僅未曾去掉戰爭的危險，卻反有增加此項危險的傾向。國家也和個人一樣。一個人如果曉得自己的武器比較敵人的精良，他試圖用武的念頭一定很大。如果一國的政府，知道本國的槍礮，射程較敵國爲遠，本國的無畏艦，威力較敵國爲大，就事理來論，牠一定不令敵國有餘暇來補足其武器的缺點，而就先向敵國下手。無論由歷史的權利上或由民族體面上，牠都可以找到很好的藉口，而衝突立即爆發。

和平時期的軍備，本身就蘊藏着戰爭的危機。這好似以避免危險爲使命的保險公司，自己反造出危險來，這是多麼奇怪的一個矛盾啊！由此可見所謂民族主權者，其中原就包含着常備軍和武裝和平二種制度，而這二種

制度原就蘊藏着戰爭的危機。

在十九世紀之中，各國對於戰爭的看法，已不是把牠看作像鼠疫或霍亂那樣非根絕不可的災禍，卻是把牠看作一種不可避免的不幸事件。至於各國政府，牠們的外交全部都用力在維持一種均勢或恢復一種均勢之上，同時卻把增加軍備當作促成均勢的手段，致使牠們所希望的均勢無日不在動搖之中。

這樣一來，人們便把戰爭看作人類統治上的一種經常程序了。

民族戰爭

戰爭已成爲一種正則的制度，所以必須使牠恰好適合牠的目標纔行。

在國家主義之下，戰爭乃是一種手段，所要達到的目的是把大陸上或殖民地上的領土，由一個主權移轉到另一主權。有土地野心的國家必須迫使敵方把行政權和軍隊由牠所欲得的土地上撤退出去。達到這個目的所常用的手續，就是以敵軍主力爲攻擊目標，而把牠加以包圍或斷其歸路；然後進而佔領或威脅敵方的首都，使其行政陷於停頓，以便迫其割讓己方所欲的土地。拿破侖的戰略和十九世紀中一切民族戰爭的戰略，其主要之點總不外乎此。

在這個策略之下，攻擊的目標完全在於敵方的政治機構和行政機構，換言之，也就是要摧毀或分裂其社會的上層構造。至於我們曾經叫牠做「經濟的基本構造」那件東西，卻是絲毫未動的。的確，敵國是必須打敗的，但

不必把牠毀滅。因此，私有財產乃是大家公認爲不可侵犯的。勝利的軍隊在所佔領的地方消費什麼東西，或徵發什麼東西，都得付給代價；在戰場上所受的損失或破壞也可以要求賠償。中立國和敵方間的貿易是禁止妨害的；不過軍械、軍需和戰時禁止品是可以截取的。這樣一來，戰爭所加於國民經濟的損害就減低到最小限度了。

對於限制人力的損失，各國也是同樣的審慎。戰略的目的是要在最短期間使敵軍投降。己方，那就是說：要使大部分的敵軍失掉戰鬥能力，但並非定要把他們殺死。反之，對於己方的國民兵卻要使他們知道：避免死亡的機會是應有盡有的，因爲他們在這個爭鬪之中，己身並無利害的關係。因此，國際間對於如何救護傷兵，如何把他們送入野戰病院，如何加以看護，加以救治，各種辦法是極爲周密的（日內瓦協約，紅十字一章）海牙會議甚至會決定禁止使用殺人能力太大的武器，例如開花礮彈，以及飛機上的炸彈等。最後，爲補償不可避免的損害，對於殘廢者和受傷者均予以要求賠償之權，戰勝國除了叫戰敗國割讓土地之外，還要牠拿出一筆賠款，這筆賠款縱然不能使戰勝國賺回戰事的全部開支，但至少足夠牠充作善後之費的。

在戰敗國一方面，如果牠的財力，對敵方既不足以履行種種賠償的義務，對己方又不足以撫卹戰爭中之犧牲者，牠便將在國際市場上發行一筆公債。各中立國的金融界和靠戰爭獲取不正當利益者將都踴躍地認購。這種長期公債並不妨礙國家的復興，反之，視復興範圍之大小，和復興事業所用資本之多少，商業和工業均將受到相當的刺激而立刻活躍起來。在戰事後發生的這種忽然暢銷的現象，使得一般人都覺得時常發生一點兒戰事，反倒有利於工商業。

這就是國家神話盛行的十九世紀當中，一般人對於戰爭的見解。這完全是一種新的觀念，爲其他時代所無的。

在較早的一個時期當中，正是忠君的神話盛行之時，軍隊都駐屯在各屬地；軍官和兵士們共分戰利品，尤以將軍們所分得者爲獨多（讀者或許記得漢諾威閣（Pavillon de Hanovre）就是用由漢諾威掠奪來的金錢，替黎塞留大公建作紀念的；）照那時的習慣，被攻拔的城市是要加以劫掠的；掠奪物就是僱傭兵的獎勵品，藉此好激勵他們捨身赴敵。

但國民兵是決不會爲此項引誘所動的，他心中時常存着尊重財產的觀念，即便到了敵方的地界，仍然是不變的。由他來看，戰爭乃是兩國間爲了變更一塊屬地的現狀而起的爭鬪。這是一種起得有點突然的政治作用，是要按照種種規則而行的。戰爭也有種種規律，好像是一種社會的決鬪；有些個武器，有些個打法是在禁止之例，並有醫生到場看護傷者。種種戰鬪法都是很和緩而且爲時很短的；如果雙方之中有一方受傷過重，傍觀的人將設法使鬪爭停止。

當柏林會議（一八七八）之中，列強曾迫使戰勝的俄國稍緩其所施於戰敗的土耳其之壓迫；一九一二年時，君士坦丁將要被佔領的時候，俄國曾在察塔爾查的陣線上援助保加利亞的斐迪南王。如果戰勝國叫戰敗國受過大的犧牲以便盡量增加自己的勢力，其結果將不免損及他國的利益。這時，連中立國都將結爲同盟，藉口勢力的均衡，以便和緩戰勝國的氣焰。

因爲有了這種種緩和的環境，所以十九世紀的戰爭情形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野蠻，致使人人聞戰爭而變色了。這時的戰爭已不會使任何的交戰國受到什麼致命的影響，牠不過僅只是一種比較兇惡的方法用來解決主權的問題而已。所以在現代人的心目中，所謂戰爭不過好像是一次的週期放血，古時的醫生都把這種手術看做健康生活的必要條件。

直至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爲止，流行的見解都以爲戰爭是一種經常的現象，是必要的並且相當有益的。各種的教科書，講演和愛國詩歌裏無不把國民兵的榮譽加以褒揚稱讚。一個國民，既是他自己土地的主人又是國家的一分子，於是他就把這兩重資格混而爲一了，以地主的資格而論，他是有自治權的，所以以國民的資格而論，他也應當是獨立自主的。爲了一些無關重要的地界問題，他會和他的隣人打起傾家蕩產的官司來，同樣，爲了一個民族自尊的問題，他也不惜使歐洲鬧起天翻地覆的戰爭來。

這種國民自尊心，原已受過教育制度的小心培養，又加之以種族和共同語言的崇拜，與國家天才的意識再替他增強力量，於是就成了一種極易燃燒的混合物，只要有一星之火，卽馬上燃着起來。但羣衆們仍然操持着樂觀的心理而有以自解：無疑主權是蘊含着戰爭的危機的，但那只是一個短時期的戰爭，其目的純是政治上的，對於私營企業不會與以致命的打擊。事實上，國家間的永久不安反足以使個人間的關係相對地安全。

把人類社會分裂成許多主權的觀念，本身上就是矛盾而富有衝突性的。但牠卻和一種經濟制度很爲適合，在這種制度之下，每個國家對於牠自己的主要需要都是自足自給的。只要大多數的企業還未受到工業專門化

的影響，還可以在國內市場上同時找到原料，銷路和資本，則這種觀念是不會改變的。政治主權和經濟自主是很相適合的；而國家神話就是農業文明最圓滿的表現。

註一

戴克里先設立兩個奧古斯梯，和兩個凱撒，目的並非要增多主權。這不過是一種手段，好使統治的威權和在其統治以下的人們較為接近而已。誠然，這種制度會引起首領間的衝突，對於帝國的瓦解，這要算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註二

我們試看一看俄國革命也具有同樣普遍，同樣超民族的特徵，定會覺得有趣。牠自己公然承認的目的是要把共產制度和蘇維埃組織推行到各地——正如法國革命要把人權和土地所有自由的制度推行到各地一樣，所以國家主義當然是他們不會承認的。可是一旦等到各民族漸漸接受了這個新法典，他們就不得不承認莫斯科共產國際的主權了。爲了表明其超民族的特徵，莫斯科政府甚至不用俄羅斯字樣而稱牠自己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當然不必說：這個觀念並沒有羅阻、莫斯科政府——或羅伯斯庇爾或拿破侖——採取嚴格的民族政策，但我們所要考查的並非實在怎樣的事實，却是遮掩事實的神話或空想。

第四編 神話與現實之對照

第十三章 經濟與政治的融合

國家神話，由一農業民族傳到另一農業民族，輾轉流傳而傳遍全世界，在各處建起民族國家來。可是正當牠擴張到了極度的時候，爲牠誕生地的各國卻早已起了整個的變化。

國家變成一個經濟實體 (economic entity)

上文已經講過的那個工業革命，順次浸透英法德各國，把各國的基本經濟構造加以重大改變。大規模而專門化的工業代替了活動範圍很小的事業，這種大規模的工業，爲尋求原料與雇主起見，不得不向國外發展。鐵路、輪船和電報都是不爲國界所限的；各國之間，貨物、資本和消息的流動，一天多似一天。有一些國家，已經脫離農業，便開始將牠們的製造品售與他國，而換取食料。另外一些國家，沒有能力在大規模工業上和人家競爭，便只好開發農業和牧畜業，又因其產品遠超乎本國的需要，便以剩餘產品換取所需的器械和衣服。這樣一來，所有的國家，爲了物質的需要，便都不得不互相倚賴，同時卻仍揚言自己是自主的、自治的。

從這時起，政治的神話和經濟的現實便兩相抵觸起來。在邏輯上說，任何國家都會徘徊於以下這樣一個歧路而無所適從：還是採取一種經濟上的馬爾薩斯主義，以國內市場的需要為標準，嚴格地限制本國工業的發展呢？還是加強工業的專門化作用，同時放棄那民族自主的定理以便獲取一些政治上的相依作用，好與經濟上的相依作用調和一致呢？但人類社會的進化並非循着直線前進的，而是極其紆曲極其錯雜，無論個人或是社會都得隨時變換方向，沿曲折的路線而進的。而且事實和理想之間的這種矛盾現象並不是馬上就顯現出來了。工業的發展起初只在國內市場的範圍以內，後來纔慢慢地試探着向外擴展，好似一棵樹的根子慢慢穿透一個牆壁的裂縫一樣，等到最後，這個擴展作用已達相當程度足以惹起人家注意時，那降生比牠早了二十五年的國家神話已經把人和各種制度一齊放在牠自己的模型內加了一番陶冶。所以我們如果要想解決這個意外的經濟擴張作用所引起的新問題，仍須把國家神話請了出來纔行。解決的辦法自然是要和這神話的精神相一致，並且須得盡力保全牠的威權。於是在十九世紀當中，這許多矛盾的力量之間就有了一種奇異的妥協作用。

那工業不甚發達的國家，其所企圖乃是輸入新式的機器，同時盡力排斥一切外國產品，以便鼓勵民族的自足自給而保持牠的自治權。結果就是經濟的國家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在那較為進步並且工業化較深的國家，其傾向乃是：如果見到某一些國家的產品足以補充本國工業之不足，必立即奪取這些國家的領土，以便在一個政治統治的體制之內成就那經濟相依的作用。結果就是帝國主義。

這兩個駁雜的信條，既把許多矛盾的力量結合成為一個不穩固的混合物結局一定會引起禍患。經濟相依

的結果，非使各自治民族發生衝突不可，反之，民族性的衝突，結果也定要把造成牠們之間相依關係的經濟機構弄得錯雜凌亂。世界大戰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我們現在得要看看把這些矛盾的原素融合到一起的究竟是什麼。

把國家當做一個經濟實體完全是最近的一種理想，是與十九世紀而俱生的。在那時以前，連這問題都無從發生。因為當時經濟生活是以本地為範圍的。農人吃的是他自己所種的小麥，雀麥或自己醃的鹹肉，喝的是他自己所釀的酒和菓汁；他夫人所紡的是他自己出產的亞麻和羊毛，紡好後就拿給本村的織工，叫他織成布。剩餘的產品都送給他的主人。主人是一個在教的或不在教的封建主君，就靠此項物品的輸納維持生活，只把其中一小部分出售，以便購買幾種奢侈品。在城市中，任何人事活動如雇用工人的數目以及貨物生產的數量都是嚴格地以本地需要為限制，主其事者是各行會和社團。因為運輸上的困難，和外省往來貿易幾乎不可能。而且產品的交換不僅決不會受到獎勵，事實上有時還要遭受禁止。凡是大的采邑之間必有關稅壁壘為之阻隔，封建貴族即以此項關稅為其收入的主要來源。後來的諸王國不過是由采邑聯合而成，只於共戴一個君主，此項關稅壁壘並未拆除。一七八九年時，布勒塔尼雖是法蘭西王國的一部分，但緬因和牠之間竟有一道關稅界限；可是對英貿易卻又是自由無阻的。可見往昔的君主國並不把自己看做一個經濟實體。

法國革命既把一切封建特權打倒，同時又把國境以內的關稅一概取消，使各種貨物得在國境以內自由流通。誠然，國境上的關稅仍然保持着原狀。但這卻是為了財政上的必要和幣制上的考量。因為在那個時代，貨幣的

儲量爲數甚少，流出少許金銀即足阻礙一切交易。所以進口的數量是不得不減少到最小限度的。往昔科爾伯特政策（policy of Colbert）的成立就是有鑑於同樣的理由，後來到了新制（new regime）之下，又迫於現金的外逃（那時 assignats 幣制尙未實行）便只好採取更嚴格的辦法了。

隨着大陸的封鎖那時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因素。英格蘭因爲重工輕農的結果，突然遇到很困難的民食問題。另一方面，法蘭西卻已禁絕海外輸入而極感某幾種產品的需要，如蔗糖、標布等，迫得拿破侖不得不獎勵甜菜的種植和紡績工廠的建設。同時，英國的地主希望民食所需的一切穀類都出自英國的土地，對於國外穀物的輸入，課以極苛的關稅幾乎到了禁止進口的程度。

從那時起，各國都已明瞭；如果爲了一些不可缺少的物產而倚靠他國，那便不配稱爲完全的獨立國。所以縱令付極大犧牲的代價，縱令實行那加重消費者負擔的保護制度，也得把所缺少的專門工業俱備起來。一個國家必須自給纔行，因爲經濟的自主和政治的獨立是相輔而不可離的。

自是以後，關稅制度便和國家神話結了不解之緣而成爲牠的一個基本部分。在十九世紀之中，任何民族一旦達到政治上的統一，必同時採取關稅統一的計劃。雖然有的時候順序和此相反，即先有關稅統一而後有政治統一，但仍以同時告成爲最常有之狀態。當奧地利亞軍隊在索非里諾（Solferino）大敗以後，意大利的諸小邦多斯加納（Tuscany）、帕馬（Parma）、摩德拿（Modena）和羅馬納（Romagna）便根據全民投票而合併於皮德蒙特斯（Piedmontese state）同時把足爲統一障礙的關稅壁壘一概取消，到了一八七一年 意大利的統

一終告實現，關稅的界限便和新王國的國界完全一致了。

經過薩多瓦 (Sadowa) 戰役之後，法蘭西斯約瑟皇帝 (Emperor Francis Joseph) 迫於時勢，只好使匈牙利與奧地利處於平等地位，但帝國的統一也是決意要維持的。爲達到這個目的，這兩個王國，除了共同的軍隊和共同的外交機關外，還訂定了一個共同的關稅稅則，由匈牙利和奧地利兩方的議會按期選派代表商訂之，於是政治的妥協之外，又加上了經濟的妥協。

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這種現象的演化已告完成。無論那一國的國境都是同時兼具政治的和經濟的兩種性質，既有軍隊爲之防守，又有稅吏爲之盤查。自是以後，建立保護關稅的權利就成爲「主權」的基本屬性之一了。這時，國家已經變成一個經濟實體。

把自由貿易做爲相依之學說

正當這個新學說（保護關稅）漸漸傳布到全世界的時候，首倡的各國卻已把牠根本推翻了。只要是工業的發展不出乎本國的範圍，原料和雇主都能在本國的市場上找到，那末這學說便很能和經濟的國家主義兩相配合；但總會有一天，因爲機械生產力的增加，迫得各國不得不向海外尋求原料和顧客，這時節，那「國家必須自足自給」的定理便被人覺得是荒謬而危險的了。這個新傾向首先顯露的地方就是英國。因爲富於煤、鐵和發明家的天才，英國創出有力量的工業組織，較之其他各國都要早了好多年。她的島嶼形勢和海灣之多，以及她在海

洋商業上歷史的久遠，在在都使她容易接近全世界的各市場。曼徹斯特的紡業工廠和郎卡邑的織業工廠都用埃及和美洲的棉花做爲原料，因其出品價格低廉，所以極易向歐洲大陸推銷。但英國如想這些顧客購買她的出品，就得准許牠們向英國售賣牠們的產品（特別是五穀）纔行。法國、荷蘭、俄國和加拿大，因爲土地的肥沃和農業人口的繁多，所生產的穀類，成本較英國爲低。所以英國向海外購買糧食，便可以減低工人的生活費，減少勞工的成本，而增加她控制國外市場的勢力。

這樣一來，便不得不撤除關稅壁壘而宣布自由貿易主義了。可是一般大地主們，回想大陸封鎖時期的情形，便藉口國家的安全而反對此項計畫，於是這兩種敵對的主義即自由貿易主義——經濟的相依主義之信條——和保護關稅主義——政治的國家主義之信條——便開始衝鋒對壘起來。

理查哥布登（Richard Cobden）和曼徹斯特工業家的爭鬪乃歷史上一個有名的插話，結果是地主們失敗了。穀物條例和航業條例都廢止了；後者的廢止是因爲牠會規定一切對英國的貿易都須利用英國船舶。這時，每個英國人儘可以向價格最低廉的市場去購買，向價格最貴的市場去販賣而不受絲毫的阻礙，每個外國人也無妨到英國去販賣，只要他的貨較英國貨便宜——這已成爲當時公認的理論了。

大不列顛三島實行自由貿易的結果，是工業的蒸蒸日上和一般事業的繁榮成爲全世界空前的現象。英國的成功當然不免要引起他國的艷羨而羣起和她競賽。即以法國而論，尤其是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之間，利用蒸汽機的紡織工廠，增加了，鐵路也敷設起來了，金屬的貿易也迅速地增長了。在起初的時候，法國工業還在幼

稚時期當然不得不設法應付那歷史較久，設備較完和經驗較富的英國工業和牠競爭。因為那時甚至連本國市場都支持不住，她便不得不乞靈於關稅壁壘的保護。但是不久她的工業也漸漸發展起來，她便開始注意到國外市場而不斷地追求着英國的煤，美國的棉，阿根廷的羊毛，和德意的顧客。最後，英國和法國的見解竟達到一種妥協的境地。一八六〇年，理查哥布登和米雪爾瑟發雷 (Michel Chevalier) 締結了最初的商約，不久又陸續和比利時，意大利，瑞士，瑞典，荷蘭，以及日爾曼關稅同盟訂立了同樣的商約。因此，大家都把那一年叫作「經濟的一七八九」 (Economie 1789)。各方面統統把關稅減低或撤廢了，任何國家都願意這個新經濟制度可以維持久遠。工業家現在無妨採取一種持久地侵入國外市場的政策，並根據此項政策而把生產業和運輸業組織起來。同時，航行路線的增加使得一切國家都有了互相貿易的便利，而蘇彝士運河的開通使牠們更能與極遠方的國家相往來。業經工業化的歐洲由各地獲取原料和食糧而以自己的製造品做爲交換物，並開發新興和落後的國家而準備促成全世界的經濟統一。

這個奇妙的組織，目的就在增加萬國的幸福；各種物價的競相跌落，使得這目的竟然達到。這確是一個宏大的和平組織；世界各國都互相是顧客，互相是買辦，牠們的利益已是十分的融合，使得牠們之間有了一種連帶的關係，藉此足以抵銷國家自利主義。自由貿易主義實現了國家間經濟相依的理想，終局或竟能達到世界和平的境地呢。

保護貿易主義之反動

可是，事與願違。歷史上的事件並非按直線的邏輯連系而展開的，人類社會又是極複雜的集合體，爲種種矛盾的力量所左右；此項力量憑種種奇怪的妥協辦法，竭力互相適應，可是這種妥協，結局一定是不穩的。正當那大工業開始要把全世界籠罩在那鐵路、輪船和電報的巨網之中，而達成全球的經濟統一時節，比牠年長了幾歲的國家神話卻早已日益健壯，而把人心和制度放在自己的模型內，加了一番鑄造的工夫了。國家神話既然能夠把大工業包容在自己所設計的體制之內，於是那幾乎普遍於全世界的保護貿易主義的反動作用，竟成爲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的時代特色了。

中歐各國和英法兩國一樣，也都希望自己有一個大工業。最初發動的是德國，她以魯爾、薩克森和西利西亞的煤礦爲基礎而建設起她的鋼鐵工廠和織業工廠。步她後塵的是奧地利亞，其活動根據地是波希米亞。後來俄國也起而仿效，以波蘭和頓尼次流域爲其活動根據。此項方在萌芽的工業當然不能和英法競爭，甚至連本國的市場都無法支持，於是牠們只好各自請求本國政府實施高度的保護關稅。不消說，此項保護的要求，在牠們的見解中，當然認爲是完全暫時的，而且僅限於未屆成熟的工業；但新工業是愈來愈多的。

不久，輪船構造的改良又引起了一個真正的商業革命，輪船的體積和載重能力都有了極度的增加，而燃料和船員的開支卻增加得極其遲慢。因此每噸貨物的運費較之以前跌落得頗巨。許多種體積笨重而價值甚小的

物品，在以前運到遠方是很不合算的，現在卻也能加入國際競爭市場了。於是種種舊式的工業和基礎頗爲鞏固的商業，都因國外製造品的侵入而受到威脅。農業產品當然也脫不了這個難關。諾爾曼的農夫眼巴巴地看着哈佛爾的市場上出售支加哥的小麥，比較數哩之遙的科克斯（Carix）的田場所出產的小麥，價格還要低廉。梅喀稜堡的牲口飼養家眼看着自己的最良出品都競爭不過伊里諾斯和阿根廷的醃牛肉，或冰凍牛肉，只好一任自己生意被人家奪去。在國際競爭市場中，每年都有若干種新工業被人家擠倒，犧牲者愈來愈多。

假使一任事情之自然而不加以人力的干涉，則每種受威脅的企業都將變更牠自己的方法。那適應能力最小的各種工業循着物競天擇的定律，將盡歸於淘汰，每個國家或每個省分均將專門製造那可以獲取最好銷路的商品。這種現象是利於消費者，並可增進一般繁榮的。不幸這時正是國家主義征服了全部歐洲的時候，各國都把關稅壁壘築了起來。於是企業界便認爲這是一種方便的手段，隨時都可以利用牠來抵制國外競爭。

這樣一來，一切受到損害或受到威脅的企業定將訴之政府而請求實行保護關稅。國家本來代表一般公眾的利益，理應保護消費者，但是大眾的想像中，最初還都以爲關稅是一種由外國人負擔的租稅。他們不曉得：一種外國貨，加了五個法郎的關稅上去，其賣價將同時貴了五個法郎；事實上的納稅者是買主，不是賣主。不僅如此，連本國所製造即在國內運銷的同類貨物也將按相同的比例而增價。假定法國由他國輸入生鐵十萬噸，每噸課稅五法郎，但法國所消費的生鐵，除這十萬噸外，還有國產生鐵一百萬噸，在這種情形下，法國國庫僅收入五十萬法郎，但法國國民，除了納五十萬法郎的關稅外，還得另外拿出五百萬法郎來，可是這筆款項並非納給國家，卻是

孝敬給鋼鐵實業家了，消費者不明瞭這一點，因為他所付的那筆錢是包含在物價之中，致使他一時覺察不出來。不過久而久之，他總會覺得生活費——這是一個含糊而不確定的東西——的增加罷了。由生產者的立場來看，納一點點的關稅就可以把他所賣的物品件件都漲起價來，所以他們甘願犧牲一筆巨款來充作關稅。因此他們不惜想盡方法來支配政治上的勢力。

代議制的民主政治不僅不能減弱此項勢力，卻反把種種新的方法貢獻給牠們，好替牠們助威。各政黨都會試圖求助於有力量的工業集團，黨中經費全仰賴於牠們的津貼。保護貿易主義派最初自然是和保守黨發生關係；但民主黨爲了戰勝牠的政敵起見——這是牠的主要目的——也漸漸地和保護貿易主義者接近起來，牠的託詞是保護小工業，小農人甚至保護勞動者。至於議會中的社會主義派和國際主義派的議員，也都是贊同有利於大工業的保護關稅的，而以替無產階級防止失業或防止減低工資爲其藉口。

經濟的國家主義

自此以後，國家受到各方面的懇求，便開始向經濟生活的各部門中（如農，商，工，航等業）進行干涉的活動。大多數的企業，因爲有國家的保護可恃，便都苟且偷安，不知改革自己的短處，只知頻頻呼籲國家的保護。保護政策原本是一種暫時的並且有限制的便利辦法，這樣一來，竟變成一種普遍而永久的制度了。在政治學的語彙中，添加了種種的新名辭，如「國家工業」，「國家商業」，「國家農業」——只有那足以代表整個國家的消費者，

這一個名目反被人家忘到九霄雲外去了。結局，全國國民都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只要是考慮到自己的經濟活動，便不能不聯想到國家的政治制度。

當法國革命奠定了現代國家主義的基礎時，在政治的範圍內，牠雖把國家尊爲全能的支配者，但國家的經濟活動卻被牠加上了嚴格的限制，而只叫國家保持一切國民在從業能力上的均勢。這就是所謂放任主義 (*Laissez-faire*)。可是，經過了一次奇怪的翻變，在一世紀之中，一切都改變了。這時國家不僅管理某些重要的公共事業，就連其他也都與以補助，並且憑藉關稅制度，幾乎把各部門的職業活動都能加以支配了。而且沒有一國不是如此。就連那些最反對國家干涉私事的人們，現在也大喊着要求國家的保護，以便抵制國外的競爭了。

我們可以說：工業革命會把國家觀念加以改變，而改變的方向恰好和牠自己的發展趨勢以及國家的發展趨勢正相矛盾，保護貿易主義者把政治和經濟融合起來，把嚴酷的神話硬加在活的現實之上，結果二者都受了很大的損傷。

可是這樣的融合只能是局部而且不澈底的。經濟相依之定律有那樣迫切的作用，沒有一個國家能够把牠完全置諸不問而逃向絕對孤立之途。即便在那最落後的國家，也會有幾種工業，只靠天時地利和長久的沿革就能支持得住，而怕國外競爭的。實行保護政策反足以招致他國的報復而阻礙此項工業的向外發展結果一定會惹起牠們的反抗。一位製造家，站在原料消費者的立場上，會主張自由貿易，但如果站在國產推銷商的立場上，就會一變而主張保護貿易了。例如法國的織業會反對保護紡業的關稅，爲的是好能買到廉價的英國棉紗；但一

方面他們卻儘管要求政府對於英國的織物課以極高的關稅。因此，在一國之中，甚至一種工業之中，都會發生激烈的爭持，但結果總會歸於妥協，使得各國之間，藉此反有互相讓步的餘地。

所以大戰以前，各國之間曾訂立了一個普遍的商約制度，根據此項商約，各國政府都把關稅減低，而且減稅的期間頗為長久，即以此為條件而要求他國對於本國也予以同樣的讓步。這種制度，在某種限度以內確曾保持住國際貿易的流通作用；譬如國際貿易是一條河流，各國的關稅制度便好似水閘一般，把河流分作許多段落，但這時的水閘是留有水門的，只要付了通過稅，便有流過去的門路。於是國家主權的原則和國際貿易的需要之間已有了調和之道——雖然各國還都保留着關閉水閘和改變最低水準標之權。因此，每到一種商約滿期之時，一國內利害相反的團體之間便會發生激烈的鬭爭，同時國際之間也會發生軋轢。負商訂條約之責者當然是各國的政府，特別是政府中的外交家。他們不僅要藉此增進自己的經濟利益，同時還想藉此貫徹自己的政治野心，有時候爲了達到他們的目的，甚且不惜利用軍事力量和政治力量。所以每當商約快要滿期而進行重訂的磋商時，往往正是國際關係緊張的時候；「關稅戰爭」有時竟會惹起軍事上的衝突。

大英帝國主義之降生

當十九世紀末葉，世界各國都被自足自給的觀念所迷。除了國家之外，牠們不能想像還有什麼別種形式的集團生活，牠們認爲經濟自主和政治自主二者是必須要互相伴隨的。各國都想把一切必要而不可少的工業，在

本國的領土以內盡量地培植起來。各小國在這種企圖上確曾有相當的成就，而把經濟國家主義的壁壘在國境周圍建築起來。但此項壁壘當然免不了許多罅隙。

然而這種地理上的限制很不合乎現代的機械時代。工業正在發展的國家，不久便會爲事實所迫，非向國外尋求原料與市場不可。但這決不是說要把國家神話卽此放棄。不過事實既已證明政治制度的構造容納不下工業的膨脹，所以牠們便認爲非把這個構造加以擴充以便應合工業的需要不可。到了這時，那政治與經濟融合的新型態，卽帝國主義便袍笏登場了。把帝國主義理論加以明白的陳述並施諸實行的第一個先進國家就是英國。

我們已經講過：自從十九世紀開始以來，英國大工業怎樣利用特殊的環境而很快地獲得國際上的發展，但因偏重工業的緣故，致使耕地日趨荒蕪，漸漸就不夠供給民食之所需了。迫於這種情勢，英國只好在工業與農業二者中選擇其一，結局她決定犧牲她的經濟自主以便達到工業上的國際相依，因此明白地採納自由貿易政策。可是她雖然想讓其他國家也跟着她一致行動，事實上卻沒有辦到。大陸諸國看見她的成功便都漸漸振奮起來，竭力抄襲她的辦法而把自己的工業建設起來，對於英國的製造品多少要阻止牠向本國市場推銷。結果，迫得英國不得不仰賴於更遠的國家來供給原料，食糧和市場給她。

幸虧由克倫威爾 (Cromwell) 到納爾遜 (Nelson) 這一百五十年當中，英國打了好多次勝仗，在全球各地到處都有了屬地。十七十八世紀的冒險遠征家不過是開闢了若干商業殖民地，原意僅在替母國採辦些香料，金子，象牙，棉花，皮毛等希罕的物品。可是等到母國的工業漸漸專門化起來，各殖民地便也起而仿效，專門替母國生

產一些補充的物品。加拿大出產的是五穀和木料，印度埃及是棉花，南非和澳洲是羊毛和金子。牠們即以此項產品爲代價而購買曼徹斯德的織物，布刺德佛德的毛織物，伯明罕的機器和器具，而且購買的數量是日益增加的。這時各殖民地正有建築鐵路的需要，英國的鋼鐵工業便替牠們建築起來。倫敦的各銀行供給築路所需的資本給牠們，各殖民地就以銷售原料所得的收入支付利息。這樣一來一往的貿易使得英國的商船可以賺得很多的運費，而母國的經濟力便隨着殖民地的發展而愈益擴張。

同時，英國並不嫌惡向帝國的範圍以外去買或賣。她也不阻止她的殖民地和別國貿易。設使澳洲把所產的羊毛輸出一部分到法國或德國去，所用的船舶大都是英國籍，而且販賣所得的代價，時常會拿到英國的市場上去買東西。就因爲英國在世界經濟上已居領袖地位，所以她纔能保持自由主義。她的自由主義是有利於她自己的。

英國的政治也顯示着同樣的寬大態度。那些住有白色人種的領地，如加拿大，好望角，澳洲，新西蘭，都已獲得自治之權。只有那些住着有色人種的殖民地，因尙未達到自治的程度，所以仍在母國的直接管理之下。一七八三年美洲各殖民地的革命給她一種教訓；自那時以後，她便再也不想把海外殖民地當作母國的附庸了。國家神話現在已經有了伸縮力。

可是，她決不是要把殖民地放棄。表面上是母國替海外一切屬地和殖民地負擔國防的費用，以示寬仁的態度（這種寬仁的態度，事先不是沒有經過一番審慎考慮的。）事實上只是禁止這些殖民地自有海陸軍隊，同時，

母國的海軍至少也要和兩個次一等的海上強國的聯合海軍維持同等的威力。而且因爲連續地在海上做了許多冒險的活動，並締結了許多順利的條約，在每一條航路上沿路都已佈設了許多堅固的前哨：如直布羅陀，摩爾太，蘇彝士，亞登，新加坡等。沿着各大洋的海岸線她都設有煤站，準許各國的船舶上煤，但隨時可以拒絕敵國海軍利用此項煤站。這個巧妙的政策使她獲得兩重利益：一方既足以保護屬地以防他國的覬覦，他方又足以防止各殖民地的離貳而保持自己的安全。

軍事組織和外交把經濟的連帶關係加強，有時或竟替代了後者的地位。各自治領雖能自由發展而不受阻礙，但卻不能叛離母國的主權。那嚴格的國家程式，現在已經換了一個比較有伸縮力的帝國程式。可是在這個變化之中，統治精神一點也沒有喪失。

一旦到了工業的發展不能再爲國家的領土所拘限，那政治組織便不得不設法擴大，以便把經濟上能有互相彌補作用的國家集合體，整個包容起來。這正是帝國主義理想之精髓。大不列顛所以能夠享有經濟相依的一切利益至一世紀之久而絲毫沒有失掉國家的連帶關係，就因爲她善於把這兩個矛盾的理想巧妙地結合起來。結局，她竟能達到空前的物質繁榮，同時她的政治力量也是自從羅馬帝國以後，世界所未前聞的。維多利亞時代的燦爛光輝，其由來也不外乎此。

法國之效法英國

英國獲得這樣非常的成功，誘使他國決意和她比賽。法國是大陸上第一個採取種種新政策的國家，同時也是第一個採納帝國主義公式的。她的工業改革較之她的對手英國要遲緩了許多，可是到了一八八〇年左右，諾曼底、諾爾和佛日的紡織工業，以及中區的鐵工業都覺得國內市場太狹窄了。大政治家非里（Jules Ferry）便想出聯合各大工業城市和各港口的商人而組織殖民團體的辦法。從那時起，法國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便整個用來開拓海外的疆土了。

阿爾及利亞（Algeria）終於被她征服並平定了；後來又添上了突尼西亞（Tunisia）的保護領土（一八一——一八三）緊跟着就是拿破侖第三連續佔領了柬埔寨（Cambodia）（一八八三——一八五）、安南和東京三個地方。遠征艦隊由塞內加爾（Senegal）舊居留地出發而奪得奈遮河口（Niger）黃金海岸（Gold Coast）和達荷美（Dahomey），不久就把這三個地方聯合起來，組成那廣大的法屬西非利加（一八八〇——一八五）。同時，薩瓦格南·得·布拉薩（Savorgnan de Brazza）率領着一班勇敢的勘查家，把法屬赤道非利加由剛果河擴展到差德湖（Lake Tchad）（一八八五——一九八）。一八九五年，法國又略取了那龐大的馬達加斯加島（Madagascar）。一九〇四年以後，因與英國組成協商而得在摩洛哥設保護國，當時固然不免惹起種種國際糾紛（一九一二）。這時她的軍事力量已然越過撒哈拉大沙漠，不久，法屬北非利加、法屬西非利加和法屬赤道非利加便都聯成一氣了。在三十年之內，法國的勢力遍及黑暗大陸，所組成的殖民帝國決不亞於大英帝國。

不幸，法國當局不明瞭他們所要效法的英國，其強盛和繁榮並不僅在於領土的擴張和人口的增加，而是由於那偉大的航線系統和電報系統，藉此纔可以把遠方各國的原料和糧食採辦到倫敦來，再把本國的製造品運銷到各國去。所以，法國儘管竭力獎勵造船業和航運業，但始終未能創辦一個興隆的商船隊，而且法國的銀行也組織不起來一個長期信用組織；與遠方各國貿易卻非有這種組織不可。因此法國各殖民地的出產就被他國乘機吸取去了；例如阿爾及利亞的鑛產和阿爾法草（*alpha grass*）大半運往英國，印度支那的米銷至日本，馬達加斯加的牲口運往德蘭士瓦，剛果的橡膠運往安特衛普，蘇丹的木料運往美洲。

另一方面，假使法國不是決意把本國的過度保護關稅制度，推廣實施到各殖民地去，無疑地，歐洲其他各國的製造品定會侵入她的殖民地，所以法國的各殖民地是只許和母國自由貿易的。這種制度使得法國的海外屬地成爲母國絲織工業和金屬工業的強制推銷市場，可是這種辦法未免得不償失，而且防害屬地的發展。直到現在，法國經濟帝國主義一向都是仿效大英帝國主義，可是東施效顰弄巧反拙了。

德國效法英國的結果，比較法國強的多了。自從帝國組成，在俾斯麥的禁止稅率保護之下，萊因河一帶的工業確已獲得重要地位（一八九七）；可是自從一八九〇年以後，德國工業就已覺得自己的力量很夠向世界市場插足的了。那位老總理的政策便馬上被人推翻，於是卡普里微（*Caprivi*）就採用了商約制度。生產既已日趨專門化，德國便開始向海外尋求可以補助本國工業的土地。不幸最好的地方都已被英法佔領，結局，德國所得只有非洲幾塊零碎的地方（多哥蘭（*Togoland*），喀麥隆（*Kamerun*），西南阿非利加，東阿非利加）和太平洋

上幾個無關重要的島嶼，此外還有一個租借的港灣，即中國海岸上的膠州灣（一八九八）。

可是柏林政府，恪守着牠那現實的，實際的精神，十分明瞭經濟帝國主義的目的不在領土的征服而在市場的開闢。於是德國的造船工廠開始建造一個商船隊，不久之後，除了英國之外沒有那一國再能勝過她了。漢堡，布勒門與世界的一切大商港之間都有了定期航線。德國船有時情願做賠本的生意，好把世界貿易的潮流吸向本國來。辦出口的銀行踴躍放出長期信用。這樣一來，如果物價相同的話，德國的經紀人就能夠奪取競爭者的生意了。法國迫於這種局勢，她的貿易範圍，便不得不以自己的殖民地為限，而且還要靠着保護關稅的壁壘，纔能把此項殖民地市場保持下來，留給自己開拓。英國人也只好眼看着在一切海外市場，甚至連本國屬地的市場上，德國產品漸漸奪取本國產品的銷路。除站在一旁發怒而外沒有別的办法。

但德國卻十分明瞭必須得到一些能和本國在政治上經濟上結成種種關係的地方，以補本國工業之不足而確保永久的，穩固的市場。不過有英國在一旁妬忌地監視着而英國的海軍威力又較德國為強，所以德國便只好向大陸上的鄰國進攻了，於是她就和奧匈密切地聯合着，向巴爾幹半島上尋求市場和同盟，因為那地方的農業，天然可以做為她的工業的輔佐。當奧國向塞羅尼加（Salonika）伸張勢力的時候，德國便和土耳其皇帝取一致行動了。兌赤利凡得航線上（Deutsche Levant line）的船舶雖僅往來於利凡得海岸（即地中海東岸一帶地方之別名，由希臘西部起至埃及西部止）各海灣之間，但越過敘利亞而建的那條赫查茲鐵路（Hedjaz railway）卻能把英國在蘇彝士的地位給轉變了。巴格達鐵路（Bagdad railway）的特許建築權把德國的工程

師和商人引入印度的門戶，使他們得到在阿那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從事灌溉事業的機會。如果這偉大的計劃得告成功的話——事實上幾乎已成功了——那末，由北海到波斯灣之間，便將組成一個龐大而連接的帝國了。凡爲日爾曼民族所需的一切原料和食糧，在這個帝國的境域以內都將有得出產，同時這也就是替他們建了一個幾乎具有無限吸收力的市場。德國的仿效英國可謂仿效得最好而最像，不過規模比較狹小，而緊密罷了。

其他帝國主義

意大利當然也免不了要追隨比鄰諸強國的先例。遠在一八八二年的時候，她就已向非洲的腹地插足而開發了她的厄立特利亞殖民地。一八九二年的時候，她原想對阿比西尼亞作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因爲遭了馬騷 (Massuah) 的禍難之後，她纔放棄此項企圖。在十九世紀的最末十年中，她藉助於外資，尤其是德國的資本，在波河流域建設起重要的冶金工業和紡織工業。後來，她又想在地中海的東岸割據一塊地方。她在突尼斯亞進行密謀，利用英法關於蘇丹的協定，而得在黎波里取得種種權利（一九〇〇年）。摩洛哥的危局使她得乘機把這塊地方奪取過來設爲殖民地（一九一一——一二）。後來，她又在多島海佔領了幾個島子，並超越亞達里亞灣而向小亞細亞伸張勢力。這就是意大利走向經濟帝國主義的第一步。

約莫在同一個時候，俄國也加入了此項國際競賽。在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之間，俄國藉法比兩國資本之助，在索斯諾尾次 (Sosnowice) 和頓尼次河的煤礦區建設起重要的冶金工廠和紡織工廠。她那廣大的帝國

各部分之間都有鐵路連貫起來。一八八八年她建起橫越裏海鐵路 (Trans-Caspian) 以便把土耳其所產的棉花運到莫斯科的各紡績廠。又因本國農民之過貧，本國的工業勢不能僅以本國為市場，她就夢想着要由陸路通到中國的市場，蓋那時正是列強試圖由水路達到中國市場的時候。一八九一年至一九〇一年之間，她果然把橫貫西比利亞的大鐵路建築成功，如與橫越滿洲鐵路相連便可通到旅順，進一步再和其他鐵路相連，即可直達中國內地。

這樣一來，在俄國中心地區製造的棉織物，器械，鐵軌，機器等，竟能在揚子江兩岸找到顧客，而那老大帝國的茶絲，和一切珍貴之品便也經由俄國而運至歐洲各市場。

這時日本也經過一個很快的變化，自從一八六八年以後，由貴族和武士的封建國家一變而為歐洲式的國家。她藉英國資本之助，不到二十年之中，就把鐵路，電報，輪船，冶金工廠，紡織工業等等統建設起來，此外還成立一個兩院制的議會，組織一個四十萬人的陸軍和海軍。約莫一八九〇年左右，日本開始覺察本國所產之米不夠供養她那稠密的人口，本國的煤鐵不夠供給本國工業之所需，並且本國的市場也推銷不盡本國所製的織物和機器。這時她就已看中了中國，特別是滿洲，想把這塊地方來補充本國經濟資源之不足，來救濟本國市場之狹隘。到了一八九四年，日本已把臺灣奪取過來，並向北直隸灣伸足，不過當時因為歐洲列強的掣肘，一時未能如願以償罷了。

其次就要說到北美合衆國，現在輪到她的頭上來採納那個新信條了。在十九世紀最初的二十五年當中，她

一向都是替東半球的歐亞非各洲充作廣闊的殖民地。人口過多而且貧窮的中歐各國把移民送到這裏，各工業國則把織物、器具和資本送到這裏來，而美國人幾乎全是務農，便以五穀、棉花和煙草做爲支付種種進口的代價，於是那經濟相依的定律就得自由運轉了。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末葉，美國人就開始轉了念頭，爲什麼不自己生產原料以供自己之所需呢？因此，她就在賓夕法尼亞的煤田周圍建起龐大的冶金工廠，並在新英格蘭建起紡織工廠。同時築起幾乎達到禁止程度的關稅壁壘（馬克金來 McKinley 的關稅稅則），以便保護這些工業而抵制歐洲強硬的競爭。可是不久牠們的生產額便超過本國市場的需要，儘管本國市場怎樣大也沒有用。大的商業托辣斯便起首向海外矚目了。但是歐洲已近飽和之點，而非洲和亞洲內地又都已被他國分配淨盡。牠們便只好轉向遠東去。又因大出口工業都建在大西洋方西，牠們便把巴拿馬運河開浚完成，好讓東部的工廠可以迅速地通到太平洋。

於是到了二十世紀初頭，大工業國家比鄰而立，佈滿了整個的北半球，由英而法而意，而奧德，而俄日而美，形成一個連續地帶。在農業時代之中，這些國家的組織，原都是根據國家神話的箴規而構成的，（即領土、語言、種族和文化的統一）可是助牠們致富的那個意外的機械革命卻同時迫得牠們不得不把歷史的體制放棄，而向國境以外去尋求那可以彌補本國不足的與家；大抵這些國家決非牠們所能同化的。到了這時，牠們便已超過國家主義的階段。

位居其次的，還有那未經完全工業化的弱小民族，謹謹慎慎地把牠們自己拘限在狹窄的國家主義範圍當

中，而那比較強大，比較先進的國家卻硬想把牠們拖入自己的勢力圈裏。

位居最後的就是那些文化落後的民族，牠們尚未達到國家主義的階段，並且未經工業的洗禮。

會有數百年之久，那些大國對於這些落後的民族毫末介意，僅僅在牠們領土之內設定一些居留地而已；但一旦到了大工業開始需要向外尋求種種原料（如棉花，橡膠，銅，亞鉛等）並推銷種種製品（如棉織物，火酒，錫製鍋，釜等等）的時候，牠們便熱烈地想要替這些落後的民族（黑人，印度人，以及婆羅洲，堪察加的土著）啓迪文化了。在查勘家和傳教士的後面，緊跟着商人，建築工程師，金融家以及關稅人員（金融家借債給土人，由關稅人員向土人徵稅以付利息。）每個大工業國都有牠自己的查勘者，出口商，銀行家，並各有嚴密的組織，專門從事開發落後的國家。每個國家都要把牠自己的航線，鐵路線和電報線盡力向外伸張，有如蝸牛之伸出觸角。在一世紀之中，全世界被他們走遍了，查勘遍了，開發遍了。

不幸，到了最後，各國的查勘隊總會有一天遇到一起，並爲了開發同一個地方而互相爭鬪；他們便各自訴之本國政府。於是因爲地球的開發，因爲落後民族的啓迪而惹起不斷的衝突，把世界所有大國都捲入漩渦了。

註一 聖西門早已預料到工業主義定有這個必然的結果。在一八一六年，他的意見就以爲：「戰爭是有害的，即使由勝利者的立場來看，依

然如此。」並曾指出來：歐洲需要一個全歐議會，完全由工業家和科學家組織起來，其權力應駕乎各國政府之上，以便裁判牠們之間的爭論。他那時就已預料到國際聯盟了。第一個把工業主義的將來和必然的結果給指出來的就是聖西門派，他們實在有先見之明。不幸他們想創造一種神話，好叫一般民衆接受他們的理想，致使他們的聲名爲之掃地。然而聖西門各大門徒的種種作爲無不由聖氏的理論出發，例如：瑟發雷之締結一八六〇年的商約，雷塞布之開掘蘇彝士運河，佩累耳兄弟之創設第一個大信用機關都是如此。這是我們太容易忘卻的。

第十四章 商戰

假定工業革命，提早一個世紀而發生於國家神話降生之前，或僅假定各民族國家尚在幼稚時間，對於經濟事項還不知關心，只知一意信奉放任主義的時候，工業革命就已到了發展圓滿的境地，在這種場合之下，無論那一家工業公司或商業公司都將自行冒險去尋求原料與市場。如果兩家公司在一個礦區或一個市場上競爭，不論屬於那一國籍，那設備比較完善而買賣價格都比較適宜的一家定將獲得最後勝利。所以受損失的只是個人，不是國家社會，而且這種損失大半有方法補償。這樣一來，世界的開發就一定能夠依照着整齊而和平的方式前進了。

但實際上，當七大國的工業到了向海外擴展的階段，國家神話就早已深入人心了。諸種强有力的制度，無論司法制度，財政制度，軍事制度或關稅制度都已把這種神話具體表現出來，而國外競爭亦已把經濟原素與政治原素結合爲一了。新生產制度實施的結果，把大衆的福利增加了那麼多，以致大衆都把牠視爲公共遺產之一部。因此，人人都相信保護私營工業乃國家之義務，其重要決不減於保護國土之完整。

等到各種工業之中，有的已經開始向國境以外伸展，大衆便公認國旗應該隨着貿易走。所以如果一種工業在海外市場上感覺有支持不住的危險時，牠當然會要求本國政府出力援助。可是國外的敵手也根據同樣原則

而行動，於是私營商店的競爭就一變而成爲國家的衝突了。

經濟武器

爲達到持久爭鬪的目的，牠們不惜把全套經濟武器一齊搬弄出來，這套武器，或用於攻或用於守，樣樣俱全。頭一種兵器就是關稅，這是各國已經用了許久現在又拿了出來的。一種工業遇到所處地位不利，或原料缺乏，或設備不善，或不得不用劣等勞工時，便要求保護稅率爲之保護。這種保護稅率的制定，原是恪守着經濟國家主義的，當然不會有什麼阻力就能獲得一般的承認了。這乃是弱者的武器。

可是那設備比較完善的另外一國的工業，當然也不情願一個重要的市場被人這樣閉鎖起來。牠定會要求該國政府採取報復政策。甲國既然拒絕乙國的製品進口，乙國當然也要拒絕甲國的製品進口。結果就是長期而煩累的關稅戰爭。關稅戰爭之結局，照例不外是締結一種和平條約，叫做商約，其中約定種種互相讓步的辦法；可是這種讓步只是暫時的，因爲雙方都希望藉某種技術的改進，把己方讓給人家的各種利益竭力恢復過來。所以這種條約只不過是一種過渡的辦法而已。譬如意國給予某種利益於法國的棉紗，致使德英的棉紗無法在米蘭和都靈推銷，這時倫敦政府和柏林政府定會插足進來向意國要求平等待遇。可見兩國之間的關稅稅率一有改變，馬上會引起所有其他各國的反響；所以爲避免他國的駭異起見，締約國常常要求對方予以最惠國條款的待遇，如果情形許可的話。

有時也許發生這樣一種局勢：甲乙兩國互相承認按照最惠國待遇，同時卻拒絕第三國的要求而不給以同樣待遇。這不啻是一種經濟同盟，實際上和兩國聯盟來抵禦一個共同的敵人一樣。這種同盟定然會使各關係國間發生嚴重的緊張局勢。受他國關稅壁壘排斥的國家將設法抵銷敵人的阻力。有時對於受打擊的那種工業給以出口獎勵金或返還已納的出口稅，以便補償牠因敵方所征的關稅而受的損失。如果這筆負擔不能列入國家預算之內，那末，有關係的諸種企業，便將聯合起來，憑藉保護稅率的力量而提高國內市場上的價格，然後用所得的額外利潤來補助出口商，出口商藉此就能將國外市場上的賣價減低，以便應付外國的競爭者。這就叫做傾銷政策（或譯音做丹拚政策 *dumping*）。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啻由私營的公司來分擔出口獎勵金，但歸根到底，這筆錢還是牠們靠着國家所定的保護稅率向本國消費者的口袋中掏取出來的。這誠然不能不說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擡高向國內同胞所索的賣價，以便賤售與外國人！可是經濟國家主義卻竟養成了這樣一種重視生產者而輕視消費者的成見，而且這種成見很深，以致大眾的意見，爲了保全本國工業的向外擴展，便寧願忍受犧牲而默認這種成見。

在別種場合，國家的干涉也許不是直接影響國外的賣價，而是人爲地減低運輸費用。至於鐵路或輪船公司，因此所受的損失，就用一種郵務補助金或其他形式之獎勵金來抵償。大戰以前，德國人在這方面曾經推演出一種很巧妙的組織。德帝國如想在某地開闢一個新市場的時候，凡向那地方運送的產品都叫牠納一筆總括的運費，譬如說，由德勒斯登運到剛果，便把兩地間一切的鐵路運費和輪船運費都包括在內。對於輪船公司所付的雖

仍照通常運價，但鐵路是屬於國有的，所以牠的運價就無妨打一個大大的折扣了。藉着這種方法，薩克森的棉貨就能運銷幾內亞，且售價較英貨爲廉。可是一旦這種暗地裏的傾銷政策已經抓到了主顧，德帝國的鐵路便漸漸地恢復通常的運費了，而且運輸的數量增加頗巨，所以牠們以前的損失是不難填補回來的。

說到這一點，在新興國家建築鐵路是一個很有效的辦法。譬如，波斯尼亞境內的各鐵路（Bosnian railways）如果和塞刺也窩（Sarajevo）至諾尼巴薩（Novi Bazar）間的土耳其各鐵路連貫起來，奧匈和德國的貨物便容易向巴爾幹半島全境推銷，而且經由薩羅尼加（Salonika）銷至利凡得（Levant）（地中海東岸）一帶。反之，如果這個連貫政策不能成功，而由多腦河流域修築一條鐵路，通至亞得里亞海，中途經過羅馬尼加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則巴爾幹的產品將易於向意法的各海口運輸，而意法的產品也將向巴爾幹半島傾銷，不過德奧的貿易卻因此而吃虧了。

不過要建築此項鐵路，事先必須得到該地當局的認可。爲達到此項目的，政治力量是要運用的：辦法不外借款與該地當局以便購買槍械軍艦，或與該地結爲同盟，而共禦一敵。帝國主義國家仗着這種種花樣攻守兼施的經濟武器，繼續不斷地干涉國際市場中私營公司的鬭爭。結果使得各國間商業關係極端紛亂，極端不穩。

殖民地之特徵

在需要巨額資本的大企業，牠的資本有呆滯若干年的可能，不穩的局勢很足以妨害牠。因此凡是工業國無

不注意新興國家，總想設法開闢一個獨佔的市場，把外國的競爭勢力排除得乾乾淨淨。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不惜把全般手段，由頂和平的以至頂暴烈的，一齊施展出來。

(甲) 第一種手段就是殖民地的征服，其步驟是：(一) 軍隊的遠征；(二) 壓服了當地的政府；(三) 設立一個歐洲式的行政機關，還附帶着一個和母國相同的關稅制度。法國之於馬達加斯加與達荷美，意國之於的黎波里坦尼亞 (Tripolitania)，德國之於卡美龍斯 (Camerons) 與多哥蘭 (Togoland)，英國之於奈機立亞 (Nigeria) 都是用的這種策略。被征服的民族，突然喪失了自己的傳統制度，曉得是做了人家的奴隸，牠們的領袖，失掉了地位，就會乘機來煽惑土民，醞釀作亂了。

(乙) 於是侵略國又想出一種比較妥當的辦法，就是讓土人的領袖仍舊居於原來的地位，並且表面上仍叫他握着威權，但侵略者卻要派一個駐節的司令官，率領若干駐屯軍來作他的輔佐，並替他擔任顧問和嚮導，以謀當地的改進。這個駐節司令官就是事實上的行政領袖，他自然要替他本國保留一切的特權和貿易的便利。這就是保護國制度，英國對於印度，埃及，法國對於安南，突尼斯亞和摩洛哥都是採的這種制度。

(丙) 有時侵略國會覺得一種更審慎的「和平侵入」之方式，是宜於採取的。在這種場合之下，就不用軍事的手干涉了，不過把一筆巨款貸給當地的政府——結果定然會使牠債臺高壘，連利息都付不起，這時侵略國就有藉口而可以奪取該地的關稅權，要求築鐵路，開鑛山，開商埠種種特權，並藉當地政府的名義征收種種租稅以便清償債權人。在歐戰以前，列強對於土耳其和波斯就用這種政策。

有時也許好幾個工業國同時對於一塊地方使用同樣的策略，其結果就不免要引起種種糾葛與紛擾，如像博斯福魯（Bosphorus）事件那樣。往往糾紛的結局，對手國會互相妥協，商定大家利益均沾，共同來開發那塊地方，有時甚至不使那表面上仍握主權的當地政府知道，大家約定暗中進行。在這種場合，牠們表面上固然仍是宣稱尊重該國政治上的完整，可是事實上早已把特權瓜分了；例如，俄德法三國會約定分割土耳其鐵路的建築特權，靠海沿岸者，歸於俄國，在安那托力亞（Anatolia）者歸於德國，在敘利亞者歸於法國，這就是所謂劃定勢力範圍的辦法。

於是到了十九世紀末葉，一整套的經濟戰術已經推演出來，七個帝國主義國家都用這種戰術互相對敵，不過技術有高下之不同罷了。每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是把牠的殖民地或在牠統治以下的市場當作立足點而努力向四鄰的地方伸張勢力。到最後，各國的踏勘家，工程師，和商人當然不免要遇在一起，結果全世界幾乎無處不有糾紛。但是令人覺得稀奇的乃是：二十世紀開始的時候，歐洲各大國間的境界早都固定下來，國境戰爭已很少繼續發生之可能。於是各國間的衝突就移轉到遠方各地去了。不僅巴爾幹，土耳其，波斯，就是阿富汗，西藏，滿洲和中國也都已成爲各國逐鹿之所，甚至連那人跡罕至的非洲地方如巴勒加紮爾的低濕地帶和贊鼻齊河流域瀑布的附近也都成爲各國爭奪的目標了。

無疑這只是一個貿易競爭的問題，也就是物產交換和新興國家開發的問題。如果一任競爭的企業自由發展，使牠們之間的爭鬪只靠自由競爭爲武器，則世界的開發定然會按照一種整齊而和平的方式。但是遍及歐洲

各地都已把經濟利益和政治組織融合而爲一，所以每一個競爭的團體都會要求本國政府用種種手段來幫助自己以便對敵人取攻勢或取守勢；所用的手段不外保護關稅，出口獎金，減低運費，征服殖民地，取得保護國以及劃定勢力範圍等等。

「外交」聽「工業」的使喚

各國政府爲保護僑居海外的本國商人起見，都設立起一個領事團，領事團的數目與勢力都是與年而俱增的。按理說，此項官吏既僅以保護私人利益爲職責，當然應該隸屬於貿易部，可是各國政府卻藉口於領事不得不干涉當地的司法，並與當地官憲接頭而把牠隸屬於外交部。

這樣一來，保護工業向外擴展的任務就落到外交家的手中了。於是此項要人便負了兩重任務，同時是政治的，又是經濟的。在政治上根據國家神話的理由，他們的任務是保持國境的安全與保全列強間的勢力均衡。他們可以指揮國家的軍隊；無論是陸軍還是海軍（艦隊是隨時準備駛向世界任何地方的）。在經濟上，他們要保護本國工業，抵制一切危險的競爭，並輔助本國工業向遠近各地擴展。他們可以和外國締結商約，要求鐵路建築特許權，磋商設定保護國或劃定勢力範圍。爲達到此項目的，他們可以使用種種攻式或守式的策略，如獎勵金，關稅等等。

他們手裏握着兩種武器——一種是保衛國土所用的，一種是扶助工業擴展所用的。久而久之，他們定然會

把他們的兩種任務合而爲一。商業報紙的頻繁宣傳，和國家神話之變爲經濟國家主義，都鼓勵着他們走向這個趨勢。

外交家把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視爲一體，他們有時靠軍事力量來獲得經濟利益，也有時靠經濟力量來獲得政治利益。譬如某國爲替該國某公司索取在君士坦丁堡建築碼頭或在阿那托力亞延長鐵路應得之紅利，便不惜派艦到博斯福魯或士麥拿去示威。這就是用軍事力量來取得經濟利益之一例。又如，柏爾格雷德政府如果表示甚願聽取俄國的建議，則奧國的稅關將藉口所有塞爾維亞的豬都染有傳染病而禁止其入口——這個辦法很可以致塞國養豬業的死亡。他們當然會要求本國政府馬上向奧政府和解。這就是用經濟力量取得政治利益之一例。

於是各國政府和人民都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就是把國境安全和工業擴展的兩種需要視同一體。經濟和政治的融合不僅在人心上而且在事實上也表現出來了。倘若一國政府目睹經濟力量的失敗，牠當然要訴之武力，這是毫無足奇的。

工業擴展的戰爭

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三年之間，歐洲爲殖民熱所侵襲，自從殖民熱發生以後，還不到十年就有第一次軍事衝突的爆發。從那時起，約二十年之中，世界各地的戰事幾乎不斷的發生。

一八九四年，日本突然打開中國緊閉的門戶。日本的一戰成功把老大中國的軍事弱點和政治弱點暴露無遺。歐洲列強（俄、法、德）雖然立刻迫着日本放棄南滿洲，而僅把臺灣給了她，但她們卻靠着她的經驗而獲得不少利益。一八九七年，德國以兩教士的被殺為藉口而奪佔膠洲灣，迫中國把該地租給她。於是山東變為德國的勢力範圍。俄國佔據旅順，藉滿洲的鐵路把這地方和西伯利亞大鐵路連貫起來。英國佔據威海衛，幾乎等於扼住了北京的咽喉。法國佔據南方的廣州灣，並獲得由東京築路直達雲南的特許權。同時，列強還要求特許開採鑛山和認可建築一萬基羅米突左右的鐵路。

一九〇〇年，義和團發生，他們的目的是要阻止外人的這種和平侵入。俄、法、英、德、奧、義、美、日八國馬上就組織聯軍，在一位德國元帥的率領之下，進行軍事行動，佔領北京，迫中國承認種種條件。後來便有一個法比合辦的公可把北京至漢口的鐵路建築起來。英美兩國注意於漢口到廣州的鐵路線，而德國則在山東建築鐵路。

日本認為自己沒有分到應得的部分，她便極為注意俄國向滿洲和高麗的和平侵入，於一九〇四年，乘機突襲旅順口。經過十八個月的血戰，卒能打勝俄國人；但因為美國居中調停，就把滿洲分成兩個勢力範圍，把北部歸於俄國，只把南部給了日本。後來不久，日本就把高麗設為保護國。

這時又有一個新的夥伴上了舞臺——她就是美國。自從一八九七年以後，美國工業，剛剛得到馬克金來（McKinley）保護政策的扶助，便開始注意到遠東的市場，知道她的工業發展，將來總會有一天需要這個市場。到了一八九八年，她便把星光燦爛的國旗在夏威夷諸島之上飄揚起來。此地不啻是通中國的第一個里程碑。可

是美國的工廠，大半都設在大西洋海岸之上，如要通到太平洋的各市場，勢非把隔絕兩大洋的地峽切斷不可。因此，美國突然抓住古巴叛亂的機會，雖然西班牙已在設法平亂，但美國卻認爲古巴叛亂足以破壞文明，並以梅因軍艦在哈瓦那灣內的爆炸爲藉口而向西班牙宣戰（一八九八）。經過了數月的戰事，華盛頓政府就把波爾多黎各（Puerto Rico）併吞過來，並把古巴夷爲保護國，又把菲律賓收買過來，做爲軍事行動的根據地，以便向中國伸張勢力。同時，美國又佔據了關島（Island of Guam）因爲那地方是舊金山和香港間各路海底電線的會合點（一八九八）。到此時，美國只須再把巴拿馬運河的諸項權利，從那一家破產的法國公司收買過來，並把小小的巴拿馬國從哥倫比亞分離開來，就能絕對地支配通遠東的道路了。

這時阿非利加也起了激烈的爭鬪。有個約瑟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是北明翰的一位鋼鐵實業家，他專好替大英帝國主義鼓吹，英國政府受了他的慫恿，就採納了由開普築鐵路直達開羅的計劃，以爲靠着這條鐵路，英國就容易統治並開發黑暗大陸了。於是啓拆涅（Kitchener）就溯尼羅河而南進，塞西爾羅德斯（Cecil Rhodes）就由開普起程北進，想把那特許公司的領域擴充到諸大湖之畔。法國政府雖曾一度派遣遠征隊到法紹達城（Fashoda）想藉此隔斷啓拆涅南進之路，但因爲受了戰爭的威脅而不得不放棄這個計劃（一八九八）。同時那波耳人的德蘭士瓦小共和國（荷蘭移民所組成）也在設法阻止羅德斯計劃的實現，他們的辦法是加重英國礦業公司的租稅負擔，反對英國建築通過境內的鐵路，並歡迎德國貨的進口。結果，打了差不多三年的仗，使英國損失六萬人的生命和二萬萬的金鎊，纔把這塊地方併入英帝國。英國雖然花了這樣大的代價，

但英國工業卻藉此而獲得阿非利加最富的區域以供自己的開發了。

倫敦內閣爲取得埃及管理權（一九〇四年）就允許把摩洛哥歸法國管領，並把軍略上甚關重要的北方海岸分給西班牙，以爲代價。一九一二年，法國正式宣布摩洛哥爲她的保護國，雖然經過了很久的戰事，但該地的大部分已在法國有效的管理之下。而且德國垂涎許久的鐵路特許權和磷鐵等礦的開發權，現在也屬於法國了。在此期間之中，德國久已想把奧托曼帝國據爲己有，而正在向巴格達建築她那條大鐵路以便侵入該地。她很想參加法英意三國瓜分北阿非利加的協商，並以干涉該三國在阿非利加的分贓爲條件而換取利凡特（地中海東岸之別名）的管領權。但她的這個要求卻被三國加以拒絕，德皇維廉第二因此親自察訪摩洛哥的丹吉爾，要求該地對德國的貿易和商業踏勘家開放門戶；德國外交部並強迫法國把摩洛哥問題提交國際會議討論（一九〇六年阿合西勒會議）；又用種種刺激的政策（如煽動卡薩布蘭卡事件，贊助曼內斯曼兄弟取得鐵礦特許權，派軍艦盤則爾號（Panther）到阿格第爾海口（Agadir），並要求法國割法領剛果的大部分地方以爲認可法國在摩洛哥設保護國的代價）阻止法國之侵入非洲。法英兩國只得把君士坦丁做爲很大的代價付給了她。

帝國主義操縱下之諸民族

俄國在遠東打了敗仗，眼看着日本在滿洲取得殖民地，把中國的門戶鎖閉了一半，她這時便只好把侵略的

目標由黃海轉移到黑海去。她依照她的傳統政策，再向博斯福魯行軍，並且夢想要把橫越裏海鐵路伸長到亞歷山大勒達海灣。她這種企圖使她和德國起了直接的衝突。另一方面，英國認為波斯灣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應算做印度的領屬，因此而拒絕德土間的鐵路以此灣為終點。法國的銀行家，因對敘利亞境內各鐵路有着管理之權，也和德國的鐵路事業（由巴格達到阿勒頗，由赫查茲到達馬士革）時常發生衝突。這三個強國就團結起來，一致對德。英法間訂了關於敘利亞的協定，英俄間訂了關於波斯的協定（一九〇七）。後來她們共備資金組織了一個聯合進步委員會（Committee of Union & Progress），到了一九〇八年的時候，就把維廉第二的同黨阿卜都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土耳其的蘇丹）給推翻了。

但是青年土耳其人，因為受壓迫於同盟國的苛酷的財政管理計劃（查理勞郎計劃 Charles Laurent Plan），而和德國攜手（一九一一年）巴爾幹的各基督教民族（如希臘人，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和門的內哥羅人）便馬上聯合起來抵制他們，把他們逐回君士坦丁堡去。

這些農業民族的企圖是想根據那國家神話的古典的法式來完成牠們的統一。不幸，巴爾幹乃是久經外族侵入的一塊地方，語言，宗族，種族的界限都是極不一定的。各族之間不斷地發生游擊式的戰爭。又因為民族的野心之外，再雜以種種經濟的動機，於是這種戰爭便愈發激烈起來。例如，各族都想接近海口，都想取得港口與鐵路，以便輸出穀物與牲畜，這就是各族間時常發生的問題。各族的政府為解決此項爭端，只有訴之武力；但牠們所用的鎗礮子彈是不得不向英法德各國的工廠去買的，而且為買軍火起見就得向各國借債。

柏林，倫敦，巴黎的外交部當然都會提出種種條件。牠們之所以肯把軍火供給這些小國不過想藉此達到擴展市場的目的。這樣一來，巴爾幹各民族間的軋轢都被諸大工業國利用了來做爲達到帝國主義野心的工具了。不久，每一個大工業國在巴爾幹都有牠自己所能操縱的「軍閥」(Confortiere 原意爲傭兵隊長。)這種軍閥誠然是靠不住的，只要各國肯以借款或軍火爲餌，牠便不惜朝秦暮楚了。

一九一三年的時候，保加利亞國王，遭了俄皇的拒絕，不得向君士坦丁伸足，他便轉而聯絡奧德兩國，向舊日的同盟國下攻擊令。但希臘和塞爾維亞，因有英法的工廠供給豐富的軍火，竟能一戰而敗保加利亞，並佔領了薩羅尼加和摩拿斯提兩城。自是以後，她們便得了極好的地利，能夠阻止奧德兩國的商業向愛琴海伸展了。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三年間巴爾幹的爭端，事實上只是大工業國間的爭鬪；一方面是奧國和德國，另一方面是英俄法三國，牠們把槍械，軍火，信用，以及一切東西供給於交戰國——幾乎只有兵士不是由牠們供給的。牠們的官吏替交戰國作軍事指導，牠們的外交官替交戰國磋商條約，締結同盟（一九一三年倫敦會議。）牠們互相之間，可以說，已經交起手來，只不過尙未直接接觸而已。

由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四年，這期間發生了不下十餘戰，這還是不把革命，叛變，政變，暗殺以及外交上的事件等等計算在內。此項戰事，因其發生於國外的戰場（古巴，滿洲，德蘭士瓦，摩洛哥等地，）所以在起初，外表上只好像是殖民地的遠征一般，但每次戰爭，至少總有一個帝國主義強國參預其間，卻是很明顯的。而且每次戰爭總要削平一些礙着牠們道路的小國。漸漸地，衝突的區域愈來愈近，而到了土耳其，巴爾幹，這時捲入漩渦的便不是

一個強國而是六個強國了。牠們間接地爭鬪了四年，但自從一九一一年以後，這些工業強國個個都懷着國家主義的野心，其間定將發生直接的衝突，已經是很明白了。

帝國主義的衝突

爲阻撓德奧兩國的商業，使不得向愛琴海伸展起見，法英合組的一家有力的商業團體曾經設計要建築打通多腦河與亞得里亞海的鐵路，牠的計劃是要把羅馬尼亞的各鐵路，向塞爾維亞延長，而以布林的西（Brindisi）對岸的阿爾巴尼亞海岸做爲各路的終點。這計畫將使塞爾維亞在商業上得到解放，不必再倚賴奧地利亞、匈牙利、巴爾幹的商業，既能在亞得里亞海有了直接的出路，便將轉移方向而以意法的各港（如布林的西、馬賽）爲其目的地，而巴爾幹半島全部便將成爲俄意英法四國商業的自由市場。這個鐵路公司的資本準備由倫敦巴黎的各銀行代爲籌措，築路的原料當然也由英法兩國的五金業供給。

奧地利亞當然不甘心被人家逐出巴爾幹，同時也不情願利凡得海岸（即地中海東岸）的門戶被人封鎖，於是她就在阿爾巴尼亞進行陰謀，竟得任命一位日耳曼公爵在那裏，同時，試圖在新得的波斯尼亞省加強她自己的權勢，以便威脅塞爾維亞。奧國的皇太子佛蘭西斯迪南大公爲了上項目的親至塞刺也窩（Sarajevo）活動，於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被一個斯拉夫族的學生所刺殺。奧國認爲這是威脅柏爾格雷德政府一個最好的機會，藉此即可強迫塞國與協商國脫離關係，如果必要的話，奧國不惜訴之武力。可是這時又有俄國出頭幫

助塞爾維亞，德國出頭幫助奧國。俄塞、德奧各結同盟的結果，法國加入了俄方，英國想乘機打倒德國，便也加入協商方面。於是促成波及全世界的戰禍。

我們若是追究：在引起戰禍的種種事變之中，各方的責任問題，那是怎樣說也可以的；可是事實上，戰禍乃是過去二十年中，各大工業國在世界各處不斷地衝突所必有結果。戰禍並非由某個人或某個民族的野心所引致的，乃是由列強所共有的一種政治的和經濟的制度所惹起的。蓋機械之極度發達迫使一切的工業都須去開發那比較落後的地方；但是國家卻不願把開發事業聽憑自由競爭定律的支配，一任私人去經營，因而把指導開發運動的責任自行擔承起來。只於在這種情形之下，經濟相依定律才必然會引起衝突。經濟競爭既然變成政治上的敵對，列強間的衝突便只好用武力解決了。

民衆們對於此項爭鬪的根本原因並不十分清楚。起初，他們只把遠方的商戰看作普通的殖民地遠征，這種遠征照例是由志願兵去參加的，所以他們不覺得有什麼可怕。民主政治根本上是傾向和平的，依然在夢想着世界和平，而期待那海牙的裁判法庭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此項表面似乎很小的衝突。

但是遠方領土的吞併改變了貿易的潮流，並且在各工業國的相互關係上引起反應。每一次的吞併都會使得列強互相猜忌疑懼。例如，法紹達事件（Fashoda incident）幾乎引起英法戰爭，南非戰爭有一個時期使得英德兩國磨拳擦掌，而費茲行軍又幾乎把德法捲入戰爭漩渦。不久，軍備競爭就開始了。一八九八年，德帝國着手建設強有力的海軍，以便保持她取得市場的政策。大不列顛也響應起來，創立了她的無畏艦政策。於是，法、奧、義、俄、美

日一時都被捲入漩渦。維廉第二曾說：「我們的將來全仗海上。」這正是工業擴展的程式，任何帝國主義無不如此。自此以後，無畏艦就成爲大工業國的重要表記了。

一九一二年土耳其的戰事，把帝國主義的衝突移到歐洲境內。這時，德國的陸軍增加到八十七萬九千人（一九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法國起而響應，把三年軍役的期限恢復過來（一九一三年八月七日）。俄國爲軍略的關係，借款建築波蘭境內的各鐵路。歐洲所有的金屬工廠都忙着造槍砲火藥。只要是某國的軍事力量勝過牠的隣國，諸隣國當然會團結起來以便維持勢力均衡。於是，一方面有了德國、奧匈國和意國的三角同盟，他方面就有法俄同盟（一八九一——九二）和牠對抗，不久又添上了英法友誼協商（一九〇四——五），最後復把英俄協定完成（一九〇七）。從這時起，全部歐洲便分成兩個陣營，一方是三國同盟，一方是三國協商，而諸小國則有時加入這方，有時轉向他方，時常發生變動。這兩個團體都是時時在暗地設法想把敵方的分子勾引過來。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謂和平者，只不過是各國的軍備競爭與合縱連衡的局勢中一種不穩固的均勢罷了。這乃是危險的和平，甚且可以說是威脅下的和平，或「武裝和平」（armed peace）。

各國的輿論開始受到擾亂。只要帝國主義的衝突，在外形上仍然是志願軍在遠方做戰，那末，牠便好像是一種裝飾品，爲了列強的光榮，這種裝飾品是不可少的。可是一旦等到戰場漸漸移近，軍事經費漸漸負擔不起，軍役期限漸漸加長，意外事變漸漸加多，歐洲的輿論便也漸漸不安起來，漸漸神經過敏起來。如果某一個隣國再有增加軍備的消息，個個國民都將時時刻刻以邊防爲懸念。許多的德國人都是這樣想像：如果法國要來包圍德國，那

一定是想把她瓜分，如像拿破侖或路易十四時代的情形一樣。同樣，法國民衆經過幾種汎日爾曼主義的刊物的宣傳，便會十分相信：如果德皇得獲勝利，法蘭西的國旗一定要取消，法國的兒童一定要強迫着學德語，而莫里哀的祭祀也一定要變爲哥德的祭祀了。那個老的國家神話又被商業報紙煽動起來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一國的外交部發出錯誤的新聞，都足以惹起那可怕的總動員來。法國飛機飛過努連堡的想像，竟能引動五百萬的德軍唱着『(Deutschland über alles)』（普天之下皆德領土）的曲調衝入比利時境，同時佛日山的那邊也就再唱起一七九二年志願軍的那個老戰歌來：『(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愛國男兒，齊往前進。）

註一 一九一一年，我發表過一本小冊，叫做：『即將到來的戰爭。』在這本小冊中，我曾預言：英德的經濟衝突和比利時被攻擊時，法國之將被捲入漩渦，以及一九一四年戰事之或將發生——那時正是英德兩國海上軍備（以無畏艦爲標準）幾乎相等的時候。

第十五章 世界大戰

大工業國間的衝突創始了一種新式的戰爭，這乃是歷史上找不到先例的一件事情。在馬爾內之戰 (Battle of the Marne) 的前夕，各方面的軍事行動都改呈了一種新的模樣，完全出乎各國政府、參謀本部和輿論的意料之外。因為這個戰爭不僅僅是前代戰爭一個擴大的重演；牠乃是一種新的戰爭，無論在作戰標的的決定上，在武器的準備上，還是在戰略的策劃與決定上，都是經濟的因素比較純軍事的因素要佔優勝的地位。

波及全世界的大戰

我們已經看到：戰爭的根本原因是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敵對。德國在一八七一年的時候，勉強能夠維持三千六百萬的人口，但是到了一九一四的時候，她已經是六千七百萬人口的一個國家了。爲了養活這樣過度的人口，並替他們準備工作起見，她便不得不輸入價值一百萬萬金馬克的食糧和原料。又爲支付購買此項舶來品的代價，她只好輸出價值大略相等的製造品。她的生命，她的繁榮，她的社會安寧和政治穩定全靠她的商業向外發展。不幸，在工業化輸出國家之中，她算是最爲後進的一個，其他諸大國都比較她進化的早，而且經濟繁榮都已達到圓滿的境地，當然不願意給她讓道，所以在地球之上，她是不易找到可以開發的地方了。各國聯合起來抵制她，連

次發生了許多愈來愈激烈的事變，那不能避免的衝突就爆發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初，歐洲列強開始爭鬪起來。一方面是德國和奧匈國；另一方面是俄法英三國——英國的同盟日本也立刻加入了這方面，因為她急於要向中國伸張勢力，以便奪取德國的利益。

從一起始的時候，八個工業帝國之中就有六國準備用武，而且在每個工業帝國之後，都有許多「補充的」的小國（按即在工業上具有補充作用的國家，下倣此。——譯者。）尾隨着——這是前一世紀裏，她們用人力和財力征服下來的。德國把土耳其拉入。英國把她的所有屬地，即澳洲，加拿大，南非洲，紐西蘭，和印度，埃及以及她的非洲各殖民地統都拉到戰線上來。法國從北赤道，阿非利加，西赤道，阿非利加，印度支那，和馬達加斯加招募土人分遣隊並採辦軍需品。俄國的動員區域和原料採辦地尤為廣闊，由維斯杜拉河一直到黃海。日本則把戰爭擴張到中國的山東，她夢想在那兒代替德國的地位。

如此說，單是幾個補充的國家聯合成爲一個工業帝國這件事就很夠把半個世界捲入戰爭漩渦了。各國之被拉入是沒有一個止境的；幾乎無論那一個都有些基本的需要必須倚靠交戰國中的某一國或某數國來供給，她們處於這兩個陣營之間，兩方的壓力迫得她們非加入一方不可。

意大利離了英國的煤就難以度日，而且她那廣闊的海岸又在英法海軍的掌握之中，於是一九一五年五月，她就加入了協約國一方。一九一六年五月，英國又把葡萄牙拉入，那時的葡國實際上已是英國的屬國了。一九一六年八月，羅馬尼亞在俄國的壓力之下，就只好向奧匈進攻。至於保加利亞則迫於德國的威力早已和塞爾維亞

對敵了。聯盟國和協約國雙方都拉攏希臘，但希臘處於海上武力的威脅之下，終局只好加入協約國一方。到了最後，歐洲各國之中，只剩瑞士、荷蘭、西班牙和斯干的那維亞還在守着中立。

亞洲方面，中國和暹羅最終也和協約國攜手。這兩國之加入協約方面是因為處於英屬緬甸和法屬安南之間，不得不如此的緣故。至於全部非洲大陸，因為早已分割在兩組交戰國的掌握之中，自然要捲入戰爭漩渦，那是不消說的；連那來比利亞的黑人國家都會對德宣戰。只有阿比西尼亞還守着中立。

一九一七年，新世界也慢慢地活動了。在起初，合衆國對於舊世界的紛擾是採一種無偏無黨的態度。但是漸漸地他已成爲交戰諸國的承辦商人了。在巨大的金融收益之刺激以下，合衆國的工廠和農業便過度地發展起來；對於交戰國雙方，她都有所供給而毫不偏袒。

可是中歐的封鎖漸漸使她失去了德國的主顧。在一九一七年的初期，海底的戰爭又突然使得她向協約國遞送的貨物無法交付。船舶封鎖在各港口以內，鐵路線也梗塞住了。各工廠眼見市場發生危險，只好減縮生產，致使一般勞工瀕於失業的危境。這時，起重機上滿貯着小麥，對於後來的包裝只好拒絕接受，製造肉類罐頭的工廠也因無法運送而退回已買的牲畜。這時候，堪薩斯的農人和伊里諾斯的牲畜業者便覺得德皇的野心是不能容忍的了。威爾遜總統，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的時候還向交戰各國提倡和平非戰運動，到了一九一七年四月便開始爲擁護世界的民主主義而向德宣戰了。

各國間的經濟相依作用迫得合衆國加入戰團。不久，她又把巴拿馬、古巴和海地拉在一起，叫她們在海上防

守巴拿馬運河的門戶，並把尼加拉瓜、危地馬拉和渾都刺斯拉了進來，叫她們擔任陸地上的防禦。同時，久做協約國承辦商人的巴西和烏拉圭，處於華盛頓和倫敦的兩重壓力之下，只好與德國斷絕關係。而秘魯、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也自動地與德絕交了。

經過了三年的戰事，有以下幾國還在守着中立：

在歐洲方面是瑞士、荷蘭、斯干的那維亞各國——她們的貿易在交戰國雙方的嚴重監視以下，牠們的資源也是分給雙方利用——和西班牙。

在亞洲方面是波斯，但這塊地方已成爲德、土聯軍與英、俄聯軍逐鹿之所了。

在非洲方面是阿比西尼亞，她的國境是一塊人跡罕至的高原，一向是與外界隔絕的。

在美洲方面是委內瑞辣、智利、巴拉圭、墨西哥和阿根廷，這幾國的穀類僅向協約國一方運送。

所以就連那些在政治上守着中立的國家，在經濟上也勢非捲入漩渦不可。戰事已經波及全世界——這乃是經濟相依法則一個稀奇的證明。在十九世紀之中，機械的發明迫使各國的生產制度變爲專門化並互具補充的作用，而國際間的通信機關、貨幣制度、信用和市場等的組織，又是那麼周密，那麼完備，所以歐洲一方面的戰禍竟致把全世界的資源吸收殆遍。

各國的政府與參謀本部，誰也沒有想到一個小小的衝突竟會擴大到全世界，因爲人人都希望戰禍範圍的縮小。各國之參加戰爭，不過是經濟勢力迫得她們不得不如此罷了。

各國之間，在平時本已有這種經濟連帶關係，但須待戰事發生，然後這種關係纔能被人明瞭……自今而後，各大國之間不發生戰事則已，一發生戰事就必定波及全世界。

經濟武器：封鎖

這種新形勢使得軍隊的運用法非加以一種根本的改革不可。假如作戰的目的是要剷除一個工業上的敵手，那末，操勝算最準確的辦法就是把各方面向牠供給物資和牠向外運送貨物的路途給牠截斷。愈是工業化程度高的國家，遇到這種打擊，愈將不能支持。封鎖乃是經濟戰爭一種自然的戰略。

但是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各國的軍事領袖卻了這件事情。德國參謀本部的意見以為當時的問題是可以用政治戰爭的傳統辦法來解決的。其作戰計劃完全以拿破侖戰略的各種原則為依據，並以薩多瓦 (Sadowa)和色當 (Sedan)的戰跡為準則，就是逼近敵人的主力軍隊（法軍），襲擊其兩翼（侵入比利時），然後大舉包圍（豐克魯克將軍率隊橫渡馬恩河），將敵軍聚殲；隨後再按照已定之計劃，派得勝之軍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東指而攻俄（俄軍之動員極為緩慢），用興登堡將軍的可怕的鉗形陣勢把俄軍擊破。德軍如已獲得大陸上的霸權，則歐亞接壤的各處地方，由利凡得海岸 (Levant)一直到波斯，印度與中國都已在德國支配之下，無論在商業上，在工業上，還是在金融上她都可以向這些地方自由伸張勢力了——此後她要擊破英國海軍便如反掌之易了。

協約各國的參謀本部對於戰事也是持同樣的心理。法軍的計劃乃是任聽左翼被德襲擊（一如奧斯特里齊之役），卻要乘機攻破德軍的中心，長趨渡過萊茵河，循屠梭和拿破命的戰跡，佔領南德的全部。這時，俄國大軍當已漸近柏林。法國便可取得萊茵左岸一帶地方，而俄國亦將佔有君士坦丁堡。然後法俄英日聯合起來共把德國當做戰利品而分割之。

各國都以爲這個巨大的賭博，在幾個星期之內即可告一結束，在這個期間之內，一切古典式的戰術都將被人施展出來，例如「迅似雷電之突襲」，「不顧一切之進攻」以及「運動戰術」。牠們當然是把這個戰爭看做一下即可解決的事情，有如賽馬一般。總而言之，牠們是要拿政治戰爭的傳統辦法來解決一個經濟衝突。

但所有此項偉大的計劃都被一件異常周密的防禦技術給打破了，這是牠們所意想不到的。只須挖掘一道壕溝，前面敷設有棘的鐵線網即能抵禦那可怕的重砲。而戰略家在平原之上調動大軍，藉沙袋的掩護，竟可使敵人不知不覺。前線的形勢好似一面綿延不絕的銅牆鐵壁。主將們的才智完全用在怎樣打破這道牆壁上面，但縱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打開一個破口，而敵方幾乎立刻就能把牠合攏起來。「運動戰術」撞見戰壕，不啻遇到了死對頭。

所以要在陸地之上迅速地決一勝負那是不可能的；然則在海上是否可以立決雌雄呢？——因爲海上沒有抵禦重砲的防禦設備。孰不知海上也有海上的困難，因爲大無畏艦上裝設的大砲，其射程之遠和發射之迅速可以使得任何被擊中的船舶立刻沉沒。如果交戰雙方的軍艦，體積和威力是旗鼓相當的話，則交戰的結果一定是

雙方的艦隊幾乎同時毀滅。所以從開戰之始，英德兩方的艦隊即都不敢立取攻勢，一則以蘇格蘭海為掩護物，一則以黑耳郭蘭島（Heligoland）為掩護物；那著名的遮特蘭（Jutland Battle）之戰很可證明牠們的策略是對的——遮特蘭之役，英德雙方艦隊均乘大霧脫逃。總之，從開戰之始，無論是陸軍是海軍都陷於不能發動的窘狀，而想把敵人出其不備一舉攻破的希望也漸漸地成為泡影了。

狠毒而敏捷的突襲戰略既無實現之可能，那便只好代之以緩攻的戰略，也就是要把敵人的生活之資給牠盡行剝奪。這時便用得着封鎖——那個最好的經濟武器了。說到這裏，一般經濟學家之間也都有一種幻想，他們相信這鬪爭是能很快解決的，一如以前各國參謀本部所抱的理想一樣。他們以為：德國既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其弱點乃是所需的原料與食糧大部分要靠着他國的供給，如果斷絕了各方的供給，她的人民和軍隊馬上就要失去作戰和維持生活的物資。協約國方面的報紙，對於這種說法很相信。

如果協約國的敵人，光是德國一國則這個假設或許是正確的。可是德國在平時早已和四隣的農業國家聯合起來，這些國家把五穀和牲畜供給德國，以養她的工業人口，而德國則以軍械和機器供給她們的農業人口。所謂『中歐同盟』（Mittelauropo）——在羅馬尼亞未放棄中立以前，其範圍伸長到土耳其——形成了一個圓滿的經濟團結。各國以經濟相依定律當作攻破德國的武器，而德國反藉此定律而獲救。

所以協約國施行封鎖不能僅以一國為目標，而須以若干國的一個集團為敵手，為達到此目的，在軍事上不得不有很大的努力。由北海到朱辣（Jura）山脈，由提羅爾（Tyrol）到愛琴海，由黑海到波羅的海，其間都掘有綿

延不絕的戰濠。並在海面以下敷設水雷以防敵船之脫逃。敵船有擅敢冒險前進者，則以巡洋艦和水雷艇驅逐之，有如捕拿海盜一般。甚至連中立國的船隻，都有被襲擊的危險。交戰國藉口戰時禁制品，不僅是製造槍礮的鋼鐵就是穀物、煤、棉等物也一律加以沒收。

可是中歐的資源漸漸就要耗盡了。於是德國的戰略就轉而集中全部力量擊破敵人的鐵一般的堡壘，以便奪取新的地區而補充資源的供給。德國大將法爾塞亥因（Falkenhayn），藉保加利亞之助，攻入羅馬尼亞，其目的就是要奪取多瑙河流域一帶平原的豐富的產物和喀爾巴阡山脈的石油鑛（因為盧登多夫所率領的卡車隊需要石油做爲燃料）。羅馬尼亞軍隊的英籍將官深知德方的策略，所以當他們退卻的時候，幾乎把所有的鑛井一概毀壞，連英籍公司所有的也一齊毀掉了。

當興登堡將軍率領的隊伍浩浩蕩蕩向俄境進發的時候，軍中帶有很多農業勞動者，目的是要叫他們耕種俄境的田地，以便補充德軍的糧食。威廉二世和共產黨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Brest-Litovsk）磋商和議時，目的也是妄想要求俄方把烏克蘭的五穀，高加索的石油，甚至連土耳其斯坦的棉花都供給於德國。另一方面，德國外交部（Wilhelmstrasse）之施壓力於瑞士，也是想得到牛乳、肉類、鋁和碳化物。波羅的海設有水雷的海面上還留着窄窄的一條路線，以便由瑞典和丹麥運入五穀和牲畜。德國甚至還要設法假道於荷蘭，冒充中立國籍，由各國運入些少的物品。總之，柏林的戰略和外交策略，是爲五穀、石油、棉花和其他重要商品的問題所支配的。

德國對於她的敵人當然也是要：即以他們的經濟武器來對付他們的。她毫不費力就把俄國封鎖起來；她用

水雷鎖閉了波羅的海之上的諸港口，同時，土耳其也把博斯福魯和達達尼爾（Dardanelles）兩海峽給封鎖起來，協約國竟不能把牠打破。不久，俄國和她同盟諸國間的聯絡幾乎完全斷絕，只有那穆耳曼鐵路（Murmansk-line）和白海與那直達海參崴的西伯利亞橫越鐵路還可自由通行，不過白海是終年結冰的，西伯利亞鐵路又未免太遠，太不適用了。到了一九一六年，國土廣闊而工業落後的俄帝國，卒因軍火之缺乏，不能不在喀爾巴阡山脈的前線上，突然放棄攻勢。

另一方面，協約諸國也有與德國相同的缺點。這些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也都要倚靠着國外市場纔能生存。在大戰爆發的時候，英國只有勉強支持三星期的食糧，巴黎只有不到八天用的麵包。不過德國雖有可怕的大無畏艦，卻迫於當時的情勢，只是藏躲在黑耳郭蘭島的背後而不敢外出，而協約諸國則可以自由往來於海上。所以協約諸國可以自由地向加拿大和烏拉乖採辦五穀牲畜，向美國採辦棉花和鋼鐵，向澳洲採辦羊毛。如果她們自己的船隻不夠用的話，還可以利用希臘挪威或荷蘭的船隻。

諸帝國間的戰爭把全世界捲入旋渦；同時把全世界分爲兩個陣營，各以封鎖爲武器，利用己方所有的資源來破壞敵方一切的資源。哪一方面能夠把敵方的資源耗盡，哪一方面就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了。

磨耗式的戰爭

經過一世紀的機械生產而積累下來的財富簡直是不可以數目計算的，我們如果看到這一點，也許會以爲

這種戰爭將要延長到無限久的期間。可是事實上，還不到五年，這次大戰竟然告一結束，這是由於現代軍隊有一種可怕的破壞力，推其所以致此之由，則有兩個主要的因素。

第一點是國家神話的原故，所有十八歲至四十五歲（或四十七歲）的壯男，都被強迫服軍役，結果戰鬥力增加到一個很大的數目，打破了歷史上的記錄。根據國際勞工局的統計，大戰中各國動員的總人數，約有七千萬之多，確數是六六，一〇三，一六四人；其中俄國佔一五，〇七〇，〇〇〇人；德國佔一三，二五〇，〇〇〇人（爲該國男性總數的百分之六六·一）；奧匈佔九百萬人（五五·四%）；法國佔七，九三五，〇〇〇人（五九·四%）；英國佔五，七〇四，〇〇〇人（三九·二%）；意國佔五，六一五，〇〇〇人（四六·三%）；美國佔四，二七二，〇〇〇人（一三·二%）。

在這七千萬人之中，在前線作戰者只有一千五百萬人。其餘都在後方工作，或服務運輸方面，或服務軍火工廠。不過一切人的工作都只是爲了軍隊上的種種需要。（註一）

這麼衆多的人都得吃飯，穿衣，並需要種種裝備物。誠然，就是在平時，他們也得消費同數量的食糧和其他物品，不過那時他們所生產的能夠補足他們所消費的而尚有餘。在戰時就不然了，他們是光消費而不生產，並且要倚仗着前數年的積蓄而維持生活。國家還得替他們預備軍裝，把他們運送到前線去。工業的巨大生產能力一變而爲可怕的破壞力了。截至十九世紀的末尾爲止，軍事上的裝備物都是很單簡的：例如，來福鎗，形式劃一的軍刀以及三四種的礮。但當大戰之中，情形就大異往昔了，濠溝戰使得軍械不得不極端的複雜化：例如，速射式的來福

鎗，機關鎗，每種型式和大小的長射程砲以及坦克車和各種飛機等等。

這些武器大都是速射式的，要消費巨量的彈藥。炸藥的進步當然是很快的，因此，硫酸，硝酸以及其他酸類都大量生產纔行。

爲輸送此項衆多的隊伍和軍械，須得增築鐵路，製造各種形式的廠車；此外還得製造摩托卡車並建築公路以利運輸，有了這兩種利器，各種軍需中途不必卸下即可直運前線。可是因爲利用摩托車的原故，必須消費大量的石油纔行，於是在煤炭的需要之外又添了石油的需要。又爲使各營盤之間能夠迅速傳達消息起見，必須建起廣大的電報電話線網。而敵人的轟炸，軍隊的移動使得此項線網必須時常修理，時常更換。

爲應付各種需要，幾乎所有的工廠都被國家徵收了。有些工廠是由舊時的工廠改造過來以便適合戰時工業之用。還有一些是特爲了作戰的目的，花了很可觀的經費而建築起來的。農業勞動者，主婦們和少女們都在忙着製造子彈，而幼童和老人則在耕種田地。據估計：四個老百姓每一天的工作合起來，只夠供給一個戰士一天的消費。後方的各種生產力量被前方可怕的破壞工作一骨腦兒地吸收過去了。有時後方的生產還不夠供給前方的破壞之需要。

由另一方面來看，前線的一千五百萬人不僅光是消費而不生產，進一步還要實行破壞。在往昔的時候，戰事的糜爛只限於戰場的範圍以內，而那時的戰場比現時又小的多，所以那時的戰鬥至多支持若干小時，而且幾個月之後，一切的戰爭遺跡就盡都泯滅了。現在就不然了，戰區的範圍長裏長到幾百基羅米突，寬裏寬到若干公里，

戰線一經變更則被破壞的區域竟及數省之廣。在廣闊的空間以內，一切東西諸如房屋，倉稟，橋梁，道路，鐵路，運河等等盡都付之破壞。樹木被砲火轟倒了，土地掘成戰壕或被轟成巨洞，田地荒蕪了，城市被敵機轟炸了。

在法國北部，以及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和波蘭都有廣闊的地區變成沒有人煙的瓦礫場。

工廠成爲戰爭的目標

除了上項破壞可以說是自然附屬於戰爭而不可避免的之外，還加之以與軍事需要不相關聯的系統的破壞。

昔日的戰事，其鬪爭只限於國家間有組織的軍隊。私有財產是要尊重的，除非由於不可抗力，不得把牠加以破壞。可是等到新式戰爭漸漸地有了經濟上的特徵，這種規律就無人遵守了。縱令是中立國籍的商船，如果有載運戰時禁制品的嫌疑，也會被人用水雷轟沉。敵人的財產，倉庫，工場是要加以扣押的，而且這種扣押和往日的辦法大不相同，因爲往日的扣押不過是暫時的扣押俾使不爲我害，將來戰事停止還要歸還原主，現在卻是永久的沒收了。敵人的財產儘可售賣或租賃於本國人民，或爲戰事的目的而利用之。

這種磨耗式的戰爭，曠日持久，漸漸地達到激烈的階段，則國際法上的一切保障盡都失效了。一九一八年開始的時期，德國參謀本部知道勝利沒有希望，並預料不久將放棄比利時和法國北部，便準備着要做一番有系統的破壞工作，不問牠有無軍事上的必要。他們有一個工程師委員會，把這幾個富庶地區以內的工業機關做了一

個詳細的調查，草成清單。當他們退卻的時候，煤鑛，鐵鑛都填毀了，抽水筒和鑛坑支柱也都炸毀了，金屬工業和紡織工業的機器，則盡量把牠拆散而運回德國。其餘別的東西都付之轟炸，連那毫無關係的糖製鍊廠也不留。

所有此項破壞計劃都出於德國大實業家的主張。如斯田內 (Stinno) 羅啓林 (Roehlin) 等不惜違犯國際公法，毅然決然指揮此項破壞計劃的實施，以便均分所獲的戰利品。他們的意思是要由此獲得兩重利益。他們很知道，戰事過後，勝利的敵人將把他們排擠出世界市場之外，所以他們想藉此使敵人喪失戰勝的利益，同時迫使敵人向德國訂購機器以便修復被破壞的工業。他們很明白此項破壞計劃是假借德國人民的名義而施行的，因此此項大規模的損害終久要由德國人民負擔賠償之責。可是此項破壞計劃足以使得德國工業為之旺盛起來，所以縱令犧牲了國家的利益也是他們所不惜的。

這真是一個稀奇的辦法，而且使我們聯想到汪達爾人 (Vandals) 砍盡阿爾及利亞 (Algeria) 的橄欖樹。迫當地居民納降的那回故事。在此處，極端的文明和極端的野蠻又兩相會合了。只有在這種場合，那窮兵黷武的真正用意在國家神話的日常話柄之中很清楚地流露出來。新的戰爭既是起於競爭工業之間的衝突，其結局自然非以各種工廠為戰爭的目標不可。

磨耗式的戰爭（連同人類生活工具的破壞在內）乃是歷史上一個新的現象，而且關係非常重大。往昔的民族戰爭，為時很短，且僅限兩三個民族。軍隊的糧餉大部分仗着平時的積蓄和佔領地區以內的資源。作戰的目的完全在破壞敵國的軍事機關和行政機關。在戰場以外的地方，居民照常生活照常工作，一如平時的安謐。戰爭

終了之後，戰敗國的國庫也許弄得一貧如洗，可是私人的財富仍然是保持原狀的，他們的生產能力，一點影響也受不到，所以國家的復興工作是毫無困難的。因此，那時的歐洲，常常繼續打了幾百年的仗，而各國的繁榮進步依然是很快的，一點阻礙也沒有受到。可見那時的戰爭只是一個地方事件，影響是很小的。

反之，新式的戰爭就迥乎不同了，不僅全國的資源要消耗在戰爭上，就是全體國民的活動也完全集中在戰事了。新式戰爭的主義和目標完全是經濟的，所以牠不只要毀滅敵方的生產，而且要毀滅牠的生產工具。不僅殃及國家，而且殃及個人。因為如果一國國境以內一切都破壞了，該國勢非向國外購買不可，從而也勢非對外負債不可。戰爭已經變成全世界的了。

當代的人創造「磨耗的戰爭」這個新語的時候，無疑地他們對於上項事實是很模糊的；可是他們那時所能想到的只是敵人的被磨耗。到後來，他們纔覺察自己將目睹全世界的被磨耗了。（註二）

戰爭中國家界限之消除

但國際的戰爭正因其擴大的緣故而致國家的個性為之消失。

在戰爭開始的時候，無論是協約方面或同盟方面的國家，無不嚴格保守國家的個性。締結聯盟關係的諸國政府，在牠們的行動上無疑是保持着聯絡的；但是牠們的軍隊都是各自獨立的，軍械軍需都取自本國的資源。各國的參謀本部，各有自己的策略；最高的號令各不相同，連作戰的目標都是不相一致的。法國的策略是想得到亞

爾薩斯洛林和萊茵河左岸；俄國想得到君士坦丁堡，英國則企圖奪取德國在各地的租界地。

每當一個新同盟國加入戰團，牠最後將分潤到什麼戰利品都是預先決定下的，此項戰利品乃祕密外交和祕密條約的標題，在戰爭進行之中，時常經人修改。我們可以說：世界戰爭在牠的最初期間不外是自主的國家間一種合縱連衡的作用——在精神上很和路易十四時代，大革命時代，和第一法蘭西帝國時代的戰爭相似。

可是經濟力量漸漸迫得聯盟的諸國不得不把牠們的資源和資金合在一起，後來軍隊也混合起來了，最後連最高號令也統一起來了。到了戰爭的末期，各國都把自主拋棄，在敵對的兩個陣營之下，都只是一個軍隊遵從一個命令。

這個統一的程序是由軍備上開始的。現代軍隊所用極端精巧的武器，除非在宏大的、高度專門化的五金工廠中，並在許多專門家的監督之下，是無法製造出來的。至於炸藥的製造也是非有極進步的化學工業不可。最後，軍隊所需的衣料鞋襪之類都非有迅速的供給不可，所以西歐的紡織工廠，有幾百萬的紡錘和織機都得日夜忙碌着。塞爾維亞，土耳其和俄羅斯等國以前為動員而積存下來的軍需軍械，彈藥，在數月之中竟已耗盡。所有的農業國家，為補充此項軍用品，便不得不仰賴於工業國。

匈牙利土耳其和保加利亞仰賴於波希米亞，薩克森西利西亞魯爾等地的工廠，而塞爾維亞，羅馬尼亞，意大利和俄羅斯則倚賴英法的工廠。後來，各國又都向美國訂購軍火。這樣一來，農業國與工業國之間自然會成立一種階級組織的關係。一方是德國，另一方是英法美三國成為交戰諸國軍火供給的四個中心。

不幸購買軍火是要支付代價的，而諸農業國不久就無力償債了；因為牠們平時的貯蓄本來甚少，而出口貨又因為動員和封鎖的關係而減少了。於是牠們遂不得不向擁有債權的同盟國請求墊款，而債權國也欣然承諾下來，蓋為使對於中歐同盟國（Central Powers）的一般封鎖發生實效起見，牠們當然很願意替俄國和巴爾幹諸國備辦軍火。

法國政府以牠自己的名義發行公債，而即以之替塞爾維亞、俄羅斯和意大利等國償付牠們向法國的金屬工業和紡織工業訂貨的代價。英國也照樣行事。於是貸給人家的款項不必離開本國而困難的運金問題也就無由發生。如此，英法兩國不啻是協約諸國最初的兩個銀行家。當法國到了智窮力竭的時候，她自己便也開始向英國借款。倫敦也會替俄國周轉資金，俾向美國購貨。但是到了最後，英國的資金也漸感枯竭，於是此時，美國纔決定加入戰爭。

從戰爭開始的時候，美國的公民，製造家，勞動者，投機家和農人，都曾賺過很多的錢。美國政府貸款於各國而即以此款抵償各國向本國購買糧食與軍火之代價。任何富庶的國家替同盟國墊付軍需品的代價，其踴躍一如自己購買軍需品。好像那時候，各國之間已經商定大家共同辦一種企業，出人力者與出物力者同等看待，而軍需品就好像是這個企業的「普通費用」（overhead cost）一般。

但是「人力足以代表資本毫不亞於任何物質」這觀念，尚非那時的羣衆所能明瞭，而各國政府又過於浸染國家神話的色彩，牠們決難承認所有的戰事經費統由大家共同負擔。此項墊款使得各國之間互有債權債務

的關係，因而造成了日後無法解決的國際債務問題。

塞爾維亞，俄國，意大利，羅馬尼亞，希臘成爲英法的債務國，而英法對於合衆國也是居於同樣的地位，合衆國曾貸款於協約各國，因而成爲全世界的債權者。各國到了水盡山窮的時候，只好請她出頭來作戰時的銀行家了。於是一向居於債務國地位的美國，一躍而成爲債權國。

除了各國政府之間有此項債務關係而外，還有各國政府向外國銀行締結的「商業借款」。此項借款大都要有擔保品。例如俄帝國銀行曾把一部分準備金運存英蘭銀行，而法蘭西銀行也曾運送現金到倫敦和紐約。後來，法國政府曾向民間徵借最良的國際有價證券，以便交給美國各銀行做爲擔保品。

同樣，德國對於她的同盟諸國也居於債權者的地位，蓋諸國會向德國借款以便償付軍需品的代價；此項借款亦多以證券爲擔保；土耳其、匈牙利的發行銀行並曾將準備金移存德帝國銀行。各國爲了國家集團的利益，漸漸地只好放棄了自己的財政獨立。

協約國際所組織的各種經濟委員會

國際間既然發生此種信用集中現象，大家當然不免要設立種種共同的購買中心地。

從戰事開始的時候，協約諸國的政府就不得不向海外購買糧食。那時各國在支加哥，倍諾斯愛勒，蒙得維的亞等地的交易所中，各設有代理人，互相競爭着，需要是很巨的，交戰各國因此浪費了不少的金錢。加以投機的影響

響，各種市價騰漲到空前的高度。

可是等到所有的購買事務統由一國一手管理的時候，那便不會一任承辦者獨得厚利致使顧客吃虧而耗資金於無用之地了。於是協約諸國商定一切購買事務都要採取共同的步驟，因而在倫敦設立小麥採辦執行委員會，由各國政府的代表按期將下一月的需要清單送委員會收存，並設有各種專門代理人，俾向委員會報告市場狀況和供給情形。訂購的總額，由各國共同決定，然後由委員會向各市場陸續採辦，每次採辦的數量都有限度，以防投機家做占買的勾當。代價的支付由各國的信用機關共同擔負之，而交貨的任務則由委員會擔任之。爲了同樣的理由，協約諸國還在倫敦設有煤炭、石油、軍火等物的採辦委員會。

可是這時候，協約諸國又遇到了種種運輸的難關。即在戰事未起的時候，她們就已經無不倚靠英國的商船了，等到戰事一起，便覺船舶不夠用了。於是協約各國都在設法購買或租賃中立國的船舶，運費因之狂漲。加之，有些國家竟用她們的船舶做無用的運輸，於是益增運輸的困難。最後，協約諸國纔決定把各國所有的船舶，不分國籍，共同交託給一個執行委員會管理。

到了一九一七年的末尾，協約國與世界各國的商業關係完全集中在幾個委員會的手裏，這幾個委員會都設在倫敦，互相間有着密切的聯絡。各國政府把需要清單按期提交各委員會，由各委員會依據市場的實在供給情形加以修改。所有食糧、原料、軍備，以及船舶、信用等等統由各國通力合作地來支配。設在倫敦的各種委員會不啻是發號施令的機關，對於協約諸國操實在的指揮之權。

在敵人那方面，自然也有相同的集中作用。起初的時候，所有主要的經濟資源也是由各國政府分別管理，但後來迫於時勢便只好統統交給德國一手管理。於是德國對於中歐各地的物產，運輸和信用遂有確實支配的威權。交戰國雙方的國家既都已放棄經濟自主，結局同樣的需要迫使牠們把兵力也合作起來。

各國軍隊的混和

當戰爭爆發的時候，締結同盟的各國政府都是審慎地各自保持着對於本國軍隊的指揮之權。無疑地，各國參謀本部固然要使各方的軍事行動保持着聯絡，但是各國的最高軍事機關卻要以他們自己的辦法實現共同的計畫，並照自己的態度解釋全體的號令。如果一種意外事變發生，馬上各自報告本國政府，並只遵從本國政府的命令。例如，查勒羅的敗仗(Derfat of Charleroi)以後，法國參謀本部竟不使英國軍隊明瞭法國軍隊的行動。

各國政府雖然也知道行動不統一的危險，但卻極為重視軍隊的自主，理由是作戰目的各不相同，一旦戰事勝利，將各自利用勝利的機會而盡量謀本國的利益。當戰事勝利之後，獲利最大的，並非犧牲最大的國家，反之，卻是那後備軍還相當地大，既足以壓倒敵人又足以壓倒諸同盟國的國家。因此，法國前線上的情景會有好久都是各國軍隊只於並列在一條戰線上，而指揮卻是各自為政的。

如果前線上總是保持着靜止的狀態，則這種辦法也沒有什麼很大的缺陷。不過一旦敵軍猛烈推進，各國軍隊退卻到自己的根據地時，將使敵軍有隙可乘，勢如破竹一般。如要挽救這個危局，免致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勢

非火速調集後備軍不可。但是各國軍隊各有自己的後備軍，而各國參謀本部之調動後備軍又只顧自己的便利，因此，協約國的防線屢為敵軍攻破，而阿拉斯（Arras）與巴黎都曾受過長期的威脅。

協約諸國終於認識了當時的危機，而不得不把她們的後備軍合在一起，並組織一個國際委員會以便指揮之統一。但光是如此顯然還不是一個完備的辦法，因為一個最高的軍事領袖是非有不可的。可是誰來任這個領袖呢？由一位法國將軍來任呢？還是由一位英國將軍來任呢？協約諸國躊躇了數月之久，民族的誇大狂與軍事上的需要，在她們的心中交起戰來，致使她們無由決定。最後，到了前線被敵人攻破，巴黎受了威脅而英國軍隊亦將敗退海上的時候，纔舉行那著名的多倫斯會談（Dollens interview）由米爾納男爵（Lord Milner）提議，把最高指揮權付托於福煦將軍（General Foch）。各國政府在敗仗的威脅之下纔明白：為求貫徹戰爭的最後目的亦即實現戰利品的最後分配，非先把戰爭的初步目標——即勝利——做到不可。於是她們這纔承認指揮是要統一的。

從那時起，由北海到佛日山一帶前線的情勢煥然一新。英、法、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葡萄牙等國聯隊在法蘭西的前線上，不分彼此地一字兒排開。美國的各師團由法國的軍官率領着，輔以英國的砲兵。印度兵在後方服役，安南兵在修治道路。軍需軍火都是大家合用。所有此項大軍，不分種族界限，統受一個最高軍事領袖的指揮。

在敵人方面也有同樣的情形發生。起初的時候，奧匈參謀本部，以霍爾箴多夫將軍（General Conrad von Hoetzendorf）為其主腦，百般設法保持本軍的獨立精神。但屢遭挫折的結果，迫使牠不得不聽從德國參謀本

部的指揮。土耳其人起初也是只願服從普魯士籍長官的命令，但自從保加利亞人加入戰團之後，他們便都接受柏林的命令了。到了大戰告終的時節，同盟諸國所有的兵力便都受盧登多夫總司令部（Ludendorff's general headquarters）的統御了。

任何國家都已把統治權最明顯的標識——即自治權——給拋棄了。各國的軍隊，軍火，軍糧，最高命令以及任何有關軍隊之事物無不採通力合作的原則。戰爭的開始，本以國家主義為標榜，但戰爭的終結卻反造成國際的軍隊。

在軍事範圍內一如在經濟範圍內，相依的原則是同樣有效的；國家的軍隊乃是國家神話的最高表現，亦即國家主權的保證與手段，現在卻到了他壽終正寢的時候。在大戰的煙霧之中，萬國破滅的氛圍之內，全世界不知不覺地在走向統一之路。

國家神話的失敗

到了一個時候，連行伍之間都要為之惶惑不安：各方的軍隊不分種族地混在一起，形成這五光十色的民族集團，究竟是為了什麼？不久，前線上便發生了奇怪的心理的劇變。

每個國民在接受動員令的時候，都只是受了那狹隘的，自私的民族衝動之感應。無論由法國人，比國人，塞爾維亞人，意大利人，或是由俄國人來看，當時的問題只可說是保護祖國神聖的領土勿令外人侵入的問題。至於那

成爲衆矢之的的德國和奧匈國也是被同樣的衝動所支配，由她們看來，侵入敵人的領土只是一種自衛的手段。英國人的心理是覺得三島有被德國艦隊圍困的危險；徐伯林式飛機之襲擊倫敦更使他們想起國防的必要。國家神話使得人人的精神爲之奮激起來。

另一方面，那澳洲的牧人，加拿大和南美的農人之贊成參戰，不過僅爲與英帝國休戚相關的心理所驅使，對於國家的危難更只有一個含糊的觀念。至於伊里諾斯的牲畜飼養者以及賓夕法尼亞的勞動者，對於大戰，久已淡然處之，由他們的眼光來看，大戰好似警察之懲治亂黨，因此輩亂黨防礙了美國的國外貿易。

當此輩種族各異的兵士們在戰壕中相遇的時候，人人都會明白戰爭的動機和目的已經超出他們自己的國家觀念的範圍之外。假如各國的軍隊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獨立，那末，單是團體精神（此乃軍隊生活最有力的因素）就很夠維持國家神話的神祕力量了。但是一旦各國的軍隊一師團一師團地混合起來，並由外國軍官任統率之職，則兵士們的心中將會覺悟他們打仗的動機已然超過國防的意義。那末，究竟是什麼動機呢？他們建了那樣壯烈的功業，受了那樣重大的犧牲，究竟爲了什麼名義呢？有什麼意義呢？此項問題是必得解答的。於是，無論在前線上，還是後方上，都發出一種呼聲，要求各國政府宣布戰爭的目的。

政治領袖們這時陷於一種極其窘迫的境遇之中。戰爭的動機與目的，一大半是經濟方面的，他們將怎樣解答呢？當協約國的外交家們在倫敦，彼得格勒，柏林，維也納等地舉行會談，磋商怎樣分配將來佔領的地盤，這時候他們所討論的問題無非是商業如何伸展，採掘鑛山，建設鐵路の特許權如何分配，以及遠方各地的勢力範圍如

何劃定等等。但是專門聽慣了政治術語的大眾們，如何能瞭解此項經濟名辭呢？而且如果使大眾們過於注意此項極其真實，極其確定的物質利益，還會有一種危險，蓋兵士們或許因此而忘掉戰死疆場的決心。所以一切足以表示戰爭之實在目的的約定，都是要嚴守秘密的。協約國會屢次要求德國說明她作戰的目的，而柏林的答覆卻是叫協約國先說明她們的作戰目的；當一九一六年年終，威爾遜總統進行調解運動的時候，也曾要求交戰國雙方解答同樣的問題，但雙方的答覆都是含糊其詞的。

彼時，一般人的心理頗現不安之態，後來，這種不安的心理又漸傳至軍隊之中。要使一個兵士有冒險赴戰的勇氣，必須叫他十分明瞭他究竟爲了什麼纔準備犧牲。光靠報紙上什麼正義啦，公平啦，文明啦等等誇大的言語是不夠的；蓋兵士們長久忍受無意義，無盡頭的痛苦，早已把士氣銷磨殆盡了。結果，遂發生一九一七年那次著名的譁變。軍隊既已盲無適從，國家神話就失去了效力，假借牠的名義而爆發的戰爭，再也不能靠牠來解釋了。

就在這時候，威爾遜總統的疊次通牒轟動了全世界。合衆國的軍隊是臨時募集的，所以比較任何國的軍隊都更需要一個尙武的神話。可是這種神話，在該國的歷史傳說上，一個也找不出來。南北戰爭只是一個內戰而以和解了局的；獨立戰爭又距今過遠，而且和這次越過大西洋的遠征一點關係沒有。然則怎樣纔能使美國人民瞭解這次國民軍開赴舊世界的意義呢？

威爾遜的神話

威爾遜總統知道當時需要一種新的神話；並爲之預備必要的信條。當時的戰爭是既可怕而又不合理的，老百姓不需要牠。戰端之啓，完全由於中歐諸帝國的專制君主想犧牲國家的利益而求達到帝王的野心。結論就是：我們來推翻君主政體而謀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吧！叫每個民族都有機會決定自己的政府吧！如果這種要求都辦到則戰爭不弭而自弭了。

這樣謬誤而膚淺的戰爭解釋我們不屑加以細論。可是正因為牠簡單的緣故，牠卻也有一種好處：就是連那出身極其寒微的老百姓們也容易了解牠。合衆國的人民是由各國遷來的移民混合而成的，種族極爲複雜，對於此種說法更能十分了解。他們在祖國（匈牙利，羅馬尼亞，俄國，塞爾維亞和加里西亞等）受盡了君主專制的壓迫，纔來到美洲，在民主政治之下找到了和平與自由。所以在他們心裏，民主主義的神話比較國家神話更爲活躍些。

烏德洛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是一位憲法學教授，認識理想的重要並且知道怎樣操縱理想。他知道神話是不能光靠閉門造車的，必須是日常生活中常有的觀念之一種放大的影像纔行。所以他不得不利用現有的神話。他知道國家神話已經失掉牠的效能，於是他就根據民主主義的神話而創造那新的信條，就是所謂「使民主主義得以安然存在於世界之上。」這個新口號很能打動人們的熱情並獲得人們一致的擁護。

如果國家神話本質上是好戰的，則民主主義的神話即以和平爲其精粹。聯邦制度的北美合衆國不是正足以證明民主政治可以垂數百年之久，一向都是過着泰平的日子嗎？所以我們如果拿北美合衆國當作模型，把舊

世界加一番改造，終局定可達到世界和平的境地。這樣一來，那遠隔重洋的戰事就有了目的了，有了意義了。而美國的四十八個聯邦乃是在那裏着手締造歐洲民主國的大聯邦。

威爾遜總統的說教轟傳全歐，到處響應。那時協約諸國都是行的代議政治——就連俄國也還在克倫斯基臨時政府之下。即使國王仍有在位者，也只是徒有國王之名義，而無國王之實權。反之，在敵方各國，如德、奧、保加利亞、土耳其，情形就大大地不然了：皇帝、國王或丹蘇們不僅依然擁有實權，而且擺出窮兵黷武的架子，於是在人民的眼目中，君主的尊嚴越發可畏了。那可怕而不合理的戰爭既非人民所願，那末，把戰爭的禍端統歸之於專制君主的野心，當然是易如反掌的。於是人人都接受了威爾遜的論斷，以為任何地方都有建立民治，民享政府的必要。自是以後，那戰壕中最下級的兵士那和工廠中最無知的工人都有了努力的新目標。士氣恢復了，形形色色的各地分遣隊配合成一個統一的軍隊，現在又找到了一個共同的靈感了。

這一次士氣的恢復實在是歷史上所有恢復士氣的故事中最驚人的一個。只有十五世紀中華奧夫阿克 (Joan of Arc) 的故事可以與牠比擬。威爾遜總統拿一種神話來代替另一種。他把民治主義的理想推崇在協約諸國所利用的國家理想之上，而即以這種新理想來團結牠們——恰好像那位洛林的牧羊女乞靈於理姆斯 (Rheims) 登極典禮的宗教神話來恢復那一時失墜聲勢的忠君神話一般。這位美國的政治家輕輕地在打字機上打了一下，就替歐洲的戰爭找到了意義，找到了目的——這戰爭現在已經變成世界民治主義的十字軍運動了。

這時國家的理想已經一敗塗地，那假借國家主權的名義而開始的戰爭，到結局卻使得國家的聲威爲之掃地，這不是一個太奇特的矛盾了嗎？

經濟武器的勝利

一旦交戰國雙方宣布經濟戰，失敗者一定是資源先耗盡的那一方面——而且勝負的最後決定不靠着什麼巧妙的軍事策略，卻靠着封鎖的物質影響和精神影響，這是確而無疑的。

俄國是第一個屈服的——但並非屈服於興登堡的進擊。興登堡儘管使出了那馳名的鉗形陣，卻未能把俄軍包圍，更未能把俄軍殲滅；他的唯一功績不過是把戰線推展到里加城和喀爾巴阡山一帶。如果俄方的交通和軍需供給都能應手的話，那源源不絕的俄國大軍定能把這個新陣線長久支持下去。

不幸俄國既已喪失波蘭境內的工廠，在退卻的時候，又失掉大部分的運輸工具，所以子彈和鐵路材料都不能照所需的數量製造出來。從戰爭剛剛爆發的時候起，俄皇就得向英法美三國購買大量的軍需品。不幸後來波羅的海和博斯福魯海峽都遭敵人封鎖，以致俄國和協約各國的往來，只能靠着穆耳曼次克鐵路（Murmansk line）和那終年結凍的白海，否則須經由那迂遠的西伯利亞橫越鐵路。加以貨車的缺少，使得軍需品和食糧越來越缺乏，以致許多兵士沒有整齊的軍裝，甚至感受飢寒之苦。

俄皇本就懦弱無能，又加兵敗氣餒，結果被迫遜位。克倫斯基掙扎於同樣的困苦之中，也沒有什麼良策可施。

最後，兵士們又受了共產黨的慫恿，便把前線放棄。他們所以放棄前線，並不是突然受了馬克思學說的影響，因為他們連馬克思是誰都還不知道呢；也不是喪失了作戰的勇氣而無可挽回；卻是純然由於俄帝國的工業資源陷於孤立的境地，致使那冒然動員的數百萬軍隊不能得到食糧和軍火的緣故。俄國乃是「經濟武器」之下的第一個犧牲者。

這時德軍便把全部力量轉移到西線去了。不過德軍雖然由俄境轉運到法境前線上去，但盧登多夫的可怕的作戰器械依然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反之，德國的經濟武器卻幾乎成功了。柏林方面深知英法意三國的物資多仰仗海外諸國的供給。特別是美國已成為供給她們軍需品的主要來源。如要阻攔此項軍需品運往協約諸國，好使她們的軍火漸漸耗盡，而不得不出於降服之一途，有如對付俄國的策略一般，最靠得住的辦法，惟有把大西洋、地中海或英國海峽各港口往來的商船給牠一舉擊沉。

德國的無畏艦雖然不能駛離本國的海岸；但她的造艦工業卻能建造續航距離很大並裝有水雷或大礮的潛水艇。此項潛水艇能夠悄然駛過敵人巡洋艦或水雷艇的下面而不為所覺察。於是德人便以這種利器在海上到處騷擾，任何船隻，如有向協約諸國裝運軍火的嫌疑，必被牠擊沉。雖然不能奪取船貨，但牠卻盡力襲擊商船，就連中立國的船隻也不加以尊重。此真「慘無人道之戰爭」（一九一七年二月）其破壞力頗為可驚；單以該年四月而論，德潛艇所擊沉的船隻，竟有四七一隻之多，總噸數達八十七萬四千噸。海上成了恐怖世界，許多商船避於港口之內，沒有軍艦護送就不敢駛出。

這時歐洲便感覺到物資的不足了。英法意三國只好施行平民給口授糧的辦法。麪包，糖，煤，咖啡都很缺乏；而採用食品券的辦法並有素食日的規定。到了一九一七年的歲杪，連軍隊都缺乏了石油，克雷孟梭（M. Clemenceau）乃不得不向威爾遜總統發出告急的文書，倘使敵方的潛艇封鎖政策順利地繼續下去，法境前線將感燃料和鋼鐵的缺乏，則當一九一八年春季德軍舉行突擊之時，前線定有崩潰的危險。

德國很會利用「經濟武器」來抵制她的敵人。但德方攻擊的猛烈卻激動了兩種意外的反動：一種是合衆國因爲很賺錢的軍火貿易受了阻礙而對德宣戰（一九一七年四月）。另一種是協約國發明了一種帶網的船舶能夠捉捕潛艇。同時，各造船廠拚命建造船舶，在幾個月內造出的噸數竟多過擊沉的噸數。從那時起，德國的潛艇就阻擋不住協約國的軍火運輸和美國軍隊之運往歐洲了。當盧登多夫把軍隊和輜重由俄境轉運到法境前線時，他突然遇到硬敵，其人數與裝備都足以和他抵抗。德國對協約國的封鎖政策，這時便完全失敗了。

反之，協約諸國對中歐同盟國的封鎖卻是一天緊似一天。迫得同盟國不得不實行越發嚴厲的計口授糧法。而且弄得食物有代替品，衣服也有代替品，可是無論什麼巧妙的代替品，終歸救不了人民的飢餓，保全不了國家的體面。老幼的死亡率升至極劇的高度。不久，各種工業便都感覺重要原料的缺乏。貨車的輪軸因搽油不足而致損毀。車輛的缺乏使得軍隊的進攻不能徹底。

一九一八年一年中，協約國陣線曾屢被德軍突破，大隊德軍一舉攻入。但德方因缺少貨車之故，致不能將子彈軍需迅速接濟前進部隊，反之，協約國方面卻能隨時調集援軍，而奪回暫時喪失之陣線。德軍在法蘭德斯，亞多

亞以及瑪倫河上進攻之失敗，奧軍在皮阿味河上進攻之失敗，無不由於上項情勢。協約國之勝利，並非由於將帥之才幹——他們時懷危懼之心——卻由於士卒之不屈不撓和兵力物力之遠勝於同盟國。

同盟國方面的資源日漸減少，而協約國方面的資源反日漸增加。自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德軍在瑪倫河上取攻勢未能得逞之後，戰局之均勢因之打破而有利於協約國方面。福煦將軍以兩個月之努力，足能將突入法國陣線之德軍漸漸擊退（七月十八至九月二十日），並於三星期內奪得興登堡的可怖的陣地（九月二十六至十月十三日）。盧登多夫為抵抗敵軍的壓迫，不得不將大部分的軍火留給西線軍隊，致使馬其頓和敘利亞的陣線均受牽掣，結局保加利亞和土耳其其兩處陣線幾乎同時被敵攻破（一在九月十五，一在九月十八）。而奧地利的陣線亦於十月十五至十八日之間崩潰。

這時羅馬尼亞之喪失致使德參謀本部失去大部分的石油供給。結果，盧登多夫之運送軍隊只好完全依靠鐵路，而不久鐵路便為之梗塞了。反之，福煦將軍卻因石油之富有，而能利用他那可怕的「卡車隊」（Larey army）道路運送之方便使聯軍得從亞爾丁（Ardennes）森林開始迅速的集中攻擊（十月十四至十一月十一）。德軍因受聯軍包圍之威脅便只好要求休戰了。

刻爾尊男爵（Lord Curzon）曾經說過協約國的勝利頗與石油的消長有關。試看協約國所用的石油，百分之八十來自美國，由那家英荷合辦的公司所供給的不過百分之二十，由此即可明瞭：經濟因素，即使在最後勝負的決定上，也還是站在支配一切的地位。

德軍之敗並非敗於戰場

可是我們如果把那些無關輕重的因素一概置之度外，那就錯了。德國人民目睹那戰爭把德國弄得精疲力盡，而且似乎沒有了結的日子，就漸漸氣餒下來。如果他們仍然堅持下去，恐怕勝利的希望極小，而被敵人侵略被敵人報復的恐怖反極大呢。

這時，威爾遜總統的演說，他們都已經讀到了。雖然有嚴密的檢查制度，但演說的譯文仍能經由瑞士而傳遍中歐各國，經社會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之手，而佈散於民衆，使他們有了很深的印象。於是黑暗的前途發現了一線光明；老百姓都在期待着一個新的福音。人們的耳鼓中充滿了這樣一種呼聲：「把你們的皇帝或國王驅逐；到處都把民治政府建立起來，你們便立刻享受和平的幸福而沒有人向你們尋仇了；既然你們得到自由，各民族之間便可以修好和睦了。」

經過多年悲慘的爭鬪，這種景像很足以惹人心目。德國人民的希望由抵抗而轉爲認敗。物質的彈力既已鬆弛，士氣便很快地消失了。聯軍所用沮喪敵軍士氣的策略是由封鎖着手的，現在卻由威爾遜總統的演說來竟其全功了。在這個緊要關頭，威爾遜的打字機，比聯軍的大砲還要有更多的成就，更多的功勞呢！

但威爾遜主義乃是一種提倡和平的學說，並不是要煽動羣衆去從事革命的。當德軍由亞爾丁森林退卻的時候，他們心中已經明白：現在自己是在保衛祖國的神聖領土而抵抗外人的侵犯。在國家神話的作用之下，他們

的抵抗力越發頑強起來。如果沒有他種阻力，戰爭仍然會延長下去。

可是這時候又出了一種新的神話。俄國共產黨奪取政權而組織起一個社會主義的共和國，距這時已有一年之久。許多的勞動者爲這種偉業所震驚，便確信非等到一個激烈的革命爆發起來，戰爭是不會了結的。在十一月四日，基爾（Kiel）的海軍水手聽到巴黎已經起了叛亂的錯誤消息，便把他們的長官驅逐上岸，而懸起赤旗來。後來調去鎮壓的軍隊也和他們串通一氣，於是到處都有水手公會和士兵公會組織起來，而且完全仿照俄國蘇維埃的制度。十一月八九兩日，慕尼克與柏林先後宣佈共和成立。這樣重大的變動竟連一點阻力也沒有遇到。蓋德國的中產階級相信威爾遜的約言一定會遵守不渝，便一任事態之推移了。

十一月九日維廉第二遜位而逃往荷蘭。社會黨的代表亦即臨時政府的領袖亞伯特（Ebert）立刻致書於教皇代表埃爾斯伯（Einzberger）要求休戰，因於十一月十一日簽立休戰之約。協約諸國堅持要德國交出大砲五千門，機鎗二萬五千架，飛機一千七百架，貨車十五萬輛，機車五千輛以及所有潛艇並大部分戰艦，纔肯罷戰。這樣一來，德軍便喪失了牠的工業設備。但聯軍對德的封鎖暫時仍然維持原狀以防德軍補充牠的損失。不過准許她保留她的軍事幹部，槍隻以及充分的機鎗與大砲，以便鎮壓共產黨而確保國內的秩序。

事實上，德國固已被人解除武裝，但表面上似乎還沒有這樣。興登堡返回柏林的時候，仍然率領着他的部隊，部伍整齊地經過凱旋門之下，而德國人民也還相信他們的軍隊並沒有打敗仗。人人都懷着這種信心。我們試把「勝利」這個字的涵義考查一下，看牠經過什麼樣的變化，與以前有什麼樣的不同，便不會覺得德國人的態度

有什麼可怪了。

在往昔的戰爭中，一國的勝負完全在戰場上顯現出來；戰敗國的主力軍必是被敵軍圍困，或是截斷後路而全軍覆沒；戰艦必是擊沉了，或離散了；領土必是被人侵犯了，首都必是受人威脅或被佔領了；行政機關必是停頓了或破壞了。在色當 (Sedan) 塞多瓦 (Sedowa) 耶拿 (Jena) 諸次戰役之中，情形莫不如此。但是在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十一日，這種照例的情形一點兒也沒有在德國實現。首都與行政機關平安如常，連一方吋的領土也沒有被人侵略。艦隊依然停泊在軍港中，所有的陸軍依然在敵國境內紮營。由北海到瑞士邊境，德軍的主力隊綿延不絕，並且自由和他們的軍事根據地或國內通消息。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德國雖未敗於戰場，但確已敗而乞和，並將軍艦大砲雙手獻於他人，而準備着屈服於那最嚴酷最恥辱的條件。在歷史上，無論那個大國也沒有受過這樣厲害的殘害。這確是戰爭的新特徵一個明顯的說明。德國的武備仍舊保全着，但她卻實在沒有再打下去的力量了。聯軍之所以獲勝，並非由於福煦將軍的軍事策略，卻要歸功於封鎖的經濟策略。工業帝國主義的戰爭，其原因，目的與方法都是屬於經濟方面的，而其結局竟又是經濟性的，這真是奇哉怪哉的邏輯了。

自是以後，大工業國家間的爭鬪，再也不能靠軍事策略來決定最後的勝負，卻一定要靠經濟策略來分別最後的雌雄，這是我們得認為當然的事情。

大戰的決算表：負債方面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國降服的電訊傳遍世界各國。經過五十一個月的大戰之後，世界終於恢復和平了——但是花了什麼代價呢？

生命和財產的損失都極大，據國際勞動工局的統計各國的生命損失和死傷人數在壯年男性人口總數中的比例有如下表：

戰國	死或失	踪	殘	廢
德國	二、〇〇〇、〇〇〇	九・八%	一、五三七、〇〇〇	七・五%
俄國	一、七〇〇、〇〇〇		七七五、〇〇〇	
奧匈	一、五四二、〇〇〇	九・五%		
法國	一、四〇〇、〇〇〇	一〇・五%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一・二%
意國	七五〇、〇〇〇	六・二%	八〇〇、〇〇〇	
英國	七四四、〇〇〇	五・〇%	九〇〇、〇〇〇	六・五%
美國	六八、〇〇〇	〇・二%	一五七、〇〇〇	〇・三%

在以上諸國中，戰死或失蹤計共八，二〇四，〇〇〇人；殘廢共五，六六九，〇〇〇人。若將其他交戰國（如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希臘，日本，葡萄牙，巴西等國）合計在內，則戰死人數將在九百萬以上，而殘廢者約達六

百萬。亦即每百個壯年男子中，有七人戰死，五人殘廢。（註三）

這就是各國供獻於工業帝國主義的火神之前一些血淋淋的犧牲品！

至於物質破壞的損失我們只能做一個大概的估計：戰區以內遭了巨大的糜爛；道路，橋梁，運河，村鎮，城市，悉數破壞了，在法意，塞爾維亞，希臘，羅馬尼亞，俄羅斯等國境內，遭受這樣蹂躪的區域總計有數千方哩之廣；各海洋的水底到處可以發現沉沒的貨船，工廠，鑛山，和鍊糖廠受了有計劃的破壞，破壞的目的乃在於剝奪敵人的生產工具。

我們試想像一個巨大的工作場，裝有可怕的機器，在那裏晝夜忙碌的，有一千五百萬工人之多。在他們的後方還有五千五百萬工人，專門做製造，運輸或修理的工作；所製造或運輸的乃是前方工人的食品，服裝和軍火；所修理的乃是前方工人的機械設備。在這五千五百萬工人之後，還有那二十九國的居民，把他們的消費減縮到最小限度（有時甚至要到最小限度以下），並把他們的私產和儲蓄供獻出來，以便養活這總共七千萬的工人。世界上所有的資源都運到了這個工作場，以供這一千五百萬工人之用。而這一千五百萬工人所做的，並非生產工作卻是破壞工作。把一切能夠弄得到手的東西都加以破壞，甚至連他們自己也毀滅了。

這個奇怪的景像，在十年以前，連那天才絕頂的威爾士（Wells）都想像不出來，現在卻演成了一齣真實的戲劇，由全人類在五十一個月內表演出來。總計用在戰事之上的『工作日』（working day）超過十萬萬日以上。如果把這個有組織而注全力於一點的努力移而用之於生產事業之上，也許會創造出無量數的財富而使全

地球頓改舊觀呢。可是他們努力的目標卻只在於破壞。

全世界竟能支持這樣一個破壞的經營到四年半之久，這不僅足以證明我們的工業文明有着可怕的力量，而且足以證明工業文明的領袖人物盲目到了極點，愚蠢到了極點。我們如果硬要替他們辯解的話，那只有說他們沒有想到生命和財產的破壞會有這樣大。在戰事的過程中，交戰的雙方都是堅信敵方決不能支持到三個月以上。這個固執的幻想出於兩個錯誤的見解：

第一是牠們太輕視了國家神話的力量。沒有人相信幾百萬的農人，工人，和智識份子能夠忍耐戰壕的恐怖到數年之久——他們之所以竟能忍耐確由於採用換班制和例假制之故。因為有了這兩種制度，戰爭便不啻是一種工業勞動一般，有着交互輪替的工人隊。那國家神話能使得這種勞動在數年之中得到最大的收穫，而不至敗壞軍隊的士氣。

第二是他們太輕視了國際信用的力量。國際信用不啻是戰爭的鐵架子，戰爭全靠牠來撐持局面。每個交戰國起初總是先從國內的儲蓄上設法籌措作戰經費。等到國內資源漸漸耗盡，方纔求助於同盟國的信用。富的國家不啻是貧的國家的銀行，交戰國的雙方無不如此。替塞爾維亞，希臘等國周轉資金的，起初是英法兩國，後來單是英國，最後是美國。而匈牙利，土耳其，保加利亞則專靠德國替她們周轉。到了最後，大家都不得不向中立國借貸，起初是用倫敦或紐約發行的債券做爲借債的擔保，後來則由各國與中立國成立所謂「商業借款」(commercial credits)的契約。中立國都願尋找一個貨物推銷場，以便賣得較高的價格，對於交戰國的借款，當然是欣

然承諾。此項借款即用爲在中立國購買軍火、穀物、羊毛、棉花等物的代價。於是瑞士、荷蘭、斯干地那維亞、西班牙以及阿根廷等地的資源盡都浪費於戰場之上。所有的中立國無不是充斥着現金與外國債券，而各種貨物都已耗盡。結局，除合衆國而外，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剩餘的真實財富（指食料與製造品而言）了。戰場好似一個鎔爐，任何東西都在牠裏面鎔解了。

設若沒有這個奇妙的國際信用機構，戰爭將不會支持那麼久，而戰爭的破壞力也不會那麼大。使世界能夠進行和平的開發事業的是信用，可是後來又把世界弄得精疲力竭的也是信用。

資產方面

以上所述可以說是大戰決算的負債方面。那末，在此項負債項目的對方，亦即決算的資產方面，還有些什麼項目可以記載的呢？一切大的工業國家都把她們的生產工具盡量地增加起來。美、英、法、意，以及德國，爲應付軍隊的非常需要計，莫不把五金、紡織、化學以及他種工業竭力地加以開發。

但所有此項新的工廠都是替前線工作的，一旦戰爭結束便不得不向海外尋求新的市場。不幸許多國家被戰禍整個地毀滅了，就是不毀滅的也無不陷於極度窮困的景況了。結果，經濟恐慌成爲普遍的現象。

不過這種現象起初是不大顯著的。在五年戰爭之中，各種事業無不是繁榮非常，各種承辦人與投機人都發了大財。工人的工資大大地增漲起來，農人也闊起來了；資本的利息騰漲了一倍。全世界——至少在勝利的國家

中——充滿了意想不到的繁榮景象。

但這種繁榮景象完全是虛構的，非自然的。爲應付巨大的戰費，幾乎所有的交戰國都不得不依賴發行紙幣的辦法。在起初，這種紙幣確乎是代表實在的貨物，如鎗礮，子彈，大衣，皮靴等物。但各種貨物在戰場上很快的消耗淨盡了，而消費牠們的軍隊卻是毫無生產以資補充。於是事實上，實在財富的數量愈來愈少，而紙幣的數量反愈來愈多。這種局勢的結果，定然會引起紙幣的貶值與匯價的紊亂。甚至連中立國都被殃及了。她們的銀行飽藏現金而國內的貨物卻已銷售一空，於是各國的物價無不騰漲起來。即以美國而言，金圓的成色與重量，在一九一八年八月的時候，和在一九一三年的時候一般無二，可是同一種的貨物，在一九一三年賣一圓錢的，這時卻要賣二·一八圓錢了。貨物稀少的結果，連黃金都跌價了。

工人們漸漸覺察出來：他們的工資雖然加倍，但他們反比以前更窮了。有企業收入的人發覺現在百分之六的紅利，其效用還不及戰前百分之三的紅利。各種有價證券的市價莫不狂跌下來。到處都感覺資本的稀少，一九二〇年時，幾乎沒有一國不是鬧着可怕的經濟恐慌；銀行倒閉了，各種工業停頓了；失業和生活費的增高成爲各地的流行症。自然，特別是戰敗的國家恐慌更鬧的厲害。因爲困於封鎖的原故，起初是俄國，後來是奧匈，德，保加利，亞等國莫不飽經饑饉與革命的恐怖。有一個時候，共產黨的恐怖甚至會傳播到意大利，足證這些國家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已是根本動搖了。

在戰勝國之中，信用的機構使得恐慌和緩一些，遲延一些，但恐慌的局勢仍然是很嚴重的。美國有三百萬人

失業，英國有二百五十萬人失業。小康的人家除須負擔軍隊的費用而外，還得納很重的稅以便維持此項失業的隊伍。法國之所以僅免於失業恐慌是因為她曾自己出資把經過戰禍糜爛的地區復興起來——就是爲了這點利益，她還不免要拿出種種的代價來，例如：通貨的貶值，公債市價的狂跌，以及國庫的紊亂。各種代用貨幣的購買力隨着數量的增加而減少下去，在戰時所發的虛偽的財，這時便如烈日下的霜雪一般，馬上消失了去。到了現在，全世界終於覺悟到自己的貧困，於是人人便都要追問這個可怕的大戰究竟是爲了什麼目的而起的。

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大工業國家爲了生產過剩的原故而互相爭奪市場，全世界各地幾乎都成了牠們爭奪的目標。爲要解決市場的問題，牠們便運用牠們的政治機關與武力。其結果是顯然的：戰敗國不僅要放棄牠們原來的主張，連牠們的政治機關也一齊破壞了。戰勝國雖能多少保持牠們的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但牠們的工業卻反處境愈難了，因爲一方面生產工具是增加了，而他方面主顧們因戰禍而破產了，於是貨物的銷路較之一九一四年更爲狹窄了。軍事上的勝利不僅未能把牠們的景況改善，卻反更加惡劣了。

勝利是勝利了，但勝利的本來目的卻未曾達到。不過至少以下這個根本的真理卻已經證明了：用武力來解決經濟問題是不可能的，一如用刀亂砍一隻壞錶是不能把牠修好的。

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之融合足致人類文明之毀滅

現在，勝利的妄想既已漸次消失，世界大戰的新奇特徵以及牠和往時戰爭的區別便很容易了解了。下列的

比較簡表就是要說明其間的區別：

往時的戰爭

原因 政治的（自主國間的均勢被破壞。）

目的 吞併領土。

手段 運動戰（無固定陣地之戰鬥。）

尊重私人財產。

尊重中立國。

勝負的決定 用拿破侖式的戰爭來決定勝負。

結果 短期間的戰爭，（數月；）地方的戰爭，僅以數國

為限；僅致國界的變更；向中立國借款以圖元氣

之恢復是很容易的；貿易之恢復也很快。

此項明顯的區別實由於兩種文明之不同：

在三千年農業文明之歷史中，戰爭有兩種形式：一種由僱傭兵作戰，規模很小而期間很長，一種由國民兵作戰，規模很大而期間很短。這種戰爭的結果，無論在時間上，或在空間上都是很小的，而只影響到社會組織的表皮，

新時代的戰爭

原因 經濟的（工業生產之過剩。）

目的 爭奪市場。

手段 封鎖。

以工廠為戰鬥目標。

壓迫中立國使在軍事或經濟上捲入戰爭漩渦；

慘無人道之戰爭。

勝負的決定 用磨耗式的戰爭或革命來決定勝負。

結果 長期間的戰爭（數年；）普遍的戰爭，使各國皆

陷於貧困，甚至影響私人生活；國際匯兌制度為

之破壞；並引起長期的經濟恐慌。

只消耗到社會的剩餘力量。所以即令連年征戰也不會危及人類的延續與進步。人們對於戰爭既已有了很長的經驗，便認為戰爭是古往今來所不能免的一回事而甘願聽天由命。可是事實上，他們所以承認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是因為他們未曾死於戰爭。

但在工業文明之下，情形就迥乎不同了，因為工業文明是以「專門化」及「生產之相依」為其基礎的，所以戰爭的打擊定必及於一切國家並影響到牠們的生活能力。凡是能夠仔細觀察新鮮的事情而不為傳統的觀念所拘的人，一定能夠看得出：戰爭的性質是已經改變了。如果戰爭所加於各國的創傷只在於牠們的行政組織，這種創傷是小而易治的。一旦戰爭的目標改變而及於各國的經濟生活，這時牠們所受的創傷將影響及於生活能力而成為致命的傷痕。

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相融合的危險性就在於此點。工業競爭，如果一任其自然，是不會危及和平的。但帝國主義卻硬要把國家的競爭來代替私人營業的競爭，並且重視那陳舊的勢力均衡主義而輕視國家間經濟關係之相依性。這不啻是叫商人殺掉他的主顧還說這是商人發財的不二法門：帝國主義真是現代的一個頂愚笨的東西！（註四）

大凡一切自相矛盾的東西，本身上都帶有一種致命的禍胎，這種禍胎務宜及早滅絕；帝國主義既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東西，當然不能逃乎此例。法國內閣總理班樂衛（Painlevé）在格勒諾布爾（Grenoble）的演說，曾經說道：「如果容我直言無隱的話，我敢說：今後十年之中，倘非設法構成世界和平的局面，歐洲各國定會遭遇那歷史

上最可怕的戰禍。這個關鍵是政治家們人人應該注意的，忽視這個時機的政治家乃是罪人。」
誠然，這樣一種災變果真重演起來，定會把人類文明整個兒毀滅。戰爭足以決定人類的運命，在世界史上，這真是一件新鮮事。

註一 此項數字根據國際勞工局一九二〇年出版之 *Enquête sur la Production, Rapport Général Tome IV.* "Consequences Démographiques Jon médiate de la Guerre,"

註二 平民對於世界漸起困窮的現象，起初是不覺得的。他們因售賣軍火於各國軍隊而賺了一大筆錢，所以他們的心理上反覺得自己是較前更富了。但是他們所收進的鈔票只代表已經毀壞的財富。一旦海外的進口貨斷絕，鈔票的購買力便馬上狂跌下去。例如法國的各種內國公債，其實在的經濟價值，在本錢上，在收益上皆減少百分之七十五乃至百分之八十。有固定收入的人們的購買力也大大地減縮了。世界所受的經濟漸條乃漸普遍化。

註三 此項數字尚未將犧牲於戰禍的無數平民以及死於飢寒的婦孺和老人計算在內。生產率的下落也是應該加以考慮的。

註四 *Norman angell* 在戰前即已發表過這個意見，見其名著 *The Great Illusion*。

第十六章 凡爾賽條約之矛盾

假如磋商和議的政治家們明瞭世界大戰和大戰的種種結果有什麼特異的性質，那末，凡爾賽條約的內容必定和現有的大不相同。

不幸新的事實連續不斷地映射在羣衆的腦海中，而人們卻都愛依據陳舊的觀念來把牠們加以解釋。如果任何一個事件呈現着新奇的特性，和世間一般的見解相反，或超乎大衆所公認的事理範圍之外，輿論界的詭辯家將會設法把牠加以修整，務使之合乎流俗的眼光，萬一這種企圖辦不成功的話，他們還會把這個事件丟在腦後，很快地把牠忘記。那最根本的事態變遷，當代的人大概總不會加以注意的。他們不僅決不能把陳舊的觀念加以修改，事實上他們反會把牠弄得愈發根深蒂固起來。必須經過若干年之後，並且把事實加以嚴格的分析，他們的看法纔能適當，他們的謬見纔能改正。

一九一九年的開頭，在凡爾賽集會的二十九國全權大使都還是被那陳舊的理想所支配，此項理想正是他們作戰所憑藉的那些理想。而戰爭的本身又生出了兩種矛盾的傾向：戰爭之發生既然由於工業帝國主義者之爭奪市場，則論理戰爭所必有的結果定然是把戰敗者看作大家奪取的目標。德國既然不得已而投降，大家當然要把她摒諸世界市場之外，而她的領地便由戰勝者大家分割。反之，各國所遭戰爭的破壞與痛苦既然是那樣水

深火熱，大家便又把戰爭看作一種禍災，以爲無論花多麼大的代價也得把世界救出這種火坑。

於是人們對於「和平」便有了兩種很不同的見解：一些人以爲和平必得是奪取的和平與征服的和平，而另一些人則以爲和平必定是和和睦睦的和平。最不幸者，許多人相信這兩種和平是可以併行而不悖的。因此，原先使得爭端加劇的那個根本矛盾，現在又重現於和平條約之上，結果所得到的和平乃與牠的前身（即戰爭）一樣的荒謬。

威爾遜的理想

這時有一位名譽卓著的政治家，人家稱讚他，說他壓根兒就明白新式戰爭是不合理的，並曾提出一些確定的和平方案。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威爾遜總統在他致國會的咨文中，發表了他那未來和平的要件十四條，這時候，全世界的人力和物力，因爲前線的消耗，已到水盡山窮的境地，於是雙方交戰國便都附保留地承受了他這十四條，認爲這是停戰議和的一個基礎，那末，這十四條的真諦是什麼呢？

在這篇公文當中，既未提到分贓問題，也未提到吞併問題，更沒有提到賠償或復仇問題，卻是把戰爭認爲一種災禍，無論花什麼代價也得防止牠的再現。有了這個目的，他便提出以下四項辦法：

（甲）有些強國希望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另一些強國則希望仍然維持她們對於被壓迫民族的統治權。此項

被壓迫民族的存在乃是國際戰爭的主要因素。要消滅國際戰爭的口實，勢非承認任何民族在那傳統的神話（語言，種族，文化）所決定的範圍之內都有自決之權不可。因此，侵入俄國（六）比利時（七），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門的內哥羅（十一）境內的軍隊應一律撤出，亞爾薩斯洛林應歸還法國（八），意大利未恢復的領土 *Irreden-*（三）應退還於意大利（九），對於奧匈國治下的各民族當給以自治之機會（十），奧托曼帝國治下的各民族亦當有自治之權（十二），波蘭當重建為獨立國（十三）。

（乙）如能使得各地國家神話的要求統統獲得滿足，便可以把爭鬪的最大的原因剷除了。不過國家神話本質上就是傾向戰爭的，尤其是在無拘束的外交之下，所以必須把牠加以矯正。矯正的辦法是要藉助於民治主義，設立民有民治的政府，取消秘密外交（一），並由各國共訂減縮軍備的辦法。這樣一來，那被解放的小國自然就可以確保安寧了。

（丙）至於那大工業國家，牠們之間的爭端大都是經濟方面的。所以防止的辦法須得：盡量撤除商業上的障壁，確立一切國家在商業上的平等（三），海上航行的絕對自由（二），凡是不濱海的國家——如塞爾維亞——都應自由取得出海之口（十一）。

這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體；因為任何國家，如果取得出海之口，就可以自動地和其他國家相往來，並且和世界所有的市場直接發生關係，因此也就能夠購買原料，食糧和所需要的種種商品了——在這種場合之下，那經濟相依的法則就可以毫無阻礙地自由活動了。但如果一個國家，她四周的國界完全是大陸，而無出海之口，倘若

她的隣國訂立了一種關稅協定，就可以把她降服，甚或把她滅亡。所以在今日，無論由那個國家的立場來看，都要把出海之口看作經濟自立的第一個要件。

(丁)大工業國之間所以會發生激烈的衝突，是以新開地的征服與開發爲其主因，諸如殖民地，保護國以及勢力範圍等等的紛爭無不如此，所以此項新開地的分配應以當地土人的利益與各國政府的平等要求爲標準，以免紛爭(五)。

(戊)最後，如果爭端發生於很多國家之間，縱有此項防止的條款也還不夠，所以大家應互相約定，今後解決爭端再不要假手於各獨立國。爲防備強國壓迫弱國而強使服從牠的意旨起見，任何爭端都要提交一個國際聯盟的總機關來公斷(十四)。在真正的民治主義精神之下，無論國之大小，在法律面前是一律平等的，而且牠們既已認識了牠們之間的相依關係，自然就可以根據大家的同意來強迫爭者服從大家的判決了。

以上就是大戰的第四年，威爾遜總統在他那篇文書裏，替世界提出的和平條件。其中決未提及均勢，霸權，吞併或賠款，賠償和報復等等字樣。真乃是世界史上一個空前的和平理想。在以前，人們都把戰爭看作一種商業活動，戰爭的危險與費用是要取償於戰敗國，把戰利品當作代價的。但自從威爾遜的十四條發表於世之後，人們的觀念爲之一變，大家這纔把戰爭看作一種無法補償的禍災。連那最後的勝利者也都以爲只要這種禍災能夠永遠防止，俾使不致再生，便是他們的勝利已經有了十分的價值了。

威爾遜總統那篇文書的使命乃是要解除各民族的武裝而求其解放；使經濟的相依法則得在任何地方充

分實現其作用，以便防止各民族間的經濟衝突，使各國互相聯合，以便使牠們的主權發生中和作用，使那互相猜忌而毫無拘束的自主國統受一個總主權機關的裁判。

威爾遜由美國國會議事堂向那紛擾的世界發出了這篇和平宣言，他確是一個眼光遠大的人。他明瞭全世界好像被種種關係結成的一個有生命的物體，只要牠一部分肢體受了打擊，便會損及全身。在當時的政治家中，完全認識這件事情的，要算他是頭一個。所以威爾遜真可稱爲一位大實際家，雖然他的敵人的主張恰好和此相反。所不幸者：他雖然瞭解當時局勢的種種真象，但其他的人大都仍然固執着昔時的種種信條。不過當時的政治家中，以相依相助的世界和平爲其理想者並不僅僅是他一個人。

協約國際各種委員會解散之原由

當停戰的前夕，法國商業部長克力門泰 (M. Clementel) 曾與英國羅伯次塞西爾爵士 (Lord Robert Cecil) 商洽同意要把國際間各種經濟委員會的壽命延長。蓋當一九一七年之末，協約國迫於當時情勢，不得不把他們的種種資源——如穀物，煤，石油，鋼鐵，以及海運，信用等——合在一起，不分彼此，大家公用，並由設在倫敦的各執行委員會任分配之職務，國家及民族的界限已是無法顧及。

在柏林也有同樣的執行委員會，中歐同盟諸國的資源供給，全都以此處爲其集中點。設使一九一九年時，倫敦與柏林兩方面的委員會合併爲一，所有全世界的資源都將受這個統制機關的管轄。那成千成萬被遣散的兵

士，以前很難找到工作，便也可以去從事建設工作，重建他們所破壞的那些東西了。

各國既然竟肯拋棄牠們的經濟獨立去從事戰爭，那末，把拋棄經濟獨立的期間延長，好修整戰禍的損失，當然是無論怎樣看也應該的。果真如此的話，不僅是被那工業國的大爭鬪所破壞的世界經濟統一，藉此就可重建起來，而且連那經濟的國際聯盟也都可以實現出來，以便替那政治的國際聯盟立下一個堅固的基礎。

不幸這時奧匈與德國都發生了革命，柏林的各種統制委員會便不得不解散了。但是協約國方面的經濟合作，這時還可以繼續下去，而且英法兩國政府確曾考慮及此。不幸這件事又遭了合衆國的拒絕。那末合衆國爲什麼拒絕呢？因爲那時候，只有合衆國還保存着豐富的食糧，原料，製造品與健全的信用機關，所以在事理上，協約國當然不得不仰賴於合衆國，作爲牠們主要的供給來源和通融資金的銀行家。但如果合衆國的主顧們（指協約國各國）依然團結在一起，那末，牠們之間是決不會有什麼競爭的。這樣一來，所有的各市場，不管都受一個主顧的統制，那買主方面就能夠自定價格，強迫賣主遵守了。如果這樣，那倫敦的各種執行委員會便可以任意處分美國的剩餘資源了。反之，如果此項國際的組織，一經解散，美國商人就不管是各國獨一無二的供給者，各國都搶着向他們購買，他們便可以取得統制一切市場的地位。這樣看來，他們當然是寧可恢復自由競爭的局面，而不願各種國際委員會延長壽命。不僅如此，當時他們也急於要脫離國家的保護，猶如歐洲的商人一般。

戰時，各國政府不得不把所有的生產部門統統集中在幾個聯合會的支配之下，而把此項聯合會又都放在國家的管理之下。但事實上，工業界的巨頭們，企業同盟以及企業組合的領袖們，在此項聯合會中都有很大的勢

力，他們甚或能夠支配國家，而且此時他們支配國家的力量，至少和以前國家對於他們所有的支配力量一樣大。結果是訂立了整套的規則章程，此項規則章程往往含糊不明，但大半都是有利於大企業的，所以那些被迫加入這些公家組織的小企業都認為此項規則章程是極其專斷的，戰事一旦告終，各處便都發出了不滿的呼聲，認為此項公家組織是國家社會主義特有的牌號，人人都渴望着推倒此項組織，好恢復他們已失的自由。

尤其美國的情形是如此，美國商人忍受政府的束縛並非出於本心，不過權且忍受下來，做爲戰時一種不得已的辦法罷了。但如果這種辦法，到了戰爭停止和平恢復之後，仍然任其拖延下去，則大商業將有受政黨支配的危險。這時民主黨正在當權，商業界便加入共和黨方面。上議院馬上對威爾遜總統的政策表示反對，全國的新聞界都在熱烈地呼籲恢復平時的商業政策。

休戰纔過幾天，石油委員會的主席裴德福先生（Mr. Bedford）便通知克力門泰和羅伯次塞西爾爵士說：美國將退出各種協約國際委員會。從那時候起，倫敦的各種執行委員會，既已失去牠們主要的供給來源，便只有解散之一途了。成立一個國際經濟機關的一線希望，這時便完全化爲泡影，而且可以預料得到：那將來的國際聯盟，既已失去物質的基礎而降格成爲一種政治機關，牠所享有的威權必將極受限制。

共同從事復興的建議

但我們卻不可因此便假定那時的合衆國已然與歐洲大陸脫離關係。一般大衆眼見得大戰的結果，只有愈

發加重大家的負累，而毫無相當的利益與之相抵，便都渴望着實行閉關自守的政策；但是商人們卻明白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

在戰時物價上騰的刺激之下，美國農業極度發展，如穀物棉花的種植都已呈生產過度之象，若不把剩餘的物產設法輸出海外，國內物價必將跌至生產費用以下。金屬、紡織、化學以及其他工業，因應付協約國軍隊的需要，都已把牠們的機械設備加倍擴充，現在卻突然感到無人購買之苦，大量的資本呆閒下來，大多數勞工階級都將有失業的危險。最後說到銀行，因在中立時期接受了協約國的種種支付，結果都擁有過剩的資金而不得不覓取投資的途徑。

所以美國需要歐洲的顧客並不亞於歐洲需要美國的資金。恰巧這時候，在那廣闊的戰區裏面，有許多城市須得整個地改築，許多工廠須得重建起來，或重新設備起來。特別是在法國，那被戰禍蹂躪的區域恰好給美國的工業開一個出路，這是美國正在求之不得的。

一九一九年之初，巴拿馬運河的建築者哥塔爾茲 (General Goethals) 曾通知法國政府，說是一個有力的金融團體正準備把法國工業自己所不能生產的一切原料與機器，以信用供給於法國。雖然美國用了種種手段，但克雷孟梭對於這個建議始終未予答覆。

同時，英國工業因突然失去戰時的銷路，也正在注意法國境內戰禍區域。一九一九年三月，英國工業聯合會的一位代表來到巴黎，曾由法政府當局正式接見。這位代表的使命，是向法國政府建議：凡法國本國的工業所不

能接受的購買委託，英國情願接受下來，並且代為墊出所需的代價，等到德國支付賠款的時候，再行清償。這種契約如果訂立起來，法國將能獲得以下幾種利益：第一是戰禍區域或能於兩三年之內趕快復興起來；第二是法國的社會儲蓄不致被國家的公債完全吸收了去；第三是英美兩國的承辦者既因墊款的原故而與德國賠款直接發生關係，則法國將與他們立於休戚相關的地位。克雷孟梭雖曾對於英國的友情誠懇地表示感謝，但對於這種有利的建議依然加以拒絕，理由是恐怕引起法郎的貶值。（註一）

但法國拒絕此項建議的真正理由乃是法國的工業家決意要把此項買賣委託全部保留給他們自己。當大戰之中，法國工業的機械設備確已有了相當的發展，但仍不足以應付這樣大規模的復興事業。可是法國工業家自有他們自己的打算，他們認為自力復興的計畫可使法國工業在若干年之內不必向海外覓求銷路，而且可以擔保不致發生失業問題。此外，所有復興事業的利潤將由法國自己獲得。謝謝這種政策的恩惠，戰禍以下的無數犧牲者仍在那臨時收容所等待着他們住房的改築，這時法國的國庫已至水盡山窮的境地，再也無力墊出所需的巨款，而法國的諸同盟國，對於法國的對德債權這時已持冷淡的態度。可是這種局勢恰好給法國當局以良好的藉口，使他們可以時常演說德國人的無信，英國人的奸詐與美國人的漠不關心。

但事實上的困難乃是大戰的教訓已然被人忘卻了。在以前，人們所以能夠認識國與國間相依的關係是迫於戰時不得已的情勢，戰事既已過去，人們便馬上把這種關係忘得乾乾淨淨了。協約國際的各種委員會，因為美國商人拒絕合作，與法國工業界拒絕英美共同復興戰禍區域的建議而不得不歸於解散之一途。看了這種現象

便可以知道戰前的國家自利主義這時又恢復起來了。

從那時起，一切的和平希望——一種健全的和平，與相互依賴的和平之希望——全都成爲泡影而無可挽回了。

歐洲的巴爾幹化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協約國與其他聯合國的全權代表，在巴黎集會，商討和約的基本問題。所代表者計二十九國。但是那所謂「利害關係較淺」(limited interests)的國家，自始就被人置之度外，只有在偶爾召集總會時，他們纔有參加的機會。

和議的磋商完全操縱在五個勝利的工業國，即英，法，意，美，日五國的手中。但日本專門想着擴充她自己在亞洲的勢力，對於歐洲的事情，實際上是漠不關心的。所以起草和約的任務，完全委之於所謂「四大會」(Council of the Big Four)。這個「四大會」是由法，英，意，美四國代表團的首領克雷孟梭，魯意佐治(Lloyd George) 俄南佗(Orlando)與威爾遜組成的。

不幸除威爾遜之外，其他三人都受種種秘密協定的限制，這種秘密協定是在戰時締結的，目的在於分配戰利品。於是他們三個人便聯合起來反對威爾遜，因爲只有威爾遜是在希望着一種互助的與和睦的和平。從和會開幕的那一天起，這種對立的情勢就已然很明顯了。克雷孟梭，魯意佐治與俄南佗不認爲他們自己是立在公斷

人的地位，應負替世界謀永久和平的使命，卻認爲自己仍是那舊式的全權代表，其任務只在藉勝利替本國謀最大的利益。他們心中所最爲掛懷的三件大事乃是：（一）打破奧德工業帝國主義的團結而瓜分牠的贓物；（二）強迫戰敗國拿出賠款以便戰勝國趕快恢復牠們戰前的地位；（三）要求充分的軍備保障，以便永久確保戰勝所獲的利益。

他們知道美國是無所要求的，便以爲在這種計劃之下，英、法、意、日四國的大工業將能奪取那已被打倒的敵人之所有的市場，而由此所獲的利益使得牠們馬上能夠繁榮起來，並且一天比一天地繁榮。這樣一來，那戰爭纔可以得到相當的代價，並且成爲一筆好生意，足以滿足那些「實務家」的心理。實務家們對於威爾遜的狂想是向不了解的。

可是他們卻也還記得和約的簽訂是根據着威爾遜的十四條，所以他們便決意要保留威爾遜的理想。不過他們另外又添上了一條就是：德國當負禍首的罪名——他們以此爲藉口就可以向德國要求賠款了。於是帝國主義的色彩便不知不覺地染在和約之上，而條約的整個意義都隨之而改變了。

第一點就是他們承認了國家主義，試看各國之參加戰爭無不是假借着國家神話的名義（至少以歐洲大陸而論是如此），就可以知道他們非承認國家主義不可了。而且爲打破中歐同盟諸國的團結計，再也找不到比牠更妙，更唐皇的藉口。

他們以返還亞爾薩斯洛林於法國與復興波蘭爲手段而使德國的一部分人民脫離德國。同時德國的重要

鐵礦，一部分的煤礦與紡織業和那最肥美的田地也都被他們奪去。他們又藉口解放捷克斯拉夫而把奧國的主要工業中心地奪去。又以聯合德蘭斯斐尼亞（Transylvania）的羅馬尼亞人與摩魯達維亞（Moldavia），窩雷啓亞（Wallachia）兩地的羅馬尼亞人為手段，而使匈牙利喪失她的森林與礦產。又藉口把哥羅西亞人（Croats）復合於他們的同族塞爾維亞，把的里雅斯德（Trieste）的住民復合於他們的同胞意大利，而使奧匈喪失了出入亞得里亞海的一切海口。又把巴爾幹各國的劃界弄得極不確定，以便阻塞奧德兩國的貿易出入於薩羅尼加灣與多島海。

用這種種手段，他們便把那環繞於德國四周的許多「補充國家」的整個系統，亦即號稱「中歐同盟」的那個完全的經濟集體給打得粉碎了。同時，那原本是中歐各國一塊殖民地的奧托曼帝國，現在也被人分割了，而成立了許多新的阿拉伯國，如敘利亞，巴力斯坦，美索不達米，和赫查茲，都受戰勝國的保護。從漢堡直達波斯灣那一塊廣闊而完整的領土，原在柏林政府的支配之下，現在也被人家一下子分成了許多自主而敵對的國家。這不啻是在國家主義的美名之下，把德意志工業帝國給分裂了。

俄國因為布爾塞維克主義化的原故而成為協約國的敵人。他們為阻止俄國與波羅的海並與德國接觸起見，便決定替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和波蘭各民族謀解放。這樣一來，彼得格勒城便不啻被人封鎖起來，而敖得薩城也因希臘人之管領達達尼爾而不能和地中海相通了。

所有這些被解放的小國所最關心的第一件事，自然是為他們自己樹起一個關稅壁壘並編成一個軍隊，因

爲這兩種東西乃是主權的最高表現；而列強也是小心謹慎的，惟恐提醒牠們注意威爾遜的第三點（其內容即竭力撤除關稅壁壘而維持一切國家的商業平等）。同樣，他們又準許各小國無限制地擴充軍備，這是和威爾遜的第四點相矛盾的。威爾遜的理想以爲民族自決足以促成和平的局面，但列強卻是決不肯鼓勵戰敗國實現民主主義。牠們一方面儘管要打倒巴威的庫耳埃斯莫爾（Kurt Eisner），同時卻擁護匈牙利的獨裁者和爾塞（Horthy）。牠們不僅沒有制止祕密條約，反締結了許多同盟條約與祕密協定而不向國聯通知。牠們儘管把海口給與塞爾維亞與波蘭，同時卻禁止奧匈有出海之口。最後，並且因英國之要求，而把海上航行自由的原則取消。結果，這些小國仍然逃不脫帝國主義列強的蹂躪。

總而言之，威爾遜的十四條之中，那頭四條——就是那使得他的整個兒學說富有和平色彩的四條——是統統被牠們犧牲了。牠們雖然准許各民族有完全的自主權，卻把怎麼促進各民族的經濟自由與政治和平的具體辦法給忽略了。勝利的帝國主義者爲確保牠們的霸權，便不惜藉口民族解放而把歐洲弄得分崩離析了。

德意志經濟組織之瓦解

以上的種種安排不僅把德國與地中海東岸各市場的交通給截斷，就連她和俄國的往來也給斷絕了。但協約國方面還認爲不足，因爲新興的小國，爲了經濟需要的壓迫，也許會和相鄰的大工業國締結商約。另一方面，漢堡和布勒門與海外各國的商業關係也許會恢復過來。如果想要把德國的競爭力量壓制下去，叫牠永遠不得翻

身，那就非把牠關乎存亡的生產機構給牠整個破壞不可，換言之，就是要打碎牠的生產工具。

頂要緊的是把牠的金屬工業給牠破壞，所謂「賠償」的原則就是要做到這一步工作的。協約國不顧國際公法上尊重私有財產的習慣，把斯丁內斯（Stinnes）、齋生（Thyssen）和羅啓林（Roehling）三大鋼鐵工廠與通微爾（Thionville）鐵鑛同時沒收；這三個大工廠原是德人爲供給盧爾的各工廠而設在洛林的，卻與盧爾的各工廠同時廉價賣與法比兩國的冶金家了。這筆生意有着兩重利益：既可將那可怕的盧爾大工業一舉擊破，同時又有利於牠的國外競爭者。

其次爲協約國所注意的就是煤鑛。根據賠償的理由，盧爾各鑛每年應將大量煤炭供給法國，供給的數量應與被德國破壞的法國各鐵坑的總產量相等，這是專爲抵償法國的損失。但此外，德國還得照戰前供給法國的數量，與德國領有洛林時供給當地各工廠的數量將煤炭與焦煤，如數供給法國。復次，盧爾各鑛的出產既不足以達到以上的目的，便將薩爾的普魯士國有各鑛交由法國經理。最後，爲維持波蘭與捷克斯拉夫的各工廠，牠們便決定把上西利西亞（Upper Silesia）的煤鑛區由各國瓜分之一（最先甚且把該區完全歸之波蘭）。這樣一來，使得德國把煤炭的來源喪失了一大部分。依照同樣的原則，德國的紡織工業不得不把睦爾豪斯（Mulhouse）的紡業工廠（這些工廠原爲薩克森的織業所仰賴）雙手獻出；化學工業也不得不把大部分的產量，以賠償的形式納於戰勝者。

勝利的列強既將德國的主要工業予以打擊之後，便將牠們的注意點轉移到德國的運輸系統上去。牠們藉

口賠償迫德國交出很多的貨車和車頭。英國就要求德國把牠在戰時擊沉協約各國的船舶一噸對一噸地如數賠償出來，其結果德國的商船幾乎全被沒收了。協約國方面甚至連這樣辦還認為不足，而決定叫德國的造船廠白盡義務地替牠們工作。

再次考慮到的就是「銷路」的問題：德國的一切殖民地，名義上是交國聯管理，實際上簡直是分給協約諸國了；租界契約取消了，在海外的投資也被人沒收了。協約國一方面禁止德國向海外發展，同時卻強迫德國把牠的國內市場開放；亞爾薩斯洛林的出產，在五年之內准其免稅輸入德國；協約國在德國的所有鐵路之上有自由運輸之權；同時德國的幾條大河也歸國際共管了。

最後，德國的資本也受了根本的打擊。協約國以賠償為藉口，要戰敗者把各方前線上一切的破壞，如數地賠償出來。賠款的總數是沒有明文規定的，但即以其最低數字而論，恐怕也非德國全體人民勞動一世代之久所能清償的。因此德國的生產事業便負了可怕的財政負擔；所有的儲蓄都被國家的需要吸收淨盡了。德國的工業既然喪失了工作資本，便只好在牠競爭者的門口，懇求牠們予以信用的援助。

我們若把散見於凡爾賽條約中屬於經濟的各條款湊集在一起，便可以十分明白戰勝者用意的所在了。

當一九一八年之初，德國陸軍本部下令把法國北部的工廠加以有計劃的破壞，這不啻是這個戰爭具有經濟性的一個顯然的證據。當協約諸國政府成立和平條件的時候，他們的傾向也很可以證明戰鬪之經濟性。牠們以賠償為藉口，用了毫不留情的手段，一心要把德意志的經濟機構整個地摧毀。德國把牠的鐵礦，最大的鎔鑛爐，

一部分煤礦，商船隊，殖民地以及她的資本通通都喪失了，顯然是沒有戰鬥的力量了。帝國主義戰爭已然達到牠的主要目的。

國際聯盟中之帝國主義

不必說，這樣的一個和平不是德人所情願接受的。在休戰言和的當初，協約國方面曾允許恢復她們對德國的國際交誼，並讓德國與其他國家立於平等的地位，只要德國肯把霍亨索倫王室(Hohenzollern)推翻而另成立民主政體。德人因確信協約國的允諾是一定可靠的，就把他們的王室一概推翻而推舉社會民主黨出來柄政。但是到現在就連他們的生產工具也被協約國剝奪淨盡了。德國的人口是那樣稠密，她非靠向外輸出物品是無法生存的；她現在只好在「移民國外」或「忍受赤貧」的兩條道路中間，選擇一條。和約的唯一結果，只是養成德國人的革命情緒與復仇心理。

協約國的三位代表克雷孟梭，魯意佐治和俄南佗馬上默契預防對策的必要。他們認為威爾遜總統所設計的民主式的國際裁判不足以維持此項嚴峻的辦法，而以為必須出於耀武揚威之一途纔行。於是她們便把德國的全部艦隊與所有的重砲加以沒收；把所有的要塞破壞，並且監視她製造武器，把她的陸軍縮減為十萬警察。進一步她們更決定要佔據萊因河左岸和所有的橋頭堡壘。因此，法國便能把一個有力的軍隊駐在德國的領土之內，並且加以英，美，比三國的分遣隊做爲援軍。波蘭於捷克斯拉夫也和法國取一致行動，而編成一個有力的軍隊，

並採戰時的編制；法國則情願把軍械供給她們，並替她們物色教官與參謀長官。德國這時眼看着各國軍隊把她包圍，準備着破壞和約而向她侵略。事實上，這只是一個暴力的和平，依照傳統的辦法，用武力撐持的和平。

威爾遜總統之計畫組織國際聯盟，原是要把牠當作一個和平與仲裁的機關，但是在上述的環境之下，國聯之無用已成盡人皆知之事。可是各國感受戰禍之痛苦，既深且鉅，人人都在切切希望着這次世界大戰過去之後，不要再有戰事發生；至少也得有一線之希望，使他們得知那持久的和平最後已經獲得，纔能慰安他們。所以儘管克雷孟梭的冷嘲熱罵，但國聯的組織並未因此而取消。可是魯意佐治和克雷孟梭決沒有打算要把他們之間的密約拋棄，而去聽從諸小國聯合組成的那個永久聯盟的判斷。所以和約是根本改變了，和約的精神完全不同了。第一是那些戰敗國，起初會被人摒諸國聯之外。(註二)這是因為戰勝國明目張膽地破壞了休戰的條件，而欲避免戰敗國提出任何抗議的原故。就是戰勝國也分爲兩類：一類就是所謂利害關係較淺的國家，另一類就是那幾個大工業國。

一切國家在聯盟總會(Assembly)上都立於平等地位，總會是每兩年集會一次。但事實上，大部分的實際工作是由理事會(Council)負責辦理的。五大工業國即英，法，意，日，美是法律上的常任理事，而其餘的國家總共只由四位理事代表之，並且這四位理事的選任期限甚短，是要時常更換的。但因美國拒絕加入國聯，所以事實上的常任理事起初只有四位，直到一九二六年准許德國加入國聯的時候，列強在理事會上的代表數目纔恢復到原來的數目——五位。至於其餘的小國，雖然也准其選舉若干非常任的代表（最初是四位，一九二二年增爲六位，

一九二六年增爲九位，)並且現在理事會上此項選任代表的數目已經超過列強代表的數目。但事實上持國聯之牛耳者仍是五大強國，一部分因爲在世界大局上，牠們佔優勝的地位，一部分因爲對於大多數事件，理事會的決議需要全體一致通過。

設有破壞盟約者，國聯並無可恃的武力藉以強制執行牠的決議，但理事會可以向有關係各國的政府建議，請牠們派遣有力的陸軍或空軍，以便執行牠的裁判。

雖然各國人士對於國聯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是在這種環境之下，牠已注定是不能有所做爲的了。除非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同意之下，牠纔能夠有所活動。

帝國主義列強間所以會發生衝突，未開發的新興地區要算是一個主要原因，所以威爾遜總統曾準備要把此項地區置於國聯的直接保護之下。他曾設計一種制度，把此項地區交由國聯所委任的國家保護之。三個大協約國和牠們的被保護者，即比國乃是當然的委任統治者(Mandatories)。委任統治有三種方式：

(甲)對於古奧托曼帝國境內被解放的諸民族，委任統治者是居於顧問的地位，指導當地的行政並管理當地的經濟資源。

(乙)對於中阿非利加德國前所領有各殖民地境內文化較低的各民族，委任統治者直接負責管理當地行政的責任，至於貿易上的利益，則與國聯的其他會員國平等享有之。

(丙)對於西南阿非利加和太平洋上德國前所領有的各殖民地，則應認作委任統治者領土的一個主要部

分。

美國既然拒絕加入國聯，所有此項委任統治的職務當然是由三大工業國分擔之。關於委任統治事項，她們每年須向國聯提出一個報告書。但是國聯的委任統治常設委員會（Permanent Mandatar Commission）對於此項報告書只能加以批評，而沒有力量強制執行他自己的政策，所以國聯的統制不過僅具形式而已。實際上，所謂委任統治者也不過是把以前的「勢力範圍」、「保護國」以及「殖民地」等等換上一個好聽的名稱罷了。帝國主義者用了種種掩人耳目的手段，仍在那裏玩牠那一套舊把戲。

新興國家得到經濟上的自治權

克雷孟梭、魯意佐治和俄南佗之起草和約，完全抱着上述的態度。結果，所得到的和平乃是一種分贓式的和平，這種和平完全要靠武力的撐持；和威爾遜的理想恰好相反，因為威爾遜的理想是以各國之相依相助為其出發點。他所以默認這種和平乃出於不得已，蓋他在巴黎既已陷於孤立，同時又見棄於美國的議會，進退維谷便只好默認下來。

經過三個月激烈的討論，便於五月七日把草約送達於德國代表。協約諸國強迫他們把那頂嚴酷、頂屈辱的條件接受下來，幾乎沒有一點兒商量餘地。德國代表雖曾表示甘願拿出一千萬萬金馬克的賠款作為賠償的代價，但協約國完全給他不睬。

根本上說，克雷孟梭和魯意佐治只把賠償看作附帶的事情。他們所以不願把戰時損失確定一個總數，意思是要保留說話的餘地，好無限地施用經濟壓力與軍事壓力，叫德國永無翻身的機會。他們打仗的目的是要把德國的各種工業一概摒諸世界所有的市場之外。在一九一八年時，他們的思想還是和一九一四年時一樣。雖然中間經過了可怕的戰禍，但他們的態度絲毫未改，他們是什麼事情也沒有忘掉，什麼教訓也沒有得到。他們以為他們的各種工業將能在世界上覓得一個無限大的銷場，甚至連那受戰禍糜爛的區域也都可以替他們增加意外的生意。而美貨進口的增加甚或被他們認為富庶的徵兆，這些政治家們都在那裏做着好夢，深信一個繁榮的時代即將開始，藉着這種種勝利的手段，將能替各國打開趨向繁榮的路子。他們的頭腦竟那樣簡單，以至於相信隣國的破滅可以致本國於富強。

這些「實務家」以為他們自己有方法可使戰爭撈回本錢來。他們頗以他們的戰功自豪，並且確信前途的樂觀。於是他們便奏着生產的讚美之歌，催促着他們的商人去開發世界的市場。

不幸他們忘了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依關係。所以他們的算盤是全盤差誤了，儘管他們用盡了種種手段，所得到的結果，竟和他們所預料的完全相反。舉個例子：譬如他們決意要把被壓迫的民族組成許多「民族國家」(nations)——這種理想本身是很對的。不過地理上種族的分配是在一個農業文明的時代之內演進而完成的，在那時代之中，每個村子實際上都是自足自給的。可是現在，無論在那個國家，這種階段早已成爲陳跡。連巴爾幹，拉特維亞，或是敘利亞的最落伍的民族都和西部歐洲有貿易往來的關係。牠們拿五穀，亞

麻、油和果品交換歐洲的機器、織物。

結果，最正當的辦法只有在劃定新國的國界時，儘可能地使之與種族、語言及宗教等等界限相符合，以便使國家神話能夠充分地見諸實際。但同時，這些新國之間卻不得不保持着門戶開放主義，好讓她們的經濟發展不致受到阻礙。當威爾遜總統草擬他的十四條時，大約也曾注意及此，因為十四條的第三點是要撤除關稅壁壘而實現貿易機會的平等。

不幸那班草擬凡爾賽條約的人所最關心的卻是要隄防德國的經濟復興，唯恐她的經濟地位優於她的諸隣國，所以他們對於這些新國的關稅壁壘是決不願過問的。於是這些新國不僅在政治上握有主權，就是在經濟上也是一樣自主的。因此，那十九世紀的根本錯誤即所謂經濟與政治之融合者便又在這時重演起來。結果凡爾賽條約的創始人只好在以下兩途之中，選擇一途：或是把新國的國界完全按照人種誌上的種種界限來劃定，不問所造成的新國是否能夠自存；或是按照經濟上的需要把新國的國界加以擴充，任聽其中包括不同的人種。

領土回復運動之風起雲湧

他們把前一種辦法適用於敵國（奧匈、保加利亞）而把後一種辦法適用於友國（法國、捷克、波蘭、塞爾維亞與意大利）。

可是這兩種辦法都得到了最不幸的結果。比如亞爾薩斯洛林之復歸法國，固然十分符合當地人民的希望，

但是洛林的鎔礦爐完全靠着盧爾的焦煤，而亞爾薩斯的紡業又以薩克森的織業爲其唯一的主顧。爲使兩地的實業不致突然發生失業問題，便不得不強迫德國開放她的國界至五年之久，並須強迫盧爾的礦坑，依照戰前的供給數量，供給焦煤於洛林。所以復歸法國的這兩塊地方，政治上雖已變爲法國的領土，但在經濟上不管仍屬德國。

這種情勢是很危險的。不久之後，德國的冶金業，因爲牠們在洛林的鋼鐵工廠已被敵人沒收，便在盧爾把牠重建起來。這時牠們就實行停止向洛林供給焦煤了。這樣一來，洛林的鎔鑄爐只有停止工作之一途，法國政府爲謀恢復起見，便派軍隊把盧爾佔領。因此惹起很大的國際糾紛，這糾紛是政治的，同時也是經濟的。在糾紛之中，法比兩國曾有一時陷於孤立的地位。

同樣，還有一個新國也是協約國方面決定要依據國家主義而創設的，就是捷克；可是爲使捷克能夠自存起見，她們便不得不把易北河上流的工業區域和摩拉維亞以東的農業區域劃歸捷克；但前地住有日耳曼人，後地又住有斯拉夫人，結果，所謂「民族國家」者，其中竟住有幾百萬異族人。

波蘭的人種狀況也是同樣的複雜。第一是劃歸波蘭的加里西亞，其中住有很多的猶太民族，語言、習慣和種源都和波蘭很不相同。其次，爲使這個新國能有一個出海之口（否則她將無法自存），便把直通但澤海港的那塊叫做「走廊」(Corridor)的地方劃歸於她。可是但澤是德國的一個城市，而「走廊」又住有很多日爾曼人。不但如此，那「走廊」又把普魯士東西兩部的領土截爲兩斷。結果，所謂「被壓迫的少數日耳曼人」提出了種

種的要求，而猶太人也提出了種種的抗議，幾乎把波蘭弄得四分五裂。壓迫人者現在反被人壓迫了。

南斯拉夫這時也正需要一個出海之口。薩羅尼加灣之內有一塊地方是準備劃給她的，但這海港是希臘領有的，希臘人當然不同意把這地方劃歸南斯拉夫。在這種環境之下，塞爾維亞人便只好把他們的注意點轉移到亞得亞里海之上的阜姆去。但意大利人這時已經領有的里雅斯德，她心裏當然不願讓南斯拉夫向阜姆發展貿易。這時，意國的丹嫩齊奧(D. Annunzio)便率領他的敢死隊把阜姆佔領下來。這海港和這城市的分配問題，在國際外交上折衝到四年之久，始終沒有得到一個足以調劑國家主義與經濟需要的解決辦法。

根據條約最初的草案，上西里西亞(Upper Silesia)是應劃歸波蘭的，因波蘭這時急需煤炭。德國對此提起抗議，協約國方面都主張用全民投票的辦法來解決，這辦法得到國聯的贊助。結局，國聯指定一個委員會來研究這個問題，後來便把這地方均分。德波兩國。兩國所以拼命爭這塊地方，由於一個經濟上的事實——因上西里西亞富藏煤炭之故。

爲要剝奪保加利亞在地中海上的出口，便把一塊地方劃歸希臘，而這地方的居民卻明明明白是斯拉夫族。爲要使英國能夠防守蘇彝士運河的諸入口，便在巴力斯坦建立一個猶太族的民族國家，但其中大多數的居民卻屬於阿拉伯族。不問古的斯族(Kurdish tribes)情願不情願而把牠合併於伊刺克(Irak)；亞美尼亞人是被人忘掉了，雖然以前曾允劃一塊領土給他們。

總而言之，人們已經覺察：要使各民族的種種抱負和他們的種種經濟需要完全調和是絕對不可能的。結果，

種族間的衝突不僅決未消滅，反倒激烈起來；戰爭的目的原是要為各民族謀最後的解放，卻僅僅把「領土回復主義」(Irredentism)給鼓動起來了。

貿易流(Trade Currents)之斷絕

戰敗者已經看出牠們自己被人囚禁在窄窄的範圍之內——這範圍就是按人種誌而劃定的國界。牠們又爲了關稅自主權而受了不少的困累。匈牙利喪失了許多森林與礦產，因爲此項富藏地區都已劃歸羅馬尼亞了。奧地利是擁有五百萬住民的一個國家，但她的首都維也納竟會發生饑饉的恐怖。奧匈保加利亞處在四面沒有出路的領土之內，幾將無法自存，她們對於種種國際條約不斷的發生反感，因爲此項條約使得她們陷於飢饉的境地。共產黨的宣傳品傳播在她們的境內，使得她們躊躇於革命與獨裁政治之間而無所適從。她們的隣國迫於這種局勢，只好結爲同盟，合力抵禦她們，並把軍隊採用戰時的編制。民族解放的意義顯然是要促進歐洲的和平，誰想結果於政治的危機之外，反倒添上了社會的危機，使得國際的糾紛愈發擴大起來。所有這些情形都是因爲經濟因素復與政治因素互相融合以致鑄成大錯而發生的必然結果。

不久之後，所有新國都已曉得：關稅自主是伴隨着危險的。當大戰之前夕，她們都已陷於豫算收支不能相合的危局，並且都會濫發紙幣，不問有無相當之金準備。在大戰之中，她們更是不得利用這種非常的手段了；但因爲她們曾與德國締有匯兌協定之故，她們的通貨便同時發生貶值的現象，而且貶值的步調互相一致。不過唯其

如此，她們之間的貿易關係纔沒有受到很大的妨害。但是等到她們的豫算都已恢復獨立之後，各國貨幣的價值（如德國和波蘭的馬克，奧匈的 Crown，羅馬尼亞的 Leu，塞爾維亞的 dinar）便開始動搖起來，而且動搖的步調各不相同。結果通貨貶值較小的國家佔了便宜，而通貨貶值較大的國家吃了虧，因為前者能以很低的代價向後者購買貨物，而後者幾乎不能向前者購買任何貨物。那較比貧困的國家便開始增加出口稅，而其他國家，為保護國內工業起見，便增加進口稅。於是歐洲全境到處都樹立起關稅壁壘來，而且關稅率又都是瞬息萬變的。因為通貨價值不安定，——亦即物價動搖——的結果，長期信用的交易已是不可能，墊款變成危險的勾當，各種交易都帶上了投機性。

在大戰之中始終維持得住的經常的貿易流，現在卻於一擊之下，整個兒紊亂了。勝利的各工業國本來希望着要把德國在中歐各市場上的地位取而代之，現在纔曉得這些市場是不容她們插足的，於是她們國內馬上呈現失業的恐慌。她們本來打算把戰敗國一下打倒，卻因為經濟相依的關係而打傷了她們自己。

接受敵人的賠償會損及本國工業的利益

但是不久之後，竟又有一個更厲害的矛盾現象呈現出來。戰勝國，為要重興戰廢的區域，為要支付戰役恩給金，為要清償債務，便把巨額的賠款加在德國的身上。她們準備叫德國於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以前，付出二百萬萬金馬克的賠款（內中有現款亦有物品）此外，並要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之間發行四百萬萬馬克的

流通債券；此外，還要發行四百萬萬馬克的債券，時期由賠款委員會決定之；此外還要另有賠款，數目待日後決定。

德國並無可恃的儲蓄足以償付此項巨額賠款及其利息，因為戰爭已經把她弄得精疲力盡了（這也實在是她失敗的主因。）所以協約國的要求是假定德國要在經濟上拼命地努力。她們的報紙不斷地指陳：德國的工業並未會破壞而反日在發展之中。但她們卻忽略了下面這件事實：——就是德國的一切都被人沒收了，例如：全部鐵礦和一部分的煤礦，一些頂大的鋼鐵工場，頂好的紡織工場，所有的商船和一部分鐵路材料，所有的殖民地，租借地以及海外投資幾乎都被協約國一網打盡了。

凡爾賽的一班人既把戰敗者的生產工具奪取過來，卻反說道：『現在去吧！——去替我們工作，好付賠款給我們！』無疑地，他們是在期待着一個奇蹟的降臨——這奇蹟的祕密現在尚未暴露出來。可是等到德國一旦宣言——這宣言當然很勉強，那是不待言的——要準備作某項的支付，便馬上又有一個新的矛盾呈露出來，把世界各國弄得不知所措。德國是怎樣地支付呢？說是用現金支付吧，她所有的現金還不夠防止她自己的紙幣的貶值。說是用勞役支付吧，德國已經自告奮勇，要派該國的工人來重修戰廢的區域，但這正是法國的企業家所深懼的，因為他們已經決意要把復興事業可得的利潤留給他們自己享受。有一位代議士而兼承辦者的叫徹什麼克力斯僕（M. Crespel）的人，曾在議會中公然地說道：『戰禍下的犧牲者寧可坦然住在瓦礫場中，也不情願目賭那些破壞他們屋宇的蠢貨們（指德人）又來替他們修葺屋宇。』

剩下來，還有物品支付問題。但德國所能交付的是些什麼物品呢？她不會是一個廣大的「加工變形」的工場，她買進原料或食糧而賣出製造品。除製造品而外，她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向債權者交付的。假如她的債權者是一個農業國，那就容易辦了：意大利和塞爾維亞對於賠款委員會規定讓德國賠與她們的物品就是一概接受的。

但如果債權者也是一個工業國，那末，德國所交付的物品必將與她國內的生產品立於競爭的地位。法國的情形就是如此。在大戰以前，法國就已時常爲了德國貨的傾銷而叫苦。因此，當大戰之中，法國實業界會組織許多團體，勸勉國人切勿再買德貨。大多數人的意見都以爲把德國貨排出法國市場之外，乃是戰爭的主要目標之一。難道得了勝利之後，反任聽德貨再行侵入嗎？難道爲了重建法國各業工廠的理由，就一任法國的工業受人蹂躪嗎？法國實業界竭力反對德貨進口。如果德國把鋼骨來代替賠款，則洛林的鋼鐵廠會起而反對——把電料來代替賠款，又要遭電氣工業協會的反對；若是拿織物來交付吧，又將使魯貝或盧昂發生失業問題。所以法德兩國政府雖會締結威斯巴登協定 (Wiesbaden agreements) 並繼之以吉勒——魯蒲協定 (Gillet-Rupet) 但實際上等於俱文。法方並曾組織一個評議委員會把所有各業，如鋼鐵、紡織、化學等業的大企業家聚於一堂，這委員會的手段真是精細，除煤及焦炭以外，法國未曾接受德方的任何物品交付。她寧可把賠償委員會規定應歸於她的十萬萬以上金馬克的賠款置而不用，也不願接受德方的製造品。

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法國政府儘管崇輿論爲後盾，不惜百般恫喝地向德國要求非常巨額的賠償，等到

德國情願交付時，她卻又一絲一毫也不接受。她已經知道：向敵人要求賠償戰事損失是和本國工業的利益互相矛盾的。

法國政治家這時便要求德國交付現款，以避免上述的困難。法國工業界是準備自己動手恢復戰禍糜爛的區域，而要叫德國付出所需的費用。但是究竟叫她用何種通貨交付呢？德國交不出現金來已是人所共知的，若說是叫她交付那越來越跌價的紙馬克吧，誰又肯接受呢？現金與紙幣既都不可能，那就只好讓她用外國貨幣交付了。

但德國要想得到外國貨幣，如金鎊，金圓，吉爾特，培梭，她非向英，美，荷蘭，阿根廷販賣貨物不可。結果，她交付賠款的能力還是要靠着她的出口。若是許她貨物出口，那就等於准她恢復她在世界各市場上的地位。所以戰勝國如想得到賠款，那就只好對德人開放世界市場。

可是大戰的目的顯然是要把德人排諸世界市場之外，而和平的構成又顯然是要防備德人再行侵入世界市場。所以在同一個條約之中，規定賠償的諸條款，與規定防備敵人捲土重來的各條款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要叫敵人賠償，則敵人將再成爲商業對手，如果要防止敵人成爲商業對手，那就不能再令其賠償。

那末，在此二途之中，究竟何去何從呢？如果是站在納稅者的立場，那一定是認爲應讓敵人賠償；但如果站在工業界的立場，那又唯恐仇貨的侵入本國市場。在所有的各大工業國中，政府總是站在實業界的一方面。比如德國的物價愈是低落，法國就愈要提高關稅稅率；英國爲保護本國工業並防止敵人的傾銷，也採了保護政策。甚至

連美國都通過了所謂福德內法案 (Fordney Act) 把關稅率擡得極高。

最後，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各國決定：每一個債權國對於進口的德國貨物可以按其價值留存百分之二十六。如果這辦法嚴格施行起來，將使德國貨物陷於不能出口之境地，不但如此，而且這種簡單的支付辦法將使一切支付辦法都無從着手了。比如一家商店，牠唯有靠着販賣纔能償債，而且償債能力之大小，要看販賣之多少。後來，協約國也不得不顧及此點。到一九二四年，專家委員會設法使德國的國家預算收支相抵之後，據該委員會估計，此後德國每年可以清償賠款二十五萬萬金馬克。這個數目和凡爾賽條約以及其後各條約所規定的賠款數目相差甚遠。但即使德方能夠按年如數以金馬克交付經理賠款支付的總機關，各債權國還不一定願意接受數量相等的貨物；牠們定要憂慮德國貨或將奪了牠們的銷路。這可算是各國因經濟相依賴關係而發生的不可避免的結果之又一例證。譬如有甲乙兩國，她們在工業發展上都已達到差不多相同的階段，除非甲國在世界所有的各市場上都能和乙國相競爭，則甲國將無力清償所欠乙國的債務。

就連協約國互相之間所欠的各項債務也難逃乎這個定律的支配。一個債務國能否清償債務，不關條約上規定的數目，也不關她的支付能力如何，卻要看國際市場對於她的貨物能夠吸收若干，並且情願吸收若干。

所以協約國若是限制德國貨的出口，就不啻是減低她的償債能力，而且愈加加以限制，她的償債能力將亦愈小。條約上儘管規定着如何巨額的賠款，不讓德貨出口，一切都等於廢話。

德國恢復了競爭能力

談判凡爾賽條約的人們也許以為：只要能夠有把握把競爭者（指德國）逐出國際市場之外，縱使賠款計劃完全失敗，也是可以自慰的。他們既已使德國工業喪失了一部分的機械設備，原料，運輸工具，資本和銷路，便相信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們的努力已經達到目的。

可是還不到一年的工夫，德國的競爭能力竟又勝利地呈現在全世界各市場之上。當德國剛剛打了敗仗的時候，德國人自己已經身受社會經濟恐慌的苦處；租稅是收不進來，政府的經費反日益增加，為彌補虧空起見，只好發行紙馬克，結果是馬克價值的狂跌。可是這時有一些外國的金融家，看到德國的工業並沒有受什麼損失，他們又不明瞭德國工業所受的束縛是如何之大，便相信德國很快即可恢復元氣。他們因相信馬克不久即將漲價而購進紙馬克。他們用金鎊，金圓，甚至用法郎來換德國的紙馬克，德國人就利用這個機會，向國外購買原料和種種商品，而把各種工廠着手恢復起來。東西兩半球的人民看見這種景況，便以為德國已經恢復繁榮而斷定德匯一定上漲。於是他們都拚命做占買馬克的投機。

他們占買馬克，真有如發狂一般，卻不知道：即使商業的恢復使得德國能暫有一個順勢的貿易差，但德政府的預算一有虧空必又立即發行毫無準備金的紙馬克——單是這一件事就很夠令紙馬克跌價的。但是各國的金融界，因為對於匯兌上的各項問題，有了錯誤的見解，只看見了這問題的一方面，而忘了其他方面，便拚命地買

進紙馬克，他們買進的數目實可驚人。因此，在一年之中竟把幾十萬萬的金圓，金鎊，吉爾特，瑞士法郎，和法國法郎獻於德人之手，使德國在世界各銀行中，到處有了存款。

德國工業現在又得到了工作資本，一切活動馬上恢復起來。真很奇怪！協約各國政府，當其在凡爾賽會談的時節，盡力要把德國工業所有的資本剝奪了去，可是牠們自己的國民卻自動地把金錢向德國傾注，使得一切外交策略都成畫餅。

正當此時，我遇到一位法國高級官吏，他是一個熱狂的愛國者，以為法國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對的。他對我說道：「最近我曾因公訪問威斯巴登，德國人民的奮勉真令我驚嘆不置，他們努力工作，他們很快地恢復起來。我決定在那裏買點馬克；你以為馬克會漲價嗎？」

我回答他說：「漲價是會漲價的，不過輸出資本是有干禁例的……照法國的法律……」

這位官吏有點狂悻不安了，他不等我說完，就接着說道：「我所賭的錢數是極少的，而且這件事不是人人都

在做嗎？一個人靠國家的勝利，想法賺點兒錢也是可以的，你以為如何？」

「是可以的；不過你收買馬克的時候是要把法郎來交換的；德國人得到法郎，就能向我們購買他所缺少的原料和商品了；這樣一來，他們的工業又將與我們的工業競爭了。難道這就是你所說的勝利的好處嗎？」

「但是等到他們的競爭將要為害於我們的時候，我們只要極力加高關稅，那是一定能夠制服他的。」

「妙！那末，你站在愛國者的立場，想必是第一個主張保護政策的。」

「那是無疑的。」

「可是這麼一來，德國的出口必然減少，馬克必然跌落，你所做的投機不是將要全盤失敗嗎？」

「我沒有想到這許多！」

站在資本所有者的立場，誰都想把他的資本投於利息頂高的地方，即使這地方是在一個敵國的境內也不管。但若是站在國民的立場，他的腦海中便只有他自己的國家了，便主張用保護政策或報復政策抵制敵國了，可是他卻沒有想到他自己的投資將因此而失去利錢。在政治人格上，他的思想是一個國家主義者；在經濟人格上，他的行動卻又是一個國際主義者。這兩種人格既是我們兼而有之的，於是在昨天完成的一件事體，到了今天，我們便不惜設法把他來破壞。這就是凡爾賽條約的哲學。

協約國的資本家把工作資本，原料和各種貨物供給於德國的工業界，不啻助長德國的出口貿易，他們這種行動大反乎條約的目的。德國實業家向國外運銷他們的產品而收進金鎊與金圓，但他們卻用貶值的紙馬克支付工資和一般費用，一出一入之間，立刻獲得厚利。而且德國的物價也因此而降落，較之英、法、美等國的物價均為低廉，於是德國的製造品便又得推銷於世界市場之上。

自然，這種商業擴展不僅有損於收買馬克的人，而且損及德國人民。因為馬克愈形貶值，則債券所有人的所得與國家的收入均隨之而減少。同時工人的實際工資亦愈來愈低減了。可是等到工資和租稅一旦增加起來的時候，商家和製造家便馬上又按照馬克貶值的比例，而提高他們的售價，把其間的差額完全入了他們的私囊。所

以德國人民這時依然是陷於嚴重的貧乏景況之中，一如戰時；但工業卻反繁榮起來。這時國際市場上的物價便一齊低落下來。這要歸功於德國勞工工資之過於低廉。國家愈窮反愈替企業家造成稱霸世界市場的機會。

所以德國的工業界唯恐怕馬克漲起價來。他們爲隄防馬克匯價因出口貿易的旺盛而增加，便把他們在國外所有的款項，大部分存在國外的銀行，而不向國內匯回。同時他們還阻止德政府按馬克貶值的比例而加增鐵路運價。所以國家預算無時不在虧損之中，政府爲彌補虧損只好再增發紙幣，結果，馬克匯價便越發跌落了。總而言之，外國的金融界是站在看漲的地位，作馬克的投機，而德國的工業界反倒站在看落的地位，做馬克的投機。

不久，馬克的貶值愈來愈快，而德國工業界所賺的利潤反愈來愈增加，出口貨數量的膨脹打破以前一切的記錄。到了一九二〇年的中間，西班牙向雨果斯丁內斯公司訂購大批車頭，巴西和日本也向牠訂購大批鐵軌。德國製造的器具，機器和織物推銷於世界各市場，其售價之低廉使得各國的出品無法與之競爭。不到一年的功夫，德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竟又恢復起來，一如戰前一樣。

足跡無所不至的德國貨，現在又在各處重新發現了。戰勝國把極重的擔子加在德國人的身上，結果，反使他們能夠利用匯兌上的策略而達到其傾銷的目的。德國人竟能將敵人用以滅亡她的種種政策巧加利用，而復蘇起來。

一九二〇年的經濟恐慌

這種政策的結果免不了要發生一般的經濟恐慌。在休戰的前夕，戰勝國的製造家已在奏着生產的讚美曲而開始其征服世界市場的運動。他們覺得在他們眼前展開的那個廣闊的戰廢區域在在都需要恢復，無論敵國或友國都需要補充生產設備和生產材料；他們心中只是怕他們的生產不足以應付人家的需求。

受戰禍糜爛的國家其人民當然是沒有償付的能力，那是無疑的；但製造家總是情願賒賣給他們的。那時美國還有很多剩餘的商品和製造品，為便利歐洲的顧客起見，他們準備接受歐洲的通貨作為一部分代價，有時甚至把他們所得的代價投資在外國的證券上面。他們現在收買法郎利爾和金磅，如同以前收買馬克一樣。結果使得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兩年之中法國的進口貨價竟超過出口貨價到四百七十萬萬法郎之多。那時法政府雖正在增發紙幣，但法郎的購買力並沒有過於跌落，就是因為國內市場上貨物的數量也按比例增加起來了。這種情形不只法國如此，就是其他國家也無不如此，全部歐洲在表面上都呈現着資本充斥的現象。

這時候，大有力的工業集團和金融集團就開始做征服世界市場的活動。如上文所述，法比兩國的鋼鐵實業家把藉口賠償而沒收來的洛林各鋼鐵廠分了贓。他們強迫薩爾的德國人把所有的證券讓渡出百分之六十來，並強迫斯丁內斯 (Stinnes) 和 Gelsenkirchen 把盧森堡的鎔鐵爐都交出來。但如此他們仍認為不足；而又把波希米亞 Skoda 的各工廠和奧國的許多公司收買過來。

其他的法國工業集團還把西利西亞的煤鐵股票，波蘭的紡織廠，加里西亞和羅馬尼亞的石油公司以及匈牙利的各銀行也都收買過來。他們的目的是要把以前德國在商業和工業金融上所佔有的地位一齊奪取過來。

因爲各地通貨的貶值較之法郎尤爲過甚，使得他們的目的愈發容易達到。於是法國的資本很快地都被吸收於這種收買計劃之中，不僅戰時所賺的利潤都利用於這一方面，就連各商業銀行的資本也是大部分投在這個上面了。後來，英國也效法國的行爲，尤其是她在奧地利的活動。美國當然也不甘落於人後，她利用金圓匯價之優異，用很低的代價收買了許多企業。

到了一九一九年之末，美國的紙幣發行總管理機關即聯邦準備局便已覺察：當時美國的貨幣供給量正在增加不已的時候，而貨物的數量，卻因爲過度輸出的結果，已經減少到稀少的程度。結局，物價便極度地騰漲起來，所以「金圓」所代表的黃金重量雖仍和一九一四年時一樣，但牠的購買力卻已減低一半了。聯邦準備局這時只好慢慢地把信用加以限制。其第一個結果就是日本發生可怕的金融恐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不久之後，英蘭銀行和法蘭西銀行也不得不屢次把貼現率提高（一九二〇年二月、四月和五月）。那些靠信用大批買進存貨，而希望物價騰貴的投機家便都陷於破產了。這時，各種物價一齊狂跌下來；許多商企業與工企業都不得不仰賴於政府的救濟，倒閉的銀行更是不計其數。當時的經濟恐慌有如地震一般，震遍了法、比、英、意等國。

這時，中歐和東歐的諸小國幽困在本國的關稅壁壘之中，只好安於自足自給的狀態，她們向海外的購買額已是微乎其微的了。即使不得不向國外購買的時候，她們也寧可向德國購買，蓋因馬克貶值不已，她們向德國購買比較便宜。雨果斯丁內斯公司以及其他與牠競爭的德國公司，牠們的資本多存於瑞士與荷蘭的各銀行，這時就開始在中歐各地，甚至遠到智利和爪哇去收買各種企業。因爲金鎊和金圓匯價過高之故，英美兩國的貨物已

經喪失了牠們的顧客。有許多地方，鑛鑪已經熄火，造船場也停工了，礦坑也不得不限產額了。英國有二百萬失業的工人，美國的失業工人，曾經一度達三百萬人之多。

當時，舉世都已陷於空前的恐慌，工業國家之中能夠維持常態者，竟只有德國一國，這真是一個奇哉怪哉的因果報應。所有的戰勝國都在窮困的境域中掙扎，尤其是其中最稱富庶的國家，這乃是由於那不可避免的經濟相依的定律在那裏做怪的原故。這個定律有一種傾向，老是要把一切的工業國家回復到同一的水平上，有如地心引力的定律一般。這時候，企業家和政治家纔都明白戰爭是不偏不倚大公無私的，因為無論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都已被戰爭鬧窮了。

武裝干涉之重演

這時各國政府仍然固執着流俗的謬見，企圖用行政上和軍事上的手段來應付經濟恐慌。為防止德國貨的侵入，法比兩國便提高關稅率；英國便通過種種抵制傾銷的法案，美國也公布了福德內法案，而開始走向極端保護政策的路子。在大戰時都未曾受到擾亂的國際貿易流，現在卻被牠們給截斷了。各種國際會議雖曾迭經舉行，但國際間的敵對形勢不僅未曾稍微緩和，反愈加嚴重了。到了最後，各國政府便只好憑武力來解決種種困難了。德國的製造品，既因受各國關稅政策的阻撓以致不能出口；而傍卡累復又藉口德國不能按約交煤，而責德國贖延賠償。法國政府因此便派遣軍隊把盧爾佔領。同時，除在波蘭，捷克斯拉夫和塞爾維亞收買各種工廠及銀

行外，復與各該國成立軍事協定。假如德國因為盧爾的佔領而不得不出於請降之一途，那時法國便定然能夠在經濟和軍事上握全歐大陸的霸權而與大英帝國、北美合衆國勢均力敵了。

但法國在巴爾幹的這種政策，卻被意大利暗中反對，而在英國則因有得亞伯南爵士 (Lord d'Abernon) 的活動，使得德人的抵抗心愈發堅強。同時，魯意佐治又急於要把德人在近東所有的地位取而代之，所以他圖謀幫助希臘人穩固他們在博斯福魯的地位，並且想建立一個盎格魯——阿拉伯帝國，其疆土由赫查茲 (Hedjaz)、巴力斯坦 (Palestine)、敘利亞 (Syria)、伊拉克 (Iraq) 直展到巴格達的各海口。

法國幫助土耳其人，而英國則援助希臘人，所以土耳其軍隊所用的鎗砲都來自法國的克勒左 (Creusot)；而希臘軍所用鎗砲都是英國威克廠製造的。英法兩國間友誼協商 (entente cordiale) 的關係竟有了這麼一種奇異的表現！結局是希臘軍隊趕快在海上佈防起來。魯意佐治聽到了凱莫爾 (Mustapha Kemal) 的兵力已經到了產納克 (Chanak)，離博斯福魯只有數英里之遙，便馬上乞援於各領地，命牠們防守通東印度的航路，藉以抵制土軍的威脅。而土耳其人因有法俄兩國為其後盾，也決不肯罷休；這一次的風雲，幾乎耗盡了全歐的財力，纔僅免於大戰之復發。

自從協約國打了勝仗，已經過了五年，可是那個和平條約不但沒有使各國的預算彌補起來，就是各國的商人也沒有因此而獲得繁榮，各國的人民也沒有因此而過太平日子。反之，無論那個國家都是：人民則有苛捐雜稅之苦，工業則有失業問題之累。這時各國還得設法和她們的敵手（德國）掙扎，致使全部歐洲都被軍備競爭的

空氣所包圍，密祕外交的雲霧所籠罩。

但戰敗國卻反因禍而得福，她們退縮到自己的範圍之內，靠她們自己的關稅壁壘，與匯兌界限而與他國隔絕起來，反因此而獲得抵制隣國的武器。國際貿易的機構是已經打壞了，商業路線是已經擾亂了。在大戰時，世界的經濟統一不過剖分為二罷了，現在卻反打得粉碎了。這時的局勢較之一九一八年更為惡劣，甚至可說又回復到一九一四年的情景了。戰爭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和平也沒有補救任何事情。在歷史所有的記錄上，唯有這回事可算是整個的失敗了。

各國政府，因為固執一種陳腐的傳統觀念，都是站在一個嚴格的國家立場上，來把握一個世界問題。牠們爲了國家政策的方便，不惜把世界的經濟統一加以破壞。簡單地說，他們是在根據農業神話所有的各種觀念來解釋一個工業世界的張本。議會和輿論所以贊許牠們這種態度，是因為牠們也都是受了同樣理想的薰陶。可是事實決不會敷衍人類的錯誤。在經濟方面的事情上，任何錯誤都一定要受到制裁的——都一定會失敗的。在歷史上，人類所犯的過失，沒有比這一次顯現得更清楚的，所受的制裁也沒有比這一次更嚴酷的了。

註一 事實上，在大戰的時候，法國顧客往往用法郎做爲購買的代價，英國工業家也常常接受，但後來英國工業家看到此項法郎不能在戰區區域使用，他們就開始把法郎賣出了。從那時起，法郎便開始貶值了。

註二 後來，奧、匈、保、德都得加入國聯，唯土耳其未得加入。

第十七章 怎樣促成真正和平

假如我們那個見解即是：「歐洲的病症的基本原因在於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的融合，」有種種事實爲之證明，而可以成立的話，那末，要療治歐洲的病症，就得把這兩種因素設法分開。

但若由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或許認爲這是不通的，因爲我們已經看慣了干涉政策，看慣了國家管理生產業，運輸業或商業，看慣了國家調整運價和關稅率，或增減紙幣的發行額……我們很難想像會有那樣一種制度，在牠之下，各種企業都是任其自然的，憑牠自身的用處或憑牠主腦人物的能力與才幹而存在。

可是當現代的國家隨法國革命而誕生的時候，卻的確把這樣的制度認做她們的理想。那時候，行會制度和國境以內的關稅都取消了；就是國境以外的關稅也只以財政收入爲目的。任何公民都享有自由創立企業，並由自己擔當危險去經營企業的權利。放任主義成了社會公認的原則。國家對於公民與公民間的關係雖然也要設法調整，但公民的經濟行爲卻是一任其自由的。這種制度盛行於法國約有五十餘年之久；英國直到十九世紀之末還受牠的支配。在一個很久很久的時期之內，世界各國的工商業界都在爲放任主義而革命，爲盡力減少國家對於實業的干涉而努力。

後來，歐洲迫於種種事變（這是上文已然講過的了）而走向經濟的國家主義。反之，美國卻仍保持着那古

舊的自由主義。

現在已經過了一世紀之久，我們不難把這兩種主義的異點審定一下了。

美國的信條

在十九世紀之中，曾有五千萬種族，宗教和語言都不相同的居民由歐洲移植到美洲去。起先他們僅只逗留在大西洋沿岸的地帶，不久便動身到西部去開發新的土地。隨着他們足跡所至，公路鐵路築起來了，電線也搭起來了，後來，他們漸漸地定居下來，便着手建立一個行政制度。

等到他們的鄉村和城市漸漸地繁盛起來，便能夠形成一個獨立的「邦」(State)。每個「邦」對於牠自己的立法，司法，警察，預算和教育都有自由辦理之權。在政治上，「邦」享有完全的自治權，但卻不准牠在邊境上設立關稅卡，也不准牠有獨立的通貨制度——而且事實上，無論那一邦也沒有這種需要。結果，在合衆國國境以內，旅客，貨物和資本都可以自由通行無阻。企業既不受行政的援助，便亦可自由發展；牠的成敗完全看主持者的能力如何與服務的成績怎樣。如此，邦與邦之間的相依關係便有了自由發揮的餘地，而決不會發生衝突，互相間既沒有隄防的必要，戰爭便也無從發生了。

只於有一次曾經發生分裂的危險：南北兩部因政治機構之大不相同，爲了放奴問題而互相敵視起來。但戰勝者卻很知尊重戰敗者的政治獨立，雖然同時也還要維持共同的經濟機構之統一。所以南北戰爭並未種下什

廢禍苗。在六十年之中，種族，語言，宗教都不相同的移民，紛紛來到一塊幾乎大似歐洲的地方，漸漸地分配在四十八個「邦」之中，竟能始終如一地過着和平而繁榮的日子，到如今已成爲一個超過一萬一千七百萬人口的大國了。

現在我們來假設：所有這些「邦」在其誕生的時候，就都已獲得完全的主權——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在這種情形下，每個「邦」都必在牠自己的周圍劃定一個關稅的界限。賓夕法尼亞既是一個工業的州，那末，爲了接近海口的問題，牠也許會和新澤稷發生衝突。俄亥俄，因想建設一個獨立的金屬工業，對於賓夕法尼亞的製造品將必課以重稅，而賓夕法尼亞爲保護本州的農業，對於俄亥俄的小麥與牲畜，亦必加以征課。俄亥俄也許要設法阻止密執安的生鐵向外推銷，使牠不能向匹茲堡的鑄鐵爐銷售。於是賓夕法尼亞將與印的安納，及坎的基結爲同盟，以便對付俄亥俄；而後者爲了保持均勢起見，亦將與新澤稷結爲同盟。在這種緊張和不安的外交氛圍裏面，各邦都將規定強制軍役的法令，並把一大部分預算用在軍備上面。戰爭一定有爆發的一天，合衆國的歷史將與歐洲的歷史同其壯烈而充滿了流血的戰蹟。

反之，我們現在再來假設：歐洲的政治組織是仿照美國的聯邦而組成的，則各國都將保持着她自己的政治自主，她有她自己的憲法，立法，行政，財政和教育等等制度，牠按照她自己種族上和文化上所特有的慣例，而自由地建立此項制度。民族的特殊精神藉此即可得到完全的保障，但全歐的通貨制度將是一致的，又因爲沒有關稅壁壘的緣故，各種原料商品，和製造品都可以自由流通於國與國之間。無論那一國都只是選擇那成本較別國爲

廉的貨物來製造，並且只向外國購買價錢比本國爲低的貨物。那種需要保護而反大有損於消費者的不合本國情形的工業將不會有了；關稅戰爭，殖民地的征服，勢力範圍的糾紛等等都不會有了。合縱連衡的把戲不必玩了，結果，戰爭也不會發生了，除了警察之外也不需要什麼軍隊了。全歐二十八國的國民都將在他們的本土上過着和平的日子，有如他們移殖到北美合衆國四十八州的同胞一般。

誠然，當北美合衆國與那國家主義支配以下的歐洲開始有了商業競爭的時候，她也不得不在國境的周圍樹立起崇高的關稅壁壘；同時，爲要在地球上分得相當的殖民地，又不得不有適當的海陸軍。爲了這個緣故，她也不能完全逃避那十九世紀的大害（即是那萬惡的『政治與經濟之融合』），以致終於走向帝國主義的道路。就在這時候，美國人纔覺得要有一個最高的信條。威爾遜總統在美國的傳說中找到了這個信條；正因爲這個緣故，假如不是在大戰方酣之中他突然病倒，他的咨文也許終於會得到本國人民的了解。但歐洲卻是毫無準備的，經過六年殘酷的試驗，她纔能夠完全領悟那問題的內容。

我們現在姑且把凡爾賽條約上所規定的那種武斷的分割置之度外，將全世界看做一個整個的東西，來試把世界經濟復興的種種條件推定一下。假如這些條件能夠共同一致地實行起來——而且除此之外也別無他法——則和平的局面總可有達到之一日。

從這方面來看，這問題或可加以如下的說明：英、法、比、德、意、日、美這七個大國，牠們所生產的製造品都是超過牠們自己所能消費的數量，而牠們的人口所要消費的農產品又都超過了牠們自己的生產量。

在大戰之前，英、法、比、德、意、日這六國都是專靠把牠們所生產的剩餘的製造品販賣給農業國纔能生存。俄國、土耳其、中國、巴爾幹各國、菲洲及南美向牠們購買大量的織物、器具、機器，以及鐵路材料而把麥、毛、油、鑛產和其他種種貨物做爲支付的代價。此項貿易所以能夠順利進行毫無阻礙，要歸功於：（一）國際運輸的便利，（二）國際市場相依關係的密切（電報）（三）和各國幾乎無不採用的金本位。其結果是各國都繁榮起來，在不到一百年之內，歐洲的人口加了一倍。

經過大戰和戰後各國的復興，結果，以上七個大工業國的生產能力都大大地增加了，尤其是在冶金、紡織和化學工業方面。另一方面，牠們主顧的需要，甚至增加得還要大些。在所有的敵國，衣服、鞋襪等等日用所需都因打仗而用盡了，農具用壞了或是毀壞了，橋樑、鐵道也都得重建，一切的一切都是求過於供。僅只這種情形就已替世界的經濟復興準備下了那最合宜的條件——假如那些主顧果真有購買能力的話。

不幸所有的戰敗國，甚至若干戰勝國，在大戰之中都已把平日積蓄的資力耗得乾乾淨淨了。儲款因爲通貨膨脹的關係而耗盡了，機器和運輸工具的缺乏使得牠們的生產力大大地減縮下來。因此牠們的購買力當然要大減。而且牠們種種產品的產量，因爲沒有買主的原故，當然又要比牠們實在有的生產能力遜了不知多少。

其結果就造成了世界的經濟恐慌，這種恐慌現象如果拖延下去，到最後非把全世界弄得窮困不堪，並引起

文化的衰退不可。所以這問題要看那些沒落的國家，如巴爾幹諸國，俄國，土耳其，中國能否把她們的購買力恢復或增加起來，以為轉移。而要恢復或增加她們的購買力，又非有一個大規模的國際借款不可。

有若干國家，尤其是美國，她們的儲蓄並未因做戰或國內的復興借款而全部耗盡，我們可以設想：她們對於種種國際公債是樂於認購的。她們的剩餘儲款將貸於其他國家，做為向她們購買種種貨物的代價。所貸之款不必離開貸款之國，而只是替貸款國家的工業開闢一條銷售的出路。這種國際公債，如果定期的減債基金和利息的支付能有確實的擔保，是一定會為實業界所歡迎的。不幸需要借款的國家大抵都已陷於財政破產，她們的預算無不是入不敷出，而她們的通貨又大都是不穩定的。在這種種情形之下，巨額的國際借款將成為不可能之事。

關於此點，我們應當把德國的問題考察一下。因為賠款的原故，她對於協約各國負着巨額的債務。她的工業設備雖已不如從前之宏大，但仍保持良好的境況，她不只有輸出巨量貨物的能力，而且事實上也不得不如此。只要她的預算可以設法弄到收支適合，她的通貨可以設法弄得穩定，那末，她一定能夠以物品撥付巨額的賠款年金。專家委員會 (Committee of Experts) 的着眼點即在於此。後來藉助於杜威斯計劃的力量，她果然能夠把金本位恢復過來，把預算弄到收支均衡，並且能有剩餘的歲入，做為支付賠款之用。

這筆剩餘歲入，其中的一部分是一筆有確實擔保的收入，在國際共管之下，由一位賠款總監督 (Agent General for Reparation Payments) 掌管。這位總監督好像是替債權人當一個破產管財人 (Official receiver)。以這筆收入做為根基便可安安穩穩地發行國際公債了。誠然，要打算撥付賠款年金非使德國輸出與這筆年金

等價的貨物不可，但是國際市場上未必馬上就能吸收這樣巨量的貨物，尤其是如果這種貨物是織物，五金或化學製品的話。不過我們可以假設：這筆剩餘收入之中，約有十萬萬金馬克可以存置一邊，做爲發行公債的基金，如照一般公債所需還本付息基金之比例來推測，以這筆收入爲根基，當可發行公債一百二十萬萬至一百四十萬萬金馬克之多。

這筆債款，用金圓，金鎊，等等貨幣應募下來，立刻就由各銀行存置起來，聽債權國自由使用，並由債權國大家約定怎樣分配。例如，按照一九二一年倫敦賠款支付表(London schedule of Payments)的規定總數之百分之二(約計爲七十萬萬金馬克)應由法國領受下來。很明顯地，法國一下子不能領受這筆巨額。蓋法國所分得的各種債券(即用金圓，金鎊或基爾特等等各國貨幣作面額的債券)乃是代表那麼多的貨物或勞役，可由各該國輸入本國來，但法國決不能突然增加了這樣巨額的進口貨，因其足以引致國內市場發生空前的恐慌。

所以法國或其他債權國不得不把這筆債權的一大部分留存在銀行裏面，共計約達七八十萬萬金馬克之多。那末，若把這筆巨款借給沒落的國家，好讓牠們有力量再做大工業國的顧客，不更好嗎？如果這樣，這筆巨款便將成爲全世界經濟復興的共同作業資本了。在這個計劃之下，復興的程序可分爲三個階段進行：

(甲)例如，俄國和羅馬尼亞都是急於要修復通至黑海的各鐵路線，但是她們的財力都不夠做這種必要的工作。如果別國肯借款給她們，她們一定要向洛林的鍊鋼廠買鐵軌，向盧爾買貨車，向北明翰和匹茲堡買車頭。憑着存在銀行的作業資本，她們就可以付出現款(法郎金鎊或金圓)。她們的訂貨單立刻就紛紛地寄向各工業

中心，於是失業的工人減少了，工資增加了，交易所中各種證券的市價也騰漲起來了。

(乙)不到兩三年，她們的鐵路就都築好了。俄羅兩國將把她們所產的小麥，亞麻和石油大量地向西方運送。此項貨物將在各國市場上，立刻增多起來，現今這樣高的生活程度便馬上可以低落下去。另一方面，賣主藉此也可以在法，英，意等國獲得可以動用的款項，牠們將用此款向各國購買大量的紡織物，農作機器，化學肥料以及各種奢侈品。於是在各國的市場上，那些沒落的國家又露面了，而且牠們現在不僅是賣主也兼是顧客了——結果，歐西各國便都在經濟上開了一個新紀元。

(丙)最後，過了五年或十年，這些國家便能謀得經濟上的自立，她們的預算收支相抵了，出口貨也超過進口貨了。這時她們便可以把以前憑那筆公共基金所借得的款項着手償還了，漸漸地便把那筆巨款付還給德國的債權國，又免得她們一下子吸收不了那麼多的款項。在二十年之內，以上的程序當可全部實現出來，而全世界的經濟流通亦可完全恢復了，我們要謝謝那筆以德國賠款為擔保的作業資本。照這樣子，那杜威斯計劃便可以成為世界經濟復興的根基了。(註一)

這樣一來，我們便不必減少德國的賠款支付，以求適合國際市場的吸收能力，反之，藉信用之助，我們卻可以按照可能支付的大小，來擴大國際市場。菲取(M. Faherty)說過：『各國不必斷斷地計較那一塊空的戰利品，應當集中力量，來創造新的財富。』

實現上述計劃的幾個條件：（一）全體恢復一種金單位

可是要達到上述的局面，必須先具若干條件：第一是資本與貨物必須使其有自由流通之可能。

在大戰以前，因為有一種國際貨幣單位的緣故，而且各國的關稅制度又很穩定，所以貨物與資本很容易自由流通。幾乎所有的文明國無不是採行金本位。一個金融家把他的儲蓄投資到國外，總可以確知：十年或二十年之後，一定能夠收回與他所貸之款等價的貨物，不管該地的通貨如何。各國對於進口貨固然都要課以關稅，但此項關稅照例都是按商約規定，而商約又總是從容商訂的，期限大都很长，普通是十年。所以製造家很容易預做向海外販賣的安排，而不必隄防銷路突被新稅率阻斷的危險。

不幸這個纖巧的機構，被大戰和凡爾賽條約起草人的不合理的策略一舉打碎。那時，所有的交戰國，除美國不計外，都不得已而乞靈於紙幣政策。結果，牠們的通貨不僅是貶值，而且貶值的程度，國與國不同，甚且一國之內，也是時時有變。於是把一個在時間與空間上極不穩定的因素捲入貿易關係之中。譬如，某國或某人向國外借款，如所訂借約係以現金為標準，因通貨不穩定之故，借款者不知到清償時究竟要若干國內通貨纔夠償還債務，其間的風險很大。反之，假如這筆借款是以國內通貨為標準，到了清償時，借款者的國內通貨也許已經貶值，而貸款者將只能收回一部分本金，因而蒙受損失。無論是前種情形或是後種情形，投資所能獲得的利益都不及可能的損失之大。於是期限較長的外國公債幾乎無法籌借了。

此外，通貨不穩定對於國外貿易也有很嚴重的影響。蓋通貨貶值的國家對於通貨健全而匯價較高的國家反能作大量的輸出。她向國外販賣所收進的代價是健全的通貨（例如金鎊或金圓），但她在國內支付工資以及雜項費用卻是用的貶值的通貨（例如法郎與里爾），所以國內的通貨愈是貶值，她愈可獲得高利。因此通貨貶值的國家，在貿易競爭上，當然要比通貨健全的國家反佔優越的地位。法郎或里爾越貶值，則法國或意國的出口亦越增加。反之，通貨貶值的國家，如要向國外購買時，卻不得不以健全的貨幣（譬如金圓或金鎊）做爲支付的代價，那時，縱令輸出國的物價很爲穩定，但輸入國因爲通貨貶值之故，仍要感受外貨太貴之苦。所以她只好設法減少進口。

通貨貶值的國家資源有涸竭的傾向，通貨健全的國家銷路有阻塞的危險。這種情形只利於少數的投機家與製造家，而損及一切其他的人。因此國際之間必須重新建立一個穩定的貨幣單位，以便任何國家都可把牠做爲標準。美國金圓確會保持着金平價。但是牠的購買力約低減百分之三七·五，換言之，即一九一三年時一塊金圓所能買到的東西，到一九二五年時，必須一塊六角金圓纔能買到——按批發物價。可是憑藉聯邦準備局管理的機構，到今日，金圓的購買力實際業已穩定了，結局，世界各國很可把金圓當作重建幣制的基礎。

各國要重建幣制，必須竭力把本國貨幣對金圓的平價恢復起來。按照各國特殊局勢之不同，約有三種方法可資利用：

（甲）一是提高紙幣的購買力——假如該國貨幣距離對金圓的平價相差很小，例如像英國那樣，只須財政

上有一番積極的措施，即可恢復平價。在以前，英國爲補救租稅與公債之不足，曾經發行紙幣，這種紙幣並不代表真實的價值，結果，紙幣的購買力乃不得不跌落。這時，要恢復紙幣的金平價，必須仍藉助於租稅與公債，好籌措必要的資金，以便漸漸把多餘的紙幣收回，並購買生金之用。紙幣經逐漸收回後，其流通額漸少，其購買力自然會漸漸增加，直至與金圓之購買力相等爲止——購買力之增加可用指數做爲明證。但如果要維持金平價而使之不變，必須國際支付差額永保順勢纔行，蓋一旦支付差額變爲逆勢，則市場上金鎊之供給將超過需要，而金鎊匯價便立刻下跌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恢復均衡，除非輸出生金纔行，因此便不得不實行金解禁。但如果因爲商業恐慌的緣故，致支付差額之逆勢，拖延下去，一時無法挽回，則金準備將因繼續外流而耗盡，金鎊的匯價勢必仍要下跌。由此足以明瞭英國國庫爲何要在紐約舉債三萬萬金圓之多。這筆款項可以做爲匯兌基金，一旦匯兌市場上金鎊的賣主多過金圓的賣主，便可利用牠來維持匯兌市場上的均衡，直到商品市場上的貿易差額也恢復均衡爲止。

英國，藉着此項辦法竟能於最近（一九二五年五月）恢復金本位制。但爲達到這個目的，她不得不花很大的代價；第一是納稅者須負擔重稅；第二是有幾種大的出口工業，其銷路因金鎊匯價之騰貴而被限制，便只好把牠們付之犧牲，但因此而發生的百萬人的失業問題，國家卻不得不設法維持他們的生活。英國雖花了這樣大的代價，但她確曾因此而獲得莫大的利益那就是美國的資本大量流入英國，使得英國的銀行業與商業得再有一個鞏固的基礎，因此，倫敦差不多又成爲世界的清算所了。英國的各領地，如加拿大，南非，澳洲和新西蘭都曾採用

這種辦法，結果，全部的大英帝國，到現在都已恢復金本位了。但須知這種辦法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金鎊對金圓匯價之跌落，距平價迄未超過百分之二十。

(乙)二是一任紙幣之貶值——對於一種貶值過甚的通貨，顯然不能利用上述辦法。即如德國的紙馬克，在停戰的時候已然跌價到百分之九十（按即一馬克只值原價十分之一）。要使紙馬克恢復牠的平價，在財政上非有一番絕大的努力不可，但是經濟政治兩種恐慌交迫之下的德國，決難做到這樣的努力。所以只好一任紙幣隨意發行，實行無限制的貨幣膨脹政策，直等到紙馬克的價值差不多等於零時為止，那時，因為馬克貶值之大與快，實際上已然是沒有一種價值標準了。於是公衆漸漸養成用金圓標一切物價的習慣，政府再把這種習慣加以法律上之承認而推廣起來，因而創立一種「閔丁馬克」(Rentenmark)，將牠的價值定為一塊金圓之四分之一。

但如遇到貿易差額是逆勢的時候，德國若想使馬克的價值永遠能夠維持上項匯價，必須能運金出口纔行——而且如果逆勢的貿易差額長久延宕下去，她還得在國外舉借一筆緊急的資金，以資應付。就爲了這個緣故，杜威斯計劃纔準備靠國際貸款的辦法替帝國銀行籌借一筆準備金，並替德國在倫敦籌借一大筆款項。自那時以後，德政府的預算既已做到收支均衡，除非有現金作準備，決定不會再增發紙幣了，於是馬克便成爲一種健全的通貨了。不但德國如此，波蘭，奧地利亞等國都會用同樣的方法把金本位恢復起來；就連蘇俄現在也建立起一種金通貨叫做 *Tcherwonetz*；不過她還須借筆外款，以保證其價值之穩定。

上述各國都是利用任聽紙幣無限貶值的方法來恢復金本位的，不啻一個人病入膏肓反倒因此而得救。

(丙)三是把貶值貨幣固定在現有價值之上——還有些國家，像法、比、意，她們的紙幣的購買力，已經跌到距離平價很遠了，縱令用種種財政上的辦法，也難使之恢復平價，可是紙幣的貶值距離零點也還很遠很遠，若任其貶到一錢不值，又未免太覺可惜。在這種情形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維持其現有價值而設法使之穩定。爲實現這個目的，以上各國所用方法，大抵相同。就是：先把預算均衡起來，以免再增發新紙幣，同時爲防止萬一發生逆勢貿易差拖延日久的情形以致匯價狂跌起見，還得向美國借一筆經濟借款。靠這種方法，便可使這種紙幣與金圓之間，維持一種固定的關係，讓牠永遠等於金圓的幾分之幾。例如：即以法郎而言，戰前一塊金圓值五·一八法郎，而新法郎的價值卻是二十五個新法郎等於一塊金圓，因而新法郎只值金法郎的五分之一。可是要使外國承認這個價格，必須使新法郎能夠兌現纔行；果然能夠兌現的話，則新法郎的購買力將永保穩定。總而言之，現在的主要問題，並不是像戰前那樣，要使法郎一定代表·二九格蘭姆的黃金，卻是只要牠代表「不變數量」的黃金，不問若干都可以。

以上辦法，比國已經採用，她把「比法」(Belgian franc)的價值加以穩定規定三十六個比法等於一塊美金。法意兩國一定也是採取這種辦法，不過法國迄至目前只於做到第一階段，即是設法使預算收支均衡罷了。總計到現在爲止，已實行恢復金本位之國家，有美國、英國及其所有領地，加拿大、南非、澳洲、新西蘭；此外還有荷蘭、比利時、瑞士、德國、波蘭、奧地利和俄國。在幾年之內，金盎斯——雖然各國的貨幣單位各有不同——又成爲世界

貨幣的標準，有如戰前一樣了。

(二)資本的自由流通

各國要想重建一健全的幣制，都得仰賴於美國的合作（向她借款）。但是關於此點用不着抱什麼杞憂，因為當大戰中間以及停戰以後，歐洲各國都不向美國大批地購買貨物，以致世界的黃金總量，已有百分之四十七流入美國。如果此項生金全部流通於美國市場，則該國的貨幣數量，必較該國市場上的貨物數量還要增加得快了好多倍結果，該國物價當然要有意外的騰漲，同時，金幣的購買力也一定要跌落下去。上項假設確有幾成已見諸事實，例如，一九二〇年時，金圓的經濟價值較之以前約減低百分之五十六（這是根據聯邦準備局的批發物價指數）。

為防備金圓之再行貶值，聯邦準備局曾有如下之決定：一是進口生金，暫時不歸各準備銀行處置，二是不用此項生金做為各銀行之準備，三是不以此項生金做為增發紙幣之基礎。因此約有十萬萬金圓，死藏在華盛頓的金窖裏，每年損失利息約達一億圓。美國人寧可忍受此項利息損失，免得發生貨幣膨脹的恐慌，蓋縱有黃金做為擔保，貨幣膨脹還是危險的——他們這種看法很對。

反之，若把此項黃金貸與歐洲，用為各國整理財政之助，卻全然是有利於美國的。所以任何國家要想恢復健全穩定的幣制，定然可以在美國舉借那必要的緊急借款。可是美國所存的黃金，數量非常巨大，不管各國的借款

怎樣巨額，依然不能把牠吸收淨盡。換言之，美國已呈資金過剩之象；在美國，一般利率不過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而在歐洲，最上等的證券，利率竟達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九。在這種環境之下，美國人的儲蓄，越過大西洋去尋覓投資途徑是很有利的。不過起初，美國人因見匯兌之不穩，對於海外投資還很冷淡。可是一旦匯兌趨於穩定，借主與貸主都能確知締結契約時與清償時，款額不致因匯兌關係而發生差異，那時，美國的資金為高利所誘，自然會越過大西洋而流入歐洲了。自從德國恢復金本位，美國的資金就已開始向歐洲傾注，每月約達美金五千萬圓。現在金鎊既然也恢復了平價，上項數目當有迅速之增加。等到法、比、意三國都已貫徹她們幣制改革的時候，其增加定然還要大。國際商會會長蒲士先生 (Mr. Willis H. Booth) 曾說：過去十年內由歐洲流向美國的黃金，現在已經開始由美國流回歐洲。這乃是世界經濟復興的第一個徵兆。

凡已恢復健全幣制的國家，黃金流通的效果已然明白顯現。在美國，資本的利息將有增加之勢，這種現象大有利於美國投資家，同時在歐洲利息反將下落，這不啻給予生產事業一個有力的刺激，對於納稅者與製造家是同樣有利的。誠然，金本位的恢復，往往會惹起國內物價暫時的騰漲，使得工企業的工作資本因之而減少，並使各種出口工業，一部分停頓下來，其結果難免發生短時期的恐慌，這是須得仔細應付的。但等到通貨已然穩定，外資開始流入，而銀行對於各業工作資本亦能與以通融的時候，則人民的購買力一定要增加起來，而恐慌自然會消弭了。

在短期之內，各國對於資本的輸出，將撤除一切法律上的障礙；富足的國家將能貸款於貧困的國家，而貧困

的國家亦能向其債權國訂購貨物了。這乃是世界經濟復興的第一個條件。

(三)貨物的自由流通

至於各國間匯價之不穩定，對於貨物流通所有的惡影響亦將間接因此而消滅。一國幣制如果不能穩定，就不能和他國訂立長期關稅協定。譬如法國對於若干擔價值十鎊進口的生絲，課以十法郎之進口稅，如果法郎突然貶值，僅及原價之一半，則原來值百抽十的進口稅，不啻已減為值百抽五了，而法國生絲業所受關稅的保護因此也減低了一半，外絲必將乘機侵入法國市場。可是原來的稅額本足以阻止外絲之進口，而實際上，稅額也並未減低，不過因為法郎貶值，事實上等於稅率減低一半罷了。要想恢復原狀，必須隨着法郎匯價之跌落而漸漸地提高稅率不可；但除非國家不受商約之約束纔能如此。

即使關稅規定以現金繳納，鎔銖不爽，仍難達到穩定的程度。在通貨貶值的國家，其國內物價決不會按精密的比例，隨匯價之變動而變動。而進口稅額又是固定的，所以隨着國內物價之忽高忽低，進口稅額與貨物價值二者間的比例率，時常會變動，結果，縱令稅率的絕對價值並未變更，但進口稅對於國內工商業所具的保護功能卻依然會忽大忽小的。由此足以明瞭戰後歐洲的關稅制度到了怎樣不穩的程度。那時的國際貿易如同一條急流洶湧的河道，其中又拖帶了大量的黃沙，所以阻力是各處不同，水面也有高有低，運貨的商船，若非甘冒損失船貨之危險，決不敢駛過這條河道。

在這種環境之下，國際貿易將一落千丈，毫無足怪。據國際商會中專家的估計：一九一三年的貿易總額爲一億五百萬金馬克，一九二三年時，減至八千四百萬金馬克，即減少百分之二十。而且那時許多沒落的國家，其需求正在增加之中，工業國的生產工具也在日益增長，若再把這兩點加以考慮，則當時國際貿易情勢之混亂不難推想而知。

可是一旦金本位恢復過來，國內物價與匯價之間便開始有了一種精確的調整關係，關稅稅率，對於國外的賣主，國內的買主，將永具同一的價值。這時只要是兩個通貨健全的國家，便能締結十年左右的長期商約，而不致發生意外事故的危險。出口業對於國外市場也不難預先做個安排打算，而決不會因爲一種新稅率，突然發生銷路被阻的恐慌了。

謝謝金本位的幫助，歐洲各地到處都已把長期的關稅協定制度的恢復起來，有如戰前一樣，國際貿易之日趨繁榮是可預卜的。

可是這種制度卻附帶着一種危險。譬如法國與英國約定對於英國鋼鐵，每若干分量，課以一法郎的關稅，但後來又與比國約定，對於比國鋼鐵（與上相同的分量）只課以半法郎的關稅，不過以比國減輕法國酒類進口的稅率爲交換條件，在這種情形下，顯然是比國在法市場上佔了優越的地位，而英國鋼鐵實際上不啻已被摒諸法市場之外。英法雙方爲應付這種意外，大概都要預先在商約上加上一個條款，約定締約者雙方中之一方，如果對於第三方承認較本約所規定之稅率爲更低之稅率，則應將此較低之稅率，自動地承認於締約者之他方。這種

條款，就叫做「最惠國條款」。這種條款並非要阻撓締約國保護本國的工業，不過要讓她對於外國工業一律給以平等待遇而已。

但各國有時把這種最惠國的待遇予於甲國，而不予於乙丙等國。於是乙丙等國都覺得自己受了損害而不要取報復手段，因此就有「貿易聯盟」組織起來，加以政治上的同盟關係，國際間的情勢便越來越複雜了，所以關稅戰往往會成爲軍事戰的序幕。要免卻這種危險，除非各國自動地在各種稅則上，對於其他各國一律予以最惠國的待遇（要保留訂約的自由是不待言的），別無他法。這就是威爾遜總統所宣布的商業自由之原則。商業和平乃政治和平的先決條件，但歐洲只有把上述原則做爲基礎，纔能享受商業和平。

但以上依然只是一種粉飾太平的辦法；我們的理想是要在各國之間樹立絕對的自由貿易。各國應各選擇若干種工業做爲她所專門從事的工業，選擇的標準是成本最低而出品最良；同時，向國外購買，亦應選擇價最廉而物最美之出產地——這是大有利於消費者的，蓋唯有消費者纔是國民利益的真正代表。保護貿易主義使得各國勉強支持種種不自然的工業，並須爲之找尋種種不自然的銷路，例如殖民地，保護國，以及所謂勢力範圍等等。這就是一切帝國主義戰爭的根本原因，所以如欲建立永久和平，非竭力提倡自由貿易不可。

要把自由貿易，馬上推行起來，顯非實際政治所能辦到，蓋許多受保護的企業將因此而立刻倒閉，其結果，各國均將陷於激烈的金融恐慌與社會紊亂。可是我們如果採漸進的步驟來推行牠，那就確是可能的了。只要各國在締結商約的時候，約定每五年，或十年修約一次，每屆修約之時，即將保護貿易的種種設施廢除一部，直至漸漸

將牠完全廢除爲止。這樣一來，那種種不自然的工業，便有餘暇把牠們的機械設備加以改造，以便改從他業，或設法清理牠們的資本，使牠們漸即於消滅，而不致惹起猛烈的動搖。這種工作是留給二十世紀來做的。蓋此時之商約制度，對於把最惠國的待遇，平等普施於一切外國工業一點已有適當之保障。但即便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外貿易依然難免要像一條千折百曲佈滿環壩的江流各處水平高低不一，不過上面設有許多水閘，只須繳納通行稅，（這種通行稅對於通行者待遇均等）便可通過。這種辦法誠然還是免不了貿易之遲滯，成本之增高，但至少還可以確保貿易的秩序，不致叫牠遭受意外的危險與風波，卻是可以斷言的。果真如此，則較之現有的情勢已是進步不少了。

如果於上述辦法之外，再設法把鐵路運價加以調整，把納稅手續加以簡化，把航行券的制度根本取消，則經濟國家主義對於國際貿易的障礙，縱不能全部撤除，至少也減輕一大部分了。把上述種種辦法即：一切商約之均以金本位爲標準，關稅稅則之平等，以及航行券之取消——合用起來，便可保障旅客、貨物和資本的自由流通了。

國際市場既經用上述辦法加以擴充，德國賠款便不難依照杜威斯計劃而順利地劃撥過來，如此則大量的國際借款，將可根據那一百五十億的定期年金而實現出來，以便做復興歐洲的聯合工作資本。沒落的國家將因此而恢復其購買力，各國工業的失業問題亦不難由此而解決，各國間的貿易將立可恢復常態。此乃迅速回復世界繁榮及使世界經濟相依律循其常軌之唯一辦法。

促進「相依關係」的各種機關

同時，我們還須設法阻攔各種帝國主義和國家主義，不要使牠們再把這個複雜的機構加以破壞。帝國主義和國家主義雖然闖了大禍，但二者竟能經大禍而猶存，並且繼續牠們的工作，因為牠們既受了有力的黨派與世俗的傳說之擁戴，又受了極端侵略主義的熱情之鼓舞。這種熱情，在戰敗國，則正因其戰敗，在戰勝國則又因其勝利的妄念而益加劇。

若欲使國際間相依的關係能夠排除萬難而存立的話，非得特別設計種種永久的機關，以便控制時常要逸出相依關係的各種勢力並調和各方面矛盾的利益不可。但迄至現在為止，這種工作一向都是留給政府去做的。無論那一國，都是把對外的經濟關係付託給外交部長去處理，把對外經濟的談判，交由大使或書記官做居間人去進行。這乃是一種不幸的習慣，不僅無成效之可言而且充滿了危險性，試看最近各種國際會議之屢告失敗，就可不言而喻了。

一般外交界的人物無論由其出身或訓練上說，都不適於處理商務。他們不負任何個人的責任而且養成一種習慣，對於商家或製造家的利益總是持一種傲慢輕視的態度。誠然，照最近的習慣講，外交官的左右常有一班「專家」跟隨着，但此項專家都是他們自己選擇的，他們不一定總能了解專家的意見，反之，對於專家的忠告卻常常置之不理。而且他們又只知對政府與國家負責。在他們的眼光中，國家的立場和黨派的精神總應該比國際

的需要占優先的地位。人們對於他們的評判只是看他們對於國家有什麼特別的「貢獻」至於所謂貢獻，對於世界和諧的精神有如何的影響，就非所問了。如果過了一些時候，所謂「貢獻」會由有利於國一變而為有害於國，人們又總是要歸罪於隣邦的惡意，卻沒有人想到把負責交涉者和所用交涉的手段加以考慮。

復次，各國的政府和官吏照例總是要把整個的國家機構，尤其是海陸軍包攬在他們的掌握之中。他們動輒用政治的壓力來解決經濟的困難，於是商業上的糾紛會一變而成爲軍事的衝突；例如，法國之佔領法蘭克福（一九二〇），來因海港（一九二一）和盧爾（一九二三）；意大利之轟炸科佛（Coffe）以及英法爲其背景的希士戰爭，無不如是。用政治的手段來處理經濟的事件，由國家的立場來解決國際的問題，不僅是大錯特錯，而且是世界上一切民族一個永久的危險。試看那屢欲實踐凡爾賽條約而屢歸失敗的三十二次外交會談，不是已經給我們不少的證明嗎？由此可以明瞭：藉外交手段來處理經濟事項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反之，大銀行，大實業，大商店的領袖們，他們所時常注意的總不外是原料，銷路，資本……等等問題，所以他們對於世界經濟相依問題的了解要清楚得多（較之外交界人物）對於此項問題之技術上的與件，和解決此問題之實際辦法要熟悉得多。因爲他們如果作錯，他們自己馬上要受損失。在商業上，作錯了就要受破產的制裁；商人不堪受這種制裁，因爲他們的利潤要因此而受影響。而且他們又沒有公衆的勢力可以任意支配，不能用暴力來強行他們的方案，所以他們總是傾向於妥協或和平的。

要求官府出而干涉商務，要求得最起勁的反倒是商人自己，這誠然是由來已久的情形了。他們時常出入達

官顯宦的會客室，時常提拔他們的親戚到政界去供職，又時常利用新聞的策略去運動國會。可是他們巨擊當局會談和軍隊示威的屢告失敗，已漸漸明瞭這種辦法是錯誤的。他們已經飽受經濟恐慌的痛苦，飽經政略鬭爭的折磨。因為受了失業和其他種種的損失，他們已經深知如欲解決切身的問題，惟有自尋解決的辦法，並且再也不想倚靠政府的幫助了。

國際商會之經濟仲裁

就在這時候，國際商會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或略寫為 I. C. C.) 纔開始爲人所注目。國際商會是一九一九年秋季，由美國的幾位巨商建議而創立的。這些巨商對於凡爾賽條約和其對商業所生的惡影響，深感失望，又深致懷疑於國際聯盟，認爲國際聯盟過受英國的操縱，他們於失望懷疑之餘，知道威爾遜總統所計劃的工作已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決不會得到上院的批准。另一方面，他們卻又深知合衆國對於歐洲的事情不能不聞不問，因為歐洲是她最好的主顧，同時歐洲也得靠美國的資源纔能救牠自己的窮困。

各國政府困於國家自利主義 (National egoism)，又渴望着攔得霸權與平均勢力，決不能夠把自由的世界貿易恢復起來。這是凡爾賽條約已經證明的。所以這班巨商便決定商人們應該超然於政治體制之外，而把這種事業擔承起來。

恰巧這時候，英、法、比、意四國的重要工業領袖都集會在阿特蘭替克城 (Atlantic City)，商討恢復貿易的

辦法，他們（美國巨商）便乘機提議要創立一個國際商會。他們的設計是打算仿照合衆國商會的組織。牠的組織是這樣：參加這個總會的一切銀行家，製造家和商家，一方面既是內地商會的會員，同時又以個人的資格，直接地參加這個總會。總會會址在華盛頓。凡有關全體利益的事體，都用全體投票的辦法商決之，以便個個人都得貢獻意見——這確是祛除地方分立主義和確定全體共同的營業方針的一個好辦法。

如果他們所設計的那個新機關果真採了這種代表制度，則人們因此或許能夠超乎國家敵對的成見之上，而另有一種較為廣大的眼光和利害的觀念，並由此而達到合力改造全世界的目的。可是歐洲的商人卻仍深囿於經濟的國家主義；他們提出了與以上相反的提案，主張各國的銀行家，製造家和商家應各自組織自治的國民委員會，而僅僅把國際商會做爲大家集會之所。最後，這兩派成立了一個妥協案：決定國際商會的組織。應以製造家，銀行家和商家等等的團體做爲正式會員，但商業界的領袖亦得以個人資格加入。此項個人會員可以出席大會，甚至亦可參加討論，但沒有表決之權。各國的國民委員會有是認或否認國際商會的候補代表與選任理事會之權。牠們可以在巴黎的會址各派一常駐代表。如果不是世界各國商人的接觸使得他們不得不認識相互間的依賴關係，則這個國際商會所具的國家精神定會較牠所具的國際精神更爲有力無疑。

起初，國際商會的態度是很謹慎的，牠只把減輕貨物自由流通的技術上的困難引爲己任。牠曾努力改革關稅手續使臻簡單化，並規定種種程式，如 Café Tob 等之意義，蓋因種種遲延，糾紛以及訴訟，往往皆以此爲其起因。但要想使各國的政府與議會改革牠們的法規，總是很麻煩而且困難的。於是國際商會就設立一個仲裁法庭。

此法庭係由許多專家所主持，凡遇案件之發生，經其當場與以調查後，立即有迅速之判決，既無官場惡習，又決不敷衍了事，故商家發生爭論，與其訴之國家法院，反不如訴於此仲裁法庭之簡捷便利。因此，商家們漸漸都知利用此法庭而在他們的契約中加入請由國際商會仲裁一條。國際商會便就這樣漸變為國際商務上的最高法院了。

自是以後，這個新機關便漸漸地擴充其活動範圍。一九二一與一九二二年之間，德國的出口商人雖因紙馬克之貶值而大發其財，但德國卻因此而陷於困窮。而且紙馬克貶值不只妨礙賠償的支付，且使得具有健全通貨的國家之工業受其妨害，因各國之工業均將受德貨傾銷之苦。於是國際商會為制止德國之匯兌傾銷，恢復所有工業之機會均等起見，便着手研究怎樣使德國恢復金本位的問題。在一九二三年三月羅馬會議席上，便已將解決此問題之根本辦法決定。其計劃係推選一專家委員會，此專家委員會將超然於各國政府之上，負研究上項問題之責任，完全撇開國家的利害觀念，純然以恢復各民族間經常的關係為其立足點。在六個月之中，國際商會之美國委員會不斷地催促華盛頓政府提倡此事。卒之一九二四年一月此專家委員會便在巴黎召集開會，加此會之分子多為國際商會中之著名商家，如阿文漾 (Owen D. Young) 魯濱孫 (H. Robinson) 皮瑞釐 (Alberto Pirelli) 阿貝爾第 (Marso Alberti) 等人。

杜威斯計劃之成立，可說全然是國際商會的功績。誠然，即在國際商會之中，意見亦復紛歧不一。例如法比兩派之會員，因該國政府深受佔領盧爾之牽累，便往往有抱逡巡猶豫之態度者。但經國際商會之創辦人而兼會長的克力孟托用雄辯的口才指點出來：「如果他們自己和新世界的同僚分離獨立，物質上精神上都有種種危險」

之後，他們便放棄了反對的態度。各國政府因見商界之意見已趨一致，便亦只好讓步，連榜卡累（M. Poincaré）都表示默認了。於是國際商會卒能在國際問題之解決上，佔舉足輕重之地位，而牠之至此地位，既非靠官府之命令，又毫不憑藉任何威力，純然憑着牠的辦事能力和牠所代表的利益關係之重大。

杜威斯計劃實行了將近一年（註二），德國的金本位恢復了，預算也能收支適合了。德國出口商人再也不能倚仗匯兌傾銷政策（這是貨幣膨脹的結果）做爲他們的發財捷徑了。斯丁內斯大托辣斯，因基礎之不穩也將有倒閉之危險了。（註三）德國的競爭能力已經被人減削到容許「大家均有機會各展所長的」限度，走向經濟和平的第一個步驟算是已經做到了。

可是現在又有一新問題發生出來。德國的賠款支付已然按部就班地交付於賠款總監督了，但是如何把這筆賠款撥交給債權國呢？若把價值二百五十萬萬金馬克的德國貨，一下子傾銷於國際市場，果能避免可怕的物價恐慌而不損及各國的工商業嗎？這確乎是一個極困難的問題。若把這件事任聽各國政府去自行處理吧，又恐怕牠們將各與德方訂立特殊的協定，而儘可能地使他國受德貨交付之煩累。其結果將不免使敵對的工業越發加劇其間的鬭爭，而致國際間的緊張情勢越發緊張。

國際商會對於此問題會加以調查與研究，並且完全拋棄政治的觀點，而純以如何獲得國際匯兌之圓滑作用爲研究應採之立場。各國政府對於該會之各項建議或將再予以接受，果如是則各債權國將可安全收受賠款而不致有損及國內生產事業之危險。

經過三十二次外交會談，及各國大使與首相屢次會商而屢告失敗之事件，今竟經一私人機關之處理而卒獲成功，並將重要的改造問題之一與以深切實際之解決，此誠為破天荒之成就。此可慶幸之結果，所以終於獲得，由於以下各項原因：各國間之利益關係，不再為分隔離立之考慮，此其一；國際事項受相約定律之支配，此其二；各政府對於此事雖難免不等閒視之，但商人卻因迫於破產之危險，故無論有何偏見，抱何烈情，都不得不把牠加以考量。

於是一種新法式陳於我們面前。那種「以政治的及國家的手段來處理經濟的及國際的問題」之舊的法式，在以前固然也曾盛極一時，但至現在，經濟職能及政治職能既已分而為二，便只好由不同的機關來處理牠們。久而久之，則經濟上的交涉將不得不脫離國家代表之手。我們現在得把經濟加以俗化，一如從前俗化政治一般。關於領土上和軍事上的協定，固然仍要留給外交家去辦，但商業問題就應該完全委之商人了。到現在，事實已經證明：經濟與政治之分離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經由國際商會之手而辦成功的杜威斯計劃，堪稱為一個新時代的起點。

國際勞工局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或略寫為 I. L. O.) 之社會仲裁

但僅靠國際商會還不夠，因為牠純然是企業領袖的一個集團，若把討論國際問題的責任完全付托於他們（企業領袖）也許會很危險。他們所最關心的乃是自己企業的成敗，所以他們或許爲了要增進自己的利益而

不惜損及賺工資者和一般的消費者。因此僅恃國際商會也許會造成一種國際寡頭的獨裁政治，雖然免了商業戰爭，但卻代之以階級鬭爭。所以國際之間，還得有一種特殊的機關，好於經濟均衡之外，設法實現社會均衡。我們現在已經有了這樣一個機關，那就是國際勞工局。

這機關也是因戰爭而發生的。在大戰進行之中，爲獎勵戰壕中及工廠中之工人起見，便不得不允替他們謀地位之相當改善，例如減少工作時間，規定最低工資以及替他們設立意外保險，失業保險，及疾病老年保險等等制度。凡此都是酬勞他們所蒙的犧牲。

當大戰告終，協約國獲得最後勝利之時，各大工業國的政府又突遇一種難局：蓋數百萬尚未解除武裝之兵士，都在渴慕一種新生活的開始而要求政府履行戰時的諾言。各國政府勢不能規避各自之義務。但另一方面，勞工人數較少而又無完備勞工組織之其他國家，卻不難擱置或竟規避社會改良之要求。此兩種國家，若在國際競爭場中，互相比較起來，則前種國家的地位顯然要相形見絀，而愈是熱心社會進步的國家，愈有遭受最重大的打擊之危險。所以一切國家在社會改良之進途上應該都採取一致的步驟。因此，經大工業之要求，便在和約之上，加上一個第十三編，這一編的內容是關於勞工之國際組織的。

談判和約者深知若任聽各國政府自行整理各自之勞工立法，則民治色彩較淡之國家，爲圖利於本國之工業家，或竟將一切社會改良事業擱置不問，所以這樣辦是很不相宜的。因此，他們便決定：勞工之國際組織，除國家之代表外，還得加入工人代表與雇主代表，工人代表對於社會改良是一定贊成的，而雇主代表，只要所有的企業

都負荷同樣的義務，對此亦不會加以反對。其結果，便組成一個異常巧妙而富有創造性之國際勞工組織。

國際勞工組織之大會 (General Assembly) 是由國際聯盟之會員國各派一代表團組成的。每一代表團內，有工人代表及雇主代表各一人。但雇主與勞工或許聯合一致而贊成一種過分之改良，而置納稅者與消費者之負擔於不顧，為免除此弊，便加入政府代表二人，蓋認為這兩位政府代表足以代表一般公眾之利益，適當於締結契約者之第三人。並為尊重國家主權之原則起見，雇主及勞工代表亦均由政府推舉，不過為確保代表之獨立不倚計，代表之選定，須經最為模範的各種職業協會之同意。

每個代表對於任何問題都有表決之權。表決權以人為單位而不以國為單位。所以各國的工人藉此便能團結一致，以與各該國的雇主立於相對立的地位，更進一步，工人雇主亦能互相團結以與各該國的政府代表相對抗。因此，各代表團之份子便不難盡力避免國家自利主義 (National particularism) 的色彩而積極發揮國際間的連帶作用，這是任何政府所不能辦到的。

大會以三分之二之多數表決通過各種計劃與建議，各國政府縱然反對，亦不得不於一年或十八個月之限內，將此項計劃與建議提交本國議會。而且國際勞工局對於各國之施行已通過之方案有監督指揮之權——這不會把國家主權之原則加以嚴重之侵犯。如果發生嚴重的破約情事，這個組織的任何份子均得向那永久的國際法庭請求傳喚破約的國家，然後由國際法庭決定應採之經濟制裁。

這誠然是一個大膽的改革：把職業的元素和政治的元素放在平等的地位之上，這要算是頭一遭；其用意是

要把前者用作一個對稱刀來牽掣後者，並且以發揮經濟相依作用爲過進之鵠的，不惜把國家主權加以侵犯。不幸，因爲克雷孟梭、魯意佐治和俄南它三人的國家主義色彩過於濃厚，致使這個組織的動作受了種種嚴格的限制。第一是在將任何社會改良計劃加入議事日程之前，須先取得各國政府之同意；各國政府都有否認之權，而且除非是大會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決定將此項計劃提出討論，各國政府的否認權必須尊重。但一經大會通過之後，各國政府即須提交本國議會請其批准。如議會不予批准，則政府不須再負任何責任。如經議會批准而政府奉行不力，則永久之國際法庭得建議對破約者施行相當之經濟制裁。但各國是否採行此項建議則完全聽其自由裁奪。

總而言之，國際勞工局本身上具有多少不相稱的特徵，如同凡爾賽條約一樣。國際間的要求總是不及國家自利主義來得有力。這適足以說明爲什麼該局的諸領袖很賣氣力而所得的結果總是不免於令人失望。在五年之中，各國政府提請各該國議會批准之案件不下八百件之多，而結果獲得批准者不過纔一百五十七件。於此可見國家的因子對於職業的因子有着何等的節制力量。可是我們也得承認：近年以來，各國受了經濟財政上恐慌的襲擊，其毫無辦法的景況正如社會改良所受私營工業的阻礙一般。

不寧唯是，照該局定章，原來只計及工業勞動者，範圍亦未免太狹；後來經過許多難關纔把農業勞動者加入在內。可是此外還有智識界的勞動者，如工程師，自由職業者等等也都應該加入定章的範圍之內，還有，對於合作運動也得給以應佔之地位。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然後該局纔能把生產上消費上一切的因子兼容並包，纔能實

現一切階級合力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之希望，並可使各國不致因求本國社會立法之進步，反在國際競爭場中受到不利的阻礙。

雖然如是，但日內瓦的這個機關仍足以表現不少的進步：在國際場中，牠把各種職業組織與各國的政治權威放在對等的地位，藉此想出一種有效的辦法，使今後的社會立法不再為狹隘的國界所範圍。從此以後，一切國際問題，凡是經濟方面的，便由國際商會負責去研討，凡是社會方面的，則由國際勞工局去推敲。這兩個組織立於平等對立的地位，經濟因素將不再比社會因素佔優勢。

國際聯盟之政治仲裁

這時候，儘管職業聯合有迅速的發展，可是在國際關係上仍然是政治機關，國家機關佔上手。

國家的主權依然是最高無上的，如同農業文明時代一樣。凡爾賽條約把被壓迫的民族解放了，但因此卻給了牠們一種危險的禮物——經濟自主；這條約增加了國家的數目，同時也就是增多了衝突的危機。因此要調和各國間的利益，仲裁各國間的糾紛，就非有一個特殊而永久的機關不可。這機關也是早已存在的，牠就是國際聯盟。

依照威爾遜的理想，這機關應該是一切國家的一個民治式的會合，在這機關之中，大國小國一切均將處於平等的地位，並能遏止帝國主義的危機；一切事件均取決於多數表決；（註四）國際糾紛亦均交由強制的仲裁機

關解決之；任何國家如違犯條約而侵略他國，則將由國際聯盟用封鎖、抵貨之方法甚或以武力制裁之。

不幸威爾遜的計劃被人弄得支離破碎。第一是凡爾賽條約把戰敗國摒諸國聯範圍以外。其次是弱小民族被人看作無足輕重的角色，雖然因為美國取迴避的態度，使得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動自由受了不少的牽掣，但真實的威權仍然操在列強手裏。為遵照主權的原則，理事會對於許多事項非經滿場贊成不得通過，且任何國政府皆不受其他各國政府決議的拘束。既沒有強制的立法機關，又沒有獨立的執行機關。理事會只能向各國建議對某國施行陸地或海上軍事制裁，至各國採納與否，那是各國的自由。所以自從國際聯盟成立之後，牠的職務雖然確乎很有用，但總是被人視為無足輕重，距離滿足各民族的希望與和平的要求尚差得很遠。

但國聯的地位確已漸漸穩固起來。各國政府，在先以為國聯這個機關，足以損及她們的主權，便都抱敬而遠之的態度，可是現在已經漸漸覺悟過來，知道單靠自己，無論何國也不能達到恢復元氣的目的。她們已然明瞭：如要重新建立本國的通貨、預算和工作資本，非在國際市場上舉借巨債不可。但舉債的先決條件是要看國際局勢的安穩。譬如說，阿姆斯特丹或紐約的金融界，堪薩斯的農人，以及伊里諾斯的牧畜家，在決定認購公債之先，無不希望將來本利有按期清還的擔保。他們很知道：如果他們的錢被借債者用於整理因過度軍費而虧折的預算，那末，這筆錢將如石沉海底一般。他們也很明白：小小的內亂或軍事佔領，將立刻使得他們所有的證券在一切交易所中紛紛跌價，結果，必牽累得他們的營業不振。在許多國家都已陷於破產與經濟恐慌之後，投資者便都躊躇不前了。他們先要求國際和平能有穩固的擔保，纔肯替歐洲籌措所需的復興基金。

凡此種種，各國當局都已明白了。現在各國的內閣總理紛紛蒞臨日內瓦，種種「草約」和「盟約」都在苦心推敲之中（註五）。各種仲裁的方式亦在計劃之中，而各國的態度又好像是準備服從似的。現在的問題不是限制國聯的職權，卻是怎樣謀國聯職權的擴充了。

但各國對於上項努力，依然不免抱冷淡的態度。各國政府仍為一種恐懼心所支配所阻撓，唯恐失去牠們些微的主權。可是上項新趨勢的發展已經漸漸顯明，這一點是很可慶幸的，准許德國加入國聯的希望即將成為事實（註六）。而最近美國銀行家會議又復宣言美國即將加入國聯。今後不久，各國均將有代表出席日內瓦國聯大會，戰勝戰敗國的區分業已撤除，世界各民族的大聯盟出現就在目前。

從那時起，小國的勢力就漸漸增加，五大工業強國現在所佔的優勢，將日益薄弱，而各國間經濟相依的意識，亦將隨商業與金融關係之漸復常態而日漸增長。國際聯盟的權限將慢慢擴充到更重要的問題，而各國對牠的決議將日益重視。凡此都是歐洲現在需要國際信用所將招致之結果；如國際局勢不能保證安全，各種公債便都無法發行。政治的仲裁已然變成一種經濟上的需要了。

各國對於國聯將不再抱敬而遠之的態度。國際商會中的專家們，常常與國際聯盟的經濟部合作。他們在苦心推敲杜威斯計劃和恢復德國支付能力上所盡的職分，誠然可稱為至極重要而又賢明的工作，現在很少有人把他們這種工作看作是侵犯國聯職權的舉動，而認為這種工作足以加強日內瓦大會的活動力量者反大有人在。另一方面，國際勞工局在職務上本就是與國聯相關連的。這三個機關的活動範圍雖各不同，但最後的目標，同

是實行國際仲裁。不過國際商會的領域限於經濟方面，國際勞工局的領域限於社會方面，而國際聯盟的領域則限於政治方面。

發揮國際間相依的作用，現在已經有了相當的機關。I.C.C. + I.L.O. + I.N.——就是將來的公式。這三個機關就是合力復興與世界和平的三個柱石。

世界主義 (Internationalism) 與和平主義 (Pacifism) 都太抽象

不過我們決不要認為這種演化作用是可以自動實現的。無論什麼制度都是被動的，惰性的。惟有藉着大思想潮流或主義的推動力量纔能促其成長。如果任其自然，制度就將成爲靜止的而終於傾毀了。

直至現時會有兩個偉大的運動，在爲了實現國際的相依與和平而不斷奮鬥着。一個是社會主義的世界主義，一個是中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卡爾馬克思，追隨着聖西蒙的見解，把十九世紀中葉盛行的工業革命確定爲一種國際現象，他相信資本的集中將使中等階級不復存在，其結果必造成兩個對抗的階級：一個是靠收益生活而不作工的資本家階級，一個是靠工作生活，既無收益又無儲蓄的無產階級。所以各國的無產階級須得拋棄國家的界限，互相團結，以便對抗資本家，結成堅固的團體以便維護自己的權利。就是要把那按國家而劃的縱的分界拋棄，而代之以按階級劃定的橫的分界。在貧富這兩個國際之間，就無所謂國家了。要達到和平的目的，只有由一個階級用暴力把另一階級壓服纔行，而且這種活動非得世界一致不可。

可是這種二元化的理想，現在看來，未免覺得太粗率太簡單了。在那只靠些微工資而勉強生活的無產者，與那毫無生產而靠收益生活的資本家之間，還有無數的中間階級存在着，而且現在大多數的勞動者也有儲蓄的機會了。那巧妙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機構使得他們也能成爲大企業的「共同所有主」了。反之，公司董事，對於創造財富的貢獻並不下於勞動者，他們雖然管理着巨額的資本，可是其中屬於他們所有的，不過一極小部分。因此如果把資本一概沒收，由大眾的眼光來，看與其說是解放，還不如說是掠奪的好，至少在先進國家，事實確是如此。蓋有價證券之發明與一般人之養成投資習慣，使得財產的所有決不平等的各社會階級之間，發生了有力的連帶關係。

例如，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德國的社會黨人，因感連帶關係而與本國的工業領袖攜手者，不計其數，都只爲工業領袖在經濟上所獲的對外勝利，使得他們得到了較安適的生活。後來，協約諸國的社會黨，也追隨德國的先例，羣起而擁護本國資本家的政府，藉以對抗國外同志。甚至俄國雖然建起無產階級的政權，但仍不能把各國的社會主義統一起來。不光是如此，如果馬克思的公式見諸實行，其結果必然以社會鬭爭代替國家間的戰爭，在建立世界和平上，這種辦法確乎是太笨了。

和平主義的基本理想完全和此相反。牠承認一國之內的各階級間有連帶關係，並把獨立國 (sovereign nations) 看做和有自治力的個人一樣。牠的目的只於要在各國之間建立一種法律上的關係，如同一國之內的公民都受同一法律的支配一般。國際之間要有一個法庭，專負施行國際法的責任，所有的國家都受同一國際法

的支配，這個法庭還得要有能力實施各種必要的制裁。至於怎樣纔能使各國之間發生這樣一種社會關係，和平主義者對此所用的手段，是純粹以民主政治機關所原有的理智力量爲其憑藉。

不幸各國的民主政治，在長久的不安之中，爲國防的思想所蒙蔽，各國政府總是以那不穩的平均勢力爲念。情勢稍有危險的時候，便把理性和法律完全丟開，而只是受「生存競爭本能」的支配；各國的議會亦完全爲一時的感情所激動，和平主義派以建立法律的統治爲理由而主戰，而世界主義派則以「以戰止戰」之理由而主戰。一九一四年的時候，這兩派的人無不是甘心受本國政府的驅使而絲毫不敢有反抗的表示。

然則這種毛病究竟由何而起？這單祇是因爲以上兩種主義都只含有一部分真理。社會主義派固然了解國際連帶的原則，但僅只是從那過於單簡的階級鬭爭的觀點上了解的。他們把中等階級和地域關係的力量太看低了。至於和平主義派呢？他們對於國家的力量雖然知道與以適當的估價，但他們又不能明瞭國家間的連帶關係，除非是只在那純粹形式的法律規定的範圍之內，或者尙能明瞭一些。前一派的理論建立在不妥當的社會情形之分析上面，後一派的理論建立在太抽象的政治和法律觀點上面。兩派都不曾信賴經濟團體。

那種發揮國際相依關係的各種機關，我們如果望其發展，必須要靠各種職業協會的力量纔行，因爲牠們的力量是較爲完備而具體的。

表現經濟相依關係的職業協會

首先籌畫把一工廠內的工人團結起來，以便合力應付雇主的威勢，而保持工人的工資者就是工團主義。等到各工廠內的工團都已組織起來之後，漸漸地，凡屬同一行業的工團就會互相聯合起來而組織各種聯合會，如同礦工聯合會，金工聯合會以及木匠聯合會等等。同時，一個城市裏面的各種工團，爲了應付本城的當局，而感覺到共同的利害關係，於是大家也會團結起來而組織勞工介紹所 (Labor exchanges) 與本城的總工會。

因此，凡是加入工團的勞工，會同時感覺到兩種連帶關係，一種是對於國內一切的同業工人，一種是對於本城內的他業工人。最後，把所有的各業聯合會和所有的地方總工會兼容併包而成爲一個總組織的，就是那勞工總同盟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這個總同盟乃是代表以上兩種關係的一個頂完備的組織。

漸漸地，雇主方面的組織也有同樣的發展。例如，在法國，所有的鑄鑪與鍊鋼廠都聯合起來而組織一個『鍛冶委員會』 (Comité des Forges)，所有的造船廠亦聯合而組織一個『機械聯合會』 (Fédération de la Mecanique)。同樣，鐵路材料，軍火，水力，汽車製造各業也有同類的組織。此項同業聯合會又互相聯合而組成一個『冶金採礦工業總會』 (Union des Industries Metallurgiques et Minières) 此外，與此同類者還有『煤礦業委員會』 (Comité des Houillères)，『船主委員會』 (Comité Central des Armateurs) 以及羊毛絲業，化學工業等等的委員會。最後，此項委員會，又聯合而組成『法國生產事業總同盟』 (Confédération Generale de la Production Française)。此總同盟代表全體雇主，一如勞工總同盟代表全體工人一般。

在英、美、比、德等一切工業國家之中，勞資雙方的組織，都有同樣的發展，不過名稱與組織略有歧異而已。尤

其是德國，此項組織已採官辦形式，叫做帝國經濟公會（Imperial Economic Council）。

可是到了大戰的時候，勞資雙方的組織，便到處要受國家疆界的限制。只於勞工方面，曾有國際鐵工聯合會，國際五金勞工聯合會之組織。至於雇主方面，在關稅壁壘的保護之下，各國的雇主組織便成了對立的形勢。休戰以後，因經濟恐慌之勃發，迫使各國雇主愈發要依靠國家來保護自己。但是外交與軍事上的失敗使他們漸漸知道國際間同業的關係，不得不設法調整一下。他們的進行步驟很是審慎，最初只是靠國際勞工局來解決社會問題，靠國際商會來解決經濟問題。

現在，他們更進一步而想靠直接的接觸來求互相瞭解了。例如土木工程界，及毛織工業，絲織工業界都曾召集國際會議。企業領袖們，雖然沒有忘記個人間與國家間的競爭，但各門各類的企業都漸有團結的傾向。譬如說，國際銀行業聯合會的形成已在吾人預料之中（一九二一年倫敦的專家會議業已倡議組織發行銀行聯合會）。而倫敦的五金業公會（Institute of Metals），紐約的石油業公會（Petroleum Institute），羅馬的國際農業公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已都在設法使全世界的同業間成立永久的聯絡。

因有此項組織之故，企業界的領袖，漸漸知道把他們自己的業務看成一個總體的一部分，漸漸明瞭種種世界問題，非要靠大家的通力合作不能解決。於是人們對於世界相依關係的認識也就漸漸地清楚了。

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之綜合

這種相依的認識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因為復興問題，基本上就是一個心理問題。光是利害關係相一致還不夠，必須有關係的團體明白知道牠們之間的利害一致纔行。

即使要把極少數的幾個人團結起來，都還有很多的困難——而且不用說，每個人對於他自己的特殊利益是格外留意的，他知道：如果出了什麼錯，他馬上要受到直接的損害。那末，如果我們的問題是要把所謂「國家」這一大羣的人團結起來，其困難更不知道要多到如何的地步了！因為在這個場合，集團的利害關係，其範圍太過於寬廣了，每個人單靠他自己的經驗，幾乎不能對於這種關係有什麼明白的估量。個人與個人間的關係好像是蜂羣裏面的幾個蜜蜂一樣。當一羣蜜蜂已經在一條樹枝上建起一個堅固的蜂巢，而與他們的近隣發生了友愛的關係，他們便安然地過他們的生活了。可是全體蜂羣是時常在移動着，而蜂巢也會時常變動牠的形狀或地位。就在這時候，蜜蜂們便要亂動起來，牠們不知道樹枝的本身是微微地在那裏擺動着。

社會變化的基本原因往往在我們出生以前早已就存在了，而牠的結果要綿延到我們死後很久很久。要把握社會變化的趨勢，非得深深地回顧過去，遠遠地展望將來不可。但是個人沒有工夫做這種探討的工作；當他看到任何變化而覺得茫然無所適從的時候，便只會歸咎於左右的隣人，於是全體的人羣便要擾亂起來，或是空做一些沒有結果的工作。要使人羣能夠了解變化的環境，適應變化的環境，非有一個特別的機關，如同人身之有視聽器官一樣，然後纔能把握住那個很慢的事態進化。

經濟的相依是最近纔有的一種現象，牠的歷史不過一世紀之久；牠還沒得到餘暇來替牠自己創造一架記

錄機。因爲沒有適當的機關，牠只好權且利用政治上的工具，蓋政治工具是早已有的，而且人們又總是遵守那最小阻力的定律，因此便把「國家」當做相依的機關。也正爲此，纔有那混亂而不調和的各種組織，把人羣弄得分崩離析，永久陷於集團鬭爭的苦境之中。

每種職能都應該有牠自己的器官。無論在生物學上，或是在人類社會的進化上，都是以這句話爲進步的要義。最初是城市，其後是國家，都會被人利用做一種工具，藉此使得一般公民認識他自己的地位。但是此項工具，久已不能再做爲現代人的完全代表物了。個人的經濟行爲，現在需要一種工具來表現他自己了——牠很自然地，在職業協會裏找到了這種工具。

從這種見地來看，工團主義的理想頗有教育上的價值。工團主義以人們所最關心的問題：即「職業」爲其出發點，因爲人們自己和其家庭的生存，都是靠職業爲其擔保的。在工團裏面，在國內或國際的工團聯合會裏面，每個人都可以獲得一種連帶的感覺，把本國以及全世界與自己同從一業的人們都網羅在這種連帶關係之中。同時，在地方工會裏面，各個人又可以獲得另外一種連帶的感覺，把本城中或本鎮上屬於其他各種職業的人們通通包括在這種連帶關係之內。

工團的領袖們（不管他是勞工還是雇主），當其在工團的階級上步步陞遷時，他們對於團體利益的眼光便會愈來愈寬廣。等到所有的工團聯合而組成一個介乎國際與各種職業間的中央機關時，他們對於工團的整個利益便可以得到一種意識。所有工團都受這中央機關的主宰與支配，牠有如脊柱中的神經中樞或高等脊椎

動物的腦髓一般，就連那頂下級的細胞都能把牠的意象傳達於腦，並接受腦的命令而聽其指揮。誠然，民主政治國家的組織也曾發生過同樣的效果。但公民被國家的體制所限制而不能出其範圍。反之，工團中的份子，無論其為勞工或雇主，智能職業者或金融家，都已超乎國家的範圍之外，可是他並不破壞國家。工業革命使企業極端地專門化，其結果，人類的行為，無論在國與國之間或職業與職業之間都有了互助相依的關係。

譬如有兩家企業，所業的種類相同，牠們的機械設備，原料來源，海外銷場也都是大體相同，不過一家在法國，一家在德國。在某一些方面上，牠們的國際利益是彼此共同的。牠們同時經歷過同樣的恐慌，也同時享受過同樣的繁榮。但唯其因為所隸國籍不同，於是在運輸，勞工，資本，財政立法或關稅政策等等事情上面，牠們所處的地位便完全不同了。牠們必須和本國的其他企業相一致，纔能改變各種條件。

所以各國都有一個介乎各種職業間的代表機關，正如各種職業都有一個國際間的代表機關一樣，二者的重要是同等的。這兩種代表機關決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補充的。提倡職業組織者所抱的見解一方面和社會主義者所主張的國際主義有別，因為牠並不拋棄國家，一方面又和中產階級所主張的和平主義不同，因為牠也不否認國際主義。牠把二者綜合而成為一體。

由職業組織而達到世界聯邦之完成

職業組織，一方面以國家為單位而有其縱的組織，他方面又以職業為單位而有其橫的組織，活動於兩方面

之間，牠雖超然於國家之上，但毫不損及國家。牠使得「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能夠同時得到雙重的意識，一是對於國家的利益，一是對於國際的利益。這兩種意識雖是相反的，但同時也是互相平衡的。而且不僅在社會團體中是相平衡的，就是在個人身上也是如此。二者的平衡乃是和平的第一個條件。

要使經濟的相依關係充分地實現出來，最合宜的工具，再沒有比得職業組織的了。不但如此，職業組織的基礎並不是建立在什麼資本主義啦，什麼權利啦等等的抽象觀念之上，而建立在一個活的現實之上，所以牠本身，原就含有一種活動的力量，能使牠所寄托的各種制度永居於一種變化的狀態之中。等到各種國際團體（例如工業家，商業家，銀行家，智能職業者以及勞工等等的國際組織）漸漸地增多起來，國際商會便可以獲得更大的力量來支配各國政府了；國際勞工局也不會因為各國政府批准各種協定的延緩而受阻礙了；國際聯盟對於各國也可以握到更為有效的威權，而把戰爭的主要原因設法消弭了。此外，利害關係的調整，立法與關稅的簡單化與統一化亦可因此而得到很大的便利。等到各地都已恢復金本位，各地的關稅壁壘都已漸趨穩定與減低，資本與貨物便可以自由地，順利地流通於歐洲全境而不至受到阻礙了。

各國之間既已一掃經濟上敵對的關係，於是國際商會在國際間之地位，便如美國的各州間商業委員會(American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一般對於國際間不公正的商業經營得設法阻止。在相互關係之解決上，國際勞工局與國際聯盟之地位，亦將如美國的聯邦會議，不過各國還儘可保留牠自己的立法，行政，和教育制度以及種種的風俗習慣。那永久的國際法庭，其功用亦將如華盛頓的最高法院，成爲一個控訴法院

的樣子，對於所有國家，將能以威權臨之。

從那時起，北美合衆國看見歐洲聯邦完全依照她們自己的模型組織起來，將毫無遲疑地加入這個共同的機關，於是全世界的經濟統一與政治統一將不難於繁榮與和平之中建立起來。

以上所說，決不只是我們心理上的一種烏托邦的觀念。好似大建築的基礎已經建好，建築的架構已具規模，機器和材料也都準備在那裏。什麼東西都不缺少，只於我們還不能看到罷了。解剖學家能夠指示給我們知道：一個小孩子的乳齒之下，一排食齒已經粗具雛型在那兒。我們的眼雖然還看不見他這一排食齒，可是牠們已準備長出，而生命的力量會促使這排食齒漸漸長成，最後把乳齒擠掉。將來的國際制度也正和此一樣，現在牠也是粗具雛型了。雖然我們的肉眼還看不見，但牠們已經排列在那兒，職業團體的力量會漸漸地迫使牠們出現。牠們的破卵而出雖免不了要經過一番苦惱與阻力，但經濟需要的作用天天在那裏督促牠們出世。在人類社會生活中，一如在物理界一樣，自然之前進，決不是跳躍的。亦如生命之本身一樣，和平乃是一個『綿延的創造』(Continuous creation)。

註一 誠能有些人對於杜威斯計劃是否能繼續推行表示懷疑。連賠款總監督吉爾伯先生 (Mr. Parker Gilbert) 都曾在國際商會的大會席上宣稱德國未必能照約如數支付賠款，他的理由是：德國恢復金本位之後，致使各種生產費一般地增加起來，結果德國的經濟地位大形墜落。但我們無妨設想，即使僅以現在這樣有限的賠款支付額做爲發行國際公債的基礎，其結果仍足以促進各國對於德國的購買額，因而使其租稅收入增加並使其運輸機關忙碌。所以德國雖然替人家準備下舉債的基礎，但牠本身亦將因此而受益。

註二 這句話是一九二五年寫的。杜威斯計劃的施行，至今已將近三年了。

註三 當這篇稿子寫完之後，斯丁內斯大托辣斯已經倒閉了。

註四 有時甚至要三分之二的票數。

註五 當此稿寫成後，羅迦諾公約業經批准施行了。

註六 德國之加入國聯是在一九二六年。

結論

由主權的多神教而至經濟的一神教

根據上文冗長的分析，兩件事實明白顯露於我們面前。就是：國際貿易機構之復元，與其經常秩序之恢復，乃一件極重要而又迫切的事情。就其本身而論，這件事並沒有什麼不能勝過的困難；只要靠普通信用借款的辦法，就可以把牠完成，而且以現在的世界資源而論，決不是辦不到的事情。如果一切國家都肯努力合作，有如一箇城市裏的市民釀資辦理種種公用事業（如自來水，瓦斯，或電車事業）一般，馬上便可以把牠完成起來。

這問題是屬於心理方面的

不幸各國對於國際連帶關係還沒有獲得清楚的認識。創立並管理各種國際機關（如鐵路，航線及電報等）的個人與團體屬於不同的國籍。他們爲了本國的利益，不惜把所管理的那一部分國際共有的機關任聽本國利用，即使此舉會把他國犧牲亦在所不顧。他們既抱這種見解，自然會慫恿本國政府儘量利用種種手段如關稅，外交，兵力，來壓迫他國而防衛本國。

目前我們所遭遇的問題是經濟方面的與國際方面的，但我們卻竟要用政治的與國別的手段來解決牠。在

過去六年之中，世界各國空耗了許多力量而一無所成，其原因即在於此。困難之發生，由於我們把事實加以誤謬的解釋，種種障害並不在事情的本身，卻在於我們對於事情所抱的觀念，所以都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物質上的。（註一）這是一個新的事實，各國和各國的領袖人物似乎還沒有領悟。現在需要加以改變的不是客觀的環境而是我們主觀的見解。譬如現代世界所以會有種種驚人的進步完全要歸功於現有的國際貿易之經濟制度——如果任其自然，牠自然會恢復牠的常態。反之，卻是我們的主觀見解，把經濟制度弄得不能發揮牠的原有作用，這是因為我們的主觀見解固於傳統的觀念而不能適合於現代的種種環境。

當我們對於自己所目擊的事情加以評判的時候，往往要犯一種眼光短淺的毛病。我們對於一件禍災，只知道考察其極近的原因。譬如說，我們要給大戰的原起加一個解釋，我們會對於塞爾維亞與奧地利亞決裂的事件，加以極詳密的分析；對於德國動員先於俄國動員幾小時，或後於俄國動員幾小時的問題加以冗長的討論。關於各國派遣大使，或各國參謀本部的決議也能加以仔細的考察。有些人甚至要把提札（Count Tisza），或伯特曼和爾味（Bethmann-Hollweg）或易茲瓦爾斯基（M. Izwolski）的打算或計畫加以研究。其眼光較遠者，至多也不過把一九一二年德國在軍事上所做的種種準備，或一八九八年以後，英德在海軍上敵對的形勢考察一下而已。可是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大戰的根本原因，在親眼看到大戰的人還沒有誕生的時候，老早就已經存在了。

我們常常以己身生命的長短做為考量時事的一個尺度。但是國家的壽命是要延展到幾世紀之久的。每一世代的開始，都要把前一世代的種種制度與思想全盤承受下來。新世代之順應於舊制度與舊思想者，較之舊制

度舊思想之順應於新世代者爲多。國家結構的變化，都只是極其遲慢的——而人們之覺察此項變化，尤其要遲慢。譬如一件化學上的發明，一件地理上的發見或一種新的政府制度，在歷史對於牠們有了記載之後，非經過二十年乃至五十年之久，牠的結果（或影響）是不能全部推演出來的。譬如把戰爭比做一齣悲劇，現在的戰場上正在進行着的爭鬪好似這悲劇的第五幕，牠的前四幕早經我們的老祖宗扮演過了。

我們觀察時事應該以歷史做爲觀察的背景。惟有這樣，纔能夠在那不可逆料的逸事奇聞和那表面上好似很紛亂的事件背後，看出那緩緩的時勢推動的力量（各國和她們的領袖都要受這種力量的支配）——也惟有如此，纔能夠因既往而逆測將來。只有歷史能夠燭照當前的混沌；我們需要靠歷史來解釋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不到一百年之內，人類營謀生活的狀況竟會全部改變了。

基本的結構已經改變了

若拿現在來比拿破侖第一的時代，一切都改變了，即使是一雙鞋的製做法，一疋布的紡織法或是一畝田地的耕種法，也和那時大不相同了。

一百年以前，工業的專門化還在極其幼稚的時代。小工業間的相依關係不出乎一鄉的範圍，大工業的相依關係也很難超乎一省的範圍。那時國外貿易還沒有發達，除了奢侈品之外，沒有其他的交換，而奢侈品乃是可有可無的，即使沒有牠，也不會影響及於社會組織。所以那時的國家很可以看做一個握有自治權與主權的整體，實

際上，國與國之間是沒有什麼依賴關係的。

可是因為機器發達的結果，在兩三個世代之內，所有這一切情形都已經改變了——到今天，世界各國沒有那一國還能夠維持自足自給的境況。爲了食糧，原料以及銷場的關係，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不倚靠他國的。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與其他各國脫離往來的關係，而不致失掉物資的來源與土產的銷場，其結果亦未曾把她自己毀滅的。就經濟方面而論，由第一法蘭西帝國起到現代爲止這四個世代之內，世界所發生的變化，較之伽圖（Cato the Elder）以後的二千年之內所發生的還要大。

如此迅速的一種演化，按道理應該使得內政與外交上的諸種制度都發生許多根本的變遷纔對。但是政治家與一般民衆不容易馬上就看清楚這種需要。自從開天闢地的時候起一直到現在爲止，歷史所昭示給牠們的景象，只是許許多多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大變革；從來沒有給牠們看見一個突然而且整個的經濟變化。羅馬帝國以後，技術上的進步雖然不能說一點兒沒有，可是那只是很希罕，很緩慢的而且只限於很小的地域。政治制度的適應作用，向來都是不慌不忙的，枝枝節節的，決不會改變牠的基本原理——誰也沒有見過一種機器發明的結果竟能迫得人類社會改變牠的政治理想或社會理想。所以當十九世紀的大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對於當代的種種制度與理想絲毫沒有什麼影響。例如，即以法國而言，她的人民依然生活於拿破侖的法典的制度之下；她的行政制度依然和在三總裁制政府之下一樣；她的民主政治制度依然以盧梭的理想與見解爲其精神；她的外交政策依然以勢力均衡爲其出發點，和黎塞留與塔力蘭（Talleyrand）的時代一般無二。

在一世紀之中，任何國家的基本結構都已完全改變了，但是牠們的政治的上層建築，實際上卻一點兒也沒有變化。其結果，二者之間愈來愈不能夠維持均衡，到最後非發生劇大的變化不可。到今天，我們遭了大戰的災禍，又無力恢復和平的局面，纔知道那社會機構已然是不穩了。

我們要應付這種局勢，必須於以下兩個途徑之中選擇一途：或是把新的經濟力量拘束在舊的神話的體制之內，或是把那政治神話加以改變，而使之適合於經濟力量的發展。

我們應該把現實置諸神話的下位嗎？

事實應該遷就理想呢？還是理想應該遷就事實呢？看來也許好像很奇怪，當代的人大都承認頭一問是對的。可是我們須知精神世界一如物理世界，也難逃惰力定律的支配。羣衆大都好用傳統的理想來解釋目前的事實。凡與大衆公認的理想不相符的事實，他們很容易把牠忘記；他們心中所時常銘記的，只是那些足以證明公認理想的事實。代表羣衆的政治家也是時常抱着種種偏見，和他們所代表的羣衆沒有什麼分別，即使他們不把這些偏見拿來利用，他們也決不願公然反對牠們。沒有一個人不是遵循着最小阻力的定律。甚至連那些不相信神話是什麼絕對真理的人們，也會認為社會上非有神話不可。

大家都覺得神話能夠建立一種不可少的社會結合力；並覺得牠能夠獲得大衆的同聲承諾而使各種制度得以順利地發揮牠們的職能。倘把神話毀滅就不啻將使社會組織解體而陷於無政府的狀況。所以神話的存在

好像是公衆福祉的一個條件。也就因爲這個原故，神話纔帶上了一種神聖的色彩。無論何人，倘敢觸犯正在得勢的神話，便成爲褻瀆神聖的罪犯，犯了侮慢法律與上帝之罪——這種人是應該打倒的。於是國民的理想便有了。一種不可捉摸的神氣，有如一種信仰一般，而且擺出了絕對不妥協的架子，好像一種宗教上的神話：要信徒們去更改所信仰的神話，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那末，他們會不會做阻撓機器的發展的打算呢？在十九世紀中葉，確會有一些「保守家」認爲這種事是可能的。他們竭力反對把鐵路延長到鄉村中去。他們以爲鄉村建築鐵路的結果，將使農民的生活狀況因之改變，新的理想將灌輸於農民的頭腦，並且以爲機器的發展將使舊日的傳統神話根本動搖——他們這種見解確是不錯的。但是他們一旦見到新的制度可以使他們的收入加多，可以使他們所有的土地增價一倍，於是個人的利益就戰勝社會的偏見了。以前對新秩序持異議者，現在反變成頂熱狂擁護新秩序的人了。他們竟然要求增築內地的鐵路線，並願採用農業機器了，於是工業的專門化就漸漸普遍了。

經濟進化所以會有不可制止的力量，原因卽在於此。每個社會細胞都把追求更大的幸福做爲頭一個目標。等到大家都已覺得機器有種種直接的利益，必然紛紛都要求採用，這是自利的本能在暗中迫使他們不得不如此的。到今天，如果由於科學的研究或是工程師的技巧，使得技術上有了一些進步的可能，沒有一個生產者會錯過這種機會的。如果因爲同樣的原因使得社會福利有增加的可能，也決不會有任何消費者甘願放棄這種福利的。因爲假如不是這樣，則世界將陷於退化的危境，現在這種事是決不會再有的了。

可是人們雖然承認「機器」、「專門化」和「企業的相依」這三件事是有益的，卻不情願看見三者出乎國家的範圍。他們覺得如果一個國家，爲了種種必要而不可或缺的物品，（不管牠是食品，衣料，燃料，運輸工具，或是機器）就不得不倚靠他國，則這個國家將不能維持完全的獨立或握有完全的主權。所以他們的目的是要把他們的國家做成一個完全獨立的經濟體。他們對於國外產品既然採了閉關政策，於是便不得不在國內獎勵種種不自然的產業——好像冬天在暖室內培植的花草，離開了保護關稅，這種產業就難以存在。

有了保護關稅，人們竟然以爲一個國家就能夠靠牠的幫助而生產天時地利不容牠生產的物品。這種辦法未免太笨了，消費者本來可以用賤價向國外購買的物品，現在卻硬要他花高價買本國的出品。不僅太笨而已，並且是極端荒謬的，因爲只靠關稅的力量，決不能使波司（Peru）生長棉花，使本無石油井的地方，天上掉下石油井，使可供五年採掘的煤礦延長到十年。法國雖曾在保護政策上，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但結果仍不能使本國的穀物產量足供本國的需要。在經濟上說，現在還沒有那一個國家是可以自給的。

當時，一些較大的國家便想出一種與此相反的辦法。國家是不妨專門化的，不過須得用征服的手段，向外吞併一些土地，藉以補充本國生產上與各種工業上的不足。這種辦法不是在國界上樹起關稅的壁壘，因而妨礙企業的相依性，卻是要把國界的範圍擴充到企業的相依性所需要的那樣大。在一世紀之中，一切國家都徘徊於「經濟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兩種理想之間。

不管是經濟國家主義也好，是帝國主義也好，都把本來有益的企業競爭弄成了國際鬭爭的形式，關稅戰爭

引起了外交上的糾紛，銷路的尋求變成了殖民地的征服。終歸會有一天，世界各國的經濟利益，相互發生了極深的聯繫，以致兩個大國之間如果發生戰爭，影響所及非使其餘各國盡行捲入漩渦不可。其結果便是遍及全世界的一個劇變，在這劇變之中，戰敗者固然遭殃不小，就是戰勝者也是同等的遭殃。這就是世界大戰所給予我們的重要教訓。

還是神話應該順應於現實呢

少數人目睹這樣不幸的結果，心中便會發生疑問：招致這樣的結果的那些「主義」（或理想）是不是需要經過一番修改呢？他們考量的結果，便會認為：理想世界中的一切東西也是要進化的，如同物理世界一樣；而且歷史也曾昭示給他們：在若干世紀之中，不僅是一切制度，就連作為一切制度之基礎的一切理想也都經過一番變化了。那國家神話，固然也和在地以前的一切神話一般，曾經是社會團結和政治進步的一個有力的因素，可是現在牠是不是已經到了一種行將消滅的境地呢？如果到了這種境地，牠的作用便不能再有什麼好處了，牠用以範圍一切社會單位的那個狹小的體制再也不能適應人類的需要了——這便是少數人心中這時會有的疑問。

於是那神聖的神話便開始成爲人們批評考察的目標了。這種事情並非最近纔有的，也不是純然屬於破壞方面的。當第二、第三世紀的時候，羅馬帝國漸漸變成大地主們所操縱的一種寡頭政治，爲了支持雇傭兵制，不惜向人民征課愈來愈苛酷的捐稅，而且這種兵制的擾民也是日甚一日，這時基督教的神父們便對於帝國的制度

與作爲牠的基礎的那種異教的神話加以批評的研究。他們把羅馬的一切的制度，那些是應當保存的，那些是不妨破壞的，加以極詳盡的分析——好像經過他們這一番巧妙的整理之後，世界上並沒有損失什麼。

過了十三個世紀之後，那確會替人類盡了不少職務的封建制度又一變而成爲中等階級要求和平與要求安寧的一種障礙了，於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人們便對於此項陳舊的制度，大膽地加以懷疑；他們的努力，在那時雖然遭受當局的苛待，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切教科書裏，卻稱揚他們對於人類進步會有很好的貢獻。又過二百年之後，那曾經有過控制封建貴族的功勞的專制王國，卻又一變而成爲人類難堪的重累了，於是十八世紀的「哲人們」便開始對於君主的神權說加以批評，這種學說在以前的時代曾經是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教義。這班哲人們的作爲，在當時的政府當局看來，固然是犯了褻瀆神聖之罪，但是由現代的人看來，卻又是我們獲得種種自由的先決條件了。

那末，經過了世界大戰的可怕的試驗而我們之難望獲得和平又已瞭然之後，那國家神話是不是又到了應該加以破壞的批評的時期呢？

民族之保留

這並不是說應該把牠破壞。住在一塊廣闊的版圖上的人們，有着同樣的語言，風俗和習慣，在現今這幾乎是走遍天下都可看到的一個既成的事實。無疑，這只是經過人類最近的努力纔有的一個非自然的（人爲的）結

果；因為事實不是像一般人所設想的那樣：種族是國家的來源。反之，卻是因為人類有集聚而成爲國家的必要，纔迫使生活於同一塊疆土內的人們不得不有同樣的語言，風俗和習慣，因此他們纔生出共戴一祖的幻想。但不管牠是人爲的，還是自然的，民族的統一性現在已是一件事實，而且是一件好的事實。在以前，因為方言，習慣和規律之歧異，大的企業無從發生，現在卻因為民族之統一而大的企業得以自由發展了。

到了今日，大的實業已然超出國家的範圍。生產的種種技術條件之趨於劃一，與各國間貿易關係之頻仍，有使一切國家的風俗習慣與法律趨於一致的傾向。但是爲了增進人類的幸福起見，各種特殊的語言，與各民族的特點是絕對不必消滅的。譬如，以完全統一的法蘭西而論，保留各省的特色，決不會礙及該國的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同樣，保留了哥德，莫里哀或莎士比亞的不同的崇拜，也決不會阻礙「歐羅巴精神」之形成。

復次，一種社會神話決不會整個地死掉。誰都知道：在基督教獲得勝利很久之後，還有好多種古時的多神教繼續存在着。希臘的哲學和羅馬的行政對於基督教的倫理，哲學與種種制度會有很大的貢獻，也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封建的階級制度較之宮廷的貴族政治有着更長久的壽命，直到封建的城堡式的邸宅毀滅了很久之後，依然存續着，就是在現在的民主政治之中，也還留有牠的遺跡，譬如像貴族的爵位——又如如現代共和國的種種制度與習慣之中，依然留有專制王國的種種遺跡也是無法否認的。

每一種神話在歷史上都會有過一個全盛時期，在此時期之中，牠確是進步的一個因素；可是一旦牠的全盛時期業已過去，牠便遺留下一種好似沖積層的東西，以便下一代的神話據此而生根。不過當一種神話已與現實

不合的時候，牠那已然腐朽的部份和那仍應保存的部份究竟要怎樣識別呢？

第一是這種神話支配人心的絕對性，定要首先失去。不管人們怎麼說，國家理想既不是康德的一種範疇，也不是一種自然的力量。國家理想的產生在一百五十年之前，牠代替了君主理想，正如君主理想之代替封建制度一樣。人們對於歷史往往不惜大膽地或無意識地加以閉門造車，他們硬說路易十四，佐安阿克，菲力普與古斯都，甚至連克羅維斯都已有「國家的」成見，如現在的人一樣。但事實上，國家神話之普及於世界，是十九世紀間的事情，因為牠對於新的人類集團好像具有頂適宜的精神團結力。牠不是一種目的而是一種手段。牠並無什麼絕對的性質，正如一切人事一般。牠的產生既由某種需要，便不得不隨這種需要而消滅，而變化。牠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用處」(Utility)。

國家主權之撲滅

站在這樣的立場上來看，那被人誘之於國家的主權，就好像已經變成一個危險的東西了。

我們可以設想一個單一的統治權，亦即一最高的威權，駕乎各國之上而充做牠們的仲裁人，一如國家之駕乎個人之上而為其仲裁人一樣。我們這個設想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確保永久和平的一個至要的條件。在上古，羅馬曾一度實現過這個單一的統治權。中古的時候，皇帝與教皇都會為他們自己打算而試圖把這個單一的統治權恢復起來，可是因為缺少迅速的，長距離的交通工具，他們的企圖未能成功。於是便採了間接的途徑：就是後

來的王國；王國對於制止封建戰爭確有充分的力量，雖然牠們的活動範圍各有廣狹之不同。王國對牠們的子民儘管主張統治權，但卻不許在牠們本身之上還有什麼統治權。其結果就產生了那個多元主權的混成制。

如果兩個人或是兩個國家一旦宣言都只對自己負義務，甚至連牠們自己的簽字，都不能夠再拘束牠們，那時，牠們之間便只有「力」的關係，一切契約，條約都將成爲廢紙了。這種觀念雖不必表之於口，但是外交家總會把牠見諸實行的。現代文明把個人的「拳頭之權利」(Right of the fist)奪過來而轉給於國家。所謂多元主權者，其含義就是：一切國際關係都要受支配於「野蠻人的法律」；強者的臂力就是公理；在現代的國家之間，依然存續着那種野蠻狀態。

這種制度所以能繼續存在數百年之久，實際上是因爲：(1)一國裏面的各區域，各省份依然過着一種獨立的經濟生活；(2)戰爭的損害只限於軍事活動的區域；(3)勝負的結果對於人民的生活狀況不會加以顯著的改變，即使支配他們的統治權已然變更。

可是到如今已經沒有一國還能保持自足自給的狀態。倘若一個國家的生活所需，一部份要倚賴外國的穀物，棉花，毛質，煤炭，石油等等，一旦失掉國外的幫助，這國的人民將不僅不能工作，即衣食所需亦將感覺缺乏；那末，儘管有什麼頂莊嚴的宣言，牠還是不能把她自己看做完全自主的。不但如此，往往連她自己的國防都不能全靠自力。例如，速射礮，特種炸藥以及飛機等等都要有一種很複雜的機械設備，和很大的資本纔能製造，唯有七大列強纔有這種力量。其他國家非得這七大列強在工業上金融上與以幫助便不能對外做戰；如果不得到七大列強

的同意，她們將陷於攻守均不可能的危境。所以在事理上，他們只不過好像這一集團或那一集團的一個「傭兵隊長」(Condotiere)；她們行使國家主權，實際上也只限於選擇她們自己的主人而已。

只有那幾個能夠製造軍器的大國纔能算是有完全的主權。反過來說，她們之間的相依的關係，卻又和她們工業化的程度成正比。她們如果互相爭戰，非把一切「補充的」國家盡行捲入漩渦不可，因為必須倚靠這些「補充的」國家來供給她們所需的食糧與原料。其結果便構成影響全世界的大戰：一切國家利用她們所有的一切資源來摧毀一切的生產工具。結果唯有使失敗者滅亡，勝利者也難逃於困窮，而世界文化亦非整個地沒落不可。

曾有一百餘年之久，國家主權一向都是替個人或企業做一個無上的安寧擔保，可是現在反成爲二者的致命傷了。這是因爲經濟的相依關係把國家主權弄成一個社會的禍患了。

經濟與政治的劃分線

但如果國家一旦失去了主權而仍要繼續存在的話，牠的威權應當在那一點加以限制呢？

我們把事實加以分析便可明瞭在一切國家之中，那基本的經濟構造和那上層的政治建築之間都已發現了一個裂痕，把二者劃分，恰好應該在這一點上着手。

一般人都知道：當國家神話降生的時候，法國革命就已經把這兩個的範圍明白地劃分了。國民對於國家須

絕對服從，但國家對於生產者卻給以完全的自由。只有影響到財政制度的利益時，國家纔能干涉企業。否則企業不受任何干涉與任何阻礙。國家決想不到要保護某一種特殊的工業或某一家公司。國家所最關心的只是維持商業競爭的平等和盡量發展各種企業的特色。在經濟的事情上，任何人都是完全享到自由的好處並且完全擔負自由的危險：這就是所謂放任主義（*Laissez-faire* *laissez-passer*）。如果一任企業的極度專門化，工業制度定會把這個信條加以發揮而把牠擴充到國際關係上去。英國最初所信奉的當然也是自由貿易主義。倘使那時機械的發達同時普遍於全部歐洲，則這種主義將會獲得世界的承認是無疑的。

不幸各國的大工業都是慢慢地成立起來，而發展的期間也有先後之不同。所以後進的國家不得不靠關稅壁壘來保護自己，好防禦先進國和自己競爭，而先進國於是也不得不出於報復的手段。牠們慢慢地就都訴之於國家的威權，於是國家便開始干涉工商業的一切部門。政治與經濟互相融合的現象就是如此發生出來的——最初只是無意之間而且做爲一種臨時的手段。

這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無關乎歷史上的定數；所以我們儘管可以把這兩個原素（政治與經濟）分爲兩開，而不致使二者受到什麼嚴重的損害。試看北美合衆國的四十八州，其政治的自治權雖受有限制，但不失爲真正的自治。只要牠們之間互助諒解，不設關稅壁壘，不採歧異的運價，或不同的幣制，便能各自過着和平的日子，並合力實現最高度的繁榮。此外，如巴西的聯邦，瑞士的行政區和德國的各邦都是相似的例子。

同樣，法、德、意或塞爾維亞諸國也可以在立法、財政和教育方面儘管保留完全的自治權，但不妨共同一致先

把她們的關稅壁壘由安定而漸進於撤除，並且把幣制重建起來，使與黃金發生固定的關係，最末，再把運價劃一起來。這樣一來，歐洲一切的國家，立刻就能過和平的日子，無論那一國也不用拋棄她自己的語言，習慣和特長。因為經濟與政治不僅根本上並無相連繫的必要，而且二者融合的結果反產生了歷史上空前的大難。所以把二者設法分開就是我們的福利。一任各種社會力量遵循牠們自己的特殊發展的法則總是一個無上妙法。無論是「社會進步」還是「技術進步」其涵義都是要使每種職能各有其特殊的機關。

中古時代的教皇，皇帝和國王都想把靈界的威權和俗界的威權由自己一手執掌：結果就發生久無終止的爭鬪，糾紛和殘殺。到後來，靈俗二界劃分纔使宗教戰爭告一結束。同樣，我們如要使商業戰爭告一段落，也得把經濟和政治劃分為二。

抵抗力與調整

現在的世界確乎好像還談不到這一點。各國都在打着國家主義的旗號而互相爭戰，藉此好把各地的民族情緒激發起來。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使得各國的此疆彼界益發增多起來。國際貿易的機構已被打破了；匯價的動搖使得各國間的關稅壁壘越發不能安定。各國的企業界都在籲請國家的保護以便抵禦國外的競爭。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結合的密切，打破歷史上的記錄。各國都保持着只顧自己的局面。對於共同的災難，大家不想找一個同舟共濟的辦法，卻反把自己所受的危難完全歸罪於鄰邦。例如，英國的利己主義，德國的不講信義，意國的朝秦

暮楚，美國的漠不關心，法國的帝國主義，成了大家互相攻擊的口實。工業鬭爭的激烈，引起各國間的誤會，並且誘致外交糾紛，祕密同盟，軍備競爭和軍事佔領種種不幸的結果，正如戰前一般無二。我們現在所目睹的激烈的民族鬭爭，歷史上大概很難找到先例。

但是否極泰來，一種禍患愈趨極端，人們亦愈將亟於尋求弭禍之方。當路易第十四朝的末年，各地貴族的封建特權有日益增強之趨勢，「舊制度」亦大有愈趨鞏固的模樣。不料數年之後，「舊制度」竟至一蹶不振，人們雖然竭力替「舊制度」撐持局面，但結果反促其顛覆。

在過去六年之中，「神聖的利己主義」(sacred egoism)之政策只產生了令人失望的結果：那就是遷延日久的經濟恐慌，翻來覆去的政治社會巨變，國家的財政恐慌和個人的困窮，以及國內國外的不安。可是現在，各國對於「訴之武力」的辦法，已然感到厭倦，而轉想在互相讓步之中覓取解決之道。誠然，我們現在還沒有覺悟：若想實現裁減軍備的希望，非先把用以保護自己和抵禦他人的經濟武器放下屠刀不可。但無論如何，最得利於這種制度的人們已然開始注意到前途的危險了。

無論在那一國，經濟國家主義的唯一產物只有種種不自然的工業，既不適於地利，又不應乎天時，非靠關稅政策的保護即將無法支持。這種不自然的工業當然要倚靠國家的干涉政策否則不能立足。牠們藉助於國家的保護政策，減削國外的競爭勢力而擡高國內的售價，但國內消費者的購買力卻亦因此而比例地減少，結果國內的銷售額亦必隨之而降低。在報酬漸減的原則之下，牠們要想保持原來的總利潤，勢必時時要求國家增加稅率，

但結果國內售價將愈益擡高，而銷售額亦將愈益減少。所以牠們這種勾當，不僅不利於牠們自己，而且使國家亦愈陷於困窮。生活費愈來愈提高，最後勢必不免於經濟恐慌的發生，再加以社會恐慌的糾葛，則牠們所享受的保護關稅的特權亦將化為烏有。

因為匯價的動搖又產生了另外一種特權階級。做出口的工商業界，方其輸出貨物時所收回的代價是以金鎊，金圓基爾特或馬克計算的，但方其支付工資和一般費用之際，卻又以法郎或里爾計算，他們利用本國貨幣之貶值，一轉手之間，獲得巨利。在國際市場上他們竭力降低賣價，好把敵手之主顧拉過來（敵手國的幣制是很健全的），同時，卻把國內市場上的賣價擡高，與出口貨價的降低達到對等的程度。他們藉此獲得兩重利益，但國內的消費者和國外的競爭者卻同時遭受損失了。

最初玩這種把戲的就是德國的大公司，固然牠們的膽子是很大，所得到的成就亦不小。但除非該國的貨幣繼續不止地貶值，牠們的把戲纔玩得通。假如貨幣的貶值忽告停止，生活費的指數便將漸漸增加，而國內市場的銷售額亦將減少了。慢慢地國內的價格非跌到和國外物價同一水平不可，於是牠們在出口上所獲的額外利益便將化為烏有了。這時，做出口的工業，一方面因為龐大的機械設備而使資金陷於呆版的境況，他方面又遇到銷路杜塞的難關。牠們便也難逃失業與破產的恐慌，而只好乞援於外資以便重建牠們的工作資本。這就是德國的大公司冒險玩上項把戲所得的果報。

克虜伯公司 (Krupps) 和息卻爾公司 (Sichels) 現在都不得不乞求英美兩國借款給牠們了。可是五年

以前，牠們還正在開始做征服世界的工作，並且準備把牠們的敵手盎格魯薩克遜人排諸任何市場之外；曾幾何時，牠們的工廠竟不得不向外資乞憐。甚至連那龐大的「縱的托辣斯」雨果斯丁內斯（Hugo Stinnes）也瀕於倒閉的危境了——其壽命恰好似在沙漠上建築起來的一個巨廈。（註11）即使我們缺乏預言的天才，也不難預料得出：如果法比意的工業界仿效牠們會得到什麼結果。

保護貿易主義者和出口商等，靠國家的干涉和國家的誤謬的政策而倖獲得的利益，遲早會有失去的危險。試看大戰時，他們所賺的巨利，到如今沒有不是化為黃梁一夢的。至於人們因戰後的經濟混亂局面而走的幸運，其消失之速，殆亦與此相同。可見在「非常」和「例外」的上面，決難建立起什麼恆久的東西。即使是那班由非常局面而獲得巨利的人們，如果他們果然希望保持此項巨利的話，亦非準備回復到「經常」的局面不可。

當然，我們所謂回復經常的局面，決不是要用鹵莽的辦法使那正在積極運轉中的各種企業突然停頓下來，因為這樣一來勢必要擾亂秩序而召致不幸的結果，正和我們原來的目標相反。我們無妨採一種漸進的辦法，譬如說：慢慢地把法郎和里爾的價值穩定下來，好讓出口業者能有充分的時間使他們的製造事業適應於新的環境。又如保護稅率，亦可藉商約之助，先把牠安定下來，然後再慢慢地把牠撤消，以便使各種不自然的工業能有餘暇把牠們的機械設備改從他業，或把牠們的資本設法折變。但我們須要及早使各國間的經濟相關係有自由發揮的機會。任何國家不應再幫助某種特許工業排除外國的同業（無論在國內市場或國際市場）而使國內的消費者負擔無謂的損失。這種經濟戰爭，一方既損及民衆，他方又危及國家，就連那班藉此機會而獲利者也難

免於最後的犧牲。

這就是進化主義者 (evolutionists) 的主張。然則這種主張能否得到大多數人的贊許呢？我們所引為不幸者就是：這種主張和今日一班領袖人物的意趣相距甚遠。雖然這種主張很是穩健，但一班保守派還是把牠看做非常不合時宜，甚且認為含有破壞的意味。

動的或靜的保守主義

人類社會中已經有所建樹的那一部份人，無論是負了維持一個家庭或經理一種企業的責任，都比較別的人更需要安定。如果某種經濟方面的改革有利於他們，他們定會欣然承認，但如果某種政治或社會制度可以擔保他們充分享受他們的利益，而有人想把牠加以改革，那是他們絕對不能容許的。

凡各種社會神話有確保各種公共制度順利運行的效力者，倘有人對於這種神話加以批評，在他們看來，就不啻直接加害於他們，或他們本身的一種危險。最大的實業改革家往往就是最大的政治保守家。如果有尋得寶物的機會，他們定然準備着向地面以下深深的挖掘，可是他們決不願意：看着他們家中的牆壁換了地方，或甚至連家具的安排都不容加以改變。由他們來看：所謂保守就是不要動的意思；由他們來看歷史進化的最後目標就是那種使他們能夠成功的社會制度。僅到這個地步為止，他們好像在說：「太陽，穩穩地停在基遍城的上方吧！」如同約書亞所說過的一樣。不幸我們這位政治上的約書亞雖然下了命令，但太陽還是不停；經濟的力量總是在

慢慢的進化之中，無論是誰，只要擋了牠們的去路，遲早會被牠們沖去的。

塔哥 (Turgot) 曾警告舊制度下的特權階級，告訴他們說：如果希望保全他們的財產和社會威望，須得把那已經過時的特權放棄一部份。但特權階級卻把種種世俗的權利看做護身符，凡是可以支持他們的權勢的思想，絲毫不許加以變更。正因為他們逆着那不可抗的力量而行，所以他們只得眼看着特權被人剝奪，財產被人沒收；把他們送上革命斷頭臺的，正是他們自己的頑固。俄國的大公們也曾遭遇同樣的不幸。當俄國正在走向工業化的時候，他們竟敢主張保守那俄皇的絕對神權政體並想保持某種政治制度的利益；這種政治制度，在蒙古人侵入時代或曾有過種種用處，但今非昔比了。正因為他們不能使那古舊的理想適應於現代的需要，纔把他們的國家陷入革命的危境之中，同時把他們自己的特權，財產，甚至連生命也都一齊失掉了。

由古至今這種保守主義不知曾激起若干次的革命，但也不是沒有例外。英國的統治階級受過了查理一世的被殺和詹姆士二世的廢立兩次嚴酷的經驗之後，首先瞭解人類社會亦如自然界一樣，其中的事物沒有一件是不變的。於是經過了若干漸進的階段，國王把威權讓於國會，地主承認製造家有自由貿易之權，大雇主和工會妥協，母國也漸漸承認各殖民地有完全自治之權。英格蘭所以能夠保留她的帝國，其工業的中產階級所以能夠保留他們的威權，其地主與國王所以能夠保持財產與王位，都由於這個原故。

「要保守就得有進化，」這乃是歷史上千古不易的教訓。不過我們所不得不承認者是：除了英國之外，其他國家還不很瞭解這個教訓。在歐洲大陸上，一般統治階級還好像很沈湎於一種「不變」政策，可是歷史上，這種

政策不知會惹起多少禍端。那個頂時髦的社會神話即國家主權說，由他們來看，其神聖不可侵犯，一如他們祖先對於國王神權說的看法一樣。就連那紡織美國的棉花，或阿根廷的羊毛而向土耳其或中國市場銷售的魯貝或德勒斯登的製造家也都主張法國或德國是有自治權和主權的，爲了繁榮他們的企業，或竟不惜對於他們的主顧與原料供給人打仗。

在這裏，我們遇到兩種說法：一種說法主張國家神話是不可侵犯的和不變的；另一種說法主張國家神話要受種種現實的宰制而須時時與之適應。這兩派都說自己是保守的，可是一派以爲保守主義是具有不動性的，而另一派卻以爲牠是時時在變動中的。然則在這兩種保守主義，即一動和一靜的保守主義之間，我們怎麼判斷其是非呢？

相依的機關

關於這問題，我們只能依據以下的標準：一種社會制度的好壞，是要看牠對於確保個人的安全與企業的穩定究有多大的效力。只要牠能夠滿足這兩個要件，那末，牠所藉以獲得羣衆認識的種種神話式的象徵，便愈顯出神聖而不可侵犯的樣子。但社會的需要是時常在變動的，而各種制度的結構則爲固定的，所以總會有一天，二者再也不能和合一致。各種特權和弊竇在神聖的神話之帷幕後，於不知不覺之間潛滋暗長；而人們往往注意不到牠們，就因爲牠們所代表的制度和習慣會有一個時期是有用而正當的。

人們受了這種弊竇的害處，但依然抱着傳統的看法認為牠們是必要的，於是他們所希望避免的禍端，更加烈害起來；於事實的混亂之外，神話又替牠加上了心理的混亂。

由此足見國家神話現在已然到了一個危急的關頭。我們已經目睹了五年的破壞現象，和着手六年而猶未見效的復興計劃。於社會上與政治上迭次發生的大變革之後，又繼之以層出不已的經濟恐慌。什麼企業呀，貿易呀，所得的來源呀，沒有一件是安全的；人們已在渴望安定了。無論是對於個人或對於他的財產而論，最大的危險，都由於多元的主權與經濟的國家主義合併爲一的結果。

不管人們的希望怎麼，到如今全世界已是深刻的國際化了。廣闊的鐵路網和航線網把全世界的海洋和大陸打成一片；種種原料和貨品向着工業中心地大量的輸送，在那裏把牠加工而製成適合人類需要的東西，然後再運給各種天時和各種文明之下的人們使用。內地的市場，無論何時都要受全世界各地供求關係的影響；各地的價格，因有許多大規模的交易所而趨向一致；各種消息和訂貨單的收發，通通都用水陸電報傳達於各地之間；各銀行把牠們的資金盡量地投向生利的所在。無論何事或無論何人都不能置身於這個潮流之外。就連那頂孤鄙的布勒通農人，現在也是飲的巴西的咖啡，穿的美棉所製的內衣，刈草所用的是支加哥的機器，所產的黃油與番薯則以倫敦爲銷售地。好像連那頂卑小的細胞都得循着全身生活的節奏而顫動。無論是政治家們或公民們都不應再忽視這個事實了。蓋時至今日不僅由整個國家的見地來看，即使是由那最小的私營企業的見地來看也得承認經濟的相依關係是一件事實了。並且這種相依關係已在事實需要的壓迫之下，開始創設相當的機關

來發揮牠所具的各種機能了。

當大戰之前夕，一切國家都已曉得牠們那種絕對而多元的主權是會直接損及牠們自身的，不過曉得的不是很清楚罷了。牠們要求設立一個最高的仲裁機關。凡爾賽條約的起草人只得迎合牠們的要求而創設國際聯盟。他們雖曾把國際的威權盡量加以限制，幾乎到了一點力量也沒有的程度，但結果是徒然的。這個仲裁機關依然存在著，而且連那敵意最深的國家都會仰賴於牠。等到各國漸漸明瞭武力政策之無效和危險，國際聯盟的職權便一天比一天擴大，其威望也一天比一天增加。縱然有自尊自大的國家對牠持反對態度，但因為牠們沒有能力促進和平，故其結果只不過益促國際之成功而已。

同樣，一切國家也都漸漸明瞭：雇主與勞工間的衝突日益趨於激烈已經不是單獨一國的問題或各國所能隨意解決的。即使像某國政府單獨採用一種社會改良政策（不問是八小時工作日，或是各種保險或是老年恩給金）那樣一件小事吧，其結果也足以增重該國工業的成本價格，並且足以招致種種危險，而妨礙該國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所以如果要採行社會改良政策的話，一切國家都得取一致的步驟纔行。國際勞工局之組織就是爲了這個目的，蓋雇主、勞工與各國政府都想藉此調整國際間的種種差別之點。

最後，連世界的工業巨頭，以及大商家和大銀行家也都已認清國際間立法上和習慣上的無數差別乃是發展實業的一個嚴重的阻礙。現在便也輪到他們，單靠他們自己的威權來創立一個國際商會了。這也是一個以仲裁爲目的的機關。

很可怪的是：誕生於大戰時的這三個機關乃是社會中那班最保守的份子和最戀慕國家主義的那班人所創立或贊許的。不過如果一切的人都已了解他們互相間那種超乎國界之上的連帶關係，那是由於他們職業上的利益——而這乃是歷史上的一件新的事實。

生產者與公民兩種資格之對立

一種制度大概代表某些集團的要求，牠的存在便不能與此項集團分離。例如，古代的國王完全以「個人」所組成的封建集團為其基礎；而現代的國家乃是「公民」的集團，公民之結成國家，目的在於保衛那神聖的國土。大工業又產生了許多種職業集團：如勞工與農人，智識份子與國家官吏，商家，製造家和銀行家都已自行組成各種工團，同盟，大同盟等等團體。所以現在人類的團結不僅以政黨為基準了，行業與職業也成為團結的中心了。當一個人在企業或工團的階級組織上一層一層地向上升進的期間，他對於本業的利害關係便愈來愈有深切的意識，而且靠着相依關係的助力，他的眼光便可漸漸超乎國界之上。

各種國際組織，例如勞工，官吏或智識份子的國際同盟，以及國際商會都是如此產生出來的。時至今日，每一種職業團體都不得不考慮到國際方面了。所應引為不幸者，乃是牠們的份子大都還沒有進步到那個階段。因為職業教育純粹着眼於技術方面；在牠的範圍以內，決講不到單獨某一種行業在全體經濟計劃中佔什麼地位。反之，公立學校的教育又只着眼於政治方面，其目的僅在養成公民資格，所最着重的就是國家利益。結果，人們對於

他自己在世界的生產活動上究佔什麼地位或有什麼職務是無從認識清楚的。

他或以個人利益爲行動之指針，例如外國貨又好又便宜，他便毫不猶豫地購買外國貨；他或亦考慮到集團的利益（但他的眼光決不會超乎國界之外），而贊同用保護關稅保全本國的工業——但他卻全不知曉保護關稅的損失還得由他自己或他的國家來負擔的。因此一般羣衆和他們的領袖便都陷於極端的迷惑之中；也正爲此纔有那矛盾的政策，致使個人的利益與集團的利益永無和協之一天。

我們每個人都具有相矛盾相反對的兩重人格，即：政治人格與經濟人格。現在世界所陷入的恐慌狀態，事實上只是個人良知上的一種恐慌。我們須得想個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種新價值

一個社會若期望其能永久而繁榮，必得靠種種不同的制度來應合牠的各種永久的需要，但必須是各個人都明白知道這種種制度與他們自身的特殊利益有着什麼不可分離的關聯，這種種制度纔能完滿地各盡其職能。一種制度所以能夠迫使人們忍受不得已的犧牲，並使得人們尊崇牠服從牠，都要歸功於這個簡單而又明瞭的觀念。

譬如以基督教徒而論，在他們的觀念上是以為要靠某種信念，某種箴言或某種儀式纔能達到自己的得救，而此種信念，箴言，或儀式唯有靠牧師爲其獨一無二的監督者與解釋者。那羅馬教堂既不仗着土地又不仗着武

力或征稅的力量卻能保持一種很可驚異的統治權，牠所以能夠如此就由於這種精神上的力量。又如以公民而論，他們認爲「在他們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之前，一切都平等」就是他們的金科玉律。他們把自由的觀念和議會制度聯在一起，就毫無異議地忍受那民主國家之下的無數的規律的拘束。在一般的愛國者，則有那保衛「神聖的領土」的觀念；他們的觀念上，認爲個人的安全與國旗有不可分的關聯，因此就毫無怨言地忍受那苦痛的兵役和戰時可怖的犧牲。

在三個世代之中，生產者因爲他的生產活動漸趨專門化而剛剛脫離了孤立的狀態，這時他相信國家所有的攻和守的兵力足以擔保他企業的安定和繁榮。到今天，他已經覺查這種錯誤的觀念發生了什麼結果，可是他還沒有明瞭他的物質生活是要仰賴於全世界的。非得到了他明瞭這件事的時候，那已經組織起來的，超乎萬國之上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仲裁機關纔能盡量的發展。

要等到各各生產者的心中，都有了相依關係的觀念，一如基督教徒之有得救的觀念，民主黨員之有平等觀念，和公民之有祖國觀念，然後世界纔能恢復均衡的局勢。不過一般羣衆究竟怎樣纔能獲得這種意識呢？這乃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也就是凡能透過事情的表面而窺及其底蘊的人們所必須應付的一個問題。

那末，是否將有一種新的神話應運而生呢？也許是如此吧。但我們用不着期望在一些天才的社會學家之頭腦中，將有這種神話整個兒地發現出來。因爲羣衆所仰戴的神話都是自生自長的；既是爲羣衆而生，便以羣衆爲其出生地。文學，哲學和藝術只能把神話加以修整，加以發揮或加以琢磨，以便使其適於激刺人們的想像。科學和

理性無疑都是很有用的角色，前者把實在指示給我們，後者把一些陳腐的信條在一般的計畫當中所應有的相對的價值還牠一個本來的地位。二者在知識和批判上的貢獻都是不可少的，但我們不可期望單靠牠們就能夠把那些外表上好像是公衆福利之必要條件的主義與學說加以破壞或加以修正。

然則我們將訴之於「公衆利益」嗎？如果「公衆利益」是直接的，容易了解的，那末，牠的確可以做爲個人的一種推動力。但如果關涉到廣大的人羣，則所謂「公衆利益」將成爲一個很難定立的平均數，而且努力的結果乃是遙遙而不可期的，這時大批的成見和謬見將阻止所謂「公衆利益」之實現。

反之，我們如果訴之於一個開明的獨裁者之威權，那又只是一個暫時的方便手段，而且充滿了新的弊竇。不但如此，獨裁者個人的威權，一旦靠暴力建樹起來，並且已經盡了牠的恢復秩序和阻遏危險的職務，牠必然要轉而乞援於舊時已有的制度。牠唯有採納靜的保守主義纔能夠保持恆久的地位；而且助牠發生的那許多勢力愈是不穩固，則牠愈將企盼不變的局面。

然則我們將聽從舊大陸在下一世代裏面依然陷於紊亂與莫可如何的境況當中嗎？不然，我們還有一個救濟的辦法呢。

痛苦的教訓

在每一種有生物，並且在有生物進化的每一階段上都有一種不甚分明但甚關重要的力量，那就是「生存

的意向』(will to live)。這種意向大抵都是無意識的，盲目的；但卻有一種警戒的機關和牠連結在一起，那就是痛苦。如果這個有生物一旦逸出那代表健康和發展體力的線路（這線路是不可見而時常在變動的），牠便會覺得不舒服，倘若長久的逸出而不知改變，便會有一定的痛苦隨之而生，而且痛苦會漸漸增劇，直等到痛苦的刺激遍傳到這有機體的全部而迫使牠停止前進。這時牠如果還不改變舊日的習慣便將有死亡之憂。有生物之所以能夠逃避錯誤的線路，除了靠理性之外，便要靠這種生存的本能。一位法國詩人曾說道：「人好比是徒弟，痛苦好比是他的師父。」不僅人是如此，就連社會亦莫不皆然。社會也有受痛苦的時候；譬如經濟恐慌或社會的巨變，就都好像是一種警告，指示給人們：那傳統的制度已然不能適合最新的需要，而須得把那舊的思想改變一下。

在從前的時候，經濟世界好似一個水蠅；那時，每一種企業至少每一個鄉村或省份都還保持自足自給的局面，實際上各自過着互不相涉的生活，好似一個水蠅雖然棲息在一塊共同的基石上，但各部份是不相連屬的，如果基石發生裂縫，只有靠近裂縫的那一部份纔感受影響，至於全體的生命是不會有什麼變化的。但在一世紀有半的期間內，這水蠅已經變成了一種高等的脊椎動物，其各部器官已是互助聯繫的了。如果盲目的利己主義，迫使這有機體的任何一部份喪失均衡，則感受痛苦的那一部份便馬上會把痛苦的刺激傳達到一切細胞。如果全體企業界暫時呈現繁榮之象，沒有一個企業不是與牠取協和之步調而與之同時浮沉的。當整個的社會體在努力掃除有毒的病菌時，其反動力之大小是與痛苦之大小成正比例的，而且有機體愈趨集中化則其變化亦愈迅速而宏大。

到今天我們這個世界已經達到一個極端經濟集中的階段了。牠好似一個有生命的東西，鐵道與航線就是牠的脈管系統，水陸電報就是牠的神經系統，工業中心好似牠的變形器官，銀行好似牠的生殖器官。內地的交易所好似牠的神經中樞，在主要的交易所與發行銀行的支配之下。後二者又好似牠的腦子，負責調整各部分活動的責任。

一位人所未知的神祇

有一位「地神」(Geon)，寓居於人世之間。我們每個人都只是他的一個細胞，雖然我們都還不知道或不希望知道這件事。每一個份子都認為自己是獨立不倚的，與其他份子不發生依賴的關係；但如果某一個份子在那整個的有機體上惹起亂子，則後者將以報復的態度加之以懲罰。這位人所未知的神祇能把痛苦加在我們身上，迫使我們的意識上對於他不能不有個印象。

據使徒行傳上的記載，當聖保羅(St. Paul)初到雅典的時候，他看到當地的人供奉着無數的神祇，據說這些神祇能隨意把禍福降在人們的身上。他並且看到那敏明的希臘人，唯恐把任何一位神祇忘記而獲罪於神，於是便立了一個祭壇，好祭那些人所未知的神祇。保羅便對他們說道：「可見你們供奉這些神祇，全是無知無識的，我把真神告訴你們吧！」他們對於他的話毫不介意。但這位真神依然自行其道。經過了三百年無意味的騷擾與無益的殘害，他已經把一切的神靈行推倒，就連皇帝都不得不向他俯首了。

正同這種情形一樣，現代的人在多神教一般的種種國家的信條支配之下，反不知崇奉那唯一的真神；但是這位真神的勢力業已遍佈於世界的任何地方。他不管人類的希望怎樣，他鼓勵並指導一切國家的經濟活動而把那些對他不尊重的打倒。世界大戰就是他加在人類身上第一次的懲罰；這次戰爭並不是一個短時期的，可以振刷振刷人類的精神，掃除掃除人類的沉悶，限於少數的國家，並僅影響若干國家的政治組織行政組織的一個戰爭，卻是一個影響全世界，支持許多年的大戰，他毫無憐憫地加在人類身上。

人類受了這種懲罰依然是莫名其妙。當大戰時，他們暫時受了戰爭狂的刺激，僅僅做到了均分資源的程度，戰事一告停止，他們便馬上又回復到國家自利主義。於是那位真神便給他們造成了一個不合理的和平局面，這種和平局面之爲害並不下於戰爭。神對他們說道：

「現在給你們一個在經濟上統一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之中，貨物，資本和人是比較可以自由流通的，因爲阻礙比較少了。你們曾經要把這個世界分割給你們的國家之神，可是你們所獲得的結果只是矛盾的，破壞的。

「你們雖然主張民族的解放，但結果你們只能替牠們準備了幾個「走廊」的地方，靠此做爲牠們僅有的生活之憑藉。你們把一些日耳曼人合併於波蘭與捷克斯拉夫，把一些意大利人合併於猶哥斯拉夫，把一些斯拉夫人合併於希臘。你們以解放被壓迫的民族爲藉口，而增加了領土回復主義者認爲應該回復的土地。

「你們確曾把敵國打敗，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你們不得不把牠們加以圍困，以冀其滅亡。可是牠們都是你們的供給者，同時又是你們的顧客；一旦被你們圍困，牠們的供給力與購買方便都減少了。你們自己的工廠，機械設

備日益擴大，但你們的顧客已被你們圍困，以至無人向你們購買，你們的工人因此而陷於失業者，不計其數。至此你們纔醒悟：勝利反把你們自己弄得貧困了。

「你們的希望是使戰敗國賠償牠們所做的破壞，你們把重得可怕的賠款一萬三千二百萬萬金馬克加在牠們的身上。但是等到經過了五年之久的爭論與衝突，最後纔把賠款的總額與分配訂立了協定的時候，你們纔曉得：要使敵人支付賠款，便須容許牠們販賣過剩的生產品，但是這樣一來，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牠們的生產品便將與你們自己的生產品立於競爭的地位了。到這時，你們纔允許你們的敵人把應付的幾萬萬萬賠款保留一部分下來。

「同時，在協約國自己方面，富的國家亦向貧的國家索償戰時所墊的款項。但除非是債權國聽從債務國在世界各市場上和牠自己競爭生意，則債務國將無清償債款的能力。爲了避開這種危險，你們曾訂了種種妥協的辦法，把債款償付的期限拖長到許多年之久，並且把每年應償的數額減之又減，以致債權國縱然接受了債務國的還款，也不覺得負擔怎樣輕減。

「無論如何，你們的製造家都相信已能永遠避免德國的競爭了。德意志帝國的鐵鑛，最好的鎔鑛爐，一部分煤鑛以及所有的工廠，船舶，大部分的貨車，海外投資，所有的殖民地，並幾乎全部的銷路都被你們削奪淨盡了。你們並且把巨額的賠款加在她的身上，幾乎要兩個世代纔能償清。這樣，你們便以爲你們的敵人永無翻身之日了。不料德國的製造家反能利用他們本國通貨的貶值，把貨物賤價向外傾銷，你們只好眼看着德國人在世界各市

場上又復佔了優越的地位，你們用盡種種手段想把牠排出世界市場之外，不料結局反助她成功。最末，你們爲了要想排除一個危險性空前大的競爭者，便不得不借款於德帝國，好讓她恢復通貨和預算的健全。所以你們現在的舉動不啻是拿金錢供給敵人替他謀復興之道，而這敵人又正是你們千方百計想要把牠毀滅的。

「這時，你們爲要令呼籲和平的各民族滿意，便創立了一個國際聯盟。但一方面你們卻亟欲保留你們的主權，爲此不惜犧牲一切代價，因此你們便不許這個最高的仲裁機關有立法權，也不許牠有強制執行牠自己的決議的手段。不僅如是，你們把國聯會中最優越的地位只分派給勝利方面的各帝國——那最強大的帝國卻反不在國聯機構之內。」（註三）結果，各國政府只接受那些於已有利的決議；祕密外交的糾紛依然存在，軍備的負擔日重一日。列強各國把小國做爲傀儡，仍然是間接地互相爭鬪。世界大戰的目的雖在止戰，但目前一般的不安局勢，毫不減於戰前。

「這時，你們對於所獲的成就已覺滿意，並且相信世界之復興，將成爲你們獲利的新途徑，你們便奏着生產之讚美曲而跑回家去。你們把戰時替你們增加力量的經濟協定一概打破了，仍然恢復到「神聖的利己主義」那個老的信條。雖然有些國家正在努力把牠們的通貨和財政制度重建起來，但其他國家陷入膨脹政策的亦正不少。可是，不久便發生了一件反乎常情，異常可怪的事情：那通貨貶值的國家竟能以傾銷廉價貨物爲手段，而擠倒較牠富足的敵國，使之陷於失業問題的危境。於是各國爲自衛起見，紛紛把關稅壁壘逐漸高築起來。結果，國際貿易的潮流被擾亂了；實業突然萎頓了；貧的國家困於生活程度之高漲，富的國家困於失業問題。最後，幾乎無國

不窮，有的因為脫出了健全的財政計畫，有的卻又因為在多數國家的財政均陷於紊亂的環境之下，獨自恢復了健全的財政。

「經過種種矛盾的嘗試，六年之後直到今天，賠款沒有支付得了；債款也停付了或減輕了，經濟的鬭爭反一天比一天地劇烈。各國國庫都涸竭了，納稅者幾乎弄得無法生存——勝利的國家驚愕地看到她們自己仍在預備用武，殷盼着最後勝利之到來。」

「這就是你們盲目的舉動所必有的結果。還有什麼事情能更加明顯地指出：你們的方法是健全的，你們的傳統思想已經過於陳舊了呢？難道你們甘願繼續忍受這樣的災禍也不情願認錯嗎？」

「所以會弄到這樣混亂的局面，其原因完全在於你們自己。你們不情願承認那把你們聯繫在一起的相依關係，可是當你們自以為正在攻擊你們鄰國的時候，卻已經傷了你們自己。只要是你們一天不能充分瞭你們之間的經濟連帶關係，則這種情形便一天不能改變。如果理智和自私心還不夠使你們覺悟的話，單是不可抗力的作用終歸會使你們覺悟的。」

「除非等到你們已經覺悟的時候，你們將無從得到和平。除非有一天你們的經濟機構（那是你們的共有遺產）能夠不為傳統的思想所支配，你們將無從逃出矛盾的辦法與毀滅的危險，你們將受到種種的懲罰，由罷工以至破產，由失業以至饑饉，由經濟恐慌以至社會巨變，由國際戰爭以至國內革命，一直等到你們那失去統治權的國家俯首於莊嚴的事實之前為止。」

一九二四年六月——一九二五年十月（註四）

註一 這句話可做爲以下這個事實的解釋：美國的商人對於舊大陸一般人的心理不甚熟悉，所以反而很熱心地替歐洲製訂實際的復興計劃，歐洲人士對於美國人所擬的計劃充耳不聞，這種態度是使美國人莫明其妙的。

註二 當這句話寫出之後，她已經倒閉了。

註三 後來德國被選爲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大會所選爲非常任理事的九小國，現在在行政院佔了多數的地位。

註四 這本書是在羅迦諾會議之前寫出的。在會議之中列強（德國在內）已經同意把她們的國界糾紛訴之於國聯的仲裁，並同意組織國際經濟會議，俾與國際商會，國際勞工局的專家合作。世界的趨勢似乎不出著者在本書中所做的推測。